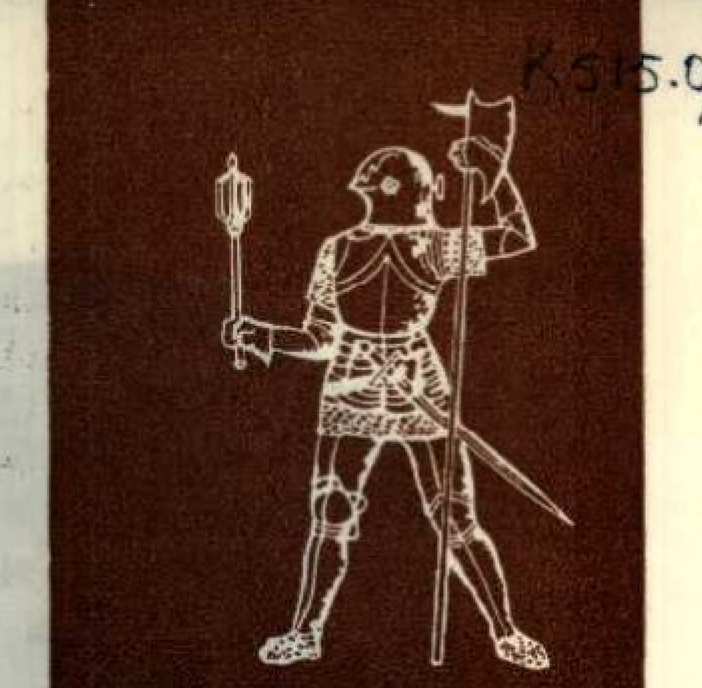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匈牙利史





匈牙利史

（匈）温盖尔·马加什
萨博尔奇·奥托 著

阚思静 龚坤余 李鸿臣 译
柴 鹏 飞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责任编辑：林焕文

封面设计：蒋　明

匈牙利史

［匈］温盖尔·马加什　萨博尔奇·奥托　著

阚思静　龚坤余　李鸿臣　译

柴鹏飞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2 12/16·插页10·字数300,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统一书号：11093·67　定价：1.50元

译者的话

这本由匈牙利"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史》从1973年第一版问世以来至1979年已印行四版，总数达几十万册，是匈牙利国内一部受欢迎的书。我们根据该书1976年第三版翻译，是我国第一本直接从匈牙利文译出的历史书。关于这本书，需要向读者作几点说明：

①书中有不少匈牙利历史地名，由于版图的变迁，这些地方现属其他国家。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一律根据原书按当时名称翻译，并作了脚注，说明现在是什么名称。同时考虑到有些读者只是阅读部分章节，因此一些较重要的地名作了多次注解，一般的地名只是在第一次出现时作注。

有些地方虽现属其他国家，但原书在解放后的历史中仍沿用过去名称。为了读者方便，1945年以后在译文中都改为现在的名称。

书中对于匈牙利国内的地名一般不作注解，但对于业已改变名称或较小的地名我们注明在哪一个州。

②匈牙利人的姓名次序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是姓在前，名在后，（如科苏特·拉约什，科苏特是姓，拉约什是名），在译文中也按照这个次序。其他国家的人名，则按照他们自己的次序。

此外，由于我国从前出版有关匈牙利历史的书籍都是从其他文字间接翻译的，同一个匈牙利人的中译名往往出入很大，我们在翻译中努力作了订正。距离太大的并作了脚注。

译名不一致的现象在外国历史人物和匈牙利人在外国作为该

不过我们认为，这本《匈牙利史》就其基本点来说，就是今天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写这本书的主旨，开始也不是想向外国读者介绍匈牙利历史，而是想帮助国内人民最广泛的阶层认识我们的过去，并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本尽管原为供匈牙利读者使用的书，但是很快在国外也引起了一些反响，根据第一版翻译的书先是在索非亚出版，以后又被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正因为这本书原为供匈牙利读者阅读，因此里面有许多概念、名称乃至表达方式以及引用的材料，对匈牙利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也许就不那么好懂了。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风尚千差万别，很多地方我们也许无法象我们主观的愿望那样使中国读者也能不费力地了解我国的历史。因此，敬希读者鉴谅！

我国历史是有趣的，它丰富多彩，充满着有时是使人振奋的、有时则是悲剧性的转折。这个属于芬——乌戈尔系的匈牙利民族受当时生活在今日俄罗斯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驱赶，来到这位于欧洲中部喀尔巴阡山群峦环抱的盆地，已经一千年了。在公元九世纪骑马的匈牙利游牧民族就是这样来到西面已有生活在比较发达的封建社会中的日尔曼民族，在北、南、东三面是斯拉夫人聚居的地盘定居。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种族和政体。在这个地区，在早先几个世纪中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多少民族流血冲突并且在政治舞台上最后消失不见，而匈牙利民族却在这里建立了国家，生存下来了，并且一直到一五二六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彻底打败为止，始终起着作用，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政治。从那以后，被经常的斗争不断削弱的匈牙利就卷入了大国争权夺利的漩涡中去，成了历经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土耳其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斗争的战场。哈布斯堡取胜以后，它作为帝国最大的民族则又陷入历经三个世纪之久的这个多民族帝国内部

致中国读者

小国人民的历史很少为人们所了解。常常连邻国对此也不甚清楚，更不用说远在另一个洲的人民了。因此，在地理上离我们如此遥远的中国将出版我们的书，使伟大的中国人民能通过拙作了解我国人民的历史，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

匈牙利人民的历史曾多次以长短不等的篇幅被很多人写过。一个半世纪以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匈牙利历史，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观点重新评价祖国的过去。现在，在我国有三部综合性匈牙利历史。一部是鸿篇巨制的通史，这是准备了多年、工程浩瀚的集体科研著作，正在陆续出版。另一部是两卷本的、近二千页的通史，在十五年中已出过三版。最短的、因此也是最普及的一部就是我们一九六二年所写的这本，它于一九六四年第一次问世以来又连续再版三次。加上一九七九年第四版，总销售量已超过二十万册。这对只有一千万人口的我国来说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了。一本历史书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在我国还从来未出现过。其实，任何地方也没有把它列入国家或党内教育的教科书来使用，它之所以畅销，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之故。

本书自写作以来将近二十年中，历史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和数据。在一九七三年问世的第二版中，我们做了少许的补充修订，主要是充实了几个有关过去时代的生活状况的资料。第三版和第四版，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未做任何改动。我们想，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对过去的一些事情，对历史上的某些部分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和探讨。但那就不是在个别地方进行补充而是重新改写全书的问题了。

不过我们认为，这本《匈牙利史》就其基本点来说，就是今天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写这本书的主旨，开始也不是想向外国读者介绍匈牙利历史，而是想帮助国内人民最广泛的阶层认识我们的过去，并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本尽管原为供匈牙利读者使用的书，但是很快在国外也引起了一些反响，根据第一版翻译的书先是在索非亚出版，以后又被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正因为这本书原为供匈牙利读者阅读，因此里面有许多概念、名称乃至表达方式以及引用的材料，对匈牙利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也许就不那么好懂了。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风尚千差万别，很多地方我们也许无法象我们主观的愿望那样使中国读者也能不费力地了解我国的历史。因此，敬希读者鉴谅！

我国历史是有趣的，它丰富多彩，充满着有时是使人振奋的、有时则是悲剧性的转折。这个属于芬——乌戈尔系的匈牙利民族受当时生活在今日俄罗斯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驱赶，来到这位于欧洲中部喀尔巴阡山群峦环抱的盆地，已经一千年了。在公元九世纪骑马的匈牙利游牧民族就是这样来到西面已有生活在比较发达的封建社会中的日尔曼民族，在北、南、东三面是斯拉夫人聚居的地盘定居。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种族和政体。在这个地区，在早先几个世纪中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多少民族流血冲突并且在政治舞台上最后消失不见，而匈牙利民族却在这里建立了国家，生存下来了，并且一直到一五二六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彻底打败为止，始终起着作用，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政治。从那以后，被经常的斗争不断削弱的匈牙利就卷入了大国争权夺利的漩涡中去，成了历经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土耳其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斗争的战场。哈布斯堡取胜以后，它作为帝国最大的民族则又陷入历经三个世纪之久的这个多民族帝国内部

国的历史人物出现时同样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辞海》的译法为准，《辞海》没有收的，则按约定俗成原则或已经出版的各该国家的历史为准。

③书内所有脚注都是我们作的。

④本书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匈牙利国内仍在继续讨论和研究，（如民族最早的起源地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此外有些政治观点也请读者在阅读时自行分析判断。

⑤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领导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译　　者



纳吉森特米克洛什地方出土的金质文物——贵族骑士



匈牙利王冠



拉斯洛一世的胸像

亚克地方的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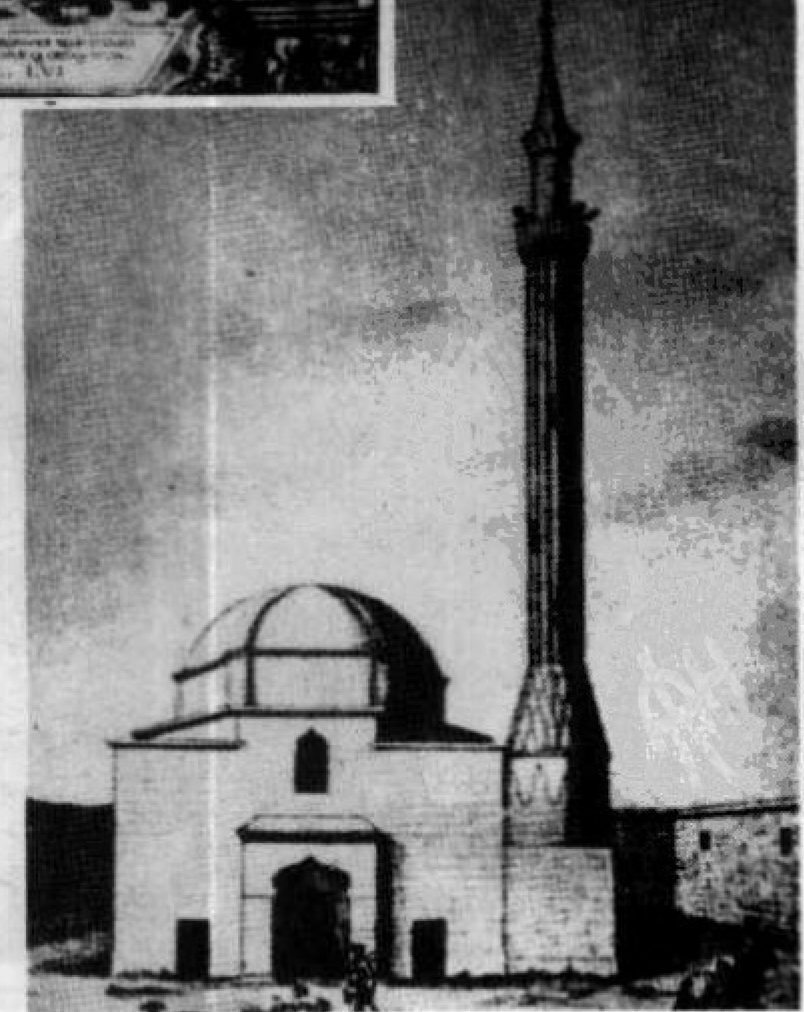
考绍大教堂



日格蒙德国王像



斐迪南一世



佩斯的清真寺



边防名将图里·久尔吉和马克西
米连国王以及奥将施文迪



纳吉松鲍特大学



库鲁茨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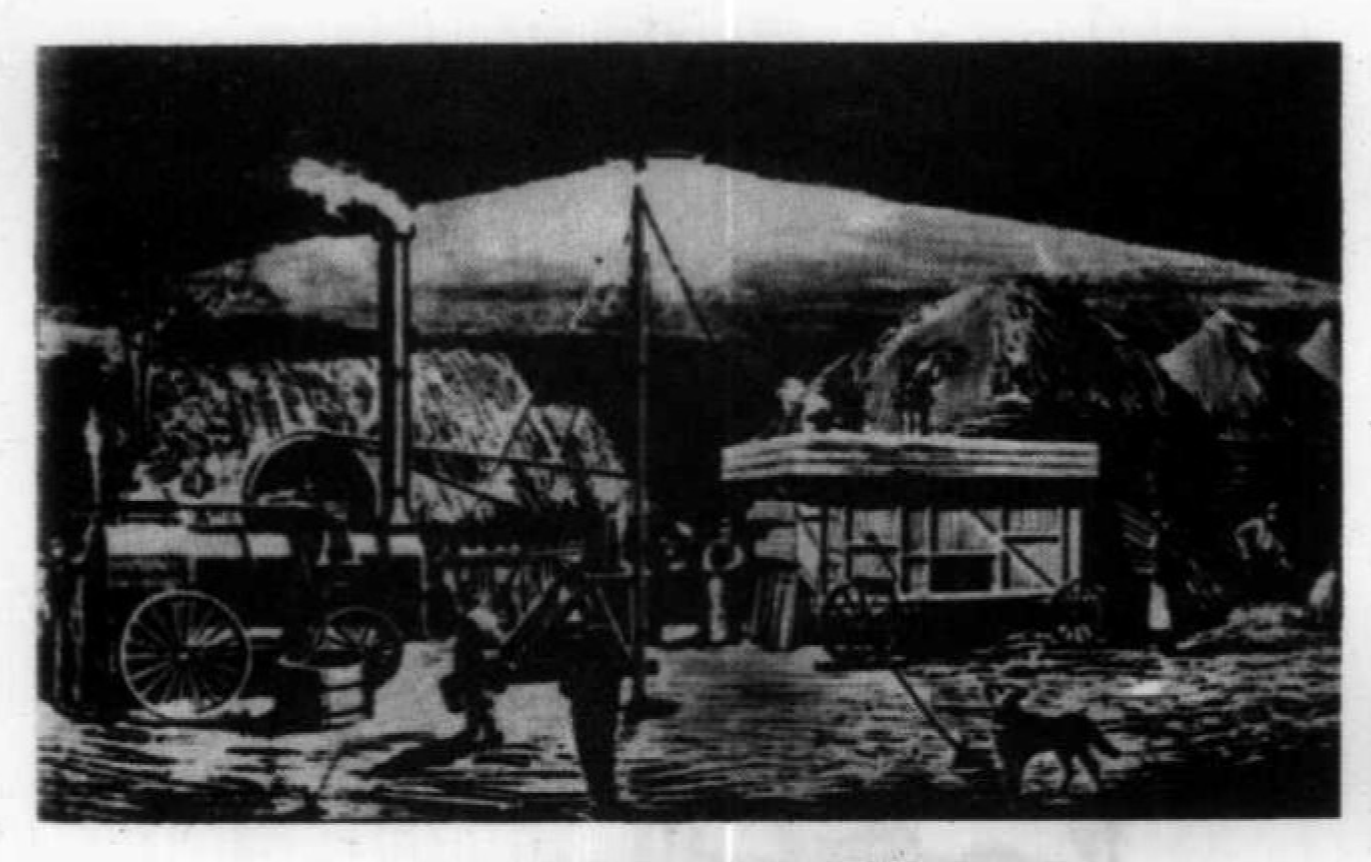
玛利亚·特利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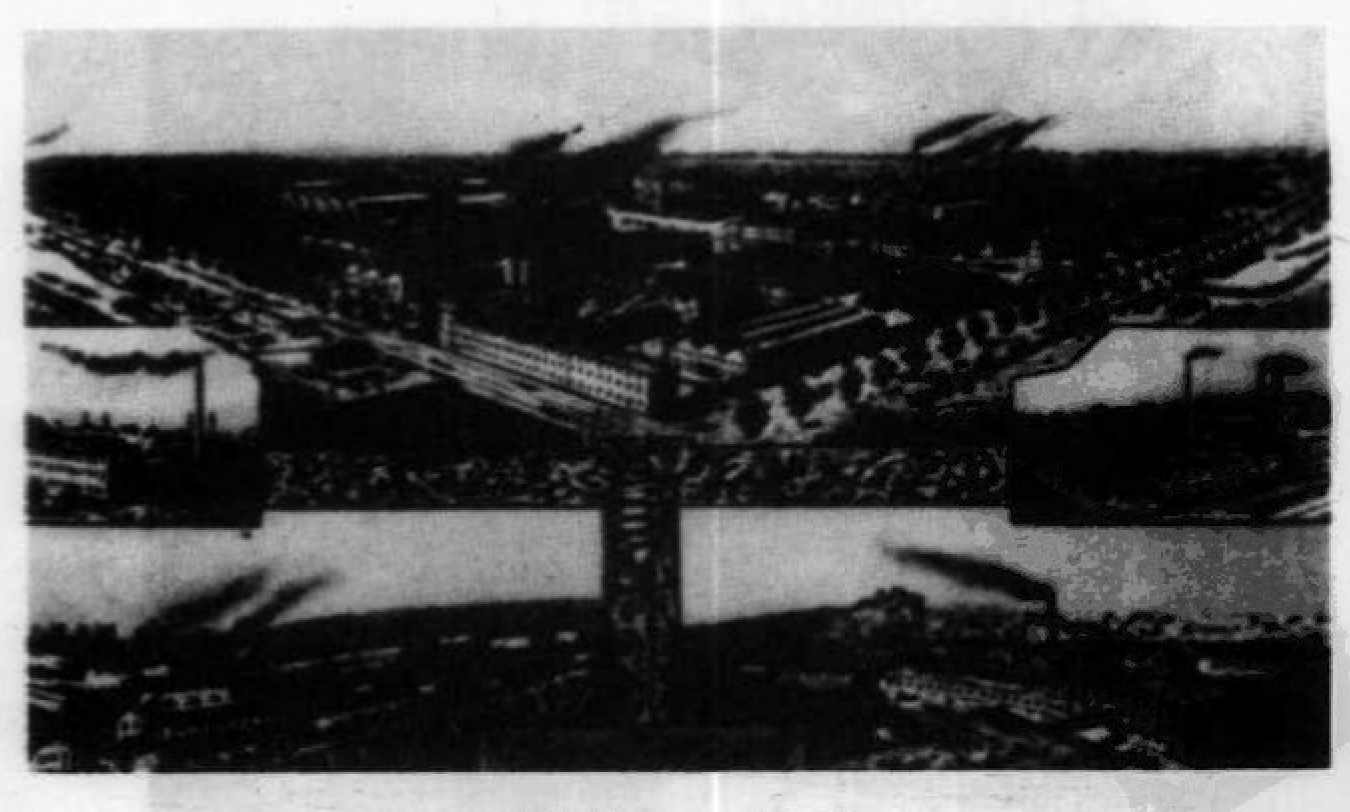
笞　刑



女子时装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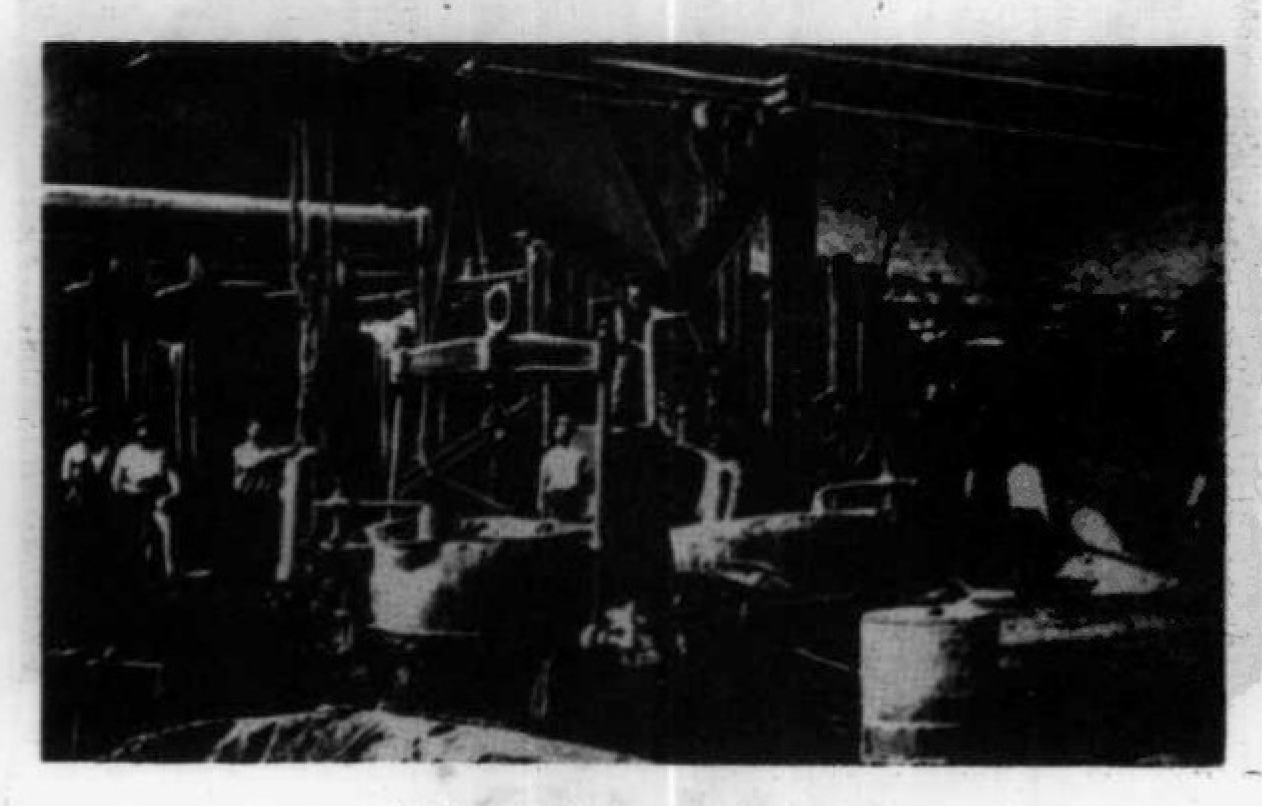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脱粒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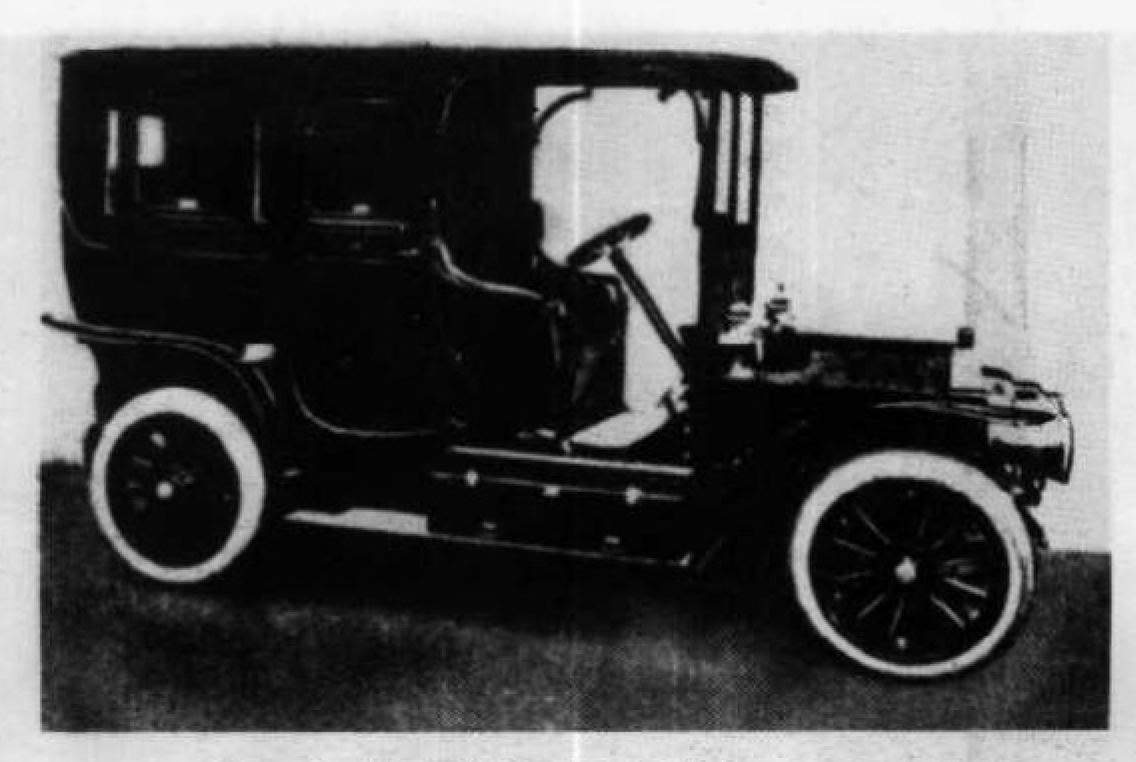
甘兹诸厂，1896 年



当时的一项新事物在今天也
可以算新事物——电动汽车



世纪初的甘兹工厂翻砂车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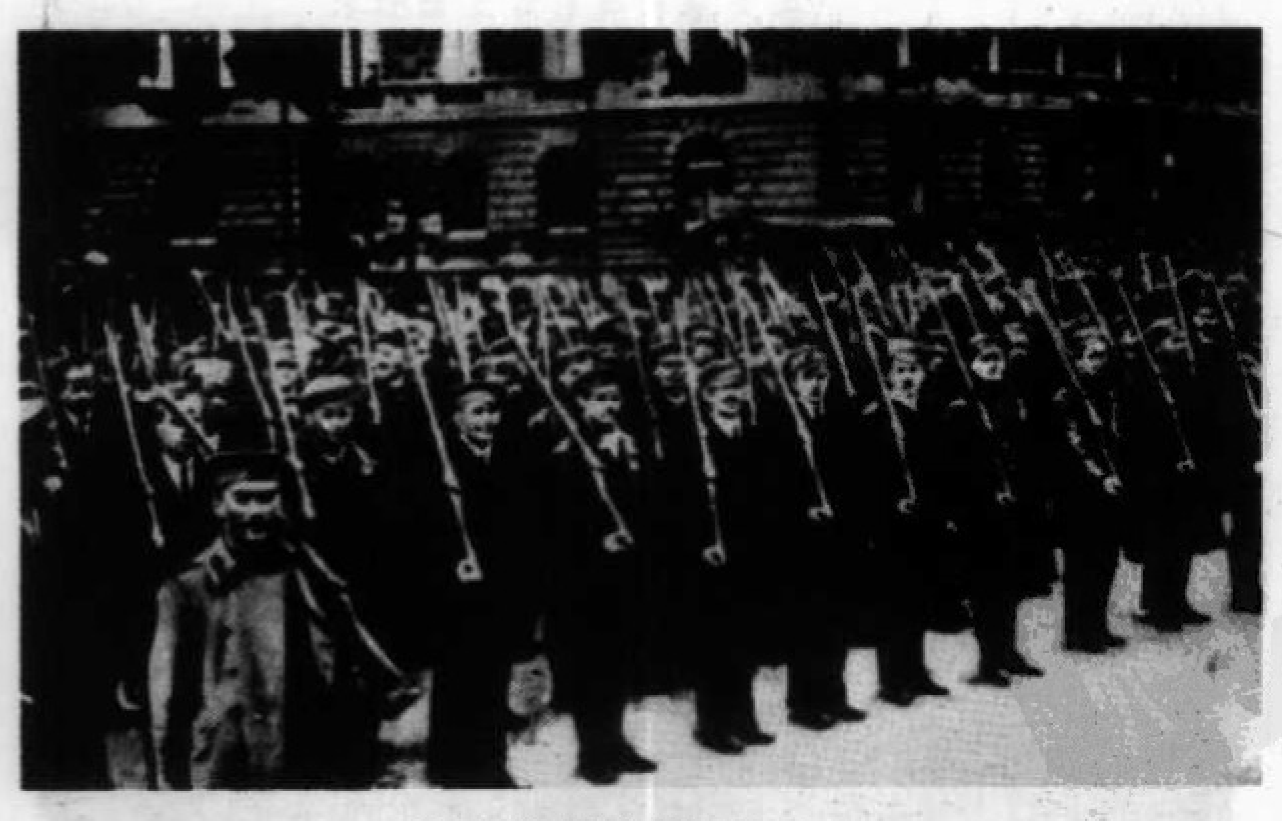
第一辆匈牙利制造的小卧车，1907 年



被扫地出门的人们(1910 年)



战线上的友好见面



1919年开赴前线的工人



1945 年春的土改



开始执行三年计划(1947 年 8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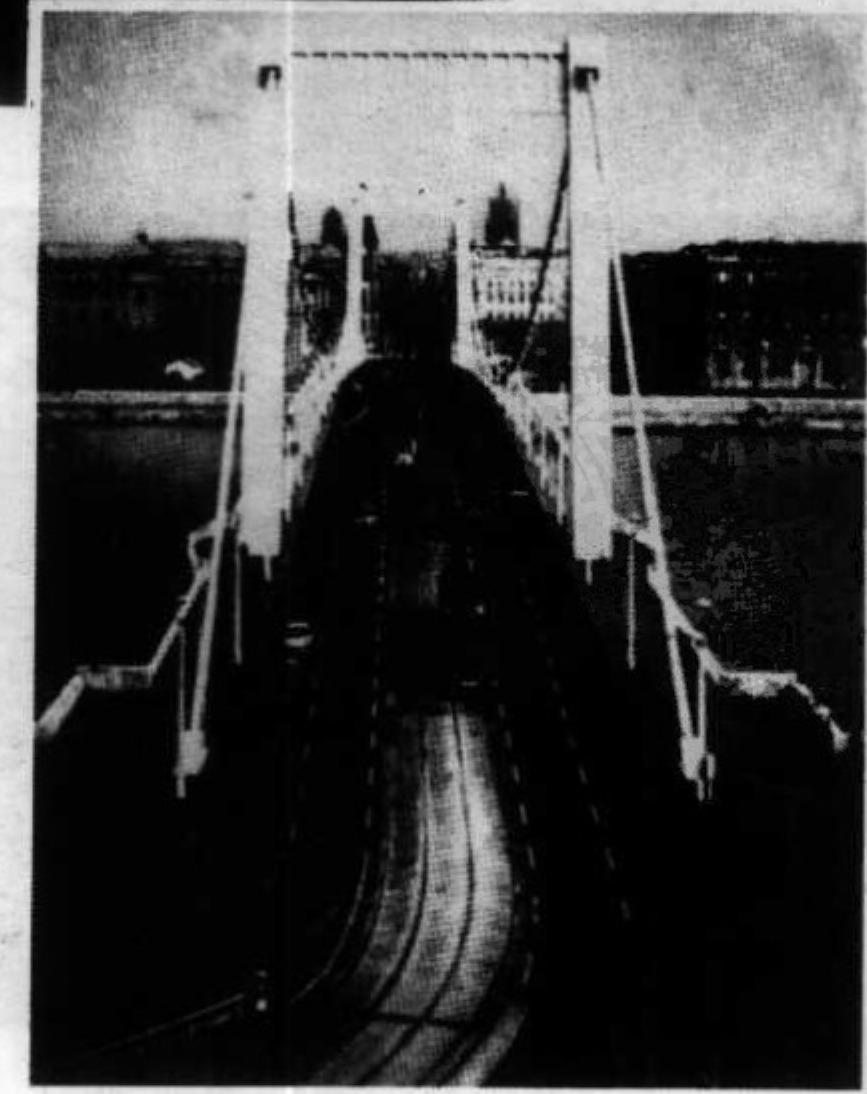
蒂萨勒克水电站



工人纠察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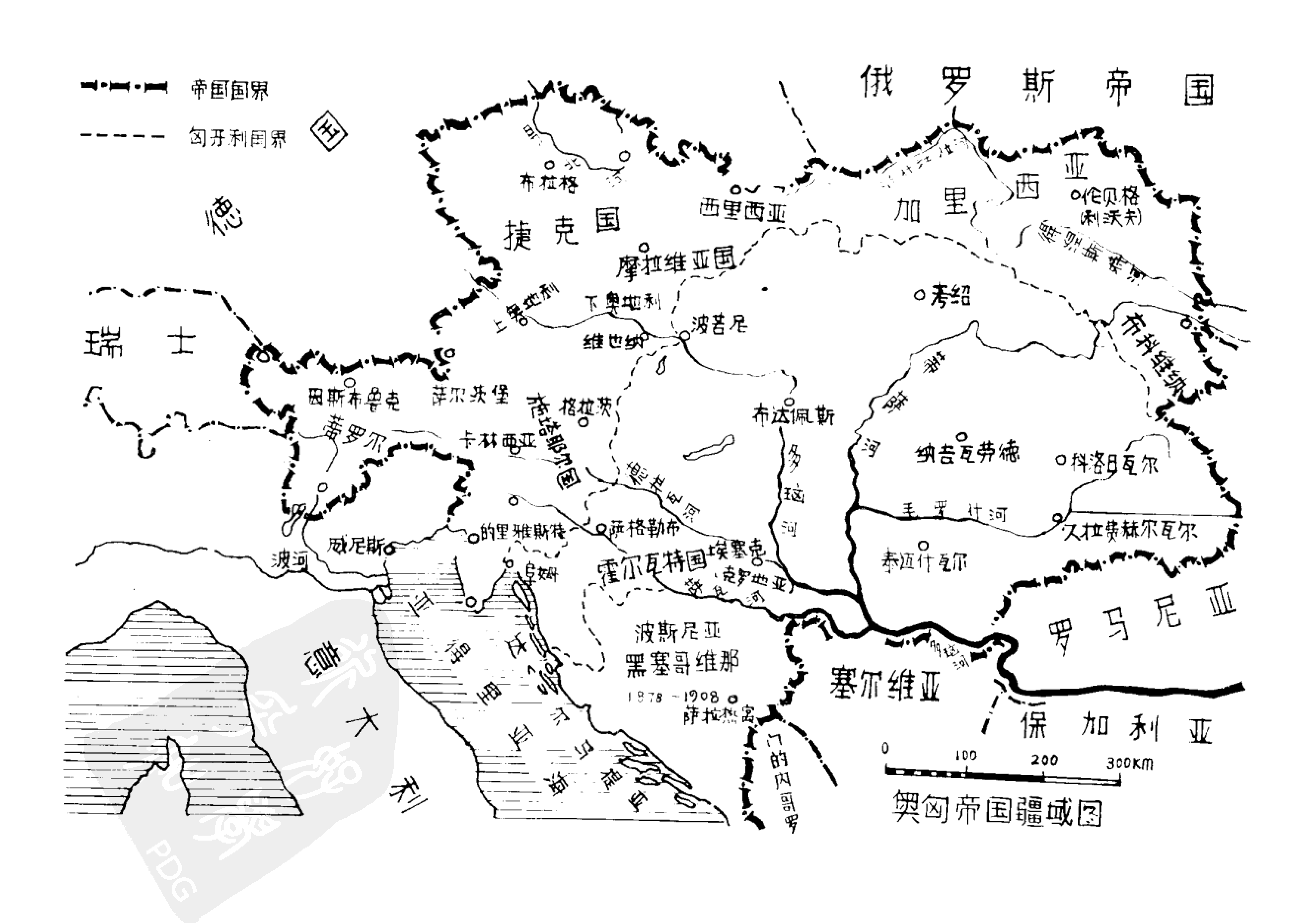
新的现代化公路





重建的伊丽莎白桥


1664年之匈牙利
塞派什地区
土耳其控制地区
匈牙利王国
埃尔代伊大公国
土耳其帝国
布达巴夏辖地
泰迈什瓦尔巴夏辖地
多瑙河
蒂萨河
特伦钦
尼特拉
波若尼
肖普朗
杰尔
森特哥特哈尔德
塞克什白堡
布达
埃斯泰尔戈姆
诺格拉德
艾格尔
托卡伊
温格瓦尔
德布勒森
纳吉瓦拉德
久拉
那格
考尼饶
塞克萨德
佩奇
莫哈赤
西盖特瓦尔
埃塞克
萨格勒布
贝尔格莱德
泰迈什瓦尔
久拉费赫尔瓦尔
科洛日瓦尔
拜斯泰尔采
塞格德
阿劳德
乔纳德


帝国国界
匈牙利国界
国
俄罗斯帝国
德
瑞士
布拉格
捷克国
西里西亚
加里西亚
伦贝格
(利沃夫)
摩拉维亚国
上奥地利
下奥地利
波若尼
维也纳
考绍
布科维纳
萨尔茨堡
因斯布鲁克
蒂罗尔
格拉茨
施蒂利亚
卡林西亚
克拉那
布达佩斯
多瑙河
纳吉瓦劳德
科洛日瓦尔
毛罗什河
久拉费赫尔瓦尔
泰梅什瓦尔
罗马尼亚
的里雅斯特
萨格勒布
霍尔瓦特国
埃塞克
克罗地亚
波河
威尼斯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1878－1908
萨拉热窝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门的内哥罗
亚得里亚海
意大利
0
100
200
300KM
奥匈帝国疆域图

目　录

一、自发源地至定居

（古代史）

匈牙利民族的起源及发源地

5

第九世纪末，当游牧的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出现的时候，在周围引起的惊惶之情不亚于四个半世纪之前匈奴人的来到。这时候，在欧洲西部，推翻罗马帝国、一度使人胆战心惊的野蛮民族都已经定居下来了，从事着农耕，并且建起了城堡和修道院。无怪，当信奉原始宗教、赶着马群和牲畜到处为家、还不时劫掠左近民族的匈牙利人被目为无异魔鬼的化身了。

那么这些匈牙利人究竟是谁？要答复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古代史——也就是定居以前的历史始终是匈牙利历史中争论最多的部分。可作为依据的材料不多。最早的文字记载只能追溯到在今日的匈牙利这块土地上定居前后，而且还不是匈牙利人自己所写的。在此以前的历史——可能是若干世纪，也可能是若干千年——历史学家们只能求助于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了。

在对匈牙利古代史的研究方面，迄今以语言学最有成绩。比较语言学家在对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字根、与其它语言的联系以及最基本的生活词汇、数词等诸方面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寻找到了同族语言。

根据语言学家研究的成果，今天已肯定匈牙利属于芬——乌

戈尔语系。与匈牙利人最接近的民族是今日分散居住在数千公里之遥的亚洲鄂毕河流域仅有数千人口的伏古尔族和奥斯佳族（他们自称孟西人和汉迪人）。同系的其它旁支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马里、科密、乌德穆尔特和莫尔多瓦诸自治共和国境内）和北欧（芬族和拉普族）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爱沙尼亚族）。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九世纪末，甚至连一部分科学家也对匈牙利人有“鱼腥味”的亲属关系这一论断讳莫如深。沙皇俄国时代，芬——乌戈尔语系的大部分民族的发展水平很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他们跃过了好几个世纪，今日已经没有人再坚持和土耳其拉亲属关系了，因为当年在一些人的眼里，仿佛那样可以使自己的民族高贵些似的。

语言上的亲属关系可以说已经是弄清楚了，但匈牙利民族究竟是在哪里起源的呢？克勒希·乔莫·山多尔① 曾在中亚西亚寻找过本民族的摇篮，今日也还有一部分人持这一观点。而另外也有人认为芬——乌戈尔语系民族的发源地应在西西伯利亚。

但现在比较最普遍的看法是：匈牙利民族最早起源于伏尔加河曲，在卡玛河和别拉雅河与乌拉尔山脉环抱的地带。至少已有足够的科学材料，可以证明在公元以前若干世纪，匈牙利人确实曾在这一地区与芬——乌戈尔语系的其他民族聚居过。

从该地区的地理特点和反映当时生活方式的最古老的匈牙利词汇中（如“根”、“浆果”、“蜜”、“鱼”、“网”、“弓”、“箭”等）可以认为匈牙利的祖先在这一地区的时候以渔猎为生，处于母系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后来，当他们从林区向草原迁移时，生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渔猎逐渐为畜牧所取代。从“马”、“鞍”、“缰”等字表明匈牙利人在纪元前后的一般时间里学会了游牧放马。游牧在

① 克勒希（1782——1842），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也曾到达过我国西藏，并编有第一部《藏英字典》。

生活中作用的上升也影响了社会结构。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虽然，母系社会的残余一直保留到民族定居前后。（日后发掘的某些墓穴中，女性的墓陪葬物远较男性的丰富即足资证明）。

匈牙利人民向南俄罗斯草原迁移

游牧生活易于迁徙。随着游牧的发展，畜群日益增大，需要寻找适当的草地和适于越冬的较为背风的地区。由此匈牙利族逐渐脱离芬——乌戈尔各族而开始历史上所通称的"迁移"阶段。但这一阶段也只是到了末期才有一些文字上的根据。关于这一历史阶段，我们所能依据的始终还是语言学。好象地质学家区分地层一样，语言学家也能把匈牙利语言中的词汇分出层次，大体上说出匈牙利人在历史上和什么民族发生过接触，并从语言中的所谓"外来语"中考察出向周围的民族学习到了什么。

迁移大概从第五世纪中叶开始，持续了四个世纪以上，匈牙利人从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草原上向西移动。现在还无法准确地说出移动的路线，但大概到达过亚速海的沼泽地带（当时当马迪斯）。根据匈牙利民间传说，两个英雄——胡诺尔和马扎尔曾在这里抢走了当地杜拉国王的两个女儿。

迁移的后期材料就比较多了。这时，匈牙利人大抵在莱韦迪亚（约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与埃泰克兹（约在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一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匈牙利人都到达了这最后一站。有一部分人半路留在或从途中折回到了"伏尔加匈牙利"。①

①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今苏联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一带。

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匈牙利尤利安神甫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发源地曾找到过这些人的后代，但在鞑靼之灾以后，就无法寻找了。

在长时期的迁移过程中，匈牙利人基本上在土耳其人所管辖的地区生活，无怪在九世纪和十世纪的一些文献中往往把匈牙利人叫做土耳其人或突厥人。长期的混居不但造成了血统的混杂，同时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也引起了重大变化。匈牙利语中畜牧业方面的词汇，如“公牛”、“阉牛”、“牛犊”、“猪”、“羊”、“奶酪”、“干酪”等都来自土耳其语，可见在畜牧方面向土耳其学了许多东西。

这样，游牧成了匈牙利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与牧放野性未驯的马群的同时，他们也牧放着躯干小，然而却是耐艰苦条件不需厩棚的马匹。除马群外，匈牙利人还放牧一种今日已濒临灭绝、极能耐苦、小躯干的大角“匈牙利牛”。当时还放牧粗毛的拉茨卡绵羊① 以及还没有完全驯化的猪。每当深秋来临，他们赶着畜群到河谷地带过冬，春天则转移到较远的山区或丘陵地。他们的生活特点之一是冬夏住处的交替。

但是，当时的匈牙利人更多的时间是在较能避寒的过冬地带生活的。这时，他们在河里捕鱼，并在住处附近经营小片耕地，种植一些高粱、大麦和小麦。水果中他们熟悉苹果、梨、核桃和葡萄。他们把高粱或其他谷物放在两块石片中碾碎，然后做成“面包”(其实是粥)，也会用奶做成干酪和酪干。他们很爱吃羊肉，每逢喜庆节日则吃马肉。

迁移末期的匈牙利游牧社会

匈牙利人的社会结构是部落——氏族组织。氏族对于其成员

① 一种源出小亚细亚的绵羊。

说来不仅意味着维持共处的共同血缘关系，同时也是经济基础，因为氏族有着共同的牧场和畜群。但是氏族社会的基本单元却是包括祖父、儿子和孙子三代的所谓“大家庭”。由于畜牧主要由男子承担，因此家庭内部也是以男子为主。采拾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减少，妇女也就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她们自己也成了财产。“女婿”在匈牙利文中的原意是“买主”，而已达结婚年龄的女子在匈文中原意就是“待卖的姑娘”。

波斯历史学者加尔戴齐有一段关于匈牙利人结婚的描写：“在他们那里，求婚的男方带去与女家财产相适应的牲畜作为聘礼。当双方就聘礼取得协议后，女方父亲领男方父亲前往自己的家中（帐篷），将所有的海獭皮、松鼠皮、银鼠皮和狐狸腋裘连同锦服以及其他皮裘，共约十件皮衣的量，用毯子裹好，绑在男方父亲的马上，然后送走客人。之后，男方父亲按事先协议向女方父亲送来牲畜、钱和其他物品，然后将姑娘带回去。”

在埃泰克齐时代的匈牙利人中间已不再是完全平等的了。畜牧、农耕和贸易（这时匈牙利语中已出现从波斯语中接受过来的“集市”、“集市日”这类词汇。）的发展导致财产上的区别和阶级关系的出现。出现了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之所以出现差别，一部分是偶然的原因（草地肥沃，水源充足，过冬条件好，瘟疫少等），但也有这样的原因：比如有些富裕的牧民出于“善意”接纳了穷困的牧民，有的则是在战争中俘虏了奴隶。这样，富裕牧民的劳动力多，畜群大。同时逐步形成了一种习惯，即氏族和部落的主要职务一般都由最有威望的家族世袭。财富和权力使社会上的一个很小的阶层有可能把一部分公共牲畜变为私有财产。匈牙利语中的“牲口”和“印记”两字就反映了这个社会阶段。“印记”的意思就是烙在牲畜身上某一家庭的记号。当时的文书中所谓“衣锦绣、佩宝刀”的大概指的就是这类匈牙利人。

根据目前可以得到的最早的阿拉伯——波斯和拜占廷的材料，匈牙利民族在定居以前的莱韦迪亚和埃泰克兹阶段，占有了很大面积的土地，有时甚至多达三十万平方公里。生活在这大片土地上的充其量不过几十万的匈牙利人由两个首领——“凯代”（也许是叫“君迪”——因为记载这名称的阿拉伯文无法分辨匈牙利声母而很难确定正确的读音）和“久拉”领导。

阿拉伯学者伊本·鲁斯塔[1]在公元920年左右所记载的公元870年左右“土耳其人”（即匈牙利人）首领的情况是：“其首领号称‘肯代’，意即‘君主’。然掌权者实为‘久拉’。无论战争或平日，事无细，咸由久拉一言决之”。

滴血为盟，匈牙利部落联盟的形成

在埃泰克兹时期的匈牙利人——根据公元十世纪时在位的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的记叙——共有七个部落，即：涅克、麦扎尔、居特焦尔马特、陶尔扬、耶诺、凯尔和凯西。其中第二个（麦扎尔）部落最强，全体匈牙利人因此也叫做麦扎尔人（即马扎尔或莫扎尔。马扎尔人在外国语言中被称为文格里人、翁加尔人或匈牙利人，大概是源出土耳其语对匈牙利人的称呼“翁古尔”一词）。

九世纪末，已经相当强盛的匈牙利人逐渐脱离卡扎尔人[2]的约束，并加强了内部的统治。根据传说，当时包括108个氏族的

① 九世纪后期到十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与旅行家，波斯人。写有著名的《旅行锦囊》一书。

② 卡扎尔人在七世纪时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下游地区曾建立国家，于十世纪时灭亡。

七个部落在埃泰克兹成立了部落联盟，据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匈牙利诸部落有鉴于阿尔莫什之子阿尔巴德深孚众望，才智过人，勇力超群，按照卡扎尔风俗与法律，置阿尔巴德于盾，立为大公。"与此有关，第一个用文字记载匈牙利历史的安诺尼慕斯[①]还在他的著作里谈到七个首领起誓永远从阿尔莫什后代中推选大公，而大公在分配战利品方面要永远照顾其他首领的后代，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后，七个首领按原始的宗教风俗割肤滴血于盆，以固盟约。 10

关于这次盟约的内容，安诺尼慕斯是按照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他自己生活时代的政治观点来追述的，但有立盟一事则是无可怀疑的。游牧民族往往滴血起誓表示结为兄弟，对内以避免日后进行血族复仇，相互刀兵相见，对外以巩固内部联盟，一致对敌。缔结这盟约的迫切性越来越增加，因为匈牙利人当时虽然已摆脱了卡扎尔人的控制，但力量上大大超过匈牙利人的拜谢涅人[②]却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七个部落的结盟使力量大为加强，周围国家的统治者每当交战，往往请他们协助。于是一部分男子以战争为业，这样虽然虏获甚多，但却造成了住地守卫的空虚，终于在公元895年被迫离开埃泰克兹。匈牙利人当时站在拜占廷帝国一边对保加利亚国王作战，但后方却遭到了拜谢涅人的袭击。在优势兵力面前，匈牙利人节节向喀尔巴阡盆地退却。匈牙利历史上的编年史作家以幼稚的但却是动人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的情况："到处都是鹰，他们没法再耽下去，因为停在树上的鹰象苍蝇一样多，不断啄他们的牛，甚至

---

① 安诺尼慕斯，拉丁文，意即无名氏，生卒年不详。

② 拜谢涅人，属土耳其族，曾在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建立政权。在十世纪时政权崩溃，一部分人与匈牙利人同化，另一部分人逐渐迁移到拜占廷帝国，也有一些人继续在原地。至十二世纪作为民族已不复存在。

还啄马。因为上帝的意思是要他们从速前来匈牙利。”

匈牙利人到达之前居住在喀尔巴阡盆地的人们

匈牙利人前来居住的这块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五万年以前曾经有尼安德特人在埃尔德高地生活。在比克山区的赛莱塔山洞和伊什塔洛克山洞出土的现代人遗迹说明这些人会使用石弓石箭狩猎。在六、七千年之前发展到“克勒什”①文化时期，已经进行原始的耕种。到所谓“佩采尔”②文化时期业已进入青铜时期，当时的文化相当发展，人们会使用四轮牛车，懂得饲养家畜，会编织，并制作陶器。

至于在纪元前后居住在喀尔巴阡盆地的人们的情况，我们就了解比较准确得多了。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曾派军队驻在这里，罗马人在这里建筑了繁华的城市、良好的道路（在布达佩斯、久尔、肖普龙、桑博特海伊、佩奇等城市都有着罗马时代的遗迹）。在罗马帝国统治四百年之后，这里成为民族迁移的通道，约有五、六百年之久，许多日耳曼民族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不断通过这里。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也曾试图在这里建国。可是直到第十世纪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较稳定的统治。昙花一现的游牧民族国家勃然兴起，然后又迅速解体，只有在第六、七世纪以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在这里立定了脚根。阿瓦尔人也占据了一块地方。公元九世纪初，（东罗马）查理大帝的东征以后，

① 克勒什河在匈牙利东南部。

② 佩采尔在今佩斯州。

法兰克人在多瑙河西部征服阿瓦尔人，建立政权，取代了阿瓦尔人，但斯拉夫人仍在这里生息。

这种没有稳定的政权的状态一直持续匈牙利人的到达之前。版图包括今日匈牙利北部山区的大摩拉维亚公国在一度鼎盛之后，当斯瓦托普勒克去世即告衰落。九世纪时，以佐洛伐尔①为中心的斯拉夫大公国以及一度占领奥尔弗尔德平原②和埃尔代伊地区③的保加利亚政权也都没有能建立巩固的统治。

当时喀尔巴阡盆地的外观今日已无法了解。大概在今日奥尔弗尔德平原上是绵亘无际的森林，多瑙河西部的小丘陵地带也有许多树林。巴拉顿湖南端与沼泽地相连，费尔特河的支流直达久尔。当时河流中鱼类充斥，山区林间野牛比比，在平坦的沼泽地带，驼鹿麋鹿成群。珍贵的皮毛兽和鸟类遍地皆是。

匈牙利人的定居

今日已无法具体了解匈牙利人在目前这块土地上如何定居的情况了。安诺尼慕斯虽然写得极为详细，但材料并不可信，因为他的出发点是试图把他那时的一些大封建领主的祖先说成是占领某一个地区的功臣，从而成为当地第一个领主。而从有关定居的其他一些传说中则更难以寻找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12

根据不同的材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肯定：定居一举始于公元 896 年。当时在阿尔巴德首领率领下的主力自基辅方面越过维

① 即今匈牙利西部。当时称摩萨堡。

② 在今匈牙利东部，即通常所说的匈牙利大平原。

③ 即今日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

列茨盖山隘①，而其他部落和零散人马则是通过埃尔代伊地区的一些山谷和隘口来到这里的。其时，摩拉维亚公国在斯瓦托普勒克去世后日益衰落，这为匈牙利人提供了方便条件。第十世纪的头几年，这个在东法兰克日耳曼人压力下本来就只是苟延残喘的国家，在匈牙利人的进攻下立即瓦解。匈牙利人并在多瑙河流域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受辖于法兰克人的泛斯拉夫大公国的抵抗，相对迅速地在几年之中实现了定居。

定居后的生息

无法了解在今日这块土地上定居时有多少匈牙利人，一般估计约二十至二十五万人，但也有人认为接近五十万。无论如何，在当时情况下，人数应该说是很多的。(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论点：前来定居的匈牙利人同化了当地的斯拉夫人，而不是象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那样，在巴尔干和保加利亚，被受他们征服的斯拉夫人所同化。)关于当时匈牙利人的情况，除了少数文字记载外，出土的文物和发掘出来的氏族墓穴提供了许多情况。每人的墓穴按照生前的地位埋葬。中间是最有地位的人物，他们的左13 边是男子，右边是女子(一如生前排列的座次)。有地位的人有物品和马匹陪葬。杀掉的马匹的肉在丧宴上吃掉，马头、马腿连同配有马具的皮一起陪葬。从陪葬的物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艺术品、刺绣的袋饰、腰带、佩刀以及女子的饰物。一般人的墓葬远为简单。

---

① 维列茨盖山在今苏联外喀尔巴阡地区、喀尔巴阡山东北段，亦即在拉托里察河和奥波尔河流入斯里季河口之间的河谷地带。

从出土的骨骼中人类学家认为，当时的匈牙利人身材中等偏矮，短颈，双目深陷。那时西方的编年史作家也可能是出于恐惧，称之曰“面目可憎”。

当时的匈牙利人从事游牧，在冬季的住地，也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根据这一生活方式，他们来到这块地方时，首先占领平原、丘陵和河谷。自东向西——先是蒂萨河东部，然后是多瑙、蒂萨两河之间的地带，最后则是多瑙河以西以及埃尔代伊的河谷地区。定居以部落为单位，部落内部按氏族划分。被他们占领地区的边界留出无人居住的地带作为防御之用，并围有路障、沟堑以固防御，进出通道设有射手守卫。

这里原先居住的斯拉夫人发展水平较高，这对于前来的匈牙利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匈牙利语中一些斯拉夫外来语词汇很好地说明了匈牙利人在农业、工业、房屋建筑上当时向斯拉夫人学到了很多东西（黑麦、燕麦、轭、垄沟、稻草、草垛、糌糠；屠夫、车轮匠、桶匠、裁缝、车工、木匠、锅匠；厨房、贮藏室、地窖、窗户）。饮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食物花样增加了（甜饼、香肠、腊肉、面疙瘩、酥饼、园白菜等）；做法多样化了（蒸、酸化）；饮食正规化、有计划了（午饭、点心、晚饭）。当然，这些变化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是逐步改变的。

冒 险 战 争

定居的匈牙利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但当年在莱韦迪亚和埃泰克兹的牧场无边无际，而在喀尔巴阡盆地中，纵横的松林和橡树林、大片的沼泽和积水限制了可供畜牧的地区。同时，部落和

氏族首领还从中不断为自己划走了不少土地叫斯拉夫农民和奴隶耕种。当然，如果从事农耕的话，要养活更多的人也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于无拘束生活的牧民不愿种地，他们宁可从事掠夺，进行战争冒险。（当然，并非仅是匈牙利人如此。其他部落联盟的首领也从事掠夺以缓和内部矛盾。）

14 继定居之后的几十年中，在西欧和南欧不断发出“上帝保佑我们免遭匈牙利人毒手”这样恐慌的祈祷。背弓、佩刀、手持长矛或狼牙棒的匈牙利人不断在德国、意大利和拜占廷出现。他们无远不达，曾到过大西洋之滨，到过比利牛斯山麓和马尔马拉海①。由部落或氏族首领率领到处冒险的、数量不等的匈牙利人经常迫使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交纳钱帛，并经常掳回大量的掠夺物和奴隶。

他们之所以能取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特别的作战方式。当轻骑的匈牙利人出现的时候，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对于游牧民族的战术早已遗忘殆尽了。当时普吕姆②地方一个叫雷吉诺的长老写道：“他们用刀杀人不多，更多的是用弓箭，他们用牛角弓射出来的箭几乎百发百中……他们骑马前驰或后退，有时也伪作遁走。15 他们作战的时间不长，如果他们能象进攻那样厉害地持久作战，那简直是难以应付的。他们往往在战斗方酣时突然后撤，但后撤后不久又猛然返回。当你以为自己已经获胜之际，也许正好是你失败的时候。”

十世纪前半期，一些修道院的编年记事录——这些记事录也记载世俗发生的大事——常常提到匈牙利人。但是匈牙利人只是在西方身披重甲的骑兵还摸不清他们打法的时候才能获胜，特别是当地的统治者和封建主把这些骑兵主要用于相互交战（冒险的

① 在土耳其。

② 在今西德境内。

匈牙利人参加)，因此，常常脱不开身来对付匈牙利人。但到十世纪中叶，在德国，国王的政权日趋强大，结束了封建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匈牙利人便开始陷于困境。面对军事技术上发达得多的西方军队，匈牙利人只能设法在每次冒险战争中投入更多的人力。但公元 955 年，在雷尔和布尔楚率领下的匈牙利人在奥格斯堡附近的勒赫菲尔特被鄂图一世① 的军队击败，从而彻底结束了冒险战争。

① 即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

二、从建国到鞑靼之灾

（匈牙利的早期封建主义阶段）

16

国家的奠基者盖萨大公①

据编年史称，在勒赫菲尔特战役中，只有七个匈牙利人生还，这显然是夸大其词。雷尔（传说中叫莱赫尔）和布尔楚的这场惨败使匈牙利人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或者步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的后尘，走向灭亡；或者向比自己发达的西方邻居学习。这时的匈牙利人需要走的道路应该是从驱赶畜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向定居一地的农业生产过渡，以服从于少数地主的统治代替自由牧民的社会平等，以天主教的教规取代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建立国家并非仅由外因强制所致，封建制度的形成在匈牙利有着它自己的内部因素。匈牙利的游牧社会（原始氏族社会）在向今日的匈牙利土地上定居时已经不再具有完整的形式，而到军事冒险年代更是进一步分化了。在掠夺中所得的战利品往往大部分被部落、氏族首领——部落贵族所吞占，奴隶为他们劳动，斯拉夫农民为他们耕种，他们所指挥的武装自由民实际上成了小小的军队。这些部落上层人物事实上已在变成封建领主。当时，农

① 我国某些历史书籍中译为吉查大公。

民和奴隶的数量业已相当可观，受着这些部落上层人物（正在形成着的统治阶级）的控制。而实际上只有封建的国家才能完成这个职能。因此可以说，当时从内部条件来看，建立国家的条件也成熟了。

盖萨大公为建立国家作了决定性的准备(972—997)，在奥格斯堡之败以后十八年，他不是派遣军队，而是派遣使节前往哈尔兹山的奎德林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处，请求派神甫和骑士前来匈牙利。盖萨本人虽然一直保留着异教徒的习惯，但出于政治上的利益，他接受了天主教洗礼。盖萨还有计划地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了他家族的权力。他娶信奉了东正教的埃尔代伊"久拉"[1]家族的女儿莎罗特为妻，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为他的儿子伊斯特万娶了一个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吉赛尔，打开了和西方的关系。同时，盖萨坚决打击了反对他政策的对手。所有传说都说盖萨对反对他的人残酷无情，而对外国骑士则优宠有加。他的政策相当大程度上为其儿子（圣）伊斯特万一世建立国家准备了条件。

17

建国国王伊斯特万[2]

盖萨的政策在坚持氏族自由和部落自主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抗。一部分在军事冒险年代可以充分自行其是的部落首领和氏族首领由于担心失去权力，公开反对新即位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公伊斯特万。其中最著名的是科巴尼。这个绍莫吉地方的首领是阿尔巴德家族近支的后代，在盖萨去世后想染指大公的宝座，于是发动了武装暴动，与年轻的统治者对抗。但是伊斯特万在教

① 埃尔代伊的统治者。参见第 12 页。

② 我国某些历史书籍中译为斯提芬。

会和德国骑士的帮助下镇压了这次叛乱，并把科巴尼的尸体分为四块，分别悬挂在埃斯泰尔戈姆、维斯普雷姆、杰尔和埃尔代伊的城门上以儆效尤。另一个反叛者，毛罗什河流域的奥伊托尼也遭到同样下场。最后一个对立者，伊斯特万的舅舅、埃尔代伊的“久拉”由于有科巴尼和奥伊托尼的前车之鉴，根本没有进行武力对抗而臣服了。

在征服反叛以后，伊斯特万于公元1000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这样，匈牙利便与邻近的捷克和波兰几乎同期成了封建王国。

按照当时的习惯，伊斯特万也说他的王位是“上帝的恩赐”。但是他统治的物质基础却是王室的领地。除了大公所属部落的土地以外，伊斯特万把反叛首领们的领地和无主土地一律据为己有，甚至还掠夺了一些氏族的土地。这样，他虽然给亲信和教会赐予了大量土地，但本人还是直接控制了大部分国土。这为组织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背叛的首领们被镇压以后，部落的自主彻底消灭，部落和氏族星散。（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在全国许多地名都带有象“乔尔玛特”、“耶诺”、“盖尔”和“陶尔扬”这类当年部落名称的原因。）伊斯特万不以血缘而以地区为基准组织了以州为单位的国家。

以城堡为中心的州治制① 是伊斯特万从斯拉夫人那里转学过

---

① 这时的“州”面积远较今日匈牙利行政建制中的“州”要小，后逐渐扩大，并遍及全国。当时在某一地区建立城堡，作为附近经济、军事的中心。城堡长官为“州督”（即“伊什潘”），负责征集所辖地区的实物税（三分之二归王室，三分之一归州督），战时由州督率领麾下士兵作战。这就是所谓“王室城堡州”。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逐渐为“贵族城堡州”所取代。“贵族城堡州”起初是保护普通贵族的利益的。由于这一制度，致使普通贵族在匈牙利历史上一直在不同程度上能与大领主、大贵族相抗衡，历代企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国王也常常借助于这些“贵族城堡州”。后来举行等级议会时也以这些州为单位派遣代表。“贵族城堡州”的职能是保护贵族利益、征收赋税、审判农奴、组织勤王军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大贵族合为一体，成为顽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力。

来的查理大帝① 的制度。匈牙利语里的"州"(Megye)即源自斯拉夫语。匈牙利一些州的名称也来自斯拉夫语(如:琼格拉德、诺格拉德),一部分是匈牙利语(如:索尔诺克、乔纳德、萨博尔奇等都是各州第一任长官的姓氏)。

伊斯特万通过州治制度,把全国人口稠密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每个州的大部分土地是王室的领地,同时也包括一部分教会土地和世俗大领主的采邑以及自由民的住地。州的长官称"伊什潘",即州督,其行政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对私人领地的管理。在各州的王室领地负责提供国王宫廷的开支,以及供养国王在各州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系统:为宫廷服务的人们,尽管社会地位各有不同,但都受所谓"库里亚"——经济中心管理,从事不同行业的人包括渔民、猎人、马倌、牧人、面包师、鞋匠、铁匠、成衣匠、驯鹰者、信差、乐师等。州的中心——城堡里的士兵和有关人员属于另一个系统。城堡的经济和军事开支由属于城堡的农奴负担。

与封建国家以及城堡州建立的同时,教会的组织也逐步发展起来了。在推行宗教的过程中,说服和强制手段兼而有之,人们被迫慢慢适应新的宗教、新的风俗习惯、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生活方式。国王为了推行天主教,在埃斯泰尔戈姆建立了本笃会的修道院,在考洛乔设立大主教区,其他象艾格尔、杰尔、维斯普雷姆、埃尔代伊等地设立主教区。伊斯特万国王大力推行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但并不排斥东正教和君士坦丁天主教。

和当代其他封建国王一样,伊斯特万国王并没有建立固定的首都,而是有几个习惯性的驻跸之地。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各地巡狩,并就近在某一个"库里亚"居住,当地就以所收的实物

① 查理大帝,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皇帝。

赋税供养国王及随从。随从中除士兵外，还包括宰相、判官等高级官员，就地处理当地上层人物和自由民的各类案件。

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遇到一系列困难，这一点在当时颁布的法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私有财产、教会、宗教仪式……，这一切 19 对于大多数人说来都是新东西。国王力图通过法律来巩固领主的私有财产和自由民的继承权，并保证教会的“什一税”①，同时下令每十个村庄建立一个教堂。

建立新秩序的困难还反映在为推行天主教而采取的各类严厉的措施。法律严格规定任何人礼拜日不得劳动而应前去教堂。规定神甫、州官或其他信徒如看到有人从事耕作，应将牛予以没收，交士兵食用。神甫及州官应命令各村村长：“除看守火种者外，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前去教堂”。法律规定，在教堂中“随意谈笑，干扰他人者”应逐出教堂，如该人年事不高，并系普通平民，应予鞭笞并处以髡刑。当时的法律实际上是国王意志的反映。“立法”程序是国王听取朝廷会议（由正好在宫廷的主教和贵族组成）的意见，然后以拉丁文颁发。

伊斯特万国王的两部法典，虽然有一部分效仿外国，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它了解不少当时匈牙利的社会情况。如自由民和被作为财产的奴隶之间的差异极大。但自由民相互之间的差别也不小。对同样犯罪行为的处分往往视该人系国王扈从卫士、抑或一般平民而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某人杀死妻子，按其地位不同，可 20 课以五十头、十头或五头牛的罚金，如杀死一个奴隶，只须适当赔偿损失即可。

伊斯特万国王用法律和武力，通过州督和神甫力图把新的社会制度巩固地建立起来。同时尽一切力量来保障国家的独立。他

---

① 农民以牲畜和农作物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纳教会。

于1030年击败了德皇孔拉德二世入侵的军队。伊斯特万不仅建立，同时也保卫了封建的国家政权，因此有理由把他看作为匈牙利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

王位之争，德国人的入侵和异教徒叛乱

伊斯特万一世去世（1038）和拉斯洛[①]一世登基（1077）之间的四十年是充满斗争和混乱的年代。其间爆发了两次异教徒叛乱企图推翻根基不稳的封建制度。在阿尔巴德家族内部则为了争夺对全国的统治，先后产生了七个国王。(彼得，奥包·沙穆埃尔，彼得复位，安德拉斯一世，[②]贝拉一世，沙罗门和盖萨一世。其中仅盖萨一世自然死亡。)

之所以产生了王位之争，是因为在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之间，阿尔巴德王朝内部没有固定的继承制度。往往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才最后确定是国王的弟弟还是长子继承王位（安德拉斯一世去世后其弟贝拉一世和其子沙罗门之争，贝拉一世之后其侄沙罗门和其子盖萨一世之争。）按天主教惯例，长子拥有继承权，而匈牙利人的传统习惯则承认家族内最年长的男子有继承权。(游牧民族不能设想让一个孩子，有时甚至由一个婴儿充当首领。)

在王室内哄中坐收渔人之利的是匈牙利大领主和德皇[③]——斗争的各方不断以赠予土地拉拢大领主，而对德皇说来，匈牙利不断的内部纠纷为其提供了入侵的大好良机。十一世纪中期，德皇

① 我国一些历史书译作"弗拉迪斯拉夫"。

② 我国一些历史书译作"安德烈一世"。

③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在其势力的极盛时代，为建立世界性的大帝国，力图把东邻的一切年轻的封建国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变为自己的附庸，不断对匈牙利进行讨伐（其中以1030年、1044年、1051年、1052年、1063年和1074年几次为最）。但德国人始终未能取得持久性的胜利。

根据史料，匈牙利人当时在对德作战中使用了焦土政策。当德国人在拉巴河和多瑙河流域出现时，匈牙利人把能带走的牲畜和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则烧掉、毁坏，然后回过头来战胜饥饿不堪的德军或迫其后撤。按照传说，“韦尔泰什山”① 的名称就是那时留下的，当时“德军大败，丢盔弃甲，弃帐篷及什物狼狈逃遁。”

21 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异教徒叛乱意味着更大的危险，虽然伊斯特万一世把叛乱首领科巴尼分尸四块，将“不虔诚”的拜谢涅人首领托努佐巴及其妻一起活埋，并将倾向异教的瓦祖尔②弄瞎，在他耳孔里灌进滚烫的铅液，但始终未能将旧制度的势力全部摧毁。失去自由的和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的自由民以及他们的奴仆不愿接受被统治的地位，对他们说来，教会是新制度的化身，因此他们首先起而反对教会和神甫。于是1046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异教徒叛乱，赶走了在位的伊斯特万一世的侄子、亲德的国王彼得。为首的是贝凯什地方的瓦塔，他把头发结成三绺，按异教徒习惯生活。他们宣称要将全国显贵一律处死，并几乎杀死了所有的神甫（包括有名的盖勒特主教③）。登上王位的安德拉斯一世起初利用了这些叛乱者，接着便镇压了他们。1061年，当安德拉斯一世在家族内部的王位之争中死去，叛乱再度爆发。以

---

① 韦尔泰什山在匈西部地区。意即“盔甲山”。

② 阿尔巴德家族成员，伊斯特万国王的堂兄弟。

③ 布达佩斯多瑙河岸边有盖勒特山，山上有盖勒特的塑像。

瓦达的儿子亚努什为首的异教徒向登位的贝拉一世提出："我们要求继续按我们祖先的习惯过活，要求砸死主教，杀光神甫，吊死税吏。"但是在十一世纪中期，以异教徒暴乱形式出现的恢复旧制度的任何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国王、教会和上升为贵族的国王原来的扈从已强大到足以扼杀这一切。

拉斯洛和卡尔曼时期
封建制度的巩固

当异教徒叛乱被镇压以后，穷困的自由民面临痛苦的选择——不是被迫接受现状，成为奴隶，承担徭役，便是逃亡他乡，到封建制度尚还不十分巩固的边境地带。在主教、寺院或世俗地主那里服役的自由民，根据当时的法令，所剩的"权利"只是"可以任意选择主人"。绝大多数自由民除了充当农奴，别无他路，但还是有许多人不甘心接受这一命运而设法逃遁。几乎在长达二、三十年之久的时间里，全国到处可见身带武器、驱赶着牲畜流浪的自由民。国王和教会的税吏捉拿流浪者，并没收这些人的牲畜，力图使他们定居下来。发生变革已是势在必行了。

（圣）拉斯洛一世（1077—1095）和卡尔曼（嗜书者，1095—1116）在位时封建制度最终地巩固起来了。拉斯洛一世当还在作王子时，即已因对入侵的库恩①人作战的胜利而受到了人们的景仰，并且在后来的几百年历史中也作为有成就的统治者不断受到歌颂。 22

---

① 属土耳其语系的游牧民族。九世纪时在西西伯利亚草原，十三世纪时迁入匈牙利。后与匈牙利人同化。

拉斯洛登基后，设法结束外部威胁和内部动乱。当时罗马教廷和德皇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使德皇无暇东顾，这为拉斯洛提供了大好良机。德皇亨利四世在拉斯洛一世即位那年被迫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去卡诺莎觐见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以表臣服。①

对拉斯洛统治的最重大考验是巩固私有制和教会权力。当时兵荒马乱，偷窃成风。在早先的部落社会中没有私有制，建立国家以后所度过的几十年时间还不足以使人们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我的”、“你的”这样的概念。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拉斯洛颁发了极为严厉的法律。

仅举几端为例，即可看到其森严程度。法律规定：任何平民，如所窃赃物价值一只母鸡，应予吊死，并没收全部财产。奴隶如有偷窃行为，处以劓刑，如再次偷窃，应予吊死。赃物买卖双方都处死刑，知情不报者亦处死刑。国王对残余的异教徒亦处以重刑。拉斯洛一世下令修复教堂，并对星期日不上教堂做礼拜的人“处以鞭刑，以资挽救”。如有人按异教徒习惯在井边祭神，或祭树、祭泉水、祭石头等，罚牛一头。

拉斯洛的侄子卡尔曼继续执行拉斯洛的政策。匈牙利历史上之所以称他为“嗜书者”卡尔曼，是因为他虽然体弱多病，但博览群书，视野开阔。卡尔曼在位时将教会的一部分土地和鱼塘收归王室，因此教会所写的编年史恶意地攻击他：“体质羸弱，外貌丑陋。但胸有城府，博学强记。驼背、跛足、口吃”(编年史上的记载慢慢成了众所公认的事实，因此建国一千年之际，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上建立的历代名王雕像中，这位国王还是驼背的。)

卡尔曼时代的法律表明，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交，匈牙利的封建社会制度已告稳定。对偷窃的惩罚已远较拉斯洛时代为轻(如

① 1076年格列高利七世乘神圣罗马帝国政局不稳，宣布将与他争夺势力范围的亨利四世开除教籍。亨利四世于次年赴卡诺莎向教皇请罪。

犯有偷窃行为的人，最重的惩罚也“只”是弄瞎眼睛或发配为奴隶)。这表明个人财产制度的概念已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扎了根。

拉斯洛和卡尔曼在当内部形势趋于稳定之后，开始了征伐战争。封建国家几乎有个规律，就是每当国内统治巩固，没有外敌的威胁时，便从事征伐，匈牙利的国王们也没有例外。一些想得到封地和封号的大领主以及想和东正教争地盘的天主教会也不断鼓励他们这样做。拉斯洛、卡尔曼以及其后的阿尔巴德家族的其他国王都以征服弱小的巴尔干诸国以及山谷以东的哈里奇① 为己任。对斯拉沃尼亚② 和沿海的霍尔瓦特王国③ 的征服战始于拉斯洛而终于卡尔曼。当时匈牙利的势力远及达尔马提的一些贸易城市，如扎拉、斯普利特④ 均为匈牙利附庸。

卡尔曼在位时，匈牙利的封建社会制度已基本形成。形形色色的奴役人等以及穷困化的自由民逐渐形成后来的农奴。其最重要的变化在于：一度曾是奴隶的人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农户。他们从主人那里得到犁、耕畜和耕地，而以徭役（为主人家庭服役或在主人田间劳动）及实物进行偿付。这些奴隶与贫困化的自由民的不同处，在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好，但不得离开主人迁徙他地。而共同点则是都被迫为地主效劳，不论其原来的地位和目前的地位如何。

十二世纪初，封建的统治阶级也强大了。从国王的贴身随从队伍中形成的大领主阶级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由于领主主要依靠国王赐予的采邑，因此，随着领主采邑面积的扩大，国王本身的土地和士兵的数目就相应减少起来。卡尔曼有鉴于此，一方面

---

① 历史地名。在今苏联乌克兰的加里西亚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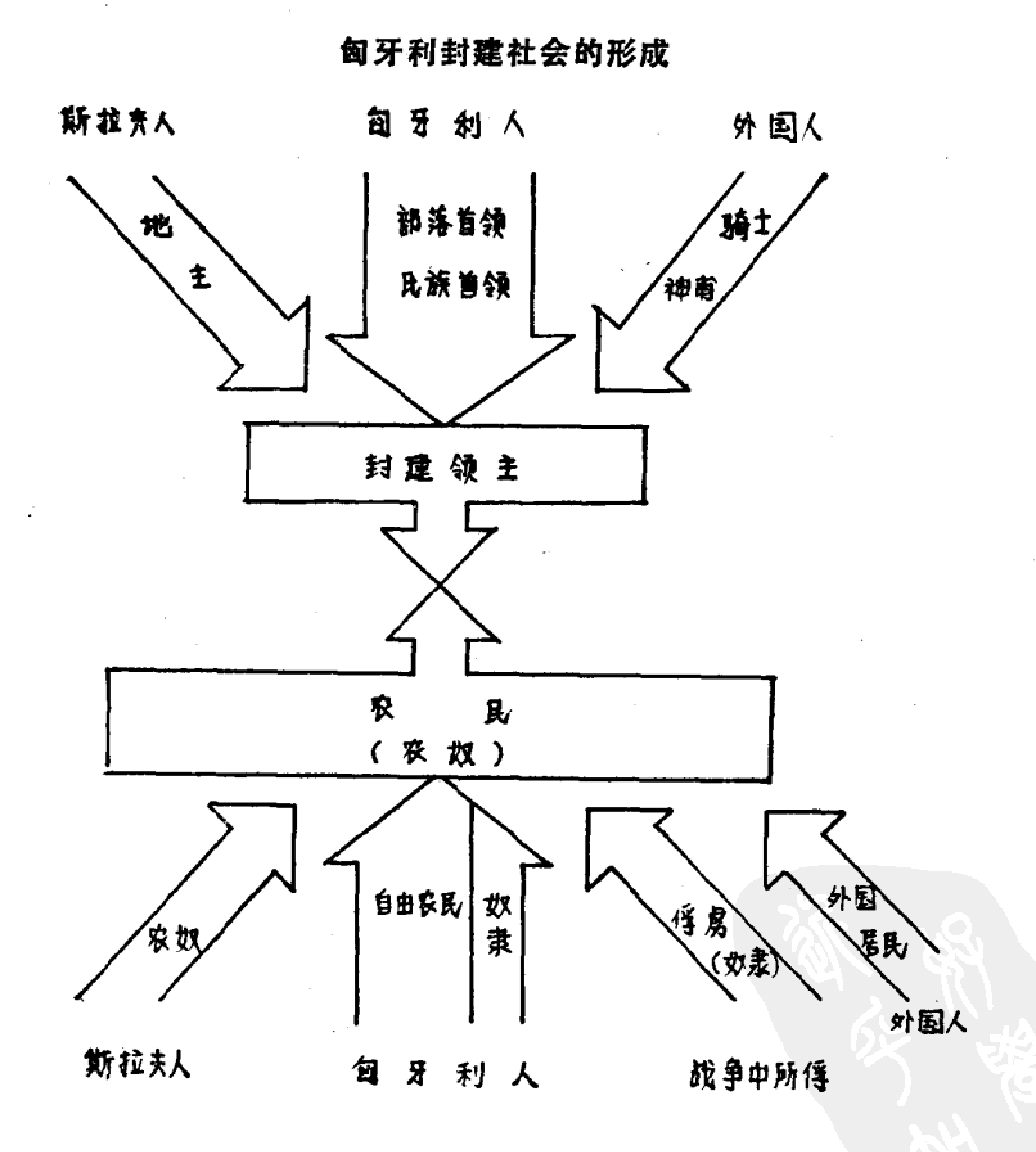
② 历史地名。在今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东部。

③ 即今克罗地亚。

④ 在今南斯拉夫亚德里亚海沿岸。

力图保持现有的王室领地，而另一方面规定领主们按照采邑比例向王室提供带甲武士，以弥补由于领地减少而出现的士兵不足的情况，从而保持精良的武装部队从事频繁的战争。

匈牙利封建社会的形成



为反对罗马教廷和拜占廷帝国的侵略所进行的战争

拉斯洛和卡尔曼的功绩巩固了匈牙利的封建制度，在当时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十二世纪其他一些匈牙利国王却并没有效仿这两位先人，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而是致力于对外作战。他们对巴尔干，尤其是对哈里奇的讨伐次数简直是不可胜数。虽然阿尔巴德家族和哈里奇的统治者之间有着数不清的姻亲关系。（但也许正因为这些关系为干涉提供了借口。）

当时在位的国王大多统治时间不长，寿命也短。在位的时间分别为：伊斯特万二世 1116—1131 年，贝拉二世（瞎子）1131—1141 年，盖萨二世 1141—1162 年，伊斯特万三世 1162—1172 年，僭位者拉斯洛二世 1162—1163 年，僭位者伊斯特万四世 1163 —1165 年。他们统治时间尽管不长，还是多方在萨瓦河右岸扩大藩属，并力图把哈里奇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与此同时，罗马教廷和拜占廷帝国则企图把匈牙利列为自己的附庸。尽管对匈牙利的独立来说，当时无论是拜占廷，还是教廷，都没有第十一世纪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那么大，但是由于双方都在匈牙利培植了强大的势力（教会支持教廷，世俗领主支持拜占廷帝国），因此数十年间战争连绵不断。

长期的战争为世俗领主扩大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战争，国王需要领主们提供军队，因此不断赐予采邑或作出让步以资拉拢。越来越强大的领主于是开始觊觎教会的大量财产。但他们对此尚不能轻易染指，因为教会得到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强大的罗马教廷的支持，有时还有国王的支持。

十二世纪中叶的王位之争为世俗领主和教会之间的斗争提供了大好时机。卡尔曼（嗜书者）在位时，国王和弟弟阿尔摩什谋反，遭到镇压后，连同他的儿子被国王残忍地（但在当时却是习见的）弄瞎了眼睛。但由于卡尔曼的儿子伊斯特万二世没有后裔，去世后便由阿尔摩什的儿子登基为国王，即贝拉二世（瞎子）。按编年史记载，贝拉二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奥劳德① 处决被指控为参与弄瞎国王的六十八个人。

十二世纪六十年代王位之争趋于白热化。拜占廷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一贯深恐匈牙利势力伸入巴尔干，便借匈国内混乱，乘机插手。拜占廷军队先是把伊斯特万三世的叔叔拉斯洛二世送到匈牙利，在拉斯洛二世去世后又把另一个叔叔伊斯特万四世送去，与在位的受到教会支持的伊斯特万三世争王位。但不久曼努埃尔去世，拜占廷帝国日趋衰落，曼努埃尔的梦想也不复再能实现。

十二世纪末叶，伊斯特万三世之弟贝拉三世即位（1172—1196），匈牙利出现了过渡性的安定。贝拉三世在拜占廷长大，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深谙外交策略，巧妙地在各派势力之间争取到二十多年的安定局面，从而使匈牙利有了显著的发展。

十二世纪末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

第十一与十二世纪中，在这块土地上最显著的变化是匈牙利人纷纷建立村庄，这是在冬季住地展开农耕的结果。从事游牧的匈牙利人夏天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只在冬季有相对稳定的住处。

① 即今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省的阿拉德。

其实即使在莱贝迪亚——埃泰克兹时期匈牙利人就已进行少量的农业生产。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冬季住地的重要性也就显得非常突出，于是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村庄。村庄中除帐篷之外，还建了一些简单的房舍或其他建筑物。夏天，也只有牧民离开村庄，大多数人都依旧住在这里，并在附近的草地放牧牲畜。每逢星期日，除留下看守火种的人以外，全村人在村长的带领下到教堂作礼拜。

起初，村庄并不是固定在一处的，如果村庄周围的耕地已不再适合使用，就在远处再行开垦新耕地，整个村庄也就随之迁移。此外，人们并不习惯当时那种用芦苇搭成的狭窄的、通风不好的“房屋”（木头和石头房子极少），只要气候条件许可，村庄的居民宁可住在帐篷里（甚至某些城市居民也这样）。

一些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形成的地方绝大多数可以从其名字中判断出来。在今日的匈牙利，象索尔诺克、切佩尔以及其它以迈杰尔、屈尔特、陶尔扬等结尾的以人名作为地名的，是十一至十二世纪形成的最早的地方。当时，还有一部分是以当时举村从事的行业为地名的，如乌德瓦尔诺克（宫廷侍役），桑托（耕地者），科瓦奇（铁匠），涅尔盖什（鞍匠），乔塔里（制盾匠等）。

匈牙利人在这两个世纪中不但建立了村庄，而且不断扩大住 28 地。当年荒芜的草地和旷野逐渐出现人烟，这样做还有防御上的好处。带有“厄尔”（守卫），“勒韦尔”、“勒弗”（都是弓箭手）的地名以及塞凯伊人① 的定居地带，都证明了上述情况。关于塞凯伊人的历史，根据地名和方言的考察，大体可以认为他们当时在今

① 今日聚居在罗马尼亚中部。关于他们的起源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库恩人的后代，有的认为是土库曼人的苗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在定居时即已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支。在十至十三世纪中逐渐向埃尔代伊（今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迁移。

日的比豪尔州一带聚居，并有部分散居在多瑙河西部。其中比豪尔州的那部分保持着旧氏族形式的塞凯伊人逐渐向东迁移，至十三世纪末到达今日居住的地方。

这时，在林区和山区也出现了一些相当发达的地方。匈牙利人在到达这里的时候，还只在平地、丘陵地和河谷定居。至此，居住地区已达到喀尔巴阡山麓。当然，这样大规模的扩展，光是匈牙利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在这过程中，不断有外来民族到匈牙利这块地方，匈牙利国王也允许他们前来。这样，一部分拜谢涅人、阿瓦尔人、高卢人、乌兹人、伊斯玛伊尔人（穆斯林商人）被匈牙利人同化（雅斯人、库恩人在十三世纪末已在匈牙利定居)。匈牙利一些带有奈麦特(德意志)、欧劳斯(意大利)、捷、俄罗斯字样的地名清楚地说明这些地方最早是什么人居住的。许多外国人乐于前来匈牙利，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内受着剥削，而在这里却可得到一些优待和大量土地。德意志人主要集中于正在向城市过渡的地方。但十二世纪中，在埃尔代伊和塞派什地区[①] 的德意志人也有自相聚居在村落中的。全国还有不少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日耳曼人的村庄。

匈牙利人和非匈牙利人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生息。国王当然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但教会和世俗领主不断扩张领地，造成对国王的压力。在阿尔巴德王朝时期，领地的特点是分散的。如1138年的德默什修道院的文书记载，属于该修道院的一百个村庄分散在绍莫吉、托尔瑙、琼格拉德诸州以及埃尔代伊等地。文书中还谈到附近教徒向该修道院交纳各类实物，如粮食、蜂蜜、家畜或渔猎所得的一部分。(文书还谈到海伦地方的渔民在大斋日期间，每日应交鱼三十条。)在埃尔代伊教会寺院有采盐工人，有的寺院

① 塞派什地区在今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的北部斯皮什一带。

要农奴服徭役。规定石匠、木匠"必须修复教会年久失修的房屋"，为修道院盖工场、畜厩，挖渔塘等等。总之，当时的领主都是自给自足的。

主要的生产是农耕。耕地用铁铧木犁，已经有镰刀和脱粒机。此外，家畜饲养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奥尔弗尔德大平原地区，自由牧放大群牲畜。山区也从事畜牧。沼泽地带和橡树林区放猪——主要也是自由放牧。打渔和狩猎远比在今日的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关于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因文物少而所知不详。匈牙利人到达这块土地前后的情况只能依靠挖掘当时的坟墓进行研究。但到十一、十二世纪，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当时的某些建筑物，今日尚保存着遗迹（如费尔代布勒、蒂豪尼和佩奇诸地教堂的佛龛），一些柱头装饰，石雕墓饰，其中尤以建国国王伊斯特万一世在塞凯什白堡的石棺为最珍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埃斯泰尔戈姆出土的贝拉三世的宫廷教堂和一部分城堡说明了教会在当时对文化和经济具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 29

在十一、二世纪的文化发展几乎全部被宗教化了。对于异教的东西，天主教神甫甚至连历史文物也力图加以消灭。历史上的匈牙利诗史和楔形文字大概就是这样被湮没了几百年，直到十六世纪才重新被发现。早年的异教文化，充其量只在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中和民间传说中被一鳞半爪地保留着。

当时罗马教廷的权力，除在东欧和巴尔干以外，遍及整个欧洲。有关宗教圣者的传说和帝王业绩的记载莫不用教会的通用文字——拉丁文书就，各类文书也用拉丁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在修道院里学会书写的神甫认识文字。当时一些最有学问的教会学者还曾前往巴黎的大学深造。估计匈牙利最早的历史学家、贝拉三世的书记官安诺尼慕斯就是其中之一。 30

今日可以考证得到的最早的匈牙利文也是保留在拉丁文的文书中，主要是一些地名记载。第一个连贯成文的文字记载（录于拉丁文的《普拉伊手写记事录》）是一篇悼文，大概是一个神甫在死者墓前所作悼词的一部分。

从十一、二世纪的情况来看，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中教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地位高的神甫（他们又兼是大地主）是国家宫廷的常客。宫廷会议上往往是他们的话最有分量，国王也常常派他们到外国充当使节。在匈牙利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中主要也由神甫处理事务。

教会的权力惊人，主宰着人们的一切，控制着他们的行动，并且力求控制他们的思想。神父和修士一方面教人们耕地、播种，同时也教育他们对国王、教会和地主唯命是从，卑躬曲膝。神甫们宣扬封建社会的阶级制度是上帝的意志，以万劫不复的惩罚威胁试图造反、违抗教义和法律的人。宣扬勤快、驯服的农民在另一个世界会得到幸福。教会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建立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宗教教义历几百年不衰地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

黄 金 诏 书

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在匈牙利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来，只是业已多次发生过的事件再次出现——贝拉三世去世后，伊姆雷和安德拉斯两兄弟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当时权力正处鼎盛阶段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一手控制着匈牙利的内政外交，决定由安德拉斯即位，是为安德拉斯二世①（1205—1235）。

① 我国一些历史书译作“安德烈二世”。

王位之争至此结束，但这里演变出影响深远的变化——国王的以城堡为中心的州治制度崩溃了。

在十一世纪即有国王赐予采邑之举，但兄弟间的王位之争使这一现象越来越频繁，而且采邑的面积也越来越大。伊姆雷和安德拉斯争相赠予领主。因此，各州内国王和一般领主所拥有的土地逐渐失去平衡。国王尽管还是全国最大的领主，但在各州已不复拥有足够的土地可以作为国王行使行政、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基础，从而破坏了国家最根本性的制度之一——国王的以城堡为中心的州治制，这带来了极为重大的后果。

首先是国王力图弥补因土地减少而造成的国库收入减少的损失。同时，不断的战争和日益奢华的宫廷生活也需要新的财源。国王想增加货币收入以代替实物赋税。但当时货币的流通量极小，因为无论农村还是大庄园，一般都是自给自足，投入市场的产品很少。安德拉斯二世利用国王可以铸币的专权，不断更换货币，减少银子成色，以填补亏空。此外，国王把关卡税收和盐的专卖权租给穆斯林商人和犹太人，由他们经营管理。这些人乘机敲榨剥削，于是民怨沸腾。

不断赐予采邑更增加了大领主们的欲壑，他们分帮结派，相互攻击。随同德意志王后来匈牙利的梅兰[1]人更是在一旁煽动领主们的争纷。土著领主对于这群外来的“国之蟊贼”深怀不满，于是在宰相班克和州督彼得的领导之下，于1213年趁国王安德拉斯在哈里奇作战之际袭击了正在比里什[2]狩猎作乐的王室。此举不但外籍骑士大遭杀戮，连王后本人也未能幸免（以此事件为题材，十九世纪剧作家卡托纳曾创有匈牙利名剧《班克督军》）。事

---

[1] 梅兰后并入蒂罗尔公爵封地。在今奥地利。

[2] 在今佩斯州。

后，国王仅杀掉州督彼得泄忿，其余参加行动的贵族并未受到任何惩处，即足以说明王权衰落到何种地步。1217年，在教皇多次敦促下，国王率领十字军东征，安德拉斯虽然战而无功，仍被授予"耶路撒冷国王"称号，而国内的世俗领世和教会更是"竞相作恶"，国内混乱日甚。

32　外国商人的盘剥敲诈和领主作威作福不仅使原先属于王室土地上的农民，甚至连小地主也怨声载道。这些小地主本来被称为"王仆"，因仅向国王一人负有服兵役的义务。但随着国王不断分赐采邑，国王的士兵大部分随土地转移到了大领主手里，他们面临因此失去原来的有利地位而成为大领主附庸的危险。这情况对于守城堡的士兵和属于城堡的农奴说来更是如此。

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最后发展成为运动。按纪年史记载，1222年春塞凯什白堡国王"视事日""聚集人众奇多，迫使国王颁发"黄金诏书"。所谓"黄金诏书"是书写在羊皮上的盖有金印的诏书。当时一式七份，可惜全部散失，其内容也只是根据后来的记载推断出来的。

"黄金诏书"主要代表小贵族的利益。小贵族根据传说习惯享有某些权利，他们乘机迫使国王正式肯定自己的权利（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自由，有权参加国王视事日活动，产业免课赋税，有权自行处置产业，不在国界以外作战）。"黄金诏书"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被压迫阶层的利益（国王答应出含银成分高的货币，一年只铸一次，约束州官们的为非作歹，命令教会主教，如农民愿以实物交纳什一税，不得勒令其以货币交纳）。对于领导这次运动的大领主，国王答应，不向外国人赐采邑和赠封号，外国人只能担任一个职务。至于后世史书所津津乐道的"担保"一说，是指国王授权给显宦之老，如他本人或后代国王违反黄金诏书，则"无论今日或来日，永远有权集体或个人反对和违抗吾人及后代而

不受惩处。”

鞑靼之灾

安德拉斯二世试图革新，然而碌碌无成。他的儿子贝拉四世（1235—1270）力图使一切都重新回到贝拉三世的轨道上去，刚一即位则着手追究给安德拉斯二世出主意的人：有的被挖眼，有的被投下狱，有的遭放逐，有的被没收财产。新国王力图提高威信，禁止官员直接觐见，甚至烧掉朝廷会议的椅子，不准有任何人坐着和他说话。但最使大领主们不安的却是贝拉四世准备收回被分赐出去的采邑。果然不久以后，他派出人马到全国各地收回“多余的和无用的封地”。

贝拉四世的另一个决定，接纳约四万户逃避鞑靼[①]入侵的库恩人。这些人与当年定居时的匈牙利人差不多，也是半游牧民族，他们被准许在奥尔弗尔德平原（全国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放牧牛羊。可以想象，国王此举给平原周围的领主们造成多大的麻烦。

正值国王和大领主之间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到国家头上——鞑靼人的入侵。这些在十三世纪初刚刚被铁木真（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统一起来的蒙古草原上的半游牧部落，在1240年即已占领了俄罗斯人当时最大、最美丽的城市基辅，并于1241年越过喀尔巴阡山。据当年的编年史记载，入侵人数达五十万。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仅此一端亦足以说明当时匈牙利人的恐惧之情了。

贝拉四世对于鞑靼人可能入侵这一点事先已经有所闻，曾向

---

① 这里说的鞑靼人，实际上是蒙古人。当时以为蒙古人就是鞑靼人。

天主教世界的两个最大人物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和德皇腓特烈二世求援，可是他们正因相互争夺权力而无暇顾及匈牙利。但事实上更大的问题在于匈牙利统治集团并不认真对待这场即将来临的灾祸。国王贝拉四世按照传统派人手持带血的宝剑四出告急，但勤王的军队姗姗来迟。在这危急的时候，一部分匈牙利领主因怀疑库恩人是鞑靼人的奸细，杀了他们的首领克泰尼，从而使形势更险恶起来。库恩人在蒂萨河以东地区烧杀一空后离开了匈牙利。

在这时，鞑靼人的前锋已经向佩斯逼进，大军在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下越过“俄罗斯大门”（维莱茨基山隘）向蒂萨河挺进。他所辖的一支军队在征服波兰和西里西亚以后从西北方向、另一支军队则自埃尔代伊两面向匈牙利包抄过来。

决战在绍约河① 边上靠近莫希的地方，在极为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展开。匈军“象网里的鱼一样”集在一块小小的地方，鞑靼人隔河看得一清二楚。同时，一部分匈牙利贵族也乐于国王交战失利。鞑靼人在佯装渡河以后突然从另一地点发动袭击。万箭齐发，刀剑如林，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没有统一指挥、乱不成军的匈牙利人扑来。匈军全军覆没，国王只和少数几个人冲出重围，幸免于难。

贝拉四世先到奥地利公爵腓特烈（好战者）处避难，之后又跑到达尔马提的特劳堡。其间鞑靼人几将匈牙利东部夷为平地。无数居民或被掳走或遭杀戮。1242 年 1 月，鞑靼人越过结冰的多瑙河，国家的西部也遭蹂躏，只有少数建筑牢固的城堡免遭厄运。当时巴伐利亚的一个编年史家写道：“匈牙利在建国三百五十年以后被鞑靼人消灭了。”

1242 年夏，入侵者突然后退。蒙古首领的习惯，往往在第一

---

① 蒂萨河的支流。

次进攻以后引军后撤，而在第二次进攻后才作长期占领。但他们刚一后撤，适逢成吉思汗去世，俄国不稳，致使拔都没有再发动进攻。当时曾身经灾难的意大利神甫罗杰里乌斯在逃脱鞑靼人的羁绊后写道："我们在荒芜人烟的土地上游荡，……只能靠教堂的塔顶辨别方向……道路野草丛生。第八天，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久拉费赫尔瓦尔①时，除尸骨骷髅、断垣残壁外，一无他物。"

根据不同资料推算，当时多瑙河西部和小平原地带②人口减少20％，奥尔弗尔德大平原人口减少60％。据估计，鞑靼之灾及其后果（饥荒、传染病）使当时的二百万匈牙利人减少了一百万，其他民族损失亦很大。只有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和斯拉沃尼亚山区的斯拉夫人和居住在埃尔代伊山区的塞凯伊人，豪沃什地区③从事游牧的罗马尼亚人损失较少。

---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尤利亚。

② 今匈西北部平原地区，并包括斯洛伐克的一些地方。

③ 在今罗马尼亚奥尔特县一带，奥尔特河以东，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地带。

三、从十三世纪中叶到莫哈赤之败

（匈牙利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

在鞑靼之灾以后重建国家

当贝拉四世回到自己已被摧毁的国家之后，他把重建国家和避免再遭灾难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幸而鞑靼之灾持续的时间不很长。虽然所遭的牺牲是相当惨重的，然而，相对来说，这个国家还是迅速地（在三、四代人的时间内）医治了创伤。农民重新建起了简陋的村舍，人烟稀少的地方重新出现了居民区。库恩人回到了奥尔弗尔德，迁入埃尔代伊的罗马尼亚人迅速增加，德国移民在西部边境城镇居住下来，北部高地居民稀少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也迅速从捷克——摩拉维亚一带得到了补充。

35

出于确保国家安全的考虑，贝拉四世改变了初期所执行的内外政策。在大灾之中他从西方所得到的除了好听的话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这使他意识到，要对付鞑靼人的卷土重来，只有仰仗俄国人。由此，他把对哈里奇一贯奉行的敌视政策代之以与之结成了联盟。贝拉四世在对内政策的转变上则更大。早期他曾竭力收回土地，而这时，为了让大领主修筑城堡，反而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在修筑城堡方面，他本人带头做出榜样，他所建的维谢格拉德地方的沙罗门城堡和罗什保陶克地方的红塔至今犹存，就是这一政策的明证。

在构筑城堡网的同时，贝拉四世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是大力发展城市。他给集市贸易比较发展的地区颁发了特许证书，使他们摆脱了州督的控制，允许免税贸易，保证他们自由选举地方长官和议会，并委派司库(国王的财政官员)进行管理。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王室自由市”。(先后被授予这个称号的城市有阿尔巴德王朝历代国王经常驻跸的塞凯什白堡和埃斯泰尔戈姆，后来又有布达、绍普龙、波若尼① 、纳吉索姆鲍特② 、考绍③ 、埃派尔耶什④ 、巴尔特福⑤ 等。)贝拉四世对某些矿区也授予了城市的待遇，如谢尔迈茨⑥ 银矿和拜斯泰尔采⑦ 银矿等矿区。

贝拉国王继续发展了货币铸造，这为城市和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那时，除了原来唯一的埃斯泰尔戈姆货币铸造厂外，在全国各地又新建了五个(包括后来以制金币闻名的克尔默茨⑧
36
矿区的制币厂)。虽然如此，亦未能完全解决货币的贬值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正在扩大的商品流通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除了铸造的货币外，白银和黄金也同样被用作支付手段。这两类贵重金属在使用时，通常以马克为计算单位，平均每马克金子相当于 250 克左右的白银。反映这个时期特点的还有，在做交易时，除用货币和金条、银条之外，还往往用实物做补充手段。这与匈牙利封建社会初期（当时最重要的支付手段是“小牛”——这一点在伊斯特万法典惩罚条令中已说得很清楚）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明显的进步。

---

①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伐。
②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尔纳伐。
③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
④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雷肖夫。
⑤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巴尔杰约夫。
⑥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⑦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斯蒂阿弗尼察。
⑧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克雷姆尼察。

在重新组建国家方面，我们应当谈谈以城堡为中心的贵族州治制如何逐渐取代以城堡为中心的王室州治制。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虽与鞑靼人入侵没有直接关系，然而事实是，贝拉四世 37 没有能恢复王室领地，当然也就没有恢复王室州治制，因此于 1241 年业已开始的贵族州治制取代王室州治制的进程在鞑靼之灾后加速了。

从黄金诏书运动就已经很清楚地看出，王室州治制度的瓦解使得为国王作战的小领主陷入极为严重的困境。这些所谓“王室侍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他们与国王的直接关系一旦中断，就将被迫为大地主服役，并丧失所享受的特权，而受制于大领主。他们之所以相互配合，全力以赴，力求把他们的特权在文字上得到确认，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局面的出现。就这样，一方面小地主获得了黄金诏书中所确认的特权，另一方面，就逐渐形成了贵族州治制。

根据 1232 年的文献可以看出，居住在佐洛河两岸的“王室侍从”首先团结起来，并在他们自己人之中选举了“地方长官”，以代替他们难以接触的国王和朝廷命官（宰相和大法官），由选举出来的地方长官处理诉讼案件，行使最重要的行政职权。鞑靼人入侵之后（这时侍从被封为“贵族”已经很普遍），形势发展加快了。佐洛河的榜样也被其他地区所效仿。十三世纪后半期和十四世纪初，在全国范围内都建立了贵族城堡州。对于这种变革，历代国王都予以承认，并且委派自己的亲信前往担任这些“州”的“州督”，而这些人往往又是大领主，因此世俗地主的势力在鞑靼之灾以后迅速扩张。

构筑城堡和国王大量赐予土地进一步扩大了大领主（十三世纪后半期，这些大领主通称“巴罗”①）的权势。巴罗们不断加强的物质力量在十三世纪罗马式的建筑上体现了出来。他们在自己庄

园的中心地点建立了宏伟的氏族教堂、氏族墓地。(如十三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莱佩尼教堂，鞑靼人入侵之后建立起来的在雕塑艺术上极有价值的亚克庙堂以及从废墟上也不难看出当年规模一斑的扎姆贝克寺庙。)

然而，真正象征大领主权势的还数城堡。当时，在城堡四周的村庄里，房子多半截埋在地下，都是简单茅舍，屋里烟熏火燎，肮脏不堪。不难想象，在中心地点高高耸立着的城堡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多大的压力。十三世纪的城堡虽然还仅是可住人的塔形单室建筑，但毕竟还是正规的碉堡。碉堡的地下室里掘有水井——就是建在山顶上的也有水井。碉堡的底层用作贮藏室；第二层是哨兵居住的地方，这一层的外部有木制吊桥与外界相通。底层连窗户都没有，顶多留有几个为箭手所用的射击孔。(当时匈牙利人还不知道用枪炮!)从第二层有回旋楼梯与以上几层相通，城堡的主人——住在里面的领主一般用第三层，第四层则由其家庭的妇女成员占用。碉堡内部陈设简单，但是往往藏有贵逾万金的珠宝首饰，因为在当时，首饰工艺已经相当发达了。当然，比这些财宝更加受重视的是那些记有各种特权的证件和国王赐与封地时所颁发的文书。

这种城堡和严加守卫的城堡似的主教所在地以及围墙高筑的修道院都给教会和世俗大地主提供了优越的安全保证，但他们的支出也随之增加了。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需要，他们强迫农民不仅要贡奉实物，而且还要服徭役，甚至还要交纳金钱。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农民强烈的反抗。

在十三世纪五十年代，有时在这个村庄，有时在那个村庄，

---

① 巴罗(Bârô)和匈牙利文里的"男爵"是同一个词。但这里的"巴罗"是大领主的称号，和十六世纪以后贵族等级中的"子爵"不是一回事。

常常发生农民拒绝服役的现象。如一部编年史就记有考洛乔大主教什马拉格德"惨遭奴仆杀害"的叙述。比这种孤立的活动显示了更大作用的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发生的群众性的外逃。在"艰难、沉重的劳动和徭役"的迫使之下，倾村出走的现象多次发生。农民们常在夜幕掩护下潜逃，随身驱赶小的家畜，把用木棍和苇箔搭成的小屋拆掉，所拆之物装上大车拉走，去寻找"比较人道的"地主，有手艺的农奴则力求奔往城市谋生。

30

农奴们的阶级斗争不无成效。一般地说，地主被迫减轻了农奴的负担，因为(正如我们从蒂豪尼修道院在公元1270年流传下来的一份文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彼等人数近日锐减"。农奴的负担逐渐变得统一起来，穷困下来的当年的自由民和附属于土地的"永世农奴"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了。后来，在十三世纪末，整个农奴阶级已经有了自由迁居权。

在大领主威胁下苟延残喘的阿尔巴德王朝末期

继贝拉四世死去(1270)之后的半个世纪的特点是世俗大领主权力的继续扩大和他们的嚣张跋扈。阿尔巴德王朝末期的几个国王，伊斯特万五世(1270—1272)、拉斯洛(库恩)四世(1272—1290)和安德拉斯三世(1290—1301)面对大地主们愈演愈烈的为争夺土地财富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弱肉强食的现象束手无策。

王室土地所有制解体之后，到十三世纪后半期，少数几个巴罗已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交替地占有国家最高职位的头衔（宰相、大法官、埃尔代伊总督、霍尔瓦特总督等)，当然这就更助长了他们的势力。在他们权力阴影下深感自身难保的中、小地主当

然无法与他们的势力相抗衡。这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被迫为他们效劳，为了争取依附于一个大家族作为附庸，而在这个家族的私人军队里服役。作为交换，巴罗们负责保护中、小地主的安全，而且如果有特殊贡献，有时甚至还赠予土地作为赏赐。这几个巴罗，大多设有人数众多的宫廷，宫廷内官员由巴罗从附庸中委派以协助执行国家公职。巴罗和附庸的关系实质上相当于西方的诸侯和附庸的关系。

为扩大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巴罗们不止一次地向邻近地区发动战争。国家第一号显要人物恰克·彼得（宰相兼大法官）于1276年肆无忌惮地向维斯普雷姆市发动了进攻，理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主教是和他敌对的内梅特新堡地方的人。恰克把这座城市和其中全国最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当地著名的教会学校洗劫一空，而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类似的事件在当时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他们相互抢劫牲畜，抢走农奴，劫掠商人。“贵族们的城堡变成了掠夺者的私家院落，用于保护掠夺者。掠夺者无远不至，到处抢劫行人。”这便是主教们在1279年时记载的当时的情景。

阿尔巴德王朝后期的几代国王对当时大领主的横暴权势无可奈何，他们自己的军队已消弱无力，充其量只能指望几个刚用赏赐土地拉拢过来的领主并不可靠的忠诚和他们的军队以及库恩人。1278年，拉斯洛四世在摩尔瓦麦泽① 与捷克国王鄂图卡尔二世对峙时所依靠的也就是以库恩人的轻骑兵为主的一支大约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当时，鄂图卡尔二世的势力已由勃兰登堡② 一直延伸到施塔耶尔国③，拉斯洛四世此举是为了要帮助新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鲁道尔夫④ 获胜。（正确地说，哈布斯

① 今奥地利的马希菲尔特。
② 在今东德。
③ 在今奥地利施蒂里亚州一带。
④ 即鲁道尔夫一世，哈布斯堡王朝的创始者。

堡·鲁道尔夫应当是德意志国王，因为只有在教皇加冕之后——至少到十五世纪末是如此——当选的德意志诸侯才可能得到皇帝称号，然而后来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因为在他们当选之后无论加冕与否都已经能够行使皇帝职权。为方便起见，本书把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一概称作皇帝。）

拉斯洛（库恩）四世的援助促进了继承巴本贝格家族遗产的哈布斯堡家族实现在多瑙河流域的统治。教会和世俗大领主们——一般来说，他们彼此之间是尖锐对立的——在阻止国王继续得到库恩人的援助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可是，虽经教皇使者多方威胁，拉斯洛四世仍拒绝同"异教徒"库恩人分手，大领主们始而一度把他软禁起来。最后，终于收买他的随从，趁娱乐之机把年轻的国王杀害了。从此，库恩人的特殊道路也就此结束。到十四世纪初，旧的氏族社会组织逐渐解体，引进了天主教，在保留一定的特权的情况下，也进入了封建社会。

当拉斯洛四世遇害身死后，阿尔巴德王朝已只有唯一的一个男性成员：安德拉斯三世（安德拉斯二世的孙子）。他是在意大利长大的，因此无论是德国皇帝还是教皇都不愿这位有着意大利式教养的王子继承王位。皇帝和教皇都想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匈牙利国王的宝座。但匈牙利的巴罗和主教们却都一致站在安德拉斯一边。主教们希望他能维护教会的产业，巴罗们则断定这位在祖国没有靠山的新国王不可能会束缚他们的手脚。

可是安德拉斯三世（1290—1301）不想做王侯大臣们的傀儡，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以加强国王权力。他认识到，可以依靠主教和中等贵族们的支持与拥有大片领地的巴罗们相抗衡。因此，他把贵族代表吸收到朝廷议会里，并在制定法律时，重视各州代表

---

① 日耳曼人法兰克公爵家族，奥地利为其封地。

们的意见。安德拉斯三世时代的全国协商会议是十五世纪等级议会早期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前身。国王在扩大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同时，还力图发展国家机构和司法机构。然而他的这些努力还是遭到了失败。由于军事实力操在巴罗们手中，因此他制定的“排挤巴罗”的法律根本不可能奏效。他虽然禁止滥用权势，勒令夷平盗贼据守的碉堡，要求将强暴分子革出教门，但实际上都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有效地执行这些措施。用编年史学家的话来说，那就是“阿尔巴德王朝最后的金枝玉叶是在徒劳无益的斗争中憔悴而死的。”

在 1301 —1308 年这段空位时期内，与阿尔巴德王朝有亲属关系的大家族为争夺匈牙利王位而进行了角逐（如捷克普舍美斯家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然而实际上的权力却越来越落到各地的巴罗们手中了。最突出的是恰克·马泰就控制了几乎整个北部高地的西北部，僭称“大公”。在首府特伦钦① 建立了豪华的宫殿，设有自己的宰相和大法官。同时自造货币，实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并以对等身份与国王谈判。当时，与恰克·马泰情况类似的巴罗，还有在北部高地东部的奥巴家族，在埃尔代伊的坎·拉斯洛，南部有舒比克，多瑙河西部地区的克塞塞家族。 42

此时，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本应当由朝廷来建立正常秩序，但在 1301—1308 年间，王位的逐鹿者之中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局面。卡洛伊·罗伯特虽受到教皇的威望和那不勒斯银行家们金钱的支持，但在匈牙利他却长时间得不到多大的支持。国内有权势的人物宁愿举捷克国王的王子、普雷美斯王朝末代王子文采尔在匈牙利登基为王。教皇的使者为维护卡洛伊·罗伯特，多

---

① 在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次使用革出教门的手段对付对方，这就使混乱局势愈演愈烈。利用教会的诅咒打击支持文采尔的布达城，而几年前就敢于把教会的征税人投入多瑙河的布达人也就反过来诅咒教皇。

激烈的内部斗争逐渐转为对卡洛伊·罗伯特有利。捷克国王把文采尔王子召回本国，因为他认为在匈牙利已事无可为。文采尔走后，另一个尝试者巴伐利亚的鄂图王子虽然被加冕为国王，但当他为巩固王权而前往埃尔代伊向坎·拉斯洛的女儿求婚时，不料遭到囚禁。这位王子最后宁可丢下王冠而逃命回国。就这样，卡洛伊·罗伯特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于1307年在拉科什[①]接受了匈牙利大领主和贵族们的效忠誓言，成为匈牙利国王。

安茹时期整顿封建国家

卡洛伊·罗伯特(1308—1342)统治的前半期主要是在与各地巴罗们进行艰难的斗争中度过的。他先建都于泰迈什堡[②]，此举只是想标志国王在匈牙利已建立了立脚之地。卡洛伊·罗伯特于1312年在海尔纳德山谷的罗兹戈尼战斗中，由于得到考绍[③]和塞派什[④]一带居民的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击败了奥巴家族。在这第一次重大胜利之后，接着又连克彼此也互相交锋的巴罗们的军队，各地霸主的权力从此一蹶不振。在恰克·马泰死后，战乱局面基本上也就随之结束了。斗争的最后一个回合发生在富丽堂皇的维谢格拉德宫廷里。恰克·马泰当年的一个亲信扎赫·费

① 在布达佩斯附近。
② 即今罗马尼亚境内的蒂米什瓦拉。
③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
④ 在斯洛伐克北部斯皮什一带。

利齐安，表面上回心转意，归顺国王，而实际上伺机行刺，最后遭到国王的族诛。关于这次事件，诗人奥洛尼·亚诺什曾写有长诗。

战胜各巴罗之后，卡洛伊·罗伯特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并着手使城堡现代化。这时，朝廷的土地已达到了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国王极力用固定财政收入来保障国家(王室)财政的平衡。这种符合时代发展的措施包括确定固定税收和所谓的王室特殊收 43 入① (这种收入不限于属于国王产业的地区，而是根据国王权力在全国都可征收)。

特殊收入的来源之一是开采贵重金属。在当时的欧洲，匈牙利拥有最富的金矿，除捷克以外，匈牙利开采着最重要的银矿。在这一时期，贵重金属的开采大部分已在矿井里进行。十四世纪中叶，银的年产量约为四千公斤，金的年产量约为一千五百公斤。国王在采矿方面可以得到三类收入：一，征收矿租；二，剩余的矿物只有王家金库有权收购；三，只有国王有权铸造货币。

日益活跃的商业也使国王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在阿尔巴德王 44 朝时期，与国外只能以牲畜、酒，偶尔也以粮食进行贸易。到了安茹时期，这些商品的出口量增加了，同时扩大了工业品的进口量。卡洛伊·罗伯特根据国王权力，规定不论匈牙利商人，还是外国经商者，过境时一律交纳关税。(此后好几个世纪，关税率一直是过境货物价值的3.33%，因此关税被称作“三十分之一税”，海关被称为“三十分之一税务局”。)

安茹王朝也实行了固定税收法。最早的税叫做“地块税”，由在同一地块上耕种的农奴共同交纳。那时农奴耕种的土地面积在全国各地差别很大，一般拥有可耕地、草地或牧场 20—25 霍尔

---

① 比较重要的有进出货物关税，盐专卖权，造币和邮政。

特① 左右。

卡洛伊·罗伯特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后，最后进行了财政改革。1320年前后，在匈牙利流通的国内外货币共有三十五种，而且不断的强制兑换造成了许多混乱。卡洛伊·罗伯特下令铸造“永久性优质货币”，一部分模仿那不勒斯铸造金币，另一部分按照阿尔巴德王朝时期的传统，铸造银币。安茹王朝时代的匈牙利，是欧洲最早使用金本位（金——银本位）货币的国家之一。

进行财政改革也造成了一些困难。由于铸造永久性货币，国王就失去了从每年的强制性货币兑换中可以得到的利益。为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卡洛伊·罗伯特采用了前面所说的“门税”。（后来的一些文书中有时把这项税收叫做“库金”。）

卡洛伊·罗伯特还重新组建了军队。当时驻守各州城堡的士兵数量已大大减少，但国王的收入又不足维持一支常规雇佣军队。于是，卡洛伊·罗伯特下令把大领主的私有武装划归国家统一指挥，但准许领主们仍保留自己的旗号。

45

在经济和军事上进行改革的同时，安茹时期的国家机器也完整化了。为完成经济任务，卡洛伊·罗伯特和后来的拉约什大王扩大并发展了——虽然依旧还不是由国家直接经营——货币铸造业和矿物贮藏制度。在这时期还设立了大司库一职，作为朝廷重要官员。大司库有权对各大城市进行监督，从而确立了对全国经济的独立领导。此外，国家还培养了大量“判官”，以协助由大领主担任的“法官”。这样，司法制度（特别是在直接隶属于国王的那些城堡——库里亚）也趋于完善。安茹时期，教会和非教会的知识分子数量有明显的增长。王室执行机构——总理府不仅处理各种文件事宜，还进行重要的外交活动。

① 一霍尔特相当于0.57公顷。

在安茹王朝中得到重建的国家比阿尔巴德时期发达多了。然而就封建主义的性质来说并未改变。得到巩固的王室政权仍以封建领主为支柱，符合贵族阶层的利益。卡洛伊·罗伯特国王在击败各地巴罗之后，自己只控制了一小部分没收的领地，而把大部分又重新分封了出去。代恰克、奥巴、博尔沙克等家族而起的是劳茨克菲和高劳伊、巴托里和考尼饶等家族。这样，一个新的、忠于安茹王朝的大地主阶级便形成了。体现这个阶级飞速兴起的典型则是高劳伊家族。高洛伊·帕尔在十四世纪初是卡洛伊·罗伯特在南部地区的一个城防官，他的一个孙子到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却当上了国家的宰相。

当时，这个新兴的大地主阶级的第一代是忠于其创始者安茹王朝的。然而到了第二、第三代就已经不那么完全俯首帖耳了。于是，拉约什大王就转而谋求中等贵族的支持。从1351年颁布的法令中就有两项措施是有利于中等贵族阶层的。

1351年的法令进一步扩大了黄金诏书中所肯定下来的贵族特权。起初，全国各地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不同，如有些贵族的特权受到了某些较小的非贵族性的负担（如貂皮税等）的限制，而且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其地位也不明确。拉约什大王宣布，每一个贵族都享有“同一”的自由权，由此便产生了强大的、法律地位上统一的一般贵族阶层。

1351年法令中另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措施是通常所说的“世袭法”规定。贵族封地世袭，也就是说，与以前的规定相反，祖传的封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通过遗嘱转让给外族人。其目的是使财产不致落到本家族或本氏族以外的人手中。

安茹王朝时，这个国家的封建主义特征还表现在对农奴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巩固起来的国家政权保障农民安定生产，但也充分利用已经增长起来的农民的生产能力。同时，农奴也乐于生

产更多的农产品，无论在品种上和数量上都如此。当然，国家、教会和地主也马上进行更多的勒索。从卡洛伊·罗伯特开始，国家征收固定税，而且在1351年——在欧洲鼠疫大流行之后不久——拉约什下令规定地主的九分之一征税法。这就是在教会征收什一税之后（去掉十分之一的粮食和酒，尚留十分之九），地主再征掉剩余部分的九分之一。

拉约什在全国推行这最沉重的实物征收税的主要考虑之一是希望以统一的税收法来限制农奴的往来迁徙。到十四世纪，在全国范围内，地主获得了审判自己农奴的权力，这就使地主的权力更加巩固了。当时人们将这种审判机构叫做"主人衙门"。而大地主还从国王那里得到所谓死刑判决权。这样，地主在自己的衙门内审判农奴，拥有死刑判决权的大地主则可以判处农奴死刑。(这类地主在自己的地界之内竖起了绞刑架，以表示自己拥有死刑判决权。)

安茹王朝的对外扩张政策

在对外政策上，卡洛伊·罗伯特先进行传统的对巴尔干的扩张。可是在豪沃什平原① 一战惨败，他本人也险些丧生。此后，便开始向北方邻国的捷克人和波兰人靠拢。最后，于1335年在维谢格拉德签署了三国同盟，规定相互支援。这个同盟在政治上反哈布斯堡王朝，在经济上实行旨在孤立维也纳的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三国互利贸易关系。这时，匈牙利有两条通商路线，其一是经布达、埃斯泰尔戈姆通向摩拉维亚，其二是途经考绍和塞派

① 今罗马尼亚奥尔特县一带。在奥尔特河以东，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地带。

什地区到达波兰。

卡洛伊·罗伯特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在他的儿子拉约什一世①（1342—1382）在位时期，妄自尊大的扩张政策又重新抬头了。于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都显著强盛起来的国家的实力被为安茹家族利益服务的拉约什一世的侵略行为挥霍 47 掉了。他同巴尔干各国人民交战，同处于极盛时期的城市共和国威尼斯进行了十几年的战争，还同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作战，并且作为波兰国王与立陶宛人和加里西亚人打仗。

拉约什大王在1347年和1350年两次向意大利发起进攻，导火线是拉约什的弟弟——那不勒斯王储约翰娜公主的丈夫安德烈亲王在公主知情的情况下惨遭杀害。拉约什一世复仇心切固然可以理解，但要征服那不勒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行不通的。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那不勒斯几乎远不可及，而且沿途充满着敌对国家。同时，拉约什也不可能得到当地的任何支持。

在巴尔干，拉约什虽然加强了匈牙利的统治，但也很快就走向了反面，因为在土耳其大举入侵的前夕，匈牙利不但没有加强与南部各邻国之间的团结，反而造成了紧张的对立局面。拉约什在其伯父去世之后，于1370年取得了波兰王位，但这并没有在政治上捞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不能同时对两个国家进行有效的统治，特别是无法驾驭波兰的封建大领主。

十四世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安茹王朝最大的功绩是经济上的发展。卡洛伊·罗伯特和拉 48

① 我国一些历史书译作路易一世。

约什大王统治时期，国内出现了数十年的稳定时期，促进了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到十五世纪，业已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农村网，新开垦了不少耕地。这时，木犁上装上了铁铧，用六至八头牛拉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犁是极其笨重的，牛也很差。但用这种犁还是能把地耕得较深，产量也还能多出种子的三、四倍。当时流行的耕作方法是对适宜种植的可耕地实行三三轮作制，这的确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一大进步。（以前是把一块块的可耕地连续耕种，五、六年以后，当地力耗尽，就另开新荒地。在所谓牧场轮作管理上，各种用途的土地并不作精细的划分。）这时，人们已把土地分成牧地、草地和耕地三种，再将耕地按三三制进行轮作。某块耕地如第一年是秋播（小麦、黑麦），第二年则进行春种（大麦、燕麦），第三年荒休。果树栽培也逐渐普及，这使得农村（以及农业经济）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村边或城郊，往往有成片的菜园，葡萄园也越来越多。（当时，人们尚不懂得榨葡萄技术，但在大木箱中用脚踏的办法制出了质地很好的葡萄酒，尤其是塞雷姆地区① 出产的葡萄酒最为有名。迈切克山② 南坡酿制的酒质量也很好。托卡伊和海基奥姚这两种葡萄酒只是在莫哈赤之战以后才闻名于世。）

十四世纪的农民不仅为自己的需要进行生产，而且还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运往城市。农村有“集市道路”通向集市地区。城市里也出现了农产品交易市场。根据历史资料，在1330—1370年间，在埃斯泰尔戈姆的市场上出现的就有牲畜、粮食、大麻、亚麻、干草和葡萄酒。远至波若尼，通过多瑙河把各种粮食和葡萄酒运到布达出售。农民们把在市场上得到的一部分现钱缴纳现金税，一部分则买回工业品。这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劳动分工，也加速了

① 今南斯拉夫德拉瓦河与萨瓦河之间地区的东部。

② 匈西南部，佩奇以北山区。

城市发展。

集市所在地大部分是所谓的“农业市镇”。通常是某一领主的辖地，它们享有比农民居住的小村庄较大的自主权，可以自己选举镇长，在经济上也享受着许多优待。由于这种小城镇有独立的手工业者阶层和自己的市场，因此在经济上比普通村庄更强大，人口也更多。但在一部分农业市镇中，可算作最大特权的是可用一笔总的款项向领主交付租税。农业市镇里逐渐资本主义化的农民，对于交纳这类长期租税已经不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而且由于不是按人头课税，地主对农奴的限制已不是那么苛刻，束缚得也不那么严格了。

属于国王的城市不受领主们的控制。在这些城市里，人们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市民享有若干自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只有国王才有权进行管辖。那时，在十四世纪，社会的分工尽管还不完善（其原因是：例如葡萄生产在匈牙利某些城市中，当时是一项主要的经济来源，占有特殊地位），但城市内外的生活情形与其他任何早期的居民区的生活情况相比，已经大不相同。

城市的四周筑有城墙，只有通过坚固的城门才能进入城市。城墙内建有石头房屋和城堡。那些窄小弯曲的街道通常是以各种手工业行业来命名的（如铁匠街、磨坊街等），这是因为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一般聚居在同一条街上或城市的某一部分的缘故。

当时，城市的居民数也仅仅几千人。到十四世纪末，布达城可能有八千到一万人，其他城市里最多的也不过四、五千人。市内最阔气的人都是一些富有的商人。市长和市议会的多数成员通常是从这些人中挑选充任的。富商们的高宅大院傲然挺立在集市的广场上、耸立在中世纪的市中心广场或建筑在哥特式教堂的毗邻之处，他们的房屋的外形也与众不同。在等级上，除他们以外，就是行会会员和手工艺工匠，这些人还能参加城市的领导。流落

到城里的农民只能打短工，护理葡萄或卖水，至于那些行会里的学徒、小伙计等则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加上大量的教士、僧侣、乞丐、流浪汉和少量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文化人、医生、药剂师、艺人等便构成了城市的全貌。

这时的手工工匠已开始组织行会。(今日所能查到的第一份行会文献是由拉约什国王于1376年颁发的，是发给埃尔代伊撒克逊人地区的行会证书。普遍建立行会组织是在十五世纪。)当时，工匠按照城市和专业组织成一个个行会，例如考绍市的毛皮行会和布达的首饰行会。行会组织中为首的是师傅，会员都是工匠。行会组织中的学徒甘愿忍受艰苦的学徒生涯以及要冒流落国外的风险，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工匠。

行会规定并监督商品的质量、价格和原料使用量。行会在同会外工匠的竞争中维护会员利益。固定的行会章程和严格的生活制度使行会变成了与世隔绝的组织：行会会员集体作礼拜，如有外敌进攻，共同保卫一个城堡或城市的某一部分。会员在自己行会的店铺中出售货物，也把货物装在用铁条加固的大木箱中用大车运到城郊的市场上出售。

对外贸易则完全由富商掌管。从匈牙利运往国外的首先是原始产品，如活牲畜、葡萄酒以及边境地区出产的粮食，但最主要的出口物品是金和银。与此同时，从国外进口工业品和高级消费品。丝绸和调味品从远东国家进口，呢料从佛兰德①、武器和金属制品从德国进口。

安茹时期，在活跃的经济生活影响下，文化和艺术领域也是丰富多采的。宫廷就是骑士文化的中心，建立了四塔形迪欧什久尔骑士城堡。这座城堡即使从遗址来看也是极为壮观的。城市的

---

① 今比利时。

集市广场通常建有哥特式教堂和市政厅，这些建筑物都挺拔高耸，气象不凡。(考绍、肖普朗、波若尼和布达都还保留着这种优美建筑的古迹。) 当时的文化遗迹还有布拉格堡院落里的圣·乔治雕像，以及几经周折，在几十年以前刚带回国的十四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插图编年史。上世纪末，在尼特腊① 一间房子的角楼里找到了第一部匈牙利文的十四世纪《约凯伊手写纪事录》。与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建立大学的同时，匈牙利也于1367年在佩奇创建了大学，可惜很快就停办了，保留下来的也仅仅是这所大学的遗迹而已。

封建领主的割据。卢森堡·日格蒙德

拉约什大王去世以后，安茹王朝也就随之解体。接着而来的是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血淋淋的搏斗和激烈的派系斗争的年代。这时，波兰也分裂出去了。波兰的封建主们把当时匈牙利国王年龄最小的公主海德维格献给了异教的立陶宛大公亚盖隆为妻。安茹王朝的从那不勒斯前来即位的卡洛伊二世（小卡洛伊）到匈牙利后没有几星期即遭杀害。在南部，叛乱的大贵族杀了宰相高劳伊，勒死了拉约什的王后，并关禁了在位的女王玛利亚。在持续了多年的内部动乱之后，玛利亚的丈夫日格蒙德登基为王(1387—1437)。

权势很大的卢森堡家族② 此时控制着德意志帝国的皇位。这个家族最闻名的成员捷克国王卡洛伊四世(布拉格大学的创始人)

① 在捷克斯洛伐克。

② 日格蒙德是卢森堡家族成员。

也刚去世不久（即使这样），面对匈牙利的局势，日格蒙德也同样束手无策。当年效忠卡洛伊·罗伯特的贵族在两、三代之后，他们的后代都变成了不可一世的地方霸王。这些人攫取了大约占全国40％的土地（在这一过程中，国王的土地则从20％缩减到5％）。

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各大贵族（巴罗）家族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出于各自当时的需要，结成集团，互相展开了残酷的斗争，连大名鼎鼎的劳茨克菲家族也未能幸免。但是，在尽可能地剥夺国王的权力这一点上，他们却都是一致的。国王日格蒙德本人于1400年被大贵族们在希克洛什堡① 监禁数月之久，后深知无计可施，也就承认了现状。自此，国王实际上成了和贵族们地位相同的人物，只是位列第一而已。

在此期间，匈牙利南部边境上出现了——本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敌人之一——土耳其。在十四世纪初，人们对于奥斯曼的后代几乎一无所闻，但此时，他们宛如迅猛的风暴崛起于小亚细亚，于1354年跨入欧洲，1389年的里戈麦泽② 一战打垮了巴尔干各国的联军，将势力扩展到多瑙河下游地区。日格蒙德国王募集了西欧骑兵部队，希望以此抵挡这股洪水猛兽般的危害。骑兵部队的首领们尽管吹嘘“天塌下来，我们也能用矛枪擎起！”但在尼卡波伊③（1396）面对土耳其人灵活的战术、有层次的作战队列和合理的指挥，骑兵部队惨遭失败。

53 在尼卡波伊的惨痛教训之后，日格蒙德国王完全放弃了进攻土耳其人的想法，而只致力于保住自己的捷克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了。后来他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卷入了由于教会

① 在巴兰尼亚州。
② 在今南斯拉夫科索沃——波列。
③ 今保加利亚尼科波尔。

分裂而造成的复杂的西方政治斗争。在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西方教会同时有两个、有时甚至有三个教皇。在日格蒙德主持下，于 1414 年召开了教廷会议，表面上恢复了教会团结，但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却把胡斯·亚诺什作为异教徒予以火刑，从而引起了长达数十年的胡斯运动。由于日格蒙德的努力，加强了此后匈牙利历代国王作为本国教会最高保护人的地位，取得了选择主教的决定权，只有国王同意才能宣布教皇诏书。因此，在 1404 年颁发的而又由这次教廷会议所重新肯定的文告大大缩小了教皇在匈牙利的影响。

日格蒙德半个世纪的统治难以一言以蔽得失。他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也登上了捷克国王的宝座，但却不能击破大贵族集团，而且在南部边境地区还时常遭受土耳其人的骚扰。日格蒙德在政治上支持中小贵族，促进城市发展，是他政策中的一个积极方面。日格蒙德下令保护本国商人，主张扩大城市法庭的权限，还吸收外国技师，设法提高本国消费工业水平，并试图统一度量衡。当然，这些愿望良好的措施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如统一度量衡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才实现）。然而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行会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城市日益富庶，并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日格蒙德时期，城市中开始形成等级制度，并从世纪中叶起，在国家议会中也有了各城市的代表。

等级制度的发展是封建时期欧洲的普遍现象。实质上就是社会上特权相近的各阶层为自己划个圈子，同时把这种地区性的等级划分扩大到全国的范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不断发展自己的特权，并使之永远保持下去。为此目的，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一致行动，按照本阶层的利益决定自己的各类政治上的对策。

匈牙利等级制度的发展在中小贵族阶层中表现得尤为清楚。在十三——十四世纪，从有各种少量地产和特权的人们（小领主，

外族移民区首领，地方政权官员）中形成了权利上统一的中小贵族阶层。贵族州治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建立——虽然仍处于大财产主的监督之下——巩固了中小贵族阶层的统一，并提高了中小贵族对权力的意识。正因如此，历代国王都常常借他们之助与大贵族抗衡。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小贵族阶层巩固、继承了自己的特权（人身自由权、免税权、州自治权等），并能够将他们的特权移交后代继承下去，而且，他们还逐渐达到了经常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目的。

到十五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城市等级的形成，等级制度的发展已告结束。在当时的匈牙利政权内部共有四个等级：大主教、大贵族、中小贵族和市民。

等级制度最重要的机构是（等级）议会，参加议会的只能是各等级的代表。在议会上制定法令，通过税收，也决定军机大事。等级议会在匈牙利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决策机构是在日格蒙德死后①。（而英国在1265年，法国在1302年就已有了等级议会。）

在等级制度的国家里，市民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而农奴则完全被排斥于国家政权之外，事实上也不可能组成等级。作为整个封建制度的统治阶级——大主教、大贵族和中小贵族尽管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但在如何压迫农奴这一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55

1437年的埃尔代伊农民起义。布达伊·纳吉·安道尔

农耕的发展和为供应城市市场而进行的生产使农民能够获得

① 1437年。

现金收入，也使农村变得富裕起来。在茅草的农舍里，住房和厨房分开了，在盛放节日服装箱柜的抽屉里开始出现了银币。但是这也引起了地主们的贪心。当时，某些贵族毫无理由地把比较富裕的农民抓起来，然后勒索赎金。教会和世俗地主们无止境地向农民榨取钱财已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

农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早期表现为与正统的教会学说相背离的异教学说蔓延开来。教会，乃至地主都以圣经的话为根据。离经叛道的人们也如此，只是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罢了。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通过从布拉格来的传教士，胡斯运动在匈牙利也传播开来了。

胡斯学说主要在南部和埃尔代伊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因为这些地方的局势比全国范围内的情况更为严重。按照当时教会的报告，“中了胡斯主义毒的人们”宣扬上帝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即农奴、教士、贵族都一律平等。他们不承认教皇，甚至认为有财产的神父在灵魂之中有着一百个恶魔，他们要求取缔教会的财产。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以宗教的形式反对封建制度。因此，教会和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共同起来对付这个运动也就不足为怪了。教会派了调查人员去扼杀异端，如果断定谁是叛教者的话，即便人已死去，也要焚尸扬灰。

南部地区最后“安静”下来了。但在埃尔代伊，胡斯运动在被扼杀之前却有力地促进了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埃尔代伊主教莱派什·久尔吉由于币值下降——三年内没有征收什一税——而在1437年要农民以优质货币补交三年的税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匈牙利族和罗马尼亚族的农民拿起了武器，起义领袖是下层贵族布达伊·纳吉·安道尔。科 56
洛日瓦尔城① 的多数居民也都支持起义。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

农民起义军在代什[①]附近战胜了封建贵族的军队，贵族被迫同起义军谈判，并在科洛日修道院前——当时一般都在这里签订契约——达成了协议。协议废除玖一税，保证自由迁居权，并且允许农民也作为一个等级参加议会。农民代表每年也能集会一次，以便检查协议执行情况。科洛日修道院的协议实际上并未能实现。在埃尔代伊地区的匈牙利、塞凯伊和撒克逊的统治阶级在卡波尔瑙达成协议，结成联盟，形成极为强大的军事上的优势，并宣布协议无效。1437年，西军在科洛日瓦尔附近进行决战，起义军大败。布达伊·纳吉·安道尔本人亦以身殉。

在胡尼奥迪·亚诺什[②]领导下的抗击土耳其的斗争

正当埃尔代伊和匈牙利的贵族们鱼肉农民的时候，土耳其加紧了对巴尔干的扩张。他们企图以欧洲战场罕见的大量军队来实现征服全球的目的。土耳其军队的主力是轻骑兵，即所谓“斯巴希”。他们在军队服役可得到苏丹赏给的产业。闻名的土耳其近卫军，即所谓“约尼查”，是一支保卫苏丹[③]或军队统帅的步兵。这些人原来是从被征服地区强迫而来的孩子，土耳其人把他们训练成了扩张政策的驯服工具。兵营就是近卫战士的家，他们的职业就是打仗，他们以僧侣的那种狂热的盲信进行着“圣战”。

土耳其的正规部队总是以大量无组织的盗匪为先导。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在南部地区已时常出现“突袭者和纵火者”，这就很

① 今罗马尼亚的德治。

② 我国一些历史书译为“匈雅提”。

③ 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的称号。

清楚地表明匈牙利的灾难就将来临了。匈牙利最富庶的地区已成为敌人俎上肉。在受到威胁的周围地区，虽多次发动征讨，但收效甚微。正如某个同时代的人所说，大贵族们对土耳其人"不寒而栗"，无力自卫的国家"面临着被占领的危险"。正在这时，胡尼奥迪·亚诺什的首次胜利给反土耳其的斗争带来了转机。

属于小贵族的胡尼奥迪家族原是从邻国豪沃什平原来到这个国家的。①胡尼奥迪的父亲曾是日格蒙德王室的宫廷侍卫官，并被赐予沃伊道胡尼奥德堡。②胡尼奥迪自幼从军，在一些大贵族军队中作战。后来当了国王随从，去过意大利和捷克。三十年代末，他到南部地区几个处于土耳其"虎口"边上的边防要地充当城防长官，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自此，他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用到了抗击土耳其的斗争上。其间，国王几经更迭〔日格蒙德之后是其女婿艾伯特·哈布斯堡(1437—1439)；然后是艾伯特的幼子、后为亚盖隆家族的乌拉斯洛一世（1440—1444)〕，大贵族集团忙于内战，纷争无日或息。仅有胡尼奥迪的部队阻止住了苏丹军队的进犯，于是他便成为土耳其人唯一的"尅星"。胡尼奥迪先后担任瑟雷尼③的督军，泰迈什州州督，埃尔代伊总督，直至成为全国最高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四百多万霍尔特土地的拥有者、全国最大的地主。然而他不同于其他封建贵族的是，当贵族们为各人的私利在互相厮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切财富和官职当作抵抗土耳其的斗争工具。

胡尼奥迪是一个真正的封建贵族，但同时也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把驱除土耳其的侵犯视为毕生的目的。这位伟大的将领写道：

57

① 当时豪沃什平原是个独立的大公国。

② 在今罗马尼亚胡内多阿拉。

③ 瑟雷尼在多瑙河东岸、今罗马尼亚境内，并非今匈牙利巴兰尼奥州的瑟雷尼区。

"我们看够了套着枷锁的男人和被凌辱的妇女，我们看够了满载头颅的大车和拍卖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们的惨景！我们尝够了对我们宗教一年甚似一年的侮辱！我们的敌人向我们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只要我们不粉碎他们，他们将永远也不会停止向我们进攻。我们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按照既定目标，胡尼奥廸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是以攻为守，即所谓积极防御。他认为："既要敢想，也要敢于行动"。在他指挥的战役中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442年，土耳其统帅迈齐德贝伊① 率兵进入毛罗什河谷。面对强敌，胡尼奥廸毫不畏惧，在遭到失败后仍不气馁。他号召农民们拿起武器，经过五天激战，在久拉费赫尔城② 附近终于全歼了土耳其侵略军。土耳其苏丹由于这次惨败而举欧洲全部力量来对付胡尼奥廸。胡尼奥廸勇敢迎战，击溃了比自己强大多倍的敌军。1443年秋，胡尼奥廸会同国王乌拉斯洛一世向敌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他们以包括巴尔干各族军队在内的约三万人的力量占领了尼什③、索非亚，只是因为天气过分寒冷，胡尼奥廸才没有越过巴尔干山脉而直捣当时土耳其首都德里纳波伊④。保加利亚大部分国土也获得解放，苏丹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在塞格德媾和。

58 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却突然遇到了极为困难的年月。在教皇使者的劝说下，国王背弃和约，并于1444年秋季匆忙集结部队，向土军发动进攻。他们寄希望于教皇的诺言，说届时将派舰队阻止亚洲的土耳其军队前来增援。而实际上总共由几艘帆船组成的教皇舰队并未能挡住土耳其军队。热那亚人以一个人一个金

---

① 贝伊，土耳其高级官员称号。

② 即久拉费耶尔，今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尤利亚。

③ 今南斯拉夫的尼什。

④ 今土耳其埃迪尔内。

币的价钱把土耳其士兵渡了过来，土军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港几乎全歼匈军。国王也阵亡，于是国内大乱。自相冲突、互相摧残、地方割据的局面再次泛起。约翰主教在概括当时的情况时说：“暴力成了法律的标准，国家正在走向崩溃。”

在局势最严重的一段时期内，为了克服无政府状态，国会选举胡尼奥迪为执政。虽然这位伟大的反土耳其的英雄也未能触动大贵族们的权力，但他还是建立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局面，使他有可能着手准备重新进攻土耳其。正如他所说：“以前，我们用盾没有获胜，今后，我们将以剑对付敌人。”

1448年，一支小而装备精良的部队通过巴尔干向里戈麦泽（科索沃波列）方向挺进，并计划与阿尔巴尼亚自由斗争的英雄斯坎德培部队会合。但由于计划被泄露，侧翼逃遁，胡尼奥迪孤军奋战三天后败于优势的土耳其军队。

胡尼奥迪经过艰难险阻，历经数月才回到匈牙利，但此后已无法将政权重新巩固到足以再次发动进攻的程度。1452年，艾伯特的幼子拉斯洛五世从伯父德皇腓特烈三世那里回国时，胡尼奥迪辞去了执政职务。由于他的丰功伟绩和深得民心，政敌从未放弃谋害他的打算。但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敌人将再度对匈牙利发动猛攻已成定局时，统治集团再次起用胡尼奥迪。

1456年，穆罕默德二世——声言“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地上只有一个统治者”——调集十五万大军（一说是二十万）重重包围了南多尔费赫尔城。① 此城为当时匈牙利的门户，如果失守，那将给土军打开通路。在此危急之时，胡尼奥迪几乎只身对敌。大贵族们闭关自守，王室也逃到了维也纳。西方国家坐视不救，而教皇仅仅口头宣布派遣约翰·卡皮斯特兰诺② 组织十字军征战。建

① 即今贝尔格莱德。

② 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

立在多瑙河和萨瓦河合流处的城堡由胡尼奥迪的内弟西拉吉·米哈伊守卫。当土军将领率重兵把城堡与外界的联系切断时，城堡的守兵总共只有几千人。但是胡尼奥迪并没有放弃这座城堡，他率领由自己封地的人众和约有四万人的十字军赶往这座城堡。当他们到达时，城墙已多处被土军大炮击开缺口，外层守卫线失守，精疲力尽的士兵正准备作最后一战。当时，胡尼奥迪首先冲破包围网，突入城内，亲自指挥作战。由于外部城墙已被敌炮火几乎全部摧毁，敌人的冲锋就变得更为危险，有一次甚至到达了内城门下。后来有一份史料清楚地记载着："其中有一个土耳其士兵把宣告胜利的马尾旗插到了堡垒的塔顶上，但是杜戈维奇·蒂图斯以生命的代价把敌旗又扯了下来。"1456年7月22日，十字军战士大举反攻。一支由工匠、农民、穷人、乡村神甫、学生、游方教士组成的大军给土耳其军队以突然的打击。当土耳其苏丹试图切断他们的退路时，胡尼奥迪进行突击，并占领了土军炮兵阵地。土军背腹受敌，仓皇逃遁。

闻名世界的南多尔费赫尔城保卫战的胜利把匈牙利的厄运推迟了七十年，但也遭到重大的损失。几周后，这位反土耳其的著名人物、伟大的胡尼奥迪·亚诺什因鼠疫流行死于军营。

马加什国王[①]

大贵族齐莱伊——高洛伊集团企图利用胡尼奥迪·亚诺什之死想消灭胡尼奥迪家族的力量。他们先是多方造谣诽谤，继之以武力要挟胡尼奥迪·亚诺什的儿子拉斯洛交出南多尔费赫尔城。

① 我国一些历史书译为"马提亚·科尔温"。

但是胡尼奥迪·拉斯洛将前来的军队关在城外，只允许齐莱伊及拉斯洛五世入城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齐莱伊拔剑威胁，被胡尼奥迪的支持者所杀。此时，被吓呆了的国王拉斯洛五世惊恐之余起誓对此事不予追究。但当他回到布达时，却又充当了胡尼奥迪反对派的工具，把胡尼奥迪·拉斯洛兄弟和主要支持者一起骗入朝廷，并在圣·久尔吉广场将胡尼奥迪·拉斯洛斩首。

面对这极端严重的非法行为，胡尼奥迪派人士在西拉吉·米哈伊和西拉吉·伊丽莎白[1]领导下开始组织武装行动。惊慌失措的国王以拉斯洛的弟弟马加什作为人质逃到了布拉格，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并在他准备结婚时突然死去。(可能是被毒死的。)

1458年1月，大贵族在布达城，中小贵族在拉科什，冒着严寒，召开国会，选举国王。大贵族的多数支持德皇腓特烈，另一部分则主张从亚盖隆家族中挑选，而高劳伊·拉斯洛宰相和乌伊洛基·米克洛什督军则迫切希望自己出任国王。但是，中小贵族和全国百姓却希望选举胡尼奥迪之子马加什为国王。在长时间的争执之后，特别是当率领着近二万兵力的西拉吉·米哈伊向反对 61 者声言“那就让我的剑来选择国王”的时候，大贵族们被迫让步了。

年轻的马加什国王的政权在开始时还是软弱的。当时西拉吉·米哈伊为了使马加什当选，接受了反对派领袖们的极为苛刻的条件，并以马加什的名义答应不因其兄之死而进行报复，保留对方的官职封地，不征收特殊税，娶反对派领袖的女儿为妻。为了实现以上各项诺言，由西拉吉·米哈伊担任五年执政。无怪马加什初期的一部分文件只是当盖有几位最高贵族的钤印之后才能得到外国的承认。

---

① 胡尼奥迪·亚诺什的内弟和妻子。

1458年马加什即位时，国家各方面都受到敌人的威胁：南面是强大的土耳其，北部和西部有权势极大的王位争夺者。与此同时，正如一个编年史作者所写的那样："匈牙利瓦解了，已变得四分五裂，而且各部分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例如，以捷克雇佣军为支柱的伊什克拉数十年以来历来和朝廷刀兵相见，独霸一方。全国其他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在此期间，外敌内患有增无已，国库空虚，军队无力。

然而，马加什并未在困难面前后退。宫廷历史学者蓬菲尼[①]写道："他生在战乱中，长在军营里，在战士的帐篷中长大成人。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学会了在受到包围时如何解围、战斗直到最后胜利的本领。他游渡多瑙河，不论寒冬盛夏，日夜手执武器，他能耐饥受寒，不停地寻找敌人的踪影，他最讨厌胆小和懒惰。"

马加什国王雄才大略，他听取了他的老师维泰兹亚诺什[②]的意见，废除了在竞选国王时作为交换被迫接受的所有条件。他没有向高劳伊家族求婚，却娶了波迪布拉德[③]的女儿卡塔琳为妻。他甚至敢于一度把当年为自己争得了王位、如今却桀骜不驯的舅父西拉吉·米哈伊关押在他的维拉戈什城堡，并同大贵族乃至武装侵入的腓特烈三世进行了坚决的对抗。虽然几经艰险，但终于击溃了大贵族集团，迫使德皇进行和解。腓特烈交还了伊斯特万国王的王冠，马加什接受的条件是：如他日后无嗣，则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匈牙利王位。

对大贵族集团所取得的胜利和击退哈布斯堡的进犯，为重新开展反土耳其的斗争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土耳其在巴尔干业已立稳脚根，而马加什又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力量，因此，这位伟大的

---

① 意大利人。

② 维泰兹是一种封号。

③ 当时的捷克国王。

反土耳其英雄的儿子不能发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战役。1463一1464年间发动的波斯尼亚战役只是为了巩固南部边境线。最大的胜利算是占领亚伊察[①]这座城堡了。战斗的胜利使入侵者大为惊恐。然而，马加什并未以应有的力量把最为重要的反土耳其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此以后，马加什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巩固中央（王室）政权和实现对西方的政策上。他认为，理想的统治手段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并希望“制止地方统治者之间无休止的、可恨的冲突。”他把相对说来比较软弱的城市资产阶级视为实现他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作为实现他宏大计划的经济基础则是当时的匈牙利，相对说来，这还算是一个人口较多、较为富庶的国家。那时的人口可能在三百五十万到四百万之间。按西方的概念，城市尽管最多不过一、二十个，但约有八、九百个农业市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贵重金属的开采一直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

马加什充分利用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建立了独立于大领主的军队和国家机器，超然于他们之上。马加什国王接过了先辈们建立的行政机构，并进行了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从而逐渐将重要事宜的处理权从大领主手中集中到政府机关中了。重大国务由总理府处理。总理府的官员、秘书、书记为朝廷会议准备材料（这样，大贵族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大大降低了）。朝廷议会制定文件，处理外交公文。国家的经济领导和王室的税收由大司库掌管。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为“御前法庭”，御前法庭的法官不是凭当事者决斗的胜负，而是根据证据和法律进行审判。在所有行政机构中，专长、技术这时第一次成为决定性的标准，从而向下层贵族、普通公民、乃至农奴出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上升的可能性。

---

① 今南斯拉夫亚伊采。

65 马加什政权最强大的支柱——在他死后——是被称为"黑军"的雇佣军。这支有名的雇佣军在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二万名骑兵、八千名步兵、九千辆战车以及二百艘多瑙河上的战船和炮舰的一支部队。马加什的炮兵也是赫赫有名的。(伊万三世曾要求他派人去莫斯科帮助铸炮。)军队的指挥官相当杰出，如基尼日就有匈牙利的海格立斯① 之称。传说他能肩扛磨石，并能轻易地举起装满一奥科② 水的大桶。军队中的大部分人是从捷克、波兰和德国雇佣而来的，但军中最杰出的还是国王自己，他是那个时代最有素养的军事统帅，又是一位高明的情报家，必要时，还能身先士卒，又可冲锋陷阵。

维持这样大规模的雇佣军和日益庞大的行政机构需要大量经费。由于富裕的城市少，极大部分税收需要农民负担。1467年在布达举行的国会上，对税务制度做了根本性的改革。安茹王朝时代的"地块税"和边境上的"三十分之一海关税"，当时已有许多人享有了免税特权。因此，这两项税收都予以废除，代之以由国王征收的"王室国库税"和"王室海关税"。征税方式也做了变更，不再以地块为单位，而是以农户为单位征税。这项变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在一个个地块上往往住着好几家农户。这样，按"农户"征税增加了王室的收入。此外，马加什国王还按地块征收一福林的特别军税。这样，国库征税收入曾多次接近、甚至超过一百万福林，而远比匈牙利富强的法国国王税收量也不比这个数字大多少。马加什当然知道，农民的负担是有限度的，因而他坚决阻止教会和非教会地主进一步剥削农民。他防止了土耳其入侵，制止了大贵族的横征暴敛，从而保障了农民的生存和财产。他维护农民的自由迁居权，支持自由农民努力经营，并给予各种优待以

---

① 大力神。源于希腊神话。

② 匈牙利古代量器。全国不统一，通常约合今日50—60公升。

发展农业市镇。因此，他在普通老百姓的印象中，是一位伟大国王的形象，是伸张正义、支持农民、打击富豪的统治者的典范。

马加什把匈牙利增长起来的力量用到了实现宏大的外交计划上。他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多瑙河王国。他打算在取得捷克和奥地利的若干省份之后，谋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座。他对于世界政治的设想是：只有在中欧实现了如此规模的统一之后才有可能粉碎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权，才有可能实现胡尼奥迪·亚诺什的未竟之业。基于这种政治设想和战略方案的外交政策，从六十年代中开始便是：对土耳其方面采取防御、对西方则实行进攻。

首先对捷克发起了战争。马加什受到教皇的鼓励，率领十字军讨伐他已经去世的第一个妻子的父亲、捷克国王波迪布拉德，借口是捷克国王支持过异教胡斯运动。这场持续时间很长(1468—1476)的战争，其侵略性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军费支出也太大，66 因此激起了普遍的不满。就是在最忠于国王的亲信中，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如维泰兹·亚诺什① 和亚努斯·潘诺尼乌斯②），但马加什却以果断的行动迅速平息了反对者的行动，并击溃了谋求王位的波兰亚盖隆·卡兹梅尔的武装进攻。最后达成妥协，马加什获得捷克国王称号。至此，除捷克外，他还辖有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并实际上控制了劳齐茨③ 。

在对捷作战之后，国王由于得到了绍巴奇④，从而加强了南部边境。但即使如此，也时常发生一起起较大的入侵事件。1479年，巴托里和基尼日在毛罗什谷地的凯涅尔麦泽⑤ 所进行的一场

① 红衣主教，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在选举马加什国王一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一度任马加什的总理大臣。

② 维泰兹·亚诺什之侄。佩斯主教。

③ 在今德、波、捷交界地区。

④ 今南斯拉夫沙巴茨。

⑤ 在今罗马尼亚境内毛罗什河流域的谢博特和奥勒什蒂之间。

战果辉煌的战斗，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67 马加什时期，匈牙利最顽强的敌人是哈布斯堡家族。他们看不到匈牙利在反土耳其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征服匈牙利或谋求匈牙利王位，并极力干涉匈牙利政治生活的进程。为此，胡尼奥迪·马加什同腓特烈三世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马加什占领了今日奥地利国土的绝大部分，并于1485年攻陷维也纳。然而马加什的宏图最后始终没有实现，他既未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也未实现他曾一度考虑的对土耳其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打算，因为他突然逝世了。

在马加什时期，匈牙利的文化水平已接近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马加什国王很重视科学和艺术。(他认为："没有文化的国王不过是一头戴着王冠的驴"。) 他的宫廷大门总是向国内外的人文学者敞开着，尤其在他和第二个王后、那不勒斯国王的公主贝阿特丽克丝结婚后，意大利作家和艺术家更是大批"前来巴诺尼亚①。"其中有蓬菲尼大师，后来他作为宫廷历史作家为马加什作传。

布达城堡和维谢格拉德宫殿的遗址充分说明了匈牙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水平。在维谢格拉德宫殿里——根据十六世纪前半期的欧拉赫·米克洛什的考证——建有三百五十间屋子。据日后记载，当代人亲眼看到，里面豪华的王宫和狩猎园、养鱼池远远胜过国王的其他建筑物。维谢格拉德城堡的喷泉用红色大理石雕刻、金属浇铸而成，每逢佳节，红、白两色葡萄酒喷向空中，宫殿金壁辉煌，前来晋见的外国人无不惊叹不已。饰有胡尼奥迪家族的家徽——乌鸦的装潢精美的书籍，即所谓《科尔温图书集成》都珍藏在布达城堡里。当时，在城堡下的一间屋子里，从意大

---

① 指匈牙利。

利来匈的德国名匠赫斯·安德拉什从事高水平的印刷术研究工作，准备在匈牙利推广。维谢格拉德和布达美丽的宫殿，经济上的发展，巩固的中央政权，繁荣的文化生活等都表明，这是中世纪匈牙利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亚盖隆时期各等级的无政府状态

1490年4月5日，复活节前几天，马加什国王在维也纳的城堡里逝世，年仅四十七岁。马加什大业未竟，遽然死去，葬于塞凯什白堡。

对于马加什国王的去世，“战士哀悼自己宽宏大量、和蔼可亲的统帅，市民怀念自己的国家元首，其他百姓和农民哭泣受人敬仰、关心人民的主人”。但大贵族们的心情很快由沉重变成轻松。他们认为，恢复自己“昔日自由”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无意让马加什的儿子科尔温·亚诺什即位，因为他们担心他将会继续奉行父亲的政策。连那些当年由马加什扶持起来并矢誓效忠的人也抛弃了这位国王当年的理想。

大贵族们希望能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作为国王。这样，他们便选中了亚盖隆家族① 的乌拉斯洛二世（1490—1516），此人还兼任捷克国王。在他统治下，王室大权旁落。这位国王把一切大权都交给了大贵族们。他对一切都是一句口头语：“多布热”②。马加什作出的某些对大贵族不利的措施被一一取消，对雇佣军不发

68

---

① 波兰和立陶宛统治集团家族。其成员中除波兰国王外，有不少人还当过匈牙利和捷克国王。

② 捷克语，意即“好吧”。

军饷，造成军队的分崩离析，昔日威名远振的“黑军”残部最后被乌拉斯洛派基尼日讨平。接着，政权便落入几个横行霸道、对国家事务极不负责的大贵族和主教之手。（当时政府中最显要的人物包括：征收二十六种教会税收、勒索民财的大主教鲍科茨·托马什，一贯贪污的司库、佩奇城主教埃尔努什特·亚诺什，酗酒成性的宰相巴托里·伊斯特万，还有飞黄腾达的大银行家塞伦切什·伊姆雷等。）

大贵族穷凶极恶的统治在马加什时期显著上升的中产阶级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抗。他们建立了人数众多的所谓“普通贵族党”，希望以人数来和大贵族抗衡。每逢国会开会，普通贵族等级的领导人——萨波亚伊·亚诺什和维尔伯齐·伊斯特万——组织数千名携带武器的中小贵族以壮声势。此外，普通贵族也坚决反对朝廷。在匈牙利没有根基的亚盖隆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哈布斯堡家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普通贵族党在1505年拉科什麦泽举行的议会上促使会议通过在亚盖隆家族无继承人的情况下只选本国人当国王的决议。表面上是因为外国人“不了解匈牙利人民的道德和风俗”，实际上他们是想以此为让自己的领袖萨波亚伊·亚诺什赢得王位作准备。

马加什死后所出现的若干变化给农民只带来了危害。诚然，马加什无休止的对外战争和他豪华的宫廷生活也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他保护农民不受地主过分苛刻的剥削。（例如，尽管马加什很器重瓦茨主教巴托里博学多才，但还是派69 了一名管事监督巴托里不得对农民进行敲榨勒索。）马加什死后，国王的税收降到了四分之一，但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而且财产也得不到保障。互相争夺的大贵族和频繁出现的土耳其掠夺者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蓬菲尼写道：“如果能使死者复生，农民宁可给故国王交六倍的税。”然而国王不能复活，就从那时传下

了这么一句话："马加什已经离开人间，世上再也没有真理。"

大贵族和普通贵族虽然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在农奴政策上却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农产品的贸易中，地主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是由于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贵族的土地交给农奴耕种，已完全分散在农民手中，经营买卖的地主希望农奴以实物交租（如酒和粮食）之故。同时，他们也想以此来巩固地主对产业的所有权。在两个世纪交替时期制定了不少这种性质的法律。例如，在马加什时期，农业城镇中的农奴通常可以集体向地主交纳地租，但这时却必须分别独立交纳玖一税。这样，实际上就使农奴没有可能在日后赎身，成为自由农民。同时，地主为了即使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也能保证必要的劳动力，几乎完全取消了农奴的自由迁居权。日积月累的怨恨终于第一次爆发了匈牙利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

匈牙利农民战争

1514 年 4 月 16 日，埃斯泰尔戈姆主教鲍科茨·托马什在隆重的出征仪式上宣读教皇圣谕，宣布派十字军讨伐土耳其。这是鲍科茨在头一年从教皇那里带回的一个圣谕。当时，鲍科茨觊觎教皇宝座，但未能如愿，新当选的教皇便以给他颁发圣谕作为安慰。

人民并没有想到大贵族们的罪恶用心，而只想到土耳其的危害。这种危害是经常性的，而且年甚一年。他们觉得，组织十字军似乎可以解除这个威胁。他们脑子里想的是胡尼奥迪对土耳其作战的盛况，因此踊跃参加。大批群众在教士和法官领导下，赶着车或步行，有的甚至倾家以赴。城市贫民、学生、手工艺工匠、

不领军饷的士兵等汇集在拉科什麦泽① 或其他集合地点。爱国心和宗教热情、痛苦和某种说不清的变革欲望促使人们在佩斯城下组成了四万人、在全国约有八万人左右的队伍。

十字军战士的兵营里几乎没有贵族参加，充其量只有少数几个穷贵族。因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塞凯伊边防军官多热·久尔吉② 担任这支队伍的头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最有名的部将是采格莱德的教区牧师梅萨罗什·勒林茨。

地主们对自己的农奴在农活最忙的时候参加十字军颇为不满。他们不怕使用暴力，也不怕别人的反对，多方阻碍组织十字军。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当中，大部分人也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十字军战争。在日渐增多的兵营面前，恐惧感也就随之增加了。五月底，他们决心采取行动。首先停止继续宣传教皇圣谕，停止了十字军募兵。鲍科茨本人也使用宗教的力量来解散十字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摆脱这群招募来的农民，不发给装备就把他们送去对土耳其作战。

拥护多热的人现在既不服从国家的领导者，也不听从埃斯泰尔戈姆城的主教鲍科茨。聚集在拉科什兵营里的农民深感地主在全国各地为非作歹，但几万人的集群，也使农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转折：农民军已经从反抗土耳其转而反抗自己的主人了。

农民军主力开始向采格莱德进发。根据当时文人们的记载，对于这一伟大转变的原因，多热是这样说的：

“你们和匈牙利贵族同属国民，但你们不是作为农民，而是被他们作为奴隶。……你们给他们耕种土地，给他们栽培葡萄，给他们饲养畜群，而留给你们的却是奴役和饥饿。

① 在布达佩斯附近。

② 我国的一些历史书译为乔治·多沙。

这种耻辱你们要忍受到何时，匈牙利人？……

那么，就听从你们自由的缔造者——上帝的意志吧。他已经麻痹了敌人，把你们集结在一起，还把武器发到了你们的手里。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要么扫除贵族老爷，要么继续饱含血泪和永恒的痛苦到高傲的敌人那里去受苦……”

1514年6月，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全国各地。多热部下的将领大力发动农村地区。主力部队在占领采格莱德之后，在沃尔沙尼跨过蒂萨河，向奥尔弗尔德平原广大农业城镇挺进。多热指望自己的队伍在资本主义化的发展中受到摧残的农业市镇里继续发展壮大，实际上果然也是如此。多热的军队所向无敌，在纳吉劳克和乔纳德附近挫败了洽克主教的军队，并迫使巴托里宰相仓皇逃遁。接着又包围了泰迈什瓦尔①。此城是南方贵族的大本营，逃窜到这个城市的宰相巴托里·伊斯特万本人领导守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围困和饥饿，迫使巴托里向他最仇视的敌手、埃尔代伊总督萨波亚伊·亚诺什求援。共同的危机把素来是水火不相容的统治阶级连在一个营垒中了。国王向教皇求助，他虽然置抵抗土耳其的边防城镇于不顾，但却招募外国雇佣军来对付农民起义军。宰相和总督讲和之后，萨波亚伊装备精良的军队开到泰迈什瓦尔城下。这场农民战争被扼杀了。

随之而来的是惨无人道的报复。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处死。按照胜者总督的命令，让多热身坐烧烫的铁椅，头戴炽热的铁冠，还用烧红的铁钳撕裂他赤裸的身驱。但是多热所留给人们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却成了农民反抗的象征。就连当时敌人的记录上也写着：“他不哭泣，不呻吟，不害怕。”

在1514年10月召开的国会上，报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

① 今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

度。① 虽然土耳其虎视眈眈，但会议讨论的几乎只是如何对付农民的问题。法律判处农民军将领和军官死刑，下令各州清查损失，并勒令农民赔偿。强制农奴服劳役，法律规定农奴不准迁徙。（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的后代也看到起而暴动反抗主人会遭到何等悲惨的下场；从今开始，取消农奴自由迁居权，以使他们成为从属于自己主人的真正的永世奴隶。"）

这项残酷的法令连同其他对付农民的法令一道，由维尔伯齐编成所谓"三章法"，它虽然从来没有被批准形成正式法典，但却被贵族阶级奉为金科玉律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个文件的作用，在于它以贵族易懂的语言概括了封建匈牙利的权利关系，指导着贵族的行动。法令的第一章包括贵族的各种特权和个人权利，并按照普通贵族的观点，在"同样的自由"基础上，把1351年确立的原则扩展成大贵族和普通贵族都能接受的东西；第二章为贵族的诉讼法；第三章包括一般国民和农奴的法律地位。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贵族和农民的权利差别无异天壤。

莫哈赤之战

正当地主阶级对农民战争进行全力报复的时候，土耳其的威胁越来越咄咄逼人。1514年国会的疯狂报复固然平息了农民暴动，但地主阶级的互相权力之争又把他们自己分化、对立起来了。以巴托里为首的大贵族阶层同萨波亚伊——维尔伯齐领导的普通贵族党之间的角斗更加尖锐了。在政治生活中，普通贵族通过几代人的时间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除了可以直接参加国会外，还在

① 即世界史上称为"野蛮会议"的国会。

迄今为止只有大贵族和主教组成的朝廷会议中争取到了发言权和表决权，并且在莫哈赤之战前夕，在豪特望举行的国会上把他们的代表人物维尔伯齐选到宰相的宝座上。由于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在频繁召开的国会上，经常出现群众性的动武场面。往往是谁能在国会显示更多的武装力量，谁便能在国会上取得胜利。

王室政权尚在苟延残喘。拉约什二世（1516—1526）在十岁时登基为王，由一部分大贵族摄政。朝廷无钱，但疯狂的挥霍有增无减。由于朝廷纸醉金迷，从而为声色犬马服务的各类徒众形成了庞大的队伍，严重地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支出，所以王室的领地不断典给各封建领主。大贵族之间激烈的斗争，为领地和权力所进行的无休止的冲突使匈牙利统治集团完全丧失了廉耻。当时一位威尼斯的使者说："只要在他们的手里放三、四次钱，那他们什么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事情都会干得出来。"他们对于国事却莫不关心。教皇的一个使者这样形容二十年代的匈牙利统治阶级："如果花三个福林就可以拯救这个国家的话，也不会有三个人肯作出这样的牺牲。"

在此期间，土耳其的力量极度壮大。1520年，卓越的外交家和杰出的军事将领苏里曼二世任苏丹。1521年，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将建在多瑙河——萨瓦河西岸的匈牙利边防一扫而空。国家大门南多尔费赫尔城也陷入了土耳其人手中。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使匈牙利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匈牙利由于亚盖隆家族的家族条约，愈来愈倒向哈布斯堡一边，而"最信仰基督教的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却同土耳其结成了联盟，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土耳其的进攻——即使单纯出于地理条件的原因——只有通过匈牙利才能打到维也纳。这样，匈牙利卷入了当时全欧范围的大冲突之中，在优势的敌人面前经历着本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即使在这末日来临的前夕，国家领导人的注意力始终没有转

移到对付土耳其方面，而是把精力花在扼杀国内的改革运动和拜斯泰尔采的矿工起义上。国会下令以火刑处死路德教徒，并派宰相维尔伯齐·伊什特万亲自赶到拜斯泰尔采矿山。他虽然口头上承认矿工们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但仍然没收了矿工们的集体基金，处死了起义的领导人。

1526年夏季，在对付土耳其人方面却没有这样有力了。当时，苏里曼二世以共约八万人的兵力向匈牙利进发。在这大祸临头的时刻，匈牙利统治者只制定了一些毫无用处的临时措施。他们不敢发动农民投入战斗，国王自己也心怀战栗，盘算着如何在战斗中逃跑。大领主和贵族们迟迟不肯派出队伍前往托尔瑙①集中。最后总算勉强集合了一支二万六千人的军队（而且主要还是外国雇佣军）准备与土耳其对阵。更麻烦的是，大贵族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军事指挥。经过多方劝说，卡洛乔城主教托莫里·帕尔和埃尔代伊总督的弟弟萨波亚伊·久尔吉承担了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1526年8月29日，两军会战。

战斗异常激烈，但速战速决。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在土耳其的炮火和优势兵力面前，匈牙利全军覆没。大批将领、贵族、主教丧命，数千名战士阵亡沙场。激战过后，正在逃窜中的国王亦一命归天。中世纪独立的匈牙利就这样覆亡了。参加这场战斗的塞雷姆城主教兼国家大法官布罗道里奇·伊斯特万在《莫哈赤战场上匈土交战记实》一书中写下了如此悲壮的一页：

"两军在距莫哈赤数里，距多瑙河不远的一段地面对阵。这是一块宽阔的平坦地，没有森林和树丛，没有河流和山丘。它的左侧与多瑙河之间有一块长满芦苇和蒲草的沼泽地。后来，许多人葬身于此。在我们的对面，是半圆形的丘陵地。丘陵的那面是土

---

① 在今匈牙利西南部。

耳其皇帝的军营。坡下是建有一个教堂的小村落，名叫弗尔德瓦尔，敌人的大炮就在这个地方。……

当发出进攻号角时，我们的前列向敌军发起猛烈的冲击，我军大炮也全部开火。就我们的攻势与我们士兵的数量而言，战斗是非常激烈的了，而且敌人的死伤也比我们多，但并没有给敌人以重创。后来，在我军战士英勇奋战面前，敌人开始后退。也许是我军奋战，击退了敌人，但也许是因为敌人想把我军引到他们大炮的射程以内。正在此时，巴托里·安德拉什飞马报告，国王说敌人开始撤退，我们胜利了。并说应当向前挺进，应当支援向敌人发起追击的部队。于是，我们奋不顾身，直向前冲。当我们赶到一个刚战斗过的地方时，看到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尸体，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的战士，更多的则是敌军士兵，有几个还活着，喘着气。我们的战士以英雄的气概继续作战，与敌人搏斗着……

战斗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许多人葬身在前面提到的无底的沼泽中。有人认为国王也阵亡于此。但后来在位于莫哈赤以北、距切莱村不远的一个深凹地里找到了他。当时由于多瑙河涨水，凹地水很深。国王连同战马一道在此溺水而死。发现尸体时，他还是全副武装。 76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敌人的铁蹄肆意践踏战场附近地区，所到之处，无不烧光毁光。不论是儿童还是老人，不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对于每一个人，对于这不幸的整个民族，他们都毫不容情，任意蹂躏。对于那一个昼夜和以后日子里的恐怖惨景，我实在没有力量继续写下去。”

四、1526—1711年间反土耳其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

（匈牙利封建社会的末期）

莫哈赤之战以后

大败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第二天，晚祷之后，布达城的人们已经知道莫哈赤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朝廷四散，人们所痛恨的王后玛丽亚·哈布斯堡立即逃往波若尼，德意志的富翁显贵们携带着自己的财物也于当夜逃离了这座城市。入夜，通向西方的旱路上车队络绎不绝，多瑙河上满载着珍宝的船只首尾相连。

国王去世，国家机器分崩离析，政权落到专横的大封建主们手中了。正当考尼饶伊·桃乐赛①在战场上埋葬阵亡者时，正在逃亡中的宰相却抢劫了也在逃亡中的佩奇城大主教府邸。这样，有统一指挥的、有组织的反土耳其行动就此终止了。苏里曼二世轻而易举地直捣布达，一路上对这个国家进行了烧杀抢掠。唯有地方上的人民群众对敌人还展开着反抗活动。在韦尔泰什、马特劳，在巴奇和彼得瓦劳德②等地的农民们赶着大车，用火枪、弓

---

① 一度任宰相的拜雷尼·伊姆雷之妻。

② 即今赫维什州彼得瓦沙尔海伊。

箭、木棒和石块进行了抵抗。

在莫哈赤战场上失去了亲兄弟的萨波亚伊·亚诺什宰相认为攫取王冠的时机已经到来。普通贵族都四处鼓吹1505年的拉科什国会决议，准备选举国王。他们幻想，未来的“民族国王”最起码能把匈牙利的国家政权恢复到马加什时代的水平。

冬季来临前，土耳其人从匈牙利撤退了。国内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莫哈赤之战以前的程度。当时，“民族派”的普通贵族推选全国最大的财主萨波亚伊为国王，而朝廷方面的大贵族们则支持查理五世①的弟弟斐迪南登基。当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苏丹正在庆祝在匈牙利取得胜利的时候，匈牙利的哪一个国王都没有考虑到对付土耳其人，而只是为展开国内战争做准备。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竭力加强自己的阵营。他们都封官许愿，进行拉拢，无怪在这几十年中，忠诚和信仰都变成了商品。一位同时代的人这样写道：“匈牙利人，不管是大贵族，还是小贵族，只要有两个儿子，他就会叫一个参加斐迪南派，另一个效忠亚诺什② 国王。”因为当时双方势力在全国各地犬牙交错，互相争夺，局势极其混乱。有些人运用权术，投靠钻营，往往青云直上，成为新的大贵族。 78

在匈牙利南部边境，有萨波亚伊当年的一个马倌，名叫切尔尼·尤万③。他还在1526年就组织了一支拥有几千人的农民军。当地的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希望这位“沙皇”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土耳其人和地主的侵扰而支持他。萨波亚伊和斐迪南也想把这支农民军变为自己的工具。但是，南部地区的大地主于1527年夏季镇压了切尔尼·尤万领导的农民运动。

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② 即萨波亚伊。
③ 即尤万·切尔尼，亦称“黑伊凡”，塞尔维亚人，自号沙皇。

由于两位国王都清楚地看到，只有仰仗外国的援助方能获胜，所以都大力设法同国外势力结成联盟。斐迪南主要通过自己当皇帝的哥哥查理五世。他的这位哥哥早在莫哈赤战役之前所进行的分配中[①]就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各国中最大最富饶的部分。（在这次分配中，查理五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获得了西班牙王国的国王称号，还占有了这个王国的海外领地[②]和欧洲低地国家[③]和意大利的一部分领土。斐迪南获得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并于莫哈赤战役之后得到了匈牙利国王和捷克国王的称号。）亚诺什国王则主要依靠法国。但是，在1527年夏秋之际，他败于斐迪南为数仅一万人的军队而逃往波兰，并在法国的唆使之下，转而向土耳其输诚。亚诺什国王的使者向苏丹说："我的主人——匈牙利国王的一切都归顺于您。"就这样，土耳其苏丹便成了裁判匈牙利二人争夺王位一案的法官，匈牙利成了大国角逐中的一个棋子。

1529年，土耳其苏丹率重兵开进匈牙利。亚诺什国王作为苏丹的附庸，重新登上王座。但是苏丹此役未能达到占领维也纳的主要目的。于是，1532年土耳其再次兴师。此时的匈牙利已被苏丹视作通道了。但苏丹在通往维也纳的大道上出乎意料地被克塞格堡[④]所阻。这座不算坚固的城堡由尤里希奇·米克洛什把守。其麾下只有几十名骑兵和七百名武装的沃什州农民。但居然在压倒优势的敌人围攻下坚守了二十五天，最后才被土耳其军队在这座被炸成瓦砾堆的城堡上插上了自己的马尾旗。实际上土耳其人并不是真想占领这座城堡。当时时近秋令，向维也纳进军已不可能。奥

① 指哈布斯堡家族内部势力范围的分配。

② 指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

③ 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④ 在今匈牙利西北部沃什州。

斯曼军队进行了一番烧杀抢掠之后便卷旗回归本国了。为保卫维也纳而集结的两个国王和一个皇帝① 的军队没有交战而解散了。

布达城落入土耳其之手——国家分裂为三部分

土耳其的多次进军和国内互相吞并的斗争是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匈牙利的特点。王室政权名存实亡，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一个中等贵族于1536年写道："……他们每个人各行其是。他们（大贵族）掠夺普通贵族的财产，鱼肉农民，攻占城堡，做尽一切坏事。此情此景只有在没有国王、没有保护人的国度里，或者是在虽有国王，但他只会睡大觉而什么也不会做的国家里才会出现。"

大贵族们则利用两个国王相争的局面从中取利。但他们还是看到了，国家局势的发展慢慢也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生存。因此，他们曾多次召开所谓无国王的议会，但除了抱怨以外并没有找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外，两个国王相互间的武装冲突显然已无法决出胜负，而且外交上的处境也极为不稳，这就促使他们走向和解。萨波亚伊对土耳其深怀戒心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另一个国王——斐迪南则因为他的哥哥正准备和法国人再次进行较量要求他采取一致行动。这样，两个国王于1538年在瓦劳德② 进行了和平谈判。双方同意暂时维持当时的局面。和谈规定，在亚诺什国王死后，由斐迪南为全匈牙利国王，若萨波亚伊日后有子嗣，则应由斐迪南册封其为塞派什公爵③，并与哈布斯堡家族的

---

① 指匈牙利（斐迪南）国王、捷克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② 即今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

③ 大体上拥有今捷克斯洛伐克斯皮什一带的领地。

公主结婚。

在这次和谈中，一位在此后十五年举世瞩目的政治家——久尔吉长老（弗拉泰尔·久尔吉）第一次公开露面。久尔吉长老出生于一个霍尔瓦特穷贵族家庭，受到萨波亚伊的重用。他由绍约拉德[1]的圣保罗修道院院长当上了瓦劳德城主教，并成了亚诺什国王最有影响的顾问。他是瓦劳德和平条约的签字者之一。两年以后，萨波亚伊临终时向久尔吉长老托孤，他宣誓扶佐婴儿亚诺什·日格蒙德即位称王。

80 事实上，双方都没有遵守瓦劳德和约。斐迪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土耳其苏丹承认他为匈牙利国王，而不是从土耳其手中拯救国家。萨波亚伊则因和波兰的伊莎贝拉结婚生下了儿子，所以不能放弃创建王朝的计划。1540年，萨波亚伊·亚诺什国王去世，1541年斐迪南便兵围布达。久尔吉长老随即向土耳其苏丹求援。久尔吉和萨波亚伊亲土耳其的朝廷认为苏丹将会信守诺言，保举亚诺什的儿子为匈牙利国王。

斐迪南的行动为苏里曼出兵匈牙利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于是他以重兵击退了围城的德皇军队。正当匈牙利官员和小国王在苏丹帐中尽欢之际，潜入城内的土耳其近卫步兵解除了城防战士的武装，夺取了布达。这样，在莫哈赤之败以后十五年，布达城失陷了。此后，一百五十年中匈牙利的相当大一部分土地沦于土耳其占领之下。

这个悲剧性的转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莫哈赤之战虽然是个惨败，但仅此一端并不足以说明。如果我们纵观莫哈赤之战前后数十年内所发生的事件，那么事情便明了多了。在造成这一局面的诸因素中，外部政治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匈牙利几个世纪

---

① 在今匈牙利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

以来一直是中、南欧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马加什国王死后，它迅速成了比自己强盛得多的外国政权的玩物。在十六世纪初，匈牙利处于想一统天下的哈布斯堡王朝和称霸三大洲的土耳其帝国 81 的夹缝之中。如何能够面临两个强敌保住本国主权，这是当时的重大课题。

莫哈赤战斗前后数十年间的等级之间的势力分野不仅是国内争权夺利斗争的反映，而且是对重大的对外政策所作不同答复的结果。朝廷派在哈布斯堡王朝寻找靠山。这在事后看来是很自然的，但那时却不可能赢得整个统治阶级的支持。过去，哈布斯堡王朝总是多方阻止安茹王朝乃至胡尼奥迪家族计划的实施。深仇大恨在“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构筑了一道鸿沟，在莫哈赤之战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对土耳其所采取的消极防御政策更进一步加深了这道鸿沟。普通贵族由于目光短浅，在莫哈赤之战前根本没有认识匈牙利已经变化了的局势，而一味醉心于设法寻找一个“了解匈牙利习俗”的“民族”国王。至于萨波亚伊·亚诺什被选为国王之后出现的形势，他们更无法理解，当然也更谈不上作出什么抉择了。匈牙利的各等级推脱不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但尽管如此，他们和周围邻国的各等级比起来并不见得更软弱、更无能。他们本应当认清自己的责任驾驭形势，然而却未能如此，致使匈牙利这个国家陷入内外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一场败仗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的命运。

国王统治下的匈牙利和埃尔代伊大公国

布达沦陷之后，国家分裂为三部分。在以后的几年中，土耳

其又在匈牙利中部地区巩固并扩大了自己的政权。在这期间，沦于土耳其统治的有佩奇、塞凯什白堡、埃斯泰尔戈姆、瓦茨、豪特望和多瑙河——蒂萨河之间的地带。国家的东半部是作为土耳其附庸的亚诺什·日格蒙德的王国，西半部为斐迪南所辖地区。

随着土耳其扩充势力范围，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的匈牙利日见衰败。其中大部分是长期战争地带。而哈布斯堡王朝的几代国王也将他们手中的那部分匈牙利土地看作是奥地利世袭领地各省的缓冲地带。匈牙利在政治上的作用却大大降低，昔日的威望和独立性扫地以尽。国王们从外国对匈牙利进行统治，他们身边左右也都是外国顾问。匈牙利的国会虽还在举行会议，但职权范围只限于通过税收。至于被与会者一次又一次提出的各种报怨，诸如：国王没有实现诺言来执行等级议会的法令，国王偏信外国人，任命外国人担任匈牙利城防长官等，从来没有得到认真考虑。面对这种情况，哈布斯堡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由于土耳其的危害，客观上也需要这样做。莫哈赤之战以后，匈牙利本身既已严重衰落，因此除了接受当时已把多瑙河流域各国的军队和物资一统在手的中欧最强大的力量——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外，别无其他选择。

82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所属各国在十六世纪尚未形成统一的帝国。例如，斐迪南是匈牙利的国王和捷克国王，又是奥地利的公爵和蒂罗尔的伯爵。这些称号不仅标志着这些国家的历史阶段，而且也能看出，斐迪南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是以什么头衔实施统治权的。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当然必须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历史发展水平和特殊的管理方式。这种复杂的情况给进行统治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困难。对此，斐迪南及其继承者当然要设法力求简化。为此，他们加强了中央机构（朝廷议会、王室金库以及由斐迪南设立的朝廷军机会议等）。各地方机构，如匈牙利政府机关虽然始

终未被撤销，但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事实上是不起作用的。

在国家东部出现的政权具有它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是经过多年危机之后建立的埃尔代伊大公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埃尔代伊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必然。被土耳其占领的地区把埃代伊和王室匈牙利分割开来，造成其孤立的局面。当然主要是因为——出于很简单的道理——苏丹认为割裂的匈牙利对他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匈牙利反对土耳其的力量自然会大大削弱。一个统一的匈牙利即便在莫哈赤之战以后对于土耳其征服中欧也还是一个威胁。

埃尔代伊作为一个缓冲国，显然不可能有完全的独立。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都把埃尔代伊看作是自己的属地，因此埃尔代伊的对外活动受到了双重限制。土耳其朝廷始终如一地对埃尔代伊行使着作为上级当局的权力。每当埃尔代伊选出大公，土耳其苏丹便发给证书以及饰有羽毛的金色高筒皮帽、骏马和土耳其式长袍，以示批准。同时，大公也必须向苏丹交纳税金。对内政策上的自由决定权以及平时安定时期埃尔代伊境内不驻扎外国军队这两者都同样表明了埃尔代伊相对独立的重大历史意义。埃尔代伊大公国在建立以后的头几年里，饱经挫折和考验，最后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也还只有从埃尔代伊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的局势才能解释清楚。

埃尔代伊的创建者是久尔吉长老，他在1541年以后掌握了匈牙利东部地区的统治权（包括与埃尔代伊连在一起的蒂萨河以东的各州，即从匈牙利分割出来的所谓“分割区”）。

久尔吉长老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把不同语言文字的各民族统一起来了，把实行着互相颇为不同的封建自治政体的塞凯伊和萨克逊地区、埃尔代伊各州和蒂萨河以东各州联合在一起。

弗拉泰尔·久尔吉长老这时已经不把埃尔代伊的独立看作是

最终目的了。他不再执行亲土耳其的政策。1541年之后，他一直在等候时机——在排除萨波亚伊家族势力的基础上——以便把埃尔代伊交给斐迪南。1551年，看来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弗拉泰尔·久尔吉黜免了伊莎贝拉和亚诺什·日格蒙德。斐迪南派遣西班牙人卡斯塔尔多到埃尔代伊接管政权。然而这位长老直到此时还同土耳其的巴夏①们保持着联系，以便不引起土耳其方面的怀疑。但是前来接管的雇佣军将领以为弗拉泰尔·久尔吉设有圈套。因此，斐迪南一方面向罗马教廷请求任命弗拉泰尔为红衣主教，同时又下令将他暗杀。这位政治家也就如此死去了。死前不久(根据当时的一位历史作家记载)，他曾说过："如果我能够同斐迪南商谈一次那就好了。他派来的人没有头脑……我着眼的是布达和匈牙利，我在为光复它们寻找合适的方案和办法。"

久尔吉长老的鲜血换来了国家短期统一的局面。可是，斐迪南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地处远方、与保卫奥地利世袭领地诸省相比实属第二位的埃尔代伊进行军事控制。埃尔代伊人也很快就饱尝了卡斯塔尔多不发军饷、只靠掠夺百姓的雇佣兵的苦头，于是自己便去和土耳其朝廷联系。几年后，土耳其朝廷重新将伊莎贝拉和已经成长为青年的亚诺什·日格蒙德送回埃尔代伊(1556年)。斐迪南认为自己至少应当控制蒂萨河以东各州。因此，在这个已经分割为两半的匈牙利国土上重又燃起了战火。这场争战的得利者自然还是土耳其。苏丹占领了久拉城(1566年)，并把权力扩展到蒂萨河以东。战争依旧是以同土耳其签订和约而告终。斐迪南的继位人马克西米连②(1564—1576)签订了德里纳波伊③和约。随后，亚诺什·日格蒙德也与哈布斯堡王朝在1570年签署了施佩

① 土耳其军事或地方行政长官的称号。

② 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连二世(1527——1576)，匈牙利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1564——1576)。

③ 即今土耳其埃迪尔内。

耶尔① 和约。和约规定，亚诺什·日格蒙德放弃国王称号，如无子嗣，承认哈布斯堡王朝为其继承者。在其母死后，他作为萨波亚伊家族最后一人，在和约签字之后不久旋即去世。当时人们回忆：这位“可怜的大公象一个影子，整天听那无休止的宗教讨论”。1571年，他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哈布斯堡王朝要求根据施佩耶尔协议，把埃尔代伊归自己所有，可是它依旧没有力量实现这一愿望。埃尔代伊各等级在土耳其支持下，推选巴托里·伊斯特万为大公。巴托里是国家东半部势力最强的地主，曾在帕多瓦② 学习，接受过人文科学教育，是一位既懂军事又懂外交的大贵族。（他作为亚诺什·日格蒙德的使节在维也纳也曾遭受监禁，而且一直到土耳其驻布达城的巴夏威胁要处死哈布斯堡王朝使者的时候，马克西米连才释放了他。）

巴托里·伊斯特万（1571—1586）不仅面对维也纳的阴谋诡计和武装进攻保卫了埃尔代伊大公国，而且还在和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竞争中取胜，当选为波兰国王③。巴托里在波兰也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他把大权操在自己的手中，并在古城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宫深谋远虑。他除了当波兰国王之外，还想成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王，以便将来能集三国之力，驱除土耳其。可惜他最有作为的年代过多地从事于对沙皇俄国的征讨。正当盛年时到来的死亡，使他的一些宏图大略都未能付诸实现。

巴托里死后，埃尔代伊又开始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波兰从瑞典的瓦萨家族选了国王，于是埃尔代伊不再能和波兰成为一体了。不久，巴托里·日格蒙德④ 当选为埃尔代伊大公。他身处来

---

① 在今西德境内。

② 在意大利境内。

③ 波兰历史上的巴托雷·斯特凡国王。

④ 巴托里·伊斯特万的侄子（1572——1613）。

自土耳其和德意志两方面的威胁之中，看不清这个弱小公国生存的可能性。因此，他左右摇摆，时而倒向土耳其苏丹，时而则想把埃尔代伊拱手让给哈布斯堡王朝。他多次退位，但又随即后悔，并且每次都要设法摆脱哈布斯堡的卵翼回到土耳其的怀抱。在这期间，埃尔代伊的领土不断遭到土耳其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蚕食。巴托里无论倒向何方，埃尔代伊都无法避免遭到血腥的杀戮。1586—1604年间（即从巴托里·伊斯特万逝世到博奇考伊·伊斯特万被推选为大公这段时间里），埃尔代伊实际上的统治数度易手。但也正是这些不幸年代的教训，使十七世纪初的两位大公——博奇考伊和贝特伦认识到，只有作为一个不依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埃尔代伊才能发挥作用。

土耳其占领地区

从1541年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土耳其被驱逐为止，土耳其不断地进行扩张。土耳其除牢牢控制奥尔弗尔德大平原和多瑙河以西的相当大部分地区以外，在最强盛的时期几乎将自己的辖区推到了匈牙利的西部边界。当然，事实上也无法准确划定边界，因为若干和约也只是规定了较大城堡归属哪一方。正因如此，在两个边境地区，即所谓边境城堡线地区出现了所属权不固定的占领地带。在这种地带里存在着为双方缴税的数以百计的村落。（根据双方协议，村民分别向国王和苏丹各纳税赋的一半。）

土耳其朝廷将占领区按军事形式进行统治，把占领区域划分为许多省（即所谓“维拉耶特”）。各省又分为若干州（即所谓“桑贾克”），州的首脑称“贝伊”（或称“贝格”），省的首脑称“巴夏”（即“贝伊们的贝伊”）。每个长官身边均设有征税官，此职务最为显要。

在匈牙利先是建立了布达省，以后又建立了泰迈什瓦尔省[1]、艾格尔省[2]、考尼饶省[3]和瓦劳德省。驻布达的巴夏是苏丹的代表，他以统治者的身份——在十六世纪后半期还用匈牙利文——与"维也纳国王"、与维也纳的朝廷军机会议，乃至匈牙利大贵族互通文件、信函。

土耳其苏丹以伊斯兰教会法规为基础，随心所欲地支配匈牙利的土地财产、城镇和乡村。苏丹把一部分土地归自己，或分封给国家高级官吏，称为"国家领地"（即所谓"哈斯领地"），其他部分作为采邑封给骑兵或步兵军官（即所谓"斯巴希"）。土耳其的封地和采邑与匈牙利的有根本上的不同。因为土耳其人的采邑不能继承，被封的斯巴希只能享用采邑的收入。苏丹又经常更换采邑，往往把一个地方的封地收回之后，重新赐给这个庞大帝国的另一块土地。因此，有句土耳其俗语："在土耳其，无人能够指出哪是他爷爷的房子。"

在土耳其占领之下，土地的主人象走马灯一样变换着。这些 87 土耳其地主并不关心如何经营自己的地产，而只是想方设法从异教的下属手中榨取更多的财物。生活在国家领地（哈斯领地）上的人情况要好些，因为那里能够维持生产的连续性。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的。（这样的哈斯领地包括毫劳什、纳吉克勒什、凯奇凯梅特等城市。此外，奥尔弗尔德大平原地区的所有农业城镇都属于此类哈斯领地。）

赋税制度和掠夺性的封地制度在实质上并无不同。百姓既要向苏丹纳税，又要向斯巴希地主纳税。国家还要征集"皇家税收"（即所谓"哈拉奇"），再加上还得为"皇家"出徭役，修筑城池，运

---

① 在今罗马尼亚境内。

② 在今匈牙利东北部。

③ 在今匈牙利西南部。

送军火等。地主按农户收租金（即伊斯本捷）和实物什一税。除此以外，还以各种名目索取钱财（如订婚金、结婚金、各类许可证费用等）。土耳其的税赋制度基本上与匈牙利的没有什么区别。问题在于执行过程中弊病甚多，官吏施虐，造成百姓苦不待言。

专横暴戾、贿赂和腐败堕落是整个土耳其国家制度的特点。甚至在苏丹宫廷里的高级职位也都视供奉多少而决定由谁担任。不献上一份厚礼，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办成。人人都想趁自己还被苏丹信宠之机尽快发家致富，因为官员更动频繁，朝不保夕。例如，布达省的巴夏，在一百四十五年内就调动过九十九次！

由于土耳其的国家制度远比匈牙利的落后，加之战事不休，使匈牙利遭到惊人的破坏。在土耳其统治的一个半世纪内，许多地方的山川风暴也变了样。不少地区荒无人烟，当年的耕地杂草丛生，流沙、盐碱、淤水、泥沼，一片衰败景象。人口数量也大约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因为有的死亡，有的被拉去当奴隶，有的到边防城堡投军，也有的逃遁到其他较为安全的地方。普通贵族差不多也都消失了。许多农奴也被迫赶着家畜逃到了深山或沼泽地。一次又一次的“大出逃”和在沼泽地的艰苦岁月也许可以说是一个半世纪中土耳其占领的象征！

一度相当发达的城市此时呈现出一副令人震惊的局面。布达城原来有一座马加什时期的宫殿，这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闻名的建筑，此时只剩下断垣残壁。到十六世纪后半期全城到处污秽不堪。土耳其人修建的只不过是几座伊斯兰教寺庙和浴池。旧有的石头房屋东倒西歪，窗户上堵塞着泥巴、砖头或乱草。伊斯兰教商贩和塞尔维亚买卖人以巴尔干的方式在街上摆摊营业。杂货铺、小吃店、小酒馆和剃头铺充塞市容。教堂被毁坏，墓碑被用来当座位，或用作柜台卖货。“啊，被毁成什么样子啦！噢，破坏者该当何罪呀！”——人文学者、考绍城大法官1650年来到佩

斯和布达时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在这普遍性的毁坏中，唯一有点发展的是奥尔弗尔德平原地区的一些农业城镇。但以多大的代价才换来了这微不足道的发展啊！仅凯奇凯梅特周围就有三十七个原来是相当兴旺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形成了二十万到四十万霍尔特的大片旷野。这里，农业毫无地位，在这一望无垠的土地上只有粗放的、饲养方式落后的畜牧业。

边 防 城 堡

当布达沦入土耳其人之手以后，对匈牙利人民说来，已不再有安宁可言。大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即使两位国王的使者签订了和约，刀枪声也从来没有停息过。小规模的战斗，从敲诈勒索，到洗劫城池，几乎无日不有。至于“攻取”毫无自卫能力的村庄之事，就是在“和平时期”也是习以为常的。在十六世纪，唯有持续了几十年的边防城堡所进行的斗争才制约了土耳其的扩张。

这条新的防御线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形成的，它深入到匈牙利腹地，是一条相互联系、向纵深发展的城堡系统。它从海岸开始，经过多瑙河以西地区和北部高地，直到埃尔代伊。这条防线上最强大的城堡有西盖特瓦尔、考尼饶、久尔、埃尔塞克乌伊瓦尔①、艾格尔、托卡伊、萨特马尔、瓦劳德、久拉和泰迈什瓦尔。

防卫线的中枢通常是由意大利军事工程师指导建立的骑兵城堡构成。城堡的哥特式尖塔被拆掉，加厚城墙以抵御炮轰。沿城墙加筑了突出来的坚固“耳形”碉堡。从碉堡发出的火力，还可以

①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扎姆基。

保卫城墙各部位。在城堡周围筑有篱笆墙。篱笆墙是按“匈牙利方式”构筑的。这就是，在木桩和篱笆之间筑有几米厚的湿土夯墙，篱笆外面用泥抹光。相对来说，篱笆夯墙筑造起来比较快，自然也不很牢固。火、水以及维修不及时，都足以使之毁坏。

90 苏丹及其巴夏们曾多次派兵进犯，企图摧垮边防城堡系统。特别是1552年和1566年的两次战役相当激烈。泰迈什瓦尔、德雷盖伊、艾格尔、西盖特瓦尔就是当时热爱祖国和英雄气概的典范。

泰迈什瓦尔堡是埃尔代伊的大门，守将洛松齐·伊斯特万大部分靠自己的力量募集了雇佣军，德皇的军队并未给以丝毫的援助，而泰迈什瓦尔在敌人围攻之下依然挺立五个星期之久。当水塔失守，城堡行将陷落时，洛松齐在其外国雇佣军向土耳其巴夏提出以允许他们自由撤走为条件时，被迫放弃城堡。然而，巴夏先是答应撤退条件，最后食言，一举消灭了洛松齐的守城部队。

与此同时，布达省巴夏阿里进攻德雷盖伊城堡。守卫这座小小城堡的是农奴出身的松迪·久尔吉，守卫人员总共才有一百五十人。进行抵抗显然毫无希望。但松迪同自己的士兵一道宁可英勇牺牲，也没有投降。

接着，号称十万的土耳其军队攻打匈牙利的北大门艾格尔。国王、艾格尔主教和邻近的各贵族州几乎没有给予守城部队任何91 援助。守将多博·伊斯特万总共指挥着二千多人，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附近的农民和手工工匠。但是，艾格尔的英雄们以自己高尚、坚强的精神投入了战斗。在决定性的反围攻战斗中，连妇女们也都参加了战斗，致使土耳其军队在经过五十八天的围攻之后汗颜无耻地从“肮脏的羊圈”那里逃走了。

1566年，土耳其又向久拉和西盖特瓦尔进攻，已经年迈的苏里曼亲自率兵攻打。保卫维也纳的西盖特瓦尔城的守将是兹里

尼·米克洛什，他手下的匈牙利族和霍尔瓦特族的士兵们表示："没有比坚决地效忠于亲爱的……即将遭到最后毁灭的祖国更为神圣的了！"据传说，当苏丹向兹里尼喊话让他交出城堡时说："如果你还想活着的话，就把你的剑送来。"英雄的守将回答道："如果你想死的话，你自己过来拿吧！"兹里尼和他的战士们也真正以这样的决心保卫了西盖特瓦尔。当城堡处于火海之中已无法固守时，他们弃盔甲，挥战刀，冲向敌营，与敌人决一死战。但他们没有白白牺牲，在围攻战斗中，年迈的苏里曼死去。这使得他的后继人把土耳其大规模西征的计划推迟了一百年之久。

在与波斯作战之后，苏丹也倾向同维也纳讲和了。于 1568 年在德里纳波伊签订了和约。当年，匈牙利边防城堡有效地阻止了土耳其最疯狂的进攻。和约签字之后，这些城堡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仍需要对付大约四倍于己的兵力，以保卫匈牙利的残余部分。（约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名匈牙利士兵对四万八千到五万名土耳其士兵。）土耳其的恶行从未停止，小则打家劫舍，大则洗劫集市。攻打小城堡，甚至烧毁城镇的事也屡见不鲜。当然，匈牙利边防城堡的战士们也以牙还牙，时常轻骑出击，予以报复。他们曾在托尔瑙阻劫土耳其船只，在塞格德城下俘获土耳其富豪。此外，双方战士的比武、格斗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匈牙利战士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艰苦的。他们不仅要同土耳其人斗争，还必须与穷困的生活斗争。国库本应发给每个战士"月薪"（军饷）二至八福林，作为穿衣、吃饭、购置装备之用。但是，他们往往整年什么也领不到。

即使如此，保持这条边境城堡防御线也耗费了大笔款项。每年支出大约为五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福林，其中能靠本国财源开支的仅占一部分。（十六世纪中叶，残缺不全的匈牙利在税收、矿山和海关上的总收入共计约五十万到六十万福林！）邻国的奥地利

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也有不少馈赠。当然，作出最大牺牲的还是匈牙利各族人民。在许多城堡中，匈牙利族人民和霍尔瓦特族人民共同战斗。如果没有斯拉夫人民、罗马尼亚人民和鲁廷[1]人民的共同努力，没有匈牙利族和其他民族农奴的纳税和修筑城堡的劳动以及在战争环境下仍顽强地从事生产，那么城堡防卫线也不可能经受得住考验。

十六世纪匈牙利的经济和社会情况

十六到十七世纪，在边防城堡的保卫下，匈牙利王国的领土上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生息。其中，主要以工商业为生的城市人口至多有十万。其他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农民，都是农业人口。正因如此，各人在封建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有无地产和地产的数量。

在莫哈赤战斗以后的数十年中，大贵族的权力重又变得固定起来。亚盖隆时期，广大的普通贵族曾起而与大贵族争权。但在莫哈赤战斗失败之后的亚诺什国王时期的历届国会中，普通贵族的地位便大大下降。在战乱时期，国内各集团的斗争和土耳其的进攻都促使大贵族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及政治地位大为加强。尽管在莫哈赤战斗之前的某些贵族家族断嗣，若干新家族出现，也并未改变这种状况。(纳道什迪家族、图尔佐家族、鲍将尼家族、兹里尼家族、拉科齐家族、代科尔温——胡尼奥迪——、欧尔隆格、德拉格菲、考尼饶伊以及萨波亚伊诸家族纷纷出现，并从十

① 居住在外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人。

六至十七世纪就先后从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伯爵或男爵称号。）

充分说明地产分配情况特点的是，全国有将近一半的农奴为十几个大地主家族劳动。这些大家族常常拥有五、六个庄园，每个庄园平均占有二十到三十个农奴村或农业市镇。这些庄园都筑有城堡以加强防御，形成“城堡小王国”。有的大地主即便担任国家公职，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自己的城堡中度过，而且手中经常握有几百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还自己设立衙门，开厅审判。他们承包了教会的什一税，并代征国家税收，阻止州里的税务官员进庄园。

一块块的大庄园就是“国中之国”。普通贵族也无法摆脱他们的控制。这样，过去的那种封建附庸关系又重新出现，充其量只是改换名称而已。附属于大庄园主的普通贵族叫“随从”，由他们充任庄园城堡的防卫长官、庄园内的经济总管等。当大地主担任国家公职时，这些随从也就成为官员，或某个方面的助手、书记官等。随从、士兵和大地主的家人，以及庄园的管理人员都居住在城堡中。此时的城堡依然是大地主权势的象征。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城堡，除还保持着碉堡这一用于防卫的特征之外，已变得比从前的城堡舒服得多。城堡通常筑有四、五个边角碉堡，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战时作为堡垒，平时则成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心。

94

城堡中的陈设（如家具）虽然还比较简单粗糙，但武器、衣物、珠宝饰物则往往价逾万贯；器皿、腰带、胸饰、刀剑的镶嵌等等也都出自全国各地的名匠之手。至于会猎、命名日、婚礼等，更是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这里仅举一例：1603 年，图尔佐·茹若伯爵举行婚礼，用掉了比采、莱特豪瓦和阿尔瓦诸地庄园农奴的三十六头阉牛、一百一十八头小牛、一百零三只成羊、五十八只幼羊、一百一十九头小猪、三十二只鹿、一百八十五只兔、五百二十六只榛鸡、三百八十一只阉鸡、七百八十五只母鸡、

四百二十只鹅、一百三十只童子鸡、五千三百三十三个鸡蛋、七十尾鲑鱼、一千六百尾鳟鱼、二百四十条其他鱼，虾无数，还有二百尾江鳕、七十袋燕麦和三十五大车柴草。此外，还从维也纳买回足有一担豌豆、五十磅生姜、二十五磅石竹花、四磅肉豆蔻树花、四磅番红花、一千个柠檬、五百个桔子和一百五十三磅甘蔗糖。光是佐料和烹调开支就支出一千零八十四福林四十四第纳尔。须知，那时农忙季节短工每日的工钱才只有十五——二十个第纳尔。）

这些大贵族们穷奢极欲的挥霍造成了农奴们沉重的负担。据记载，大约在1555年，考尼饶地方庄园的农奴们给纳道什迪·托马什的夫人、有名的考尼饶·欧尔索娅的信就这样诉苦道："尊贵的夫人，您知道，我们的土地多灾多难，卡辛贝伊在这里屠杀了两次，而不是一次。您也知道，尊贵的夫人，德国人的队伍也把您的农奴们抢掠得精光。从此，我们再也恢复不了元气。现在是您的管家命令我们在考尼饶庄园干那么多活，可我们各户只有一两头牛，都被管家征去耕地了。我们耕上一个星期还不行，要让我们耕半个月。不放我们的牲口，也不放我们本人回家。我们的牛干活累得都起不来了。"

纳道什迪家族农奴们的这封信表达的是十六世纪中期匈牙利农奴的典型情况。他们受尽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军事冲突之苦（不管是敌军，还是友军，只要踏入村庄，他们都难免遭殃。）和平时期，农奴们的负担成倍增加。与从前相比，徭役的负担也是惊人的。农奴所面临的这种突然猛增的负担我们可以从土地所有制结构所产生的变化找到原因。

根据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每块土地都属于地主所有。（维尔伯齐[1]规定，"农民除获得劳动工资和奖赏之外，无任何权利，

① 参见第168页。

土地属地主所有”。）地主使用的土地分两种形式：一是分成小块，租给农奴；二是直接由自己耕种。由地主自耕的土地叫做地主自营地。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农村贵族的土地也几乎全部由农奴耕种的地块组成。地主靠农民交租获得收入。地主亲自经营的地块不占任何比重。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大量军需物资的供应以及得到大大发展、工业化达到相当水平的城市都为粮食、酒类和肉类提供了良好的市场。这一切都促使大地主们——他们为维持自己豪华的生活和大兴土木，都需要更多的钱——把尚未交给农奴耕种的土地亲自经营，或用开垦荒地、收回农奴的耕地等办法来扩大自营地。

地主们很少雇佣劳力，而是用农奴应出的徭役来耕种自营地。农奴为地主耕作时，必须自带耕畜和农具，而且往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法律规定的农奴徭役天数为52天，这已经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了，但地主还时常加码。每当耕、播、收这些农忙季节到来时，他们都任意指派农奴为他们干活。1514年的法令规定每星期出徭役一天，而地主却往往增加到二至三天。每逢农忙，地主们不顾农民自己地里的农活堆积如山，却任意征用农奴为他们劳动。

地主的自营地和农奴的地块一样，都是广种薄收。农民采用秋耕、春种、休息的“三三轮作制”，带铁铧的木犁总共只能耕几指深，土地也很少上肥。无怪收获量只达到种子的四、五倍。收割用镰刀，收下的粮食带穗堆放在仓库里，整个冬天边用边打，剩下的乱草、杂禾则挖坑沤肥。

随着地主自营地的扩大，农奴的负担也随之加重，这就引起了农奴的反抗。除了经常发生的逃走事件以外，农奴杀死残暴地主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斯拉沃尼亚曾在1573年发生过古拜茨·马泰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约有一万二千名农民参加的暴动也扩展到

近邻克拉伊纳和斯塔耶尔①。暴动被武装镇压下去之后，古拜茨也如同当年多热一样，被活活烧死。除了暴力和最终的威慑手段外，在通常情况下，维护封建统治，用地主阶级的行政机构和国家政权机关就足够了。如禁止农奴自由迁移和使用地主法庭进行审判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1514年，国会出于报复，规定将农奴固定在土地上。但是，在莫哈赤之战以后的数十年中，这在事实上不可能彻底实行。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看到农奴自由迁居好处的人，因为他们希望以此获得新的劳动力。为了缓和社会的紧张局势，国王也愿意朝这方面施加影响。由此，十六世纪中叶又恢复了自由迁徙权。但具体执行起来又完全取决于各贵族州。自1608年开始，当等级权力加强时，整整一个多世纪没有重新改变这个规定。但由于普通贵族的发言权增加，而他们又比较愿意农奴固定在土地上，因此实际上这条规定仍没有得到实施。

地主法庭是地主阶级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大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极大的特权，他们自己可以行使许多实质性的国家权力，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尤为如此。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各贵族州的地主法庭至少由一个法官和一个陪审员组成，并有邻近地区的贵族出庭陪审。农奴的任何诉讼，如村长无法解决，或案情较重要，均由地主法庭处理。地主与农奴之间的案件，或农奴之间的民事案件(如遗产问题、污辱名誉问题等)亦由该法庭受理。地主法庭并可对刑事案件进行判决(包括判处死刑)。

总结农奴状况所发生的变化，明显地可以看到封建制度又重新得到巩固。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从十五世纪末起，开始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市镇的特权几乎被取消殆尽；地主加强了农

① 今奥地利施蒂里亚一带。

奴的人身依附性(迁居的困难、地主法庭对农奴的无上权力)；严格规定了农奴不得拥有土地权；地主大量扩大了自营地，从而更加重了农奴的徭役等等。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单是匈牙利一个国家的特殊性，在周围几个国家也大体相同(如捷克、波兰、俄罗斯和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欧洲西部迅速城市化、资本主义化，而东部封建主义却重新强化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按照恩格斯所下的定义——把十六至十八世纪称作“第二个农奴制”阶段。

农奴社会地位的固定化、通过征用农奴劳役而经营的大面积地主自营地的形成都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和迅速扩大工商业。当时，伦敦人口已达到五十万左右，而匈牙利最大的城市（布达、波若尼、德布勒森）充其量才有八千至一万人口。几乎谈不上全国性的贸易市场。商品交换是在地方，而且主要是在集市里进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当松弛，至多是把若干本地特产从平原地区运往邻近的山区，或从山区运到平原农村地区。事实上，每个地区，出于运输困难，都力求经济上自给自足。正因如此，当时国内无论是度量衡制度和商品价格都不统一。常有这种情况：同一种商品到邻州就可以卖到两倍的价钱。

随着“地理大发现”年代[①]的到来，世界的贸易中心已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这给匈牙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种变化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使易北河以东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晚了几百年。

匈牙利的国内改革

政治上处于分裂、受土耳其欺压的十六世纪匈牙利的经济和

① 西方史学对十五到十七世纪欧洲航海者发现新航路的通称。

社会发展程度无疑是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的。但是宗教改革运动（恩格斯把它称作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向封建主义发动的第一次进攻）还是传到匈牙利来了。这不单是因为维腾贝尔格①大学的匈牙利学生和从德国回来的商人很快把路德教的活动情况带回到匈牙利，也还因为地主的过度压迫使农民得不到自由发展，从而促使农奴，特别是促使生活相对说来较为优裕的农业市镇居民比较易于接受新思想的缘故。统一的国家政权的消亡、为争当国王而展开的两派势力的斗争、教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软弱，以及匈牙利国家的人道主义思想等都促进了改革思想在匈牙利迅速传播。宗教改革运动的传播者是不畏险阻的基督教改革派。其中大部分原是天主教的下层教士或僧侣。他们先是设法到维腾贝尔格去接近路德和梅兰希通，而后来则是更多地到传播瑞士改革派教旨的西方各大学去学习，更多地宣传加尔文教派的观点。在国内则是争取某些大贵族，设法做这些贵族的家庭神甫，因为这样他们进行活动比较自由。改革者们走遍了王室匈牙利和埃尔代伊，而且在土耳其占领地区也建立了好几百个宣讲点。起先，他们传播路德教教义，到十六世纪中期，则主要是宣传瑞士派改革学说（特别在蒂萨河东部地区）。当局企图阻止，但未能奏效，国会的决议等于一纸空文。

当时，人们对生活中的任何问题，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福利等问题，都以宗教的观点来加以研究，用宗教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不仅互相对立的传教士们极其热烈地争论着（即使是一些神学性的问题），而且连市民、农民和贵族也都展开了争论。北方地区的各个城市和埃尔代伊的撒克逊人拥护路德教派，农业市镇中的农民和大部分从事贸易的市民则倒向了瑞士思潮一边。要求变革

① 维腾贝尔格在今东德。1517年马丁·路德在这里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皇。

的激进分子却不满足于适应封建制度的福音派和改革派教会的宗旨。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中传播新的、遭到一切政权禁止的学说（例如反对三位一体说和儿童受洗等），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提出了革命的主张。他们鼓吹特殊的僧侣等级没有必要，宣传允许拒缴三十分之一税（海关税），不应当为"叛教和异教"的主人效劳等。他们还预言，1570年世界末日将要到来，代之而在人间的将是"千年之国"，那里既没有王公、主教，也没有地主和农民。

改革运动中人民派的一支在1569年酿成了蒂萨河东部地区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西拉基① 地方的罗马尼亚族农民，名叫卡拉丘尼·久尔吉，外号"黑人"。他聚集了一支很大的队伍，宣布对土耳其进行圣战。一时间，农民和边防城堡的战士迅速从四面八方投奔而来。起义军一度占领了德布勒森。但是，在巴拉森特米克洛什地区的土耳其边境城堡（在今特勒克森特米克洛什附近）一战，他的部队受挫后瓦解，其本人则被德布勒森市的贵族们俘获并处死。实际上这也是整个改革运动人民派的命运。虽然在"三位一体否定者"运动中较温和的一派甚至还赢得了亚诺什·日格蒙德的支持，并在埃尔代伊组织了"唯一神教"的教会，但这是以同封建主义制度的和解为代价的。而改革运动人民派的追随者则不是遭到杀戮，就是被监禁。（匈牙利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最杰出的人物达维德·费伦茨的遭遇也大体相同。他是科洛日瓦尔一位鞋匠的儿子，从一个天主教徒成为路德教徒，后做了基督教的加尔文派主教，接着又成了三位一体说的反对者，最后则作为一个守安息派日的烈士死在狱中。）毫不奇怪，各方面的围攻致使这场人民改革运动最后遭到了毁灭。

从本质上看，这场改革运动，没有能够改变匈牙利的封建制

---

① 在巴兰尼亚州。

度，但它在文化生活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经过严峻生活洗礼的传教士们一般都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不少人既是作家、翻译家、传教士、印刷者和出版者，又是匈牙利语言和匈牙利文化的忘我战士。

传教士们用匈牙利文宣讲和书写，因为“对农民说拉丁文，就100 象和石墙说话一样。”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匈牙利文后再传送给农民。“对每个民族都要用该民族自己的语言说话”——西尔维什泰尔·亚诺什在圣经匈译本前言中这样写道。他和圣经的另一个译著者卡罗利·加什帕尔一道为开创匈牙利文学语言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找到与圣经里丰富的词汇相符合的匈牙利词汇。除他们两个人以外，还出现了不少写赞美诗、创作剧本，甚至还有创造传奇文学（当时的小说文学）的宗教改革家。斯达拉伊·米哈伊、斯卡罗希·霍尔瓦特·安德拉什、海尔塔伊·加什帕尔和博尔奈米萨·彼得等，虽然在今天只有文学史家熟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却是早期匈牙利文学的先驱。

这次改革运动的一项重大成绩是印刷术的传播。在赫斯·安德拉什的试验遭到失败以后半个世纪，改革家们在大贵族的庄园内，在城市里创立了二十几个印刷所。宗教改革时期创建学校的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那些当时有名的“学堂”一直是各地的文化教育中心。这些地区有帕塔克、帕保、德布勒森、绍普隆和埃佩尔耶什①。

101 反土耳其还是反哈布斯堡？

莫哈赤之战所处的那个世纪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土耳其灾

①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雷肖夫。

难、哈布斯堡的统治、埃尔代伊的命运和前途、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等——互相关联地在向新的世纪过度的年代里逐一出现了。对土耳其的十五年战争是这场严重考验的第一个课题。

苏里曼死后，强大的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在它当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现在却不断遭到失败。1571 年，在莱潘托海① 之败以后是旷日持久的波斯之战。1593 年，在匈牙利从未间断过边防城堡之间的小接触发展成了一场大战争。这时在人们面前出现了驱逐土耳其的希望之星。起初，为收复布达市附近的一些城堡发生了战斗。随后，埃斯泰尔戈姆获得解放。在攻占了维谢格拉德、瓦茨、豪特望和佩斯之后，开始围攻布达。但希望很快变成了泡影。哈布斯堡无能的将领在军事上失去了主动。接着，在迈泽凯莱斯泰什附近的一次会战中（1596 年）土耳其军队取胜。(起初土军已开始溃退，但哈布斯堡雇佣军毫无纪律和肆意掳掠，终于造成了这次战斗、乃至整个战争的失败。)

这场战争在经过迈泽凯莱斯泰什战斗之后，实际上已变得毫无目的。城堡频繁易手。但在力量对比方面始终没有出现重大变化。若干微小的战果使匈牙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艾格尔和考尼饶两城市落入土耳其之手，多瑙河沿岸的战场变为一片荒野，雇佣兵士抢劫无度，传染病流行。

但在布拉格的德皇鲁道尔夫(1576—1608)却置匈牙利人民的疾苦于不顾，依旧着迷似地收集着钟表和珠宝，并时常担心被刺。后来，他在西班牙和教皇的影响以及耶稣会的鼓动下制定了计划，声称不仅要驱除土耳其（甚至到后来已经没有这一可能性时也未放弃这一打算），还要建立专制主义政权，摧毁等级制度的反抗势力，并要无情地清除新教。

---

① 在希腊。

战争为鲁道尔夫实现他上述计划的后几项目标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当无能和不坚定的巴托里·日格蒙德最后完全放弃埃尔代伊以后（其间还有巴托里·安德拉什和米哈伊任大公的短时间），鲁道尔夫的将军巴斯塔成了埃尔代伊的主宰。这个到处当雇佣军头子的将领认为对匈牙利人“必须用铁棒统治”。在这期间他还往自己的各个城堡里搜集了数量惊人的珍宝。

鲁道尔夫的雇佣军在匈牙利也慢慢地变为贯彻哈布斯堡王朝对内政策的工具。卡绍城防长官贝尔基尤若①把大炮架设在大教堂对面，以此强迫新教徒交出教堂。雇佣军的军官们在塞拜什地区也照此办理。国王用暴力对付改革运动时，就是在几个和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城市开始的。但是，也为搞垮代表着相对来说具有较大力量的贵族阶层做了准备。此间，当年由斐迪南设立的以处理经济（及一部分政治）问题的政权机构“匈牙利枢密院”对贵族罗织了一系列叛国案。（特别是被认为对国王忠贞不移的新教徒大地主伊雷什哈齐·伊斯特万一案激起了很大波澜。）他们试图以此吓倒坚持等级机构、坚持等级政治权力的贵族们和新教徒们，并想通过没收土地解决枢密院财政上的匮乏。

匈牙利毫无理由的被蹂躏，埃尔代伊被掠夺，外国雇佣兵的横行霸道，宪法被嘲弄，以及枢密院罗织的“叛国案”等所带来的耻辱，在匈牙利造成了对哈布斯堡王朝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即可爆发公开的起义。当卡绍城防长官贝尔基尤若（他声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我们千万不要休息！”）贪婪心切地开始向蒂萨河以东最大的地主博赤卡伊·伊斯特万的比豪尔州领地发起进攻时，起义时机成熟了。

102

① 意大利人。

1604—1606年的 博赤卡伊起义

103

博赤卡伊的一生正是十七世纪初这个历史转折点的象征。博赤卡伊曾经是巴托里·日格蒙德的近臣，原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家。他当时相信，团结哈布斯堡驱除土耳其会成功。在为时十五年的对土战争开始时，他本人也亲临战场，和米哈伊总督一起在多瑙河下游的久尔杰沃① 战胜了土耳其军队。然后，在鲁道尔夫的布拉格宫廷供职。在这里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失去了信心，于是退居自己在比豪尔的领地上。起初对于反哈布斯堡王朝逃往土耳其占领区的贵族们发出的呼吁他还不肯响应。但当贝尔基尤若用武力向他发动进攻时，他被迫招集哈伊杜骑兵战士保卫他的城堡了。

除博赤卡伊外，事件的主角是哈伊杜骑兵。所谓"哈伊杜"，在十五世纪大部是南斯拉夫一带的贩牛人。但在土耳其多次进犯之后，主要构成已是失地后投军的匈牙利农奴了。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边防城堡作战，但更多的则是在接收他们的各大地主那里当兵。

在向博赤卡伊进攻的卡绍城城防长官的军队中也有相当多的这种哈伊杜士兵。但是——正如博赤卡伊所写的那样——"他们不愿当本民族的刽子手"，而且暗中和博赤卡伊商谈，最后转到了他的一边。他们发誓"为祖国和所信仰的自由战斗到最后一息。"并在1604年10月15日夜间，奇袭并击溃了处在迪欧塞格和阿尔莫什 104

① 今罗马尼亚的朱尔朱。

德地区行进中的德国雇佣军。

博赤卡伊的起义迅速扩展，不到两个星期，从瓦劳德一直到卡绍，全被博赤卡伊所控制。在两军交战时，雇佣军固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胜利，但在受挫之后，博赤卡伊又重整队伍，致使巴斯塔在将队伍开往埃拜尔耶什进行冬季驻营期间大有四面楚歌之感。起先，贵族们不信任地旁观这支“东拼西凑的乡巴佬乌合之众”，但当1605年春季哈伊杜各路军驱逐了巴斯塔部队、占领了北部地区、出现在多瑙河西部地区，并向奥地利挺进的时候，多数大地主和各州贵族改变了看法，并也加入进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使博赤卡伊在塞伦奇①会议上被推选为匈牙利大公，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埃尔代伊也选他为大公。土耳其苏丹也给博赤卡伊送来了国王的王冠。

博赤卡伊被迫同土耳其结成联盟，因为他很清楚，他不可能与同时存在的两位皇帝相抗衡。当时，从匈牙利等级制宪法和匈牙利的独立出发，他认定哈布斯堡王朝更为有害。因此，他同“天然的敌人”结成了同盟。他认为这虽然是必要的，但也是暂时的。博赤卡伊大公处处都显示了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还清楚地看到，单靠土耳其的完全孤立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可能达到废黜哈布斯堡匈牙利王位的目的。因此，他决定进行谈判。他的谈判代表是伊雷什哈齐·伊斯特万。在维也纳所进行的讨价还价极其冗长，极端艰苦。然而，现实环境迫使双方达成了一致。博赤卡伊知道，贵族是不愿意长期付出牺牲的，而且他们正以仇视的目光看着这难以控制的、耗费他们财富的哈伊杜军队。威胁哈布斯堡王朝的，首先是财政亏空，同时王朝也怕捷克、奥地利的贵族和农奴发难起义。这样，到1606年秋季，就产生了维也纳和约。和

---

① 在今匈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

约使埃尔代伊得到了几个州（如乌戈乔、拜莱格、索特马尔），并加强了匈牙利的等级权利。

维也纳和约保证宗教活动自由，但只有贵族、城市居民和边防城堡战士才享有这种自由。（就是说，宗教自由在当时尚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一种等级特权。）和约恢复并加强了等级制宪法。匈牙利各等级对和约规定五十年以后可以重新选举宰相一条深感满意。各等级认为在宰相极为广泛的权限中可以找到维护自己政治权利的保障。朝廷还作了其他一些许诺，如：承认匈牙利王室会议，匈牙利大法院行使原来的职权，任命匈牙利人为各大边防城堡的城防长官。但和约最有影响、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条规定是保证埃尔代伊的独立自主。在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各等级之间和平局势的维也纳和约之后又与土耳其签订了日特沃河①口协定。该协定规定，交战双方各自保持自己手中现有的城堡，匈牙利国王不再向土耳其苏丹纳贡。

博赤卡伊对他的哈伊杜将士——"夺回自由的人们"，并没有忘恩负义。他把一万多名哈伊杜将士在集体提升一批贵族之后，安顿在自己蒂萨河东部地区的领地。（他们有的搬进卡罗市的城堡——很快又从这里迁居到伯瑟尔梅尼——，有的迁居到纳纳什、多罗格、沃尔亚什、哈德哈佐、瓦莫什佩奇、希马和维德，原在比豪尔地区的那一部分则迁到了克莱谢尔城，后又从这里迁到了萨伦塔城。）一部分哈伊杜战士就这样从农民的命运中摆脱出来了。所谓"哈伊杜战士的自由"，意味着免除他们对地主承受的负担，而只负担服兵役义务。博赤卡伊给哈伊杜战士们以家园，给祖国以英勇善战的战士。

105

① 日特沃河在斯洛伐克。

反改革势力再次反扑和埃尔代伊的局势

在1606年的最后几天里，博赤卡伊于卡绍城逝世。随后，有消息（无法知道是否属实）说是被他的秘书卡塔伊"毒死"的。哈伊杜战士们怒不可遏，愤怒之下在这座城市的市场上将卡塔伊凌迟。战士们预感到艰苦岁月正在来临。果然，博赤卡伊死后不久，各城防长官旋即阻止哈伊杜战士们到各地定居。于是，很快就有大约二、三万名哈伊杜人重新拿起了武器。哈伊杜人认为神化的德意志鲁道尔夫皇帝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要让匈牙利人取代鲁道尔夫当自己的国王。

106 当时，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处在相当混乱的局势之中，因为奥地利和摩拉维亚的各等级也反对鲁道尔夫。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的斗争也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哈伊杜人的暴动、各等级的反抗、家族内部的不统一迫使鲁道尔夫于1608年离位。随后，选举了他的弟弟马笃斯亲王接替他作了国王。马笃斯二世（1608——1619）在加冕之前发布的法令条款中被迫承认等级议会的权力、等级的特权和维也纳和约各条款。最后，巴托里·加博尔把哈伊杜士兵们收集到自己的雇佣军队伍中，并在他们帮助之下成为埃尔代伊大公。

各等级权利的加强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加强中央集权才是随着发展而出现的时代趋势。

在周围国家中，等级地位在同王室政权的斗争中得到加强的只有波兰一国。哈布斯堡还拥有很大的潜力。马加什二世在同匈牙利——奥地利——摩拉维亚各等级松弛联盟的斗争中逐步获胜。他采纳了维也纳红衣主教克莱斯尔的建议，试图用专制主义

手段加以统治。

对维也纳朝廷来说，专制主义与反改革是不可分割的。在马笃斯二世的继承人、狂热的教徒斐迪南二世(1619——1637)统治之下更是如此。斐迪南自幼受耶稣会的教育，他把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宗教”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为此，他利用国家政权的一切手段帮助耶稣会教徒进行反改革的行动。当时，在他的统治权的支持之下，修建了不少寺庙，出现了大量的宗教书籍，建起了许多学校和宗教团体，并辅之以威胁、许愿、驱赶对方传教士、强行拆毁新教教堂等。

匈牙利国的反改革派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帕兹马尼·彼得。他从一个青年天主教的下层贵族当上了耶稣教会派大学的教授，后成为埃斯泰尔戈姆的大主教，是斐迪南二世的亲信和顾问。他以过人的精力和突出的辩才指挥着反改革运动。在运动中，作为他的支柱的是十七世纪前十年里在匈牙利也奠定了基础的耶稣会。在他的纲领中，文化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帕兹马尼身体力行，以卓越的才华写出了大量论文和神学著作。在匈牙利反改革运动的中心纳吉桑博特① 于 1635年建立了一所耶稣会大学(后来这所大学由玛利亚·特利莎女皇迁至布达，又由约瑟夫二世移到佩斯)。帕兹马尼是匈牙利文学语言的创始者之一，但他的政治活动却支持和加强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

帕兹马尼认识到，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和与其息息相关的天主教教会对匈牙利的统治同大地主的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各大地主所信仰的宗教及其政治态度通常是受他们权势影响下的一般贵族（即所谓“随从”）的宗教和政治态度所决定，而农奴的信仰则是由大地主规定的，即所谓“耕谁的地就信谁的教”。修建

①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尔纳伐。

教堂的地主们也按照自己的信仰选择相应教派的教士在教堂里供职。因此，各大地主一旦重新成为天主教教徒时，也就迫使农奴与主人信仰同一种宗教。于是，帕兹马尼便竭力争取大地主。他的活动也受到了王朝的支持，因为王朝很清楚，大地主归信天主教，就会更加忠顺朝庭。

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愈来愈坚决地实行专制主义政策，也就是竭力将政权集中到国王手中的政策。与此同时，王朝极力降低贵族地位，尽量使贵族脱离政治生活。为加强王室政权，哈布斯堡王朝和欧洲其他专制统治者一样，还加强了军队，并发展了行政系统。一般说来，这是带有积极意义的措施，因为王室集权会阻止大贵族滥用权势，会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实行的专制统治却不完全如此。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优越性首先是在本民族的国王当政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体现，而哈布斯堡家族是外国人，他们的朝廷又设在维也纳或布拉格。同时，他们身边的顾问又首先是德意志人，这些人首要的目标是帝国的利益。因此，他们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把匈牙利纳入德意志帝国的轨道。哈布斯堡王朝"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的概念不仅给匈牙利国带来了危机，而且威胁到了匈牙利的等级制度，威胁到了这个国家残存的一点独立性，甚至还可能会使国家遭到全面毁灭。

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这种独裁统治将会带来的危害，博赤卡伊已认识得很清楚。他曾试图以埃尔代伊大公国进行抗衡。他的遗言充分说明了他卓越的现实主义政治远见，他曾指出："只要匈牙利王冠操在比我们更强大的民族手中，也就是德意志人手中……。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匈牙利人在埃尔代伊当大公。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博赤卡伊面对维也纳的企图，考虑如

何制约王朝的政治统治以及如何全面捍卫匈牙利的利益（首先是独立）时，是这样估价埃尔代伊的作用的。

可是，巴托里·加博尔（1608——1613），这位名门大地主家庭的最后一个后代，却没有能够真正地贯彻这个思想。这位年轻的大公才智过人，胸怀大志，但他放荡不羁、刚愎自用。他想一统罗马尼亚诸大公国、埃尔代伊和波兰于一体，却又迫使最忠于自己的贝特伦·加博尔逃亡到土耳其。他用暴力强占了撒克逊人的城市，把那里的人们树为自己的敌人。他的任性、固执引起了土耳其皇宫和维也纳朝廷的不满。最后，苏丹认为他僭越过甚，便发兵到埃尔代伊将他赶下王位。后来，巴托里在逃跑中死于哈伊杜之手。接着，议会把被巴托里赶到土耳其的贝特伦举为大公。

贝特伦·加博尔和拉科齐·久尔吉[1]一世

109

贝特伦·加博尔是作为蒂萨河东部地区塞凯伊人的后代从中等贵族阶层登上大公宝座的。其祖父参加过莫哈赤战斗，父亲先是效忠斐迪南，后在巴托里家族供职。贝特伦青年时就参加了战斗，开始了政治生涯。十五岁时参加了博赤卡伊军队在豪沃什平原的战斗。曾一度在哈布斯堡朝廷任职，但很快就同德国人发生了冲突。后来，正如他日后自己所写的那样，经过激烈的思想矛盾之后，毅然离开了祖国和未婚妻卡罗伊·茹让娜，逃到土耳其。事后他看到这次逃亡对他来说是有益的，因为他认识了土耳其人，

① 我国有些历史书译为“拉科西”。

而且还同土耳其的巴夏们建立了许多联系。

他最初的一系列计划就是以土耳其人的支持为基础产生的。原有一批为数不多的贵族因对哈布斯堡王朝在埃尔代伊的统治不满而逃到了土耳其占领区，这时贝特伦就当上了这些贵族们的领袖。由于他一时还无独立行动的力量，因此他很希望博赤卡伊组织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他们之间开始信件来往，而来往函件却成了贝尔基尤若征讨博赤卡伊的导火线。因为实际上，就是当贝尔基尤若受命搜查“亲土耳其贵族”时发现了他们之间的来往函件。

在博赤卡伊的朝廷中，贝特伦是个显要人物。巴托里·加博尔也铭记着自己被选为大公主要应归功于贝特伦，因此赐予了贝特伦以高位和封地。但是由于巴托里专横跋扈，喜怒无常——正如当时的一位宫廷史作家所说的那样——贝特伦“出于无奈，才远走土耳其逃生。因为埃尔代伊和匈牙利的距离过近和教士们的仇视太深，到匈牙利去是无安全保证的。”果然，在土耳其的帮助之下，很快他就以大公的身份返回了埃尔代伊。

他统治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抗哈布斯堡朝廷的公开和秘密的干涉。他刚一上任，维也纳就对他展开了一个诽谤运动。骂他背信弃义，亲土耳其，背叛天主教，但未能奏效，后又组织阴谋活动，物色僭位者，还挑拨土耳其朝廷来对付他。但是，这些阴谋诡计都破产了，而贝特伦却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最后，哈布斯堡王朝被迫签订了和约。后来又承认埃尔代伊独立，承认贝特伦为大公(分别于 1615 年和 1617 年)。

三十年的战争① 为贝特伦提供了大好良机。他由维持转入了

① 指 1618——1648 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战争以皇帝一方的失败告终，签订《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反击。在匈牙利北部儿位大贵族(拉科齐·久尔吉、图尔佐·伊姆雷、塞齐·久尔吉)的支持下，贝特伦出奇不意地攻陷了卡绍城，甚至当哈布斯堡的卡绍城堡长官被抓到贝特伦面前时还在惊疑不定。1619年8月底，贝特伦自埃尔代伊出击，不到三个月就占领了波若尼，把王冠夺到了手中，并同捷克——摩拉维亚联军一道开始围攻维也纳。

卡绍城传教士奥尔温齐·彼得在题为《匈牙利的哀怨》这篇传单中概括了这次起义的原因。文中控诉了等级会议宪法所受到的凌辱和对新教徒的迫害。贝特伦本人在1619年11月初的一封信中也写到了决定发动起义的原因。他写道："由于高贵的匈牙利 110 ——我可以为之愉快而死的亲爱的祖国遭受了戴王冠的国王和主教的百般凌辱，这就是一切原因所在。"但是，除此而外，贝特伦丝毫也不掩饰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统一匈牙利，建立民族帝国。

但当时内外政治形势对于实现这一大胆的目标不利。匈牙利的各等级虽然对哈布斯堡王朝置他们于不顾，对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心怀不满，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才能最有效地保障地主对农奴的权力。此外，这些等级不肯作出牺牲，他们只是在看不到对哈布斯堡王朝有妥协的可能性时才肯承担战争的负担。在1620年拜斯泰尔采银矿区召开的国会上，匈牙利的贵族在得到对他们的等级特权的保证之后，虽然热情不高，但还是选举了贝特伦为国王。至于加冕仪式——贝特伦本人也并不着急——最后也没有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公国，只有取得土耳其的同意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国际上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才可能巩固，但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土耳其朝廷虽然愿意贝特伦为王执政，但这样它需要放弃埃尔代伊。(苏丹朝廷的回答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让埃尔代伊归属匈牙利，那是不可能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捷克的起义军于1620年11月在布拉格附近的费赫尔山的一场决定 111

性的战斗中遭到了失败。此时，贝特伦实际上已处于孤立地位，被吓呆了的贵族们对贝特伦置之不理。但这位大公却显示了他的军事领袖的才能，这使斐迪南认为还是同他签订和约为佳。结果，1622 年 1 月的尼科尔斯堡和约重申了维也纳和约的各项条款，并且规定贝特伦在世期间将北方七个州划归埃尔代伊。

当捷克还处于专制主义的野蛮统治时，在匈牙利取得了上述结果，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贝特伦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在寻找新的可能性。他试图同英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西方势力建立关系，并两次(向哈布斯堡王朝)出击。在 1623 年和 1625 年发动的进攻，甚至还击溃了在三十年的战争中最著名的德军司令华伦斯泰。可是，西方各国对此只是作壁上观。因此，贝特伦的战绩只具有地区性价值，他的成绩也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巩固他已经取得的地位而已。贝特伦仍不灰心，甚至他还向哈布斯堡王朝建议结盟，表示如果他能得到匈牙利，甘愿娶王朝家族的一个直系公主为妻（此时贝特伦的妻子已去世)。但此事未果，然后他娶瑞典王后的姻亲卡塞琳·勃兰登堡为妻，以此促进瑞(典)——俄(罗斯)——埃(尔代伊)大联盟的建立。但是，当他的使者抵达克里姆林宫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112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接替他的未竟事业的是拉科齐·久尔吉一世。拉科齐·久尔吉(1630——1648)是贝特伦的军事统领，是蒂萨河东部和北方地区最大的地主。他缺少贝特伦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他只是经过长时间的权衡和犹豫之后，才投入了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才充分利用三十年战争最后的瑞典——法国阶段① 的有利时机。匈牙利的等级对他的行动反应冷淡，而北方人民——尤其是斯洛伐克的农奴——却给了他不少帮助。拉

① 1635——1648 年

科齐联合了瑞典人。这时，土耳其朝廷却命令埃尔代伊收兵。(埃尔代伊大公在内政方面几乎完全独立，但在对外活动上却受到苏丹的有力控制。)拉科齐被迫同斐迪南三世(1637——1657)订立了林茨和约。该和约比博赤卡伊与贝特伦所签订的和约有所前进的地方是把宗教自由权扩大到了农奴。

多次起义所获得的政治成果是很有限的。虽然拯救了等级宪法和独立，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尽管保证了宗教自由，而在王室匈牙利(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却未能抵挡住反改革势力。

当然，在埃尔代伊所获得的胜利是无可争辩的。贝特伦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限制了封建等级。在埃尔代伊出现了民族专制政体的轮廓。贝特伦大公接纳了当时被驱逐的（基督教）再洗新教徒手工艺工匠，发展了采矿业，即使在长期战争期间也大力铸造币值稳定、质地优良的货币。拉科齐·久尔吉虽然主要忙于扩大和经营自己的产业，但在他的统治下，这个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埃尔代伊毕竟还是向前发展了。

贝特伦和拉科齐除在军事上耗费了大量金钱以外，还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艺术和文化事业上。埃尔代伊是当时匈牙利民族文化的根据地。在这里，几任大公进行建设，开办学校，还将作家、学者和艺术家邀进宫中。贝特伦·加博尔还曾设想把久拉费赫尔瓦尔变成与他的政权相称的首都。他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具有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的宫殿，并以很大的代价创办了一所欧洲水平的学院。在重视学校方面，拉科齐家族的人也是以贝特伦为榜样的。拉科齐·久尔吉一世及其妻子罗兰特菲·茹让娜把沙罗什帕塔克城变成了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捷克的大教育家科门斯基就曾在这里讲学多年。在拉科齐时代，匈牙利最伟大的教育家奥巴曹伊·切莱·亚诺什也曾在埃尔代伊讲学。在文学上，当时最大的诗人里马伊·亚诺什和最大的人文主义学者森齐·莫

尔纳尔·奥尔贝尔特也都得到过埃尔代伊几任大公的支持。

113

埃尔代伊政权的失败。兹里尼·米克洛什

十七世纪中叶，维也纳、伊斯坦布尔① 和久拉费赫尔瓦尔这三个地方决定着匈牙利的命运，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土耳其历任苏丹和埃尔代伊的大公们支配着这个国家。

在威斯特发里亚和约② 签订之后，哈布斯堡王朝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对西方的政策。因此，它力图避免和土耳其的一切冲突。这虽然会严重损害匈牙利的利益，但仍旧同土耳其一次又一次地订立了和约。除了研究对西方政策以外，哈布斯堡王朝着重解决国内问题。它以正在强大起来的国家政权摧毁了奥地利等级的对抗，并在匈牙利也如法炮制。

土耳其帝国经过一段时期的衰落之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重新崛起。它的几个阿尔巴尼亚出生的将领又重建了军队，企图实现其昔日称霸世界的宿愿。埃尔代伊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力量上，都不可能与这二者相匹敌，但就匈牙利而言，它还算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因素。

在这样一种历史形势下，兹里尼·米克洛什（1620—1664）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在政治上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匈牙利人民应该自己解决自己历史上的问题，首先就是要驱逐土耳其。

起源于霍尔瓦特③ 、一贯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兹里尼家族同

---

① 即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帝国首都。

②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和约。

③ 今克罗地亚。

土耳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这个家族的土地面临着土耳其侵略者的危害，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从来不惜流血牺牲。兹里尼·米克洛什的一位先辈曾战死在莫哈赤沙场，他的曾祖父牺牲在西盖特瓦尔，祖父和父亲以及他本人都是抵抗土耳其的名将。他自幼读书时就练习武艺，从小立志以赶走土耳其为己任。他断定，形势对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是有利的。于是着手以匈牙利的力量建立起一支民族军队。他所设想的民族军队，不分宗教信仰。他把自己依靠的力量从"破落贵族"，越来越多地转向"种地人"。兹里尼曾这样阐述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自我保存的基础，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坐等哈布斯堡王朝去驱逐土耳其的话，我们将彻底失去独立。"

当兹里尼考虑着把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千百个障碍。到十七世纪中叶，边防城堡的生活已毫无战斗气息。拥有地产的贵族已由参加战争改为经营土地了。各边防城堡已失去了昔日的威武，纪律松弛，军队枯竭。大贵族们一心等待哈布斯堡王朝来解放国家，而维也纳则认为同土耳其作战不仅十分冒险，且耗费过大，因此根本无意交战。

兹里尼不辞辛劳，多方努力，试图实现宏图大志。他还作为一个作家，时常以曾祖父的英雄事迹激励着自己的战斗意志。在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西盖特瓦尔之灾》中唱出了"拿起武器，我的勇士"这样的豪言壮语。后来，在他的具有时代水平的军事战略著作（《军事策略》、《勇敢的中尉》）中，阐述了应该如何建立和率领军队反抗土耳其。在实践中，他也确实表现出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天才。

没有实权，当然无法将计划付诸实现。起初，他进展顺利， 114
年未三十，即当上了霍尔瓦特的督军。然而，只有获得宰相的职

位才能够组织民族军队①。在1655年的国会上，他也为获得这个职位做了一次尝试，得到了由一般贵族组成的强大的反对派的支持。如果朝廷也提名他为候选人的话，选举他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国会只能在国王指定的两个天主教徒和两个新教徒的大贵族候选人中进行选举。)维也纳在里帕伊大主教的同意之下，没有提名兹里尼为候选人。最后，维塞霄尼·费伦茨当选为宰相。

兹里尼受到了明显的冷遇和教会的制肘，被迫采取新的政治路线。他在《论马加什国王》一文中阐述了自己过去毫无保留地支持哈布斯堡的路线转而寻求匈牙利的民族国王的思想。他认为拉科齐·久尔吉二世就是理想的人选。但他以埃尔代伊为基础建立的计划不到几年就悲剧性地破灭了。

年轻的拉科齐·久尔吉二世（1648—1660）由于才智较差，处事不慎，难于继承贝特伦的未竟之业。埃尔代伊因多次超越了它作为一个附庸的范围，早已引起了伊斯坦布尔的注意和不信任。当埃尔代伊为争夺波兰王位，同瑞典结成联盟，未经土耳其皇宫同意就发动战争时，苏丹对这种擅自行动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当拉科齐占领了科拉科夫并率兵攻入华沙时，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从后面向他攻来。鞑靼人俘虏了被瑞典人扔在一边的军队，并把战俘解送到克里米亚。其间，鞑靼和土耳其的军队闯入埃尔代伊，横扫了这个在半个世纪的安宁环境下富强起来的国家。土耳其人还攻占了孤立无援的瓦拉德和耶诺②两座城堡，并把城堡和四周大片肥沃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占领区。拉科齐阵亡，他的军事统帅和有可能继承大公职位的凯梅尼·亚诺什也同时战死。从此

① 根据1485年规定的宰相职权为：国王不在时，行使最高权力。如国王年幼，可出任摄政王、军队统帅、佩斯州的州督、等级会议上议院议长（至1848年）。

② 耶诺在今匈牙利的费耶尔州。

以后，只有对土耳其唯命是从的人物才能充当埃尔代伊大公了。115 这个领土被分割得残缺不全、负担着比原来重得多的赋税和被战败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国家再也不能发挥重大的政治作用了。埃尔代伊闪耀了几十年的光辉最后悲剧性地熄灭了。

维也纳朝廷对此无动于衷。天主教教会也不加掩饰地、幸灾乐祸地观望大公国的毁灭。他们对新教等级说："你们再也没有博赤卡伊和贝特伦·加博尔了，埃尔代伊靠不住了。"兹里尼没有用宗派和政治上的偏见看待这些事件，他认识到危险正在发展，预料土耳其人会重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感到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他不顾维也纳军机会议的禁令，建造了兹里尼新堡。他本人还亲自参加构筑工事，甚至倘若需要，他还会拿起刀剑抗击入侵者，保卫家乡。

他的作家的才干也用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1661年，他的题为《医治土耳其鸦片的药方》一文问世。这是一篇充满着沉痛的呼唤和号召英勇战斗的檄文。

"……我看见一条吓人的恶龙，它充满了毒汁和怒火，它想抢夺匈牙利王冠放在它的胸前；我并不是一个生来不会说话、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聋哑人。如果我的呐喊能够吓走这条狂暴的恶龙，那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大喊起来，我要喊：不许欺侮匈牙利！……匈牙利人，我在向你们呼唤！这条恶龙就是土耳其。它从我们手中夺走了瓦拉德和耶诺，它把我们几千个匈牙利人置于奴隶境地，它那锋利的刀剑杀了我们许多人。埃尔代伊，我们王冠上的最珍贵的明珠，被它肢解蹂躏，大公也被它杀害，它象森林中跑出的野猪一样践踏我们美丽的葡萄园，在我们民族和国土上横冲直撞！你们可以问一问，这是给谁带来的灾祸，这种战争威胁着谁？如果我们不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我们切身大患的话，那就让别人来统 116 治我们吧。要知道，连那冥顽不灵的兽类为了自己的洞穴免遭毁

坏，为了让幼畜不被伤害，都会拚死搏斗的话，那么我们又该当如何？在我们的躯体中流着的是匈牙利人的血，为了我们的兄弟姊妹，为了我们的父母双亲，为了我们的妻子儿女，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更要奋起挺身，就是死亡，也要前进！”

1663年，当这条“吓人的恶龙”再次扑过来的时候，兹里尼不顾维也纳的冷遇，挺身而出。但直到土耳其人攻下埃尔谢克乌伊瓦尔①时，他才被委任为匈军临时总司令。在乔洛克兹②，他率兵阻挡住了侵略军的继续进攻。在1664年1至2月里，他成功地指挥了在德拉瓦河沿岸对土耳其军队的进攻，先后攻克并烧毁土耳其的一些边境小城堡，一直追击到埃塞克③。这个地方有一条横越河道与沼泽区的两三公里长的木桥，是土耳其军队最重要的后备通路。兹里尼率军猝然抵达，放手焚毁桥梁，使土耳其在几个月内因通路截断而无法进犯。这时，兹里尼想利用这段时间攻打考尼饶，但维也纳军机会议故意拖延时间，攻城战车误期到达，计划未能实现。

1664年夏季，土耳其的统领又率重兵发起进攻。维也纳再次排斥兹里尼，任命蒙泰库科利为统帅。（这位意大利裔的军事将领是当时有名的军事科学理论家。他把在西方战场上所运用的大规模调遣部队的理论搬来对付土耳其。他有一句名言，打仗需要三件宝：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当土耳其人向西部边境挺进，在森特戈特哈尔德附近横渡拉保河时，遭到了惨败。

蒙泰库科利没有追击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却急忙下令签订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沃尔瓦尔④停战协定。和约规定，土耳其人新

①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扎姆基。

②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日特尼奥斯特罗夫，在布拉迪斯拉发东南，是多瑙河最大的岛。

③ 今南斯拉夫奥西耶克。

④ 在今匈牙利沃什州。

占领的地方也划归苏丹。看来，维也纳是想利用土耳其来制止反抗专制主义的匈牙利。于是，兹里尼开始向最重要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取得联系，但还未来得及采取军事行动，兹里尼本人却在恰克托尔涅[1]附近的树林中打猎的时候被一个狂怒的野猪伤害了。当时和以后几个世纪的社会舆论都把兹里尼之死迁怒于哈布斯堡，甚至直到今日还有这样的传说：杀害兹里尼的实际上是哈布斯堡。有的人尽管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仍坚信在维也纳宫廷里长期保存着一支枪，上面写道："这就是杀死兹里尼的那只野猪。"

维赛雷尼政变

可耻的沃什瓦尔和约及受到威胁的等级制议会，甚至激起了一贯忠于国王的天主教会的上层人物也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此时，国家最显要的一些人物正在策划着一次政变。他们是：维赛雷尼·费伦茨宰相、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里帕伊·久尔吉、国家大法官纳道什迪·费伦茨、霍尔瓦特督军兹里尼·彼得（兹里尼·米克洛什的弟弟）和拉科齐·费伦茨一世（拉科齐·久尔吉二世转信天主教的儿子、兹里尼·伊伦娜的丈夫）。由于埃尔代伊崩溃之后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行动基地的适当地点，因此起义的策划者们往往聚集在某个休养地，设法与外国建立联系，尤其是希望取得法王路易十四的援助。与此同时，他们和土耳其朝廷也有来往，甚至还试着同波兰王室建立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也没有具体办法。他们只策划了一个擒拿德皇利奥波德一世 118

① 即今南斯拉夫查科韦基。

（1657—1705）的冒险计划，而对组织普通贵族阶层，尤其是组织农民几乎未加考虑。他们的活动自始至终只不过是一些大贵族的谋反而已。

1670年，谋反者们在经过多次犹豫之后，决定武装起义。但是，根本无需朝廷镇压即告夭折。由于他们惧怕后果，兹里尼·彼得和他的姻亲弗朗盖潘·费伦茨奔赴维也纳，恳求恕罪。当皇家军队还未开到之前，其他人也放弃了武装起义的打算。然而，维也纳并没有宽恕他们的行动。全部由德国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判处谋反者死刑或剥夺财产。纳道什迪、兹里尼和弗朗盖潘也被处死。拉科齐·费伦茨一世由于付出大笔赎金，并由于他的母亲巴托里·佐菲娅一贯虔诚地支持耶稣会教派有功，才免去一死。这时，维赛雷尼和里帕伊已死去。

利奥波德一世的专制统治和特克利起义

维赛雷尼的谋反为利奥波德一世摒弃匈牙利等级议会和彻底进行反改革运动提供了大好时机。（“我想借此机会把匈牙利的事情好好处理一下。”——他曾这样表示。）利奥波德把匈牙利当作一个被征服了的省份用武力进行控制。他委任德意志骑士等级的首领阿姆波林肯·加什帕尔为执政来统治这个国家，并在波若尼设立德国人和无条件地忠于朝廷的主教参加的执政府。在各地设立了“非常法庭”。他们控制下的雇佣军更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成千上万的一般贵族地主受到审判，即使无证据构成“背叛罪”，其财产也统统被没收。大量“不可靠”的匈牙利边防战士被不予分文地驱走。大约有一万名雇佣兵占领这个国家，成为“德国人的屯兵

119

之地"达数十年之久。

传教士还利用驻军公开追缉新教徒。士兵占据着教堂、学校，并解散了新教徒的市政府。匈牙利新教传教士和学校教员被押到非常法庭。以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为首的执行法庭把莫须有的罪名、坚持自己信念的无辜者一律作为刑事犯发配到船上做苦役。

野蛮的压迫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人逃亡。发轫者是遭到嫌疑的贵族们，继之是被解雇的边防士兵，后有不堪受占领军凌辱的农奴。有很多人逃往埃尔代伊边境地区——分割区，这些出逃的人起初自称"逃亡者"，后来农奴数量居于多数，改称"库鲁茨"。这样，利奥波德愚蠢的专制统治造成了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库鲁茨——洛邦茨"之战。("库鲁茨"一词源自多热·久尔吉十字军的拉丁字；"洛邦茨"是对皇室占领军的贬词，可能来自德语"Lanzr"雇佣军一词。)

库鲁茨拥戴特克利·伊姆雷为他们的领袖。这个有教养、聪明、热情的青年人的曾祖父只是一个富有的贩牛商，到他父亲时已是北方地区最大的地主。他父亲因参加维赛雷尼等人的谋反活动，因而在临死时被德军围于阿尔瓦城堡，当时特克利·伊姆雷尚是个少年，他被迫逃往埃尔代伊，在奥保菲影子大公的朝廷里成长起来，成为善于理财的人物，还是卓越的外交家和出色的军人。他身上集中了库鲁茨领袖的长处和弱点。在最危险的环境中，他从不气馁，并善以奇袭、恶战夺取惊人的胜利。但是，他不懂得组织现代化军队，因此也就不能利用战果，以致在多次遭遇德皇军队的袭击后无奈远遁。 120

1678 年到 1685 年间，特克利在北部高地高劳姆河① 以东地区建立了堪与大公国相比拟的政权。后来，当他与拉科齐·费伦

① 即斯洛伐克境内的赫龙河。

茨的遗孀兹里尼·伊洛娜结婚后，疆域骤增。他的军队通常在二万到二万五千人之间，主要由当年的边防城堡的士兵组成。由于没有常年军饷，因此部队的管理和纪律都极差。特克利的政权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都很不巩固。各州也不愿向特克利纳税。同时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也削弱着他的政权的力量。这位“库鲁茨国王”所能得到的唯一外援就是土耳其。

在特克利起义的影响下，维也纳改变了政策，放弃了公开形式的专制手法。撤销了执政府，在邻近的肖普朗召开了被搁置了将近二十年的议会。在1681年的国民议会上国王重申了普通贵族的特权，各等级选举了效忠哈布斯堡王朝的埃什泰尔哈齐·帕尔为宰相(此人数年后晋升为公爵)。这次国会还同意新教徒在各州的若干地方（即所谓“指定区域”）开展宗教活动。维也纳皇室所做出的妥协显然使各等级和大多数州感到兴奋，但特克利及其拥护者对这种让步并不满意，而且也不认为维也纳确有诚意。因此，起义者仍继续坚持战斗，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战绩。

121

驱逐土耳其

看到特克利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土耳其人于1683年又进行了一次攻占维也纳的尝试。卡拉·穆斯塔发的大军以不可阻挡之势直逼皇城，利奥波德皇帝及其朝廷文武仓忙逃盾。土耳其人焚毁并占领了外城。在维也纳的末日来临时，由洛邻郡公爵和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扬率领的援军抵达。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战以土耳其的惨败而告结束。

维也纳的被围攻，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教训。利奥波德一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战。首先，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

四休战，并在教皇的支持下建立了神圣联盟（由反土耳其的哈布斯堡帝国、波兰和威尼斯组成，几年以后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也加入进来）。

战争一开始，首先是完全依靠同土耳其联盟的特克利政权被摧毁。这位在维也纳被围困时炙手可热的库鲁茨大公旋即成了土耳其人的阶下囚。瓦拉德的巴夏在喝完“黑汤”（土耳其咖啡）之后逮捕了在自己那里作客的特克利大公，他想以特克利作为同哈布斯堡王朝媾和的条件。特克利虽然很快获得了自由，但却永远丧失了大公职位。各等级，特别是各州的普通贵族背离了他，他的士兵也大多倒向了皇帝一边，因为他们希望这样至少可以使国家从土耳其手中解放出来。到 1685 年底，“残存的自由”退到了蒙卡奇城堡。在这四面受敌的堡垒里，兹里尼·伊洛娜面对德皇军队坚守了三年之久。

1686 年，布达城终于再次获得解放。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血战之后，9 月 2 日，布达的最后一个巴夏战死。在激战中毁成瓦砾的城堡也随之易手。虽然哈布斯堡王朝的战将们之间意见分歧很多，但对土作战还是节节获胜。1688 年，攻陷贝尔格莱德，并有直捣君士坦丁堡之势。此时，路易十四对哈布斯堡疆域扩展如此迅速深为不安，便在莱茵河发动了进攻。这样，希望之星又一次在特克利头上闪耀。他越过崎岖的南喀尔巴阡山，奇袭当地的哈布斯堡军队，因而当上了几个星期的埃尔代伊大公。

虽然形势发生变化，土耳其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在巴尔干稳住了自己的统治。但是，自苏里曼死后以来不断衰落的帝国若想再度获得匈牙利已是不可能了。1697 年，很有才干的绍沃亚伊·耶诺[1] 不顾维也纳军机会议的命令在曾塔[2] 以少量军队击溃了正在

① 即法裔奥军统帅萨瓦公爵弗朗索瓦·厄热纳。

② 今南斯拉夫的森塔。

122 渡蒂萨河的土军，从而使土耳其皇宫于 1699 年通过英国斡旋，签订了考罗曹① 和约，规定除泰迈什地区② 之外，土耳其放弃整个匈牙利。

拉科齐自由斗争的前因

随着土耳其的被驱逐，匈牙利便结束了一个半世纪的被占领状态。因此，匈牙利发展的最大障碍也就排除了。但是，为了赶走土耳其人一正如兹里尼所精辟地预言到的那样——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摆脱了土耳其的枷锁，但哈布斯堡的统治却更是无孔不入了。

各等级在收复布达的第二年就被迫做出了政治上的让步。在 1687 年国会上放弃了自由选举国王的权利，黄金诏书中(普通贵族对国王可行使)的对抗条款也告取消。这样，匈牙利便成了哈布斯堡代代相传的王国。当然，哈布斯堡统治力量的加强，是反土耳其所赢得的巨大胜利的必然结果。由于这场解放战争是维也纳皇宫发动和指挥的，因此这种结局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几十年内被用作战场的匈牙利，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备受摧残。约有六万到八万的皇家军队的士兵住在匈牙利的农奴家庭中，战马的草秣和贪婪的雇佣兵的粮食，即所谓“粮秣税”也必须由农奴承担。奥军官兵都把这个国家当作可以任意支配的战利品，从而极度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尤其是加拉伐将军在德布勒森所进行的掠夺和在埃派尔耶什所设立的血腥的军事法庭更使人不寒而栗。对匈牙利压榨的程度，有一位哈布斯堡军事法官的报告说：

① 今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东南的斯兰斯基·卡洛弗奇镇。

② 以今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为中心的一片地区。

"匈牙利人在德国军队的压迫之下已经被逼到了塔西佗①所描述的当年古日耳曼人的情况那样：'他们先是卖掉耕牛，然后卖掉土地，最后连妻子儿女也被迫卖掉当了奴隶，'以冀自己能够从德意志人的奴役下赎身。"

维也纳朝廷把土耳其当年占领的地方不是作为应归还匈牙利的领土，而是当作它新获得的战利品，把成州的土地随意分封给有功将领和提供雇佣军的人。匈牙利的贵族却只有在出示证书、交纳巨额"武器偿金"之后，才能从"战利品分配委员会"得到自己原来的地产。此外，朝廷还强迫进行传教活动。一时间，在这个国家里到处都是耶稣会教徒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教派。哈布斯堡派到匈牙利的第一批信仰天主教的德国移民就是为加强哈布斯堡的政权服务的。科隆尼奇②的所谓"关于匈牙利王国的设想"这一计划是："把这个王国逐渐德意志化，要在那些易于倾向革命和不安分守己的匈牙利人的血液中掺上温和的德意志血液，使他们热爱和永远效忠于万世永传的国王和主宰。"

拉科齐写道："维也纳认为手里有鞭子，就可以随意用它来抽打。"但是，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已在1697年于海基奥尔姚地区激起了一场起义。众所周知，这一带盛产葡萄酒，因此奥军极为关心。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奴和当年的边防战士在彼得——帕尔集市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占了帕塔克和托卡伊两座城堡。然后，起义者们号召"所有寻找祖国和自由的人们"都拿起武器。这次起义由于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失败了。此时，维也纳的政策仍无改变，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尖锐，逃亡的农民愈来愈多。因此，当1703年拉科齐·费伦茨二世(1676—1735)挺身而出时，就酿成了遍及全国的自由斗争。

123

① 古代罗马的历史学家。

② 利奥波德·科隆尼奇为奥地利国务大臣。1695年任埃斯泰尔戈姆红衣主教。

拉科齐自由斗争的开始

拉科齐在和逃亡农民的领袖埃赛·托马什联合之前曾经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这位具有反哈布斯堡传统的拉科齐、兹里尼和巴托里诸家族的后裔心中怀着对蒙卡奇堡的回忆①进入了耶稣会的学校。他是从他母亲兹里尼·伊洛娜身边被抓入这学校的。在这些修道院的学校里，哈布斯堡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僧侣，把她姐姐尤丽娅变成一个修女。后来，当他作为全国最大的领主回到祖国时，看上去象一个效忠国王的大贵族。他身穿德国衣裳，手挽德国妻子，不问政治。在1697年的海基奥尔姚起义期间，他没有响应农民的召唤，而是径直奔赴维也纳，以避嫌疑。但匈牙利当时的现实和他同贝尔切尼·米克洛什伯爵②的友谊，还是促使他走上了祖先的道路。起初，他效仿父亲③和外祖父④的榜样，采取秘密谋反的办法。他打算同路易十四取得联系，但因消息走漏，被关进维也纳新城的监狱。越狱后，他逃到了当时亲法国的波兰。这时他已下决心为自由斗争而献身。但是法国国王和波兰贵族不可能向他提供足以进行自由斗争的援助。这时，他的住在塔尔帕的农奴埃赛·托马什给他带来了农民已经为起义做好准备的信息。告诉他，只要有人亮出旗帜，发出号召，那些"没有首领的人群就会变为军队"。拉科齐从他派往匈牙利回来的使者那里也听到

124

① 拉科齐·费伦茨二世的母亲兹里尼·伊洛娜曾坚守蒙卡奇堡达三年之久。

② 1687年获伯爵称号，后任温格州州督，匈牙利北部地区军队长官。自由斗争失败后同拉科齐一道流亡国外。

③ 拉科齐·费伦茨一世。

④ 兹里尼·米克洛什。

了同样的报告，于是他接受了作农民军领袖的要求。1703 年 5 月，他从靠近边境线的布莱赞堡向起义农民送去了标有“上帝保佑我们为祖国和自由而战”字样的大旗，并号召“一切贵族和一切非贵族，一切真正的匈牙利人”拿起武器。

“我们号召真正热爱祖国、渴望着我们的国家保持昔日崇高自由的所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贵族和非贵族的匈牙利人，号召武装士兵和普通百姓，总之，一切真正的匈牙利人都发扬爱国精神。我们号召，那些已被上帝在心中点燃了爱国火焰的人们，为了祖国，为了自由，为了民族，拿起武器，反对那个肆意违背上帝和法律、不让庶民安居乐业、任意加重苛捐杂税、剥夺我们自由、践踏我们尊严、夺走我们盐和面包、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罪恶多端的帝国！”

开始，只有农民和与农民相差无几的“小贵族”站到拉科齐的旗帜下，由猪倌、牛倌、剃头匠、裁缝等充当军官。大贵族和贵族州则以敌视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行动。大地主、索特马尔州州督卡罗伊·山多尔在多尔哈曾击溃了贝莱格萨斯附近的农民起义队伍。但是，当 1703 年 6 月中旬，拉科齐越过喀尔巴阡山来到匈牙利国土时，在几个月内自由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起来了，农民军迅速扩大。拉科齐许诺：“谁拿起武器为把贫穷的匈牙利民族从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战斗，谁就可以免除一切徭役和赋税”。现在双重希望展现在匈牙利农奴面前：既可以从占领军的残酷压迫下获得自由，又可以摆脱地主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于是，他们“没有枪，就用刀剑、铁叉和镰刀① 武装起来。”起义军强渡蒂萨河，使德布勒森、卡罗② 和直至瓦拉德的整个蒂萨河以东地区都在拉科齐控制之下。

---

① 长柄大镰刀。

② 在诺格拉德州。

这些“赤脚汉”迅速取得的成功也把各州的一些普通贵族，甚至一部分大贵族吸引到起义军阵营里来了。卡罗伊·山多尔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多尔哈的胜利，朝廷根本未予置理，这使他大为恼火。此外，他的领地是库鲁茨士兵首先占领的地方，看来也是一个原因。)但教会的头目顽固对立，除了艾格尔主教外，其他所有主教始终坚持与自由斗争为敌。

1703 年底和 1704 年初，从各方面看，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西班牙的王位之战(1701—1714)完全把哈布斯堡拖住了。哈布斯堡同法国路易十四为争夺西班牙王位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斗争。(当时的西班牙除今天西班牙本土以外，还包括意大利和美洲殖民地。)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年里，法军获胜重大。1703 年 12 月由贝尔切尼率领的二万五千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起义者攻打到瓦格河和摩拉维亚河岸的时候，维也纳政权的崩溃似乎是指日可待了。1704 年初，除几个比较强大的城堡之外，整个国家已经控制在库鲁茨军队手中，而法国军队则在多瑙河的巴伐利亚—奥地利地区挺进。

125

库鲁茨政权及其军队

1704 年夏季，速战速决的希望落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巴伐利亚的霍希太德附近又成功地打击了法国人，获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西方战场一下子转移到了莱茵河边，这就出现了长期而艰苦斗争的局面。

在塞切尼① 召开的国会(1705年)的任务是建立自由斗争的国

① 在今匈诺格拉德州。

家。各起义等级照波兰的做法，成立了等级联盟。参加联盟的匈牙利各等级推选拉科齐为全匈牙利总大公。(在前一年他已被埃尔代伊议会选为埃尔代伊大公)。设立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参议院为决策机构，还设立了解决当时极端困难的经济任务的经济委员会，同时商讨决定了与哈布斯堡王朝讲和的条件，要求王朝加强等级议会的权力，恢复自由选举国王，恢复保证贵族有同国王对抗的权利①，还要求王朝的盟国——英国和荷兰予以保证。在此基础上，拉科齐要求哈布斯堡王朝确认其对埃尔代伊的统治权。这样，拉科齐回到了博赤卡伊政治上的基本设想上来，认为建立独立自主的埃尔代伊大公国是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专制统治的最可靠的保证。

这一计划能否实现，主要决定于军队。库鲁茨军是典型的农民起义军，它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前身，而是产生于人民的激愤和实现自己的愿望，以疾风暴雨式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支队伍。拉科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基斯·奥尔贝尔特在1703年4月同埃赛·托马什一道发难时，只有七十个人，5月就有七百个人，6月到了七千人，12月就形成了一支为数七万名士兵的部队。"而当时封建主义的匈牙利只有不发达的手工业，无法以足够的武器和装备来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样就造成了大部分是装备简单的非正规的所谓"野战"队伍的情况。队伍的人数起伏也很大，在自由斗争发展到高峰时期，人数超过十万（通常是七万左右)。处在低潮时，则降到三万人。当年兹里尼梦寐以求的民族军队尽管组成了，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没有一个与兹里尼相比拟的将领。民间出身的首领，很快就被贵族军官所代替，高级将领更是骄横无能。从小贵族行列中提升为将军的只有瞎了一只眼睛的

126

① 参见第(290)页。

"瞎子"布简(布简·亚诺什)一人而已。上升为准将的仅有的两个平民是塔尔帕的农奴埃赛·托马什和赛拜什的平民采尔代尔·奥尔班。

库鲁茨军尽管还有这些主要由封建主义社会条件所造成的不足之处，但还是取得了大量光辉的胜利。他们尤以出奇不意的突袭和小股攻击见长。(1704年春季,在靠近摩拉维亚边境的索莫兰城堡，在起义农民的协助之下，活捉了皇室军队的将军里钱。有一次还戏弄了正在维也纳狩猎的皇帝，并从对方的大后方捉到了敌军总司令。)可是，在战场上，由于缺乏良好的装备、必要的纪律和现代化军事知识，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自由斗争的高潮和失败

1705年登基的约瑟夫一世(1705—1711)试图通过谈判来扑灭自由斗争。在纳吉桑博特①的谈判中哈布斯堡虽然作了大量许诺，但却反对外国(英国和荷兰)来保证和平的实现，并拒绝允许埃尔代伊以任何形式独立。维也纳朝廷企图利用被它监禁的拉科齐夫人、黑森女公爵莎罗塔·奥玛利亚来迫使拉科齐做出原则性让步。但是拉科齐大公却坚决拒绝了对方的要挟，并给他的妻子写道:"我的态度是，我必须履行职责，尊守誓言，把公众的事业放在我个人的一切之前。"

谈判未能成功,战火重起。哈布斯堡王朝投入了更大的力量。可是库鲁茨还是占据优势。他们攻占了埃斯泰尔戈姆，收复了埃尔代伊的疆土。"瞎子"布简面对三个将军率领的敌军守住了蒂萨

① 今斯洛伐克的特尔纳伐。

河以东地区，埃赛·托马什也保住了卡绍（可惜这是他最后的一大军事业绩了）。但另一方面，拉布丁将军率领的皇家军队从埃尔代伊出发，先是围攻卡绍，继而开往布达，在匈牙利境内往来征战，如入无人之境。显然这是库鲁茨的正规军力量不足所致。

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困难的条件下所召开的1707年欧诺德国会决定迈出激进的一步：宣布剥夺哈布斯堡家族的匈牙利王位。当时代表们对维也纳极端仇恨，以至于把主张和维也纳妥协的特伦钦州的代表们处死，并随着贝尔奇尼同声高呼："杂毛马是狗的主人，约瑟夫皇帝不是我们的国王！" 127

获得独立的匈牙利的领导者此时正在寻找可以结盟的国家。当时，争夺西班牙王位和反对瑞典霸权的北欧战争实际上已经使每一个国家都处在战争状态。在自由斗争一开始路易十四就给了拉科齐大量经济援助（后来减少了），并派来了若干高级军官。但是出于各种原则上和实践上的考虑，这位"太阳王"始终不愿同拉科齐公开结盟，瑞典人也拒绝同匈牙利结盟，而彼得大帝却建议匈牙利同俄罗斯国建立联盟，并于1707年在华沙签订了盟约。然而，在对外政策上，从各方面衡量，匈牙利的局势并不太妙。彼得大帝先是被瑞典人，后是被土耳其人牵制住了。法国人则几乎不在作战。这样，哈布斯堡就有可能向匈牙利投入更大兵力。

库鲁茨国家的内部困难也越来越多。拉科齐说："贵族日甚一日地重又加强了对农奴的权力，造成他们对作战失去兴趣，因为他们并无所获。"失望的农奴愈来愈以冷漠的态度观望着自由斗争的局势。他们说，"假如我们将来还是当奴隶，那我们现在打仗干什么呢？"虽然1708年底在沙罗什帕塔克召开的国会许诺那些将自由斗争进行到底的农民将来可以得到哈伊杜骑兵所享有的自由权，现在也无济于事了。在战争开始时，固然最终目标各有不同，但共同的反哈布斯堡的信念却暂时把贵族和农奴带到了一个阵营

里。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几年之内就把这个联盟破坏了。长期的战争也使这个国家的经济耗竭殆尽。拉科齐时代所发行的铜币也遭到灾难性的贬值。商人只接受“白钱”(银币)，而库鲁茨战士们衣袋里却只有铜币。

自然，这也会使战场上发生不利的转折。1708年，装备最好的、准备向西里西亚大举进攻的库鲁茨却在特伦钦附近不幸遭到了致命的失败。自此，贵族阶层里愈来愈多的人叛变投敌。此

128

时，要求同哈布斯堡媾和的呼声越发高涨。教皇对拉科齐的追随者所发出的诅咒，以及效忠维也纳的大地主和贵族们软硬兼施的手段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托尔瑙州的克莱什德、巴洛戈·阿达姆的库鲁茨虽然又一次打了胜仗，但在重要的罗姆哈尼战斗中却又告败北。埃尔谢克乌伊瓦尔① 失守后，勒切② 也告陷落。于是，自由斗争退回到了最早发动起义的地方。库鲁茨军队兵员锐减。这时，一场使数十万人丧命的鼠疫更加加重了这个国家的困境。

此时，拉科齐并未绝望，他寄希望于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他首先把贝尔奇尼派往华沙，然后于1711年初他本人也前往华沙。国内的领导权落到了卡罗伊·山多尔手中。此人取得拉科齐同意后，开始同洛邦茨③ 的主帅帕尔菲·亚诺什伯爵谈判。这原本是拉科齐的缓兵之计，但卡罗伊却和对方签署了索特马尔和约(1711年)。在索特马尔和约里，约瑟夫皇帝(无任何保证地)口头答应维护匈牙利等级制宪法和宗教自由权。于是，残存的库鲁茨军的大部分士兵在马伊泰尼平原④ 放下了武器。

---

①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扎姆基。

②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莱沃恰。

③ 即奥地利军队。

④ 在今罗马尼亚境内的莫弗蒂努尔。

这些原来的库鲁茨士兵，或者回家，或者再次逃亡。索特马尔和约保障贵族的生命和财产。据此，拉科齐本人也可以收回他的近二百万霍尔特的领地，而他没有接受恩赐，他说："我永远不能只看到我的家族的利益，因为我投入斗争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我的祖国获得自由。"他信守誓言，宁愿流亡。

索特马尔和约也使匈牙利的文化发展受到挫折。在自由斗争的年代中，即使在战争处于困难的条件下，文化还是繁荣的，科学事业也很兴旺。帕塔克、纳吉埃涅德① 和埃拜尔耶什等城市的当年享有盛名的学院又得以开放，印刷出版了兹里尼写的《土耳其的鸦片》和后来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帕帕伊·帕里兹编著的《拉丁——匈牙利文词典》。拉科齐还出版了第一份匈牙利报纸《匈牙利信使报》(拉丁文)，向国外报道。拉科齐的宫廷里有著名肖像画家马纽基·阿达姆。

自由斗争时期文化生活上最丰富的遗产是库鲁茨诗歌。这些诗歌始终与伟大的斗争息息相关。其中有一首反映拉科齐来到时呼吁人们参加斗争的诗这样写道：

匈牙利呀，埃尔代伊，
你听着，这好消息！
过去你委靡不振，
现在是你觉醒的好时机。
你把带锈的枪、剑擦亮磨利，
迎着鼓声，跨上战骑！

战场上的胜败所引起的喜怒哀乐都反映到了当时的诗歌里。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阿尤德。

《整洁的帕尔克》就是一首风趣的讽刺诗。《穷小伙子之歌》则抒发了1706年前后“库鲁茨士兵不受尊重的”怨气。马伊泰尼之后，以拉科齐悲诗和拉科齐之歌为代表的所谓库鲁茨后期诗歌抒发了无限悲愤之情。

五、从索特马尔和约至约瑟夫二世的去世

130

（匈牙利后期封建社会的结束）

在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

从1711年至1790年之间的八十年，与莫哈赤之战以后的两个世纪的历史阶段不同，因为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随着布达的收复和土耳其的被驱逐，扫除了匈牙利发展上的最大障碍。在1716—1718年对土耳其的作战中泰迈什督军区① 也获得解放。丧失了权势的奥斯曼帝国重又退回到巴尔干半岛。从此，它在匈牙利的历史上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了。

马伊泰尼之降结束了持续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库鲁茨—洛邦茨之战。匈牙利各等级为求得独立而进行的反哈布斯堡的一系列斗争也就此结束（直至1848年）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还出现过个别的斗争，但当1735年流亡的拉科齐在马尔马拉② 海边的小地方罗多斯托去世后，库鲁茨起义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此后，在匈牙利的土地上虽然不再飘扬土耳其的马尾旗，但贝特

① 今匈牙利奥尔弗德大平原南部蒂萨河以东、毛罗什河和多瑙河之间的一片地区，最大城市为蒂米什瓦拉。

② 在土耳其。

伦和拉科齐的战旗也就此消失了。

在等级制宪法和独立问题上，索特马尔和约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贵族阶层妥协的产物。哈布斯堡放弃了公开而野蛮的暴政，匈牙利贵族阶层则也放弃了求得真正独立的最重要的保障——独立的埃尔代伊和自由选举国王。贵族阶层满足于能够选举宰相，能够进入国会。由于他们还感觉到维也纳王朝在维护他们的特权，在保证他们的领主权力，因此他们转而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者。

王室和各等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在击败土耳其之后，它在欧洲中部、东部扩大了疆土，加强了影响。西班牙王位之战在意大利和西欧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果。虽然最后它放弃了西班牙王位，但却从西班牙取得了尼德兰[①]作为已经绝嗣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遗产。同时，它还得到了富庶的米兰公爵的封地和托斯卡纳的亲王的封地（且不说那些短时间内占有的和某些面积较小的封地了）。

哈布斯堡诸国——在外交上以后通称为奥地利——分布在欧131洲各个部位，而且彼此相隔很远，往往在中间还横亘若干敌国。因此，哈布斯堡这个大国从开始就易受攻击。维也纳同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利害关系，所以在十八世纪里，哪一次政治危机、哪一次较大的欧洲战争都少不了奥地利。

哈布斯堡帝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匈牙利的命运和发展道路。拉科齐领导的自由斗争虽然使维也纳认识到利奥波德式的粗暴专制统治对哈布斯堡王朝本身也无好处，因为那样会削弱帝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活动能力。然而，从全

---

① 今荷兰、比利时一带。

局看，他们认为可采用不那么暴烈的手段将匈牙利更好地纳入帝国利益的轨道。历史条件也有利于哈布斯堡王朝这样做，因为当时全欧普遍出现了专制政权体制，迫使匈牙利各等级长期处于守势。此外，土耳其统治结束后所进行的大规模改组、整顿，也为王朝统治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移民情况和各民族间的关系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土耳其占领之后，有半个匈牙利变成了荒地和沼泽地。人口数字在经过十六世纪的灾难性下降后，直到1720年前后，才勉强达到马加什时期的四百万。这其中虽与生产水平低有关，即使在未被土耳其占领的地区里人口也未能迅速增加。因此，土耳其的入侵使人口发展受到挫折，毫无疑问，这是第一位的因素。持续两个世纪的战争使人口的分布严重不均。在占全国一大半的敌占区里居住着几乎不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而且生活条件极端恶劣。除农业城镇的若干生活较好的市民以外，往往在成州面积的土地上只见到梳着辫子的半游牧牧人和靠“草地”为生、从事渔猎度日的人。耕地稀少，在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一切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 132

自然，要重新把这块荒芜的土地经营起来，需要百万计的人手。十八世纪所发生的最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之一就是当年在土耳其占领区迅速进行了移民。在这些地区定居的人口来源有国内移民、国外大批入迁和其他零散流入。

相对来说，人口偏多的北部和西部地区逃出来的农奴以早年的民族大迁移之势涌入这些地区。有的州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口外流，因为那里的新地主欢迎劳动力，分给农奴大块土地耕种，还

免交地租若干年，免租期满后另订优待契约。

欧洲通常采用的移民方法是将外国人有组织地大批入迁。早在查理三世（1711—1740）时就向德国各阶层（首先是向士瓦本族人——匈牙利人对在匈牙利的德国人的通称）发出号召，将他们多余的农奴移居到匈牙利。招募人走遍德国南部，把应征者用轮船先运到波若尼或佩斯，然后用大车送往指定的乡村或城市。到了新地方以后，一开始由当地的地主提供必要的资助，如耕畜和种子、食物等。这种迁移在1720年前后就已开始了，一直到这个世纪末。倡议这样做的最早是大地主，后来是王宝财库。朝廷只让德意志人——而且尽量让天主教徒——迁移。当时以巨大的经费为这些移居者建起了村庄。村庄都是按规范建筑，设备完善。特别是在泰迈什督军区的国家领地中更是如此。由国家和地主在几十年中移入匈牙利的人口大约为四十万。这时已经出现了巴科尼、维尔泰什和布达山区的德意志人的村镇，以及托尔瑙和巴兰尼亚互相联系的德意志人聚居区。

除这种有组织的集体移民以外，人口的零散流入也始终没有间断过。十七世纪末已有总计四万个塞尔维亚家庭从土耳其人那里逃到这里定居。这批塞尔维亚人是由他们（东正教）的神甫率领下来到匈牙利的。当时朝廷给予他们不少优待，把他们安居在南方作边防卫士。除了这样的集体迁入以外，还经常有大群的罗马尼亚牧民和农民从土耳其当局控制下的两个罗马尼亚大公国流落到这里定居。此外，还在佩斯州和贝凯什出现了斯洛伐克族聚居区。

这样，匈牙利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尽管多次鼠疫流行（仅在1738—1741年之间，就有三十万人死于瘟疫），但到该世纪末也还是超过了八百万。匈牙利族人由于只靠自然增长率繁殖，便不可避免地要居于少数。当然，在莫哈赤之战以前，匈牙利就是

133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自卡尔曼国王以来就归属匈牙利并享有一定自治权的霍尔瓦特和斯洛沃尼亚以外，在匈牙利已居住着许多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鲁廷① 人和罗马尼亚人等少数民族人。但在十五世纪，匈牙利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而在土耳其占领之后，匈牙利族人所占的比例数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我们可以说，在十八世纪，从地区和人口比例的角度看，已经形成了此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匈牙利历史发展的局面。

新贵族的产生和匈牙利政权的改组

从重要性和后果来看，不亚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则是匈牙利统治阶级在构成上的变化。大地主固然保持着领导地位，但他们的阶级构成和政治作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七世纪出现了高举独立旗帜的兹里尼家族和拉科齐家族，而到十八世纪，大地主贵族则毫无例外地都成了朝廷的支柱。各起义的家族作为贵族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封地被没收后转封他人。例如，拉科齐的封地被分封给了好儿个洛邦茨将领和一些奥地利贵族。

在分封原（土耳其）占领区的基础上，迅速形成了无条件地效忠朝廷的上层贵族阶层。皇家军队的将军和王室大臣只交少量钱财即可获得大量封地。例如，哈鲁茨凯伦家族就获得了整个贝凯什州。在镇压库鲁茨起义中以烧杀著称的军事将领海斯特尔·西格贝特等此时也都成了“匈牙利的”上层贵族。许多人通过交换、收买、婚姻关系、纳捐，甚至通过诉讼和暴力获得了惊人的

① 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人。

财产。（比如卡罗伊家族所获得的地产比其原有的翻了几番，格拉绍尔科维奇家族居然从普通小职员最后僭身于伯爵乃至公爵之列。）

在大地主当中，教会地主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主教、大主教以及教堂和修道院的长老们等因其当年对哈布斯堡的忠诚，如今一本万利，一跃成了全国最富有、最有影响的阶层。

这些在语言上和生活习惯上都已经外国化、在政治上忠于维也纳的新兴贵族的形成，使得查理三世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王权驾驭这个国家，着手改革军事和政法了。

虽然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随着土耳其的被驱逐而结束了，但匈牙利领土的统一并未恢复。埃尔代伊在某些方面仍作为大公国 134 单独存在。（但沦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埃尔代伊的法律地位是利奥波德皇帝 1691 年发布的所谓《利奥波德文告》所决定的，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 1848 年。）

在靠土耳其的边境上，设立了一条宽敞的边防地带。这里（主要是塞尔维亚族）的农民不是向地主交租，而是为军队服务。这些边防地带直接受维也纳军机会议领导。泰迈什地区也在很长时间内受军机会议管辖，后划归枢密院。直到世纪末才与当年日格蒙德国王抵押给波兰人的塞派什地区的十三个城镇一道交还匈牙利。

哈布斯堡王朝还设立了几个高级行政机构来专管匈牙利事物。其中，在维也纳的“匈牙利政务署”设在波若尼的枢密院已有多年历史。但最重要的还应属 1723 年成立的以首相或总督为首的“总督公署”（后由约瑟夫二世迁往布达）。总督公署除财政、司法以外，其职权范围涉及国内的一切部门（宗教、教育、工业、交通、农业等）。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管理匈牙利的高级行政机构的独立性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有关匈牙利的重大事情都

是由维也纳的秘密会议或国务会议决定、交予匈牙利机构执行罢了。至于军事和外交，匈牙利行政机构则更是无发言权。

司法事物上的变动之一是建立了经常性的法院（以前只有短期的开庭审案期）。同时，把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区别了开来，至少在最高一级里是如此。最高司法机关，即所谓"七人法庭"，下设"王家法院"，再下面设有四个地方法院（即设在克塞格、纳吉桑博特、埃拜尔耶什和德布勒森的四个地方法院）。此外，各州也继续保持司法职能，关于农奴的案件仍归地主法庭审理。

匈牙利原来的那个"贵族勤王制"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也建立了常备军（参加人数，匈牙利人和外国人各半）。维持这支军队需要巨额款项。王朝试图把军事改革和停止贵族的免税特权同时付诸实现，但遭到匈牙利国会（1712—1715）的坚决拒绝。结果，贵族把军事负担完全推给了非贵族阶层。

皇位继承法。玛利亚·特利莎和匈牙利各等级

卡罗伊三世无子继位。而且，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面临瓦解的危险局面。因此，查理修改了世袭制度，以便能够让其女儿玛利亚·特利莎继承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各国的王位。在匈牙利，特别是普通贵族曾一度对王朝修改家族继承法坚决反对，想在查理死后好在匈牙利自行选举国王，但在匈牙利各主教（尤其是其中的埃什泰尔哈齐）和几个世俗大贵族（其中卡罗伊·山多尔最为积极）的迫使下，最后在1722—1723年于波若尼召开的国会通过了皇位继承法。对此，朝廷作为报酬给匈牙利统治阶级以大量封 135

号、爵位和勋章，使得匈牙利的整个统治阶级进一步加强了国内的地位和对农奴的统治。

根据皇位继承法，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后嗣也有权继承各国王位（依次为查理后嗣、约瑟夫后嗣和利奥波德后嗣)。此外，匈牙利各等级始终惧于土耳其的进攻，并感到单独一个匈牙利无力对抗，于是在法律上确定同哈布斯堡王朝各国建立联盟。此后，等级权力和国家的自由有所加强。同时还强调，匈牙利国和哈布斯堡的其他各国或省份都将是王朝“不可分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只承认哈布斯堡为自己的统治者。

皇位继承法还规定遭受外来进攻时，哈布斯堡各国应互相支援。匈牙利统治阶级还在查理三世在世时就已经为欧洲各国承认皇位继承法作出过牺牲。但真正的考验却是在查理三世去世后出现的。玛利亚·特利莎所继承的除了一纸皇位继承法的空文以外，只有空空如也的国库和虚弱无力的军队了。这位年轻的女皇很快就陷入了保卫自己皇位的长期战争（1740—1748）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占领了哈布斯堡王朝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捷克所属的、手工业最发达的西里西亚。同时，法国、巴伐利亚和西班牙都要求对帝国进行公开的瓜分。

当王朝处于最紧急关头的时候，玛利亚·特利莎向波若尼国会的各等级代表发出呼吁。当时这些人按照传统抽出佩剑，情绪激昂地宣誓：“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神圣的女皇，保卫我们的王冠和祖国！”于是，国会通过了拨款，提供军队，全国动员，支持女皇。（当然，他们慷慨大方所通过的措施而带来的新负担大部分落到了农奴头上。）匈牙利贵族的立场起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并不在于所提供了多大的援助，而是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没有起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

136

奥地利争夺王位的战争最后还是巩固了玛利亚·特利莎的皇

位。但是，西里西亚地区却依然为对方所控制。女皇不甘心失去这个最有价值的省份，便转而同世仇法国结成了联盟，还拉拢俄罗斯向普鲁士宣战（1756—1763）。这次持续了七年的战争又造成了新的牺牲，最后也还是没有如愿以偿。（在战争中，匈牙利的骑兵在纳道什迪·费伦茨和哈迪克·安德拉什率领下屡建奇功。有一次还攻占了柏林，并勒索了赔款）。

女皇与匈牙利各等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是相当亲密的。玛利亚·特利莎慷慨地为他们加封了许多官衔（从他们中任命了不少宫廷顾问和将军，当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她还设立了圣·伊斯特万——玛利亚·特利莎勋章。在布达，她修筑了王宫（事实上，她根本没在里边居住过）。她时常出入匈牙利大贵族和主教们举办的奢侈的晚会，并热忠于在匈牙利和德意志上层贵族的家族之间撮合婚事。她把一些大地主册封为宫廷新贵。还通过建立宫廷卫队竭力把普通贵族也吸引到自己身边。

可是，就在这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里，朝廷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冷下来了。其原因是玛利亚·特利莎的统治中专制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中央执政机构不断地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每一个领域，而且等级议会召开得也愈来愈少。在中央政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各等级的力量在下降。但比政治上失势更使匈牙利贵族感到切肤之痛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也打算废除贵族免税制。（当时在奥地利各省，贵族都交纳一般所得税。）在1764—1765年召开的国会上，朝廷试图对落后的"贵族勤王"兵役制度进行改革，并试图通过与此相关的贵族纳税法引起了匈牙利贵族的强烈反对，以致连在维也纳授意下编写的鼓吹贵族纳税法的一本书也遭禁读。在毫无结果的国会之后，关系更为紧张了。（在1765年至 1790 年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内，等级国会没有再召开过。玛

利亚·特利莎和后来的约瑟夫二世只通过发布命令进行统治。）

顽固坚持自己特权的贵族阶层已越发变成了阻挡社会前进的势力。朝廷的主要政治家们深知不进行改革，便无法挽救封建制度。在玛利亚·特利莎的朝廷里，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启蒙思想①日益抬头。有着严格宗教信仰的女皇本人虽然从来也没有成为启蒙运动的信徒，但是改革的必要性她还是看到了，而贵族阶层的大部人却对改革很反感。对兴办公共卫生事业（如开办"行会理发店"、让正式医生取代江湖庸医）、扶持兴办孤儿院和救济贫民的慈善事业，贵族们没有反对。他们也接受对教育事业的改革。（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试行了国家对学校的监督，实行统一的学校制度和教学管理。此前，国家对教会一手把持的学校从形式到内容等从不过问。进行教育改革也有许多阻力，如新教学校就进行了抵制。）但是，当朝廷着手解决农奴问题时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抗。

十八世纪的地主和农奴

在十八世纪，基本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依然是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问题。至少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人直接或间接地作为农奴耕种着土地，而土地所有权却毫无变化地只属于地主。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现象。十八世纪出现的地主——农奴关系的紧张化当时也并不是这种矛盾引起的，而是所谓的地主自营地的经营

① 启蒙运动发生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期间。宣扬生产资料私有制，批判等级特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及"主权在民"思想，主张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要求变革。是法国资产阶级以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方式占了优势的缘故。

关于地主的土地，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就是，一部分土地划为小块交给农奴耕作，另一部分则由地主自己经营，这就是所谓的"地主自营地"。在十六到十七世纪，开始形成面积较大 138 的——约有几百霍尔特——这类地主自营地，主要分布在多瑙河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大地主庄园中，真正的发展却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前后。由于战争频繁(奥国王位战、七年战争等)，对粮食、葡萄酒、肉牛和羊毛的需求量剧增。为了更好地经营自营地，地主在很多地方把土地重作调整，把土质差、离家远的土地交给农奴耕种。已转为经营畜牧业的地主也往往把自己庄园里的畜群赶到全村公有的草地上放牧，挤走农奴的牛羊。总之，地主尽一切可能扩大自营地，以增加经营收入。

拥有大片地产的贵族将大量钱财用于豪华的生活，并大兴土木。匈牙利迄今到处可见的巴洛克式建筑物① 大多是这个时期建造的。大地主庄园这时已不再用于防御，而是供享受和炫耀奢华排场服务的了。(此时的庄园一般模仿格德勒②的格拉萨科维奇③庄园营造。)最大的庄园里还建有剧场和音乐厅，供主人及其宾客 139 消遣、娱乐之用。埃什泰尔哈齐·米克洛什在费尔特沙土地上建造的庄园豪华阔绰、闻名全欧，时人认为堪与法国的凡尔赛宫媲美。在这座建筑的厅室和房间里陈列着价值连城的雕塑和绘画，装饰着精巧的壁毯和吊灯，奇工异巧的家具不计其数。花园里有修成几何图形的林荫道，有喷水池，还有源于神话的雕像。举世闻名的音乐家海顿就曾在这里担任过乐队指挥。当时，一次大型

① 亦即所谓"洛可可式"，是十七、八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追求华丽、纤巧装饰的建筑流派。

② 在布达佩斯附近。

③ 伯爵，玛利亚·特利莎女皇的宠臣。

宴会的花费能够买一所小庄园。

农奴的负担和徭役

在经历了土耳其和鞑靼人的摧残、接连不断的多次自由斗争的不安宁的两个世纪之后，十八世纪初所出现的安定和平为农民提供了较好的劳动环境。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有许多农奴迁移或逃到了原来土耳其的各占领区。新的地主一开始对迁来的农民还比较看重，但到了世纪中期，国内形势日见稳定，活动的余地逐渐减少，农民负担也随之重新增加起来。这负担不仅来自国家和地主，教会和贵族州加于农民的也比过去增加了。

十八世纪，为国家供职的人员增加了，因为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不断扩大自己的管理范围。这时最大的开支是建立常备军队。原来只是为了应付具体的战役才招募雇佣军，而现在则要建立常备师团。这本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农民所承受的来自国家的负担却因此大大增加了。无怪当时人们把国家的直接税叫做“军事税”了。军队在其他方面也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于部队缺乏兵营，于是让士兵们住在农奴家中，住进去的士兵连马一道都要农奴家庭负责供养(这就是所谓的“粮秣金”)。虽然粮秣金也算到军事税款中，但农民供给士兵和战马的粮秣是按事先规定并比市场低得多的价格折算，因此农民的损失很大。当部队向别处调动时，也要用农奴家的马匹运送他们的行囊物件(即所谓“脚力”)，往往使农民损失不少耕畜。当时常备军的军官由贵族充任，士兵都是农奴。士兵或战死，或因残废方可退役。当时不是征兵，而是募兵制。前来募兵的人以耀眼的军服、酒肉和优厚的待遇等花言巧语哄骗人们去当兵，但当数量招不满时则“用绳子招兵”了。

州里的官员和村长往往串通一气，把那些流浪汉和不安分守己、不满现状的穷苦青年人抓走，强行把他们送往遥远的外国去当兵。

“粮秣金”、“脚力”和国家的赋税使人们怀念当年的库鲁茨起义。1735年，在克勒什河和毛罗什河流域的莫代纳公爵与哈尔鲁茨凯伦男爵的土地上爆发了武装起义。这就是毛罗什边防卫队的司令官塞盖迪纳茨·佩罗，迈佐图尔村的农民帕斯托尔·安德拉什和森安德拉什村村长维尔泰希·米哈伊等三人招集了大约一千名贝凯什州的农民举行的武装暴动。据起义失败后起义者的供词说他们“盼望”逃亡在外的(拉科齐)大公当听到这起义的消息后就会重新返回祖国。可是实际上那时拉科齐已经去世了。孤立无援的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起义领导人或被处死或判长期苦役。 140

到十八世纪的后半期，随着地主自营地制度的日益普遍，农奴的徭役负担也大大加重了。地主们甚至对和农民签订的书面契约及规定农奴负担的章程也“重新考虑”，不加信守。他们既想加强经营自营地，又不愿另雇“要钱的工人”，因此无限度地加重了农奴的负担。绝大部分地方的地主认为农奴每星期出三次徭役太少，到后来索性采用了“不定数量”的、按地主“随意分派”的劳役办法。自营地上出产的农产品的“长途运输”任务也往往有农奴承担(如把酒、粮食等从佐洛州运到维也纳或佩斯)。

加在农奴头上的沉重负担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加剧了农奴财富上的差别(即所谓“分化”)。那些有足够土地和畜力，并能充分利用有利的销售条件的农民，就能成为富裕的庄稼户。他们常常能够租入大块土地进行经营（特别是在奥尔弗尔德平原地区）。与此同时，少地或无地，甚至连房屋都没有的雇农则迅速增多，他们大多被迫在地主或富裕农民的土地上从事着勉强维生的劳动。

加重农民的负担总会激起农民的不满。在十八世纪里，没有

哪十年是未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暴动的。1735 年和 1753 年，141 在后来称为“风暴之角”[①] 的地区，1755 年在霍尔瓦特地区[②]，1764年在塞凯伊弗尔德[③]，1765 年在多瑙河西部地区，都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农民不满的原因是地主愈来愈加重的剥削，因此农奴问题就愈发成了朝廷注意的中心。哈布斯堡王朝不仅要保护封建制度，而且——因为农民是纳税者——还必须考虑国家的财政平衡问题。在玛利亚·特利莎的朝廷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剪羊毛，就得喂羊。”因此，女皇设法限制地主过分的贪婪，甚至有时还接见前去陈述疾苦的农民代表。

地主不承认国家在农奴——地主关系上的发言权。正因如此，朝廷打算通过国会来解决地租问题上的设想才遭到了各等级的抵制。于是，玛利亚·特利莎于 1767 年采取发布法令的办法，以解决这个从国家角度来看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法令规定了各地农奴租地的数量和农奴为所租种的田亩应承受的负担。农奴所种的田亩数按各州的情况和土地质量有所不同。每霍尔特农奴居住地（包括住房和经营用建筑物）可拥有十六——四十霍尔特耕地，四——十五霍尔特的草地用作牧场，可从树林里砍伐必需的树木用于建房或作燃料。在此情况下，农奴的负担是：地租每年 1 福林；什一税（即交纳作物收获量的九分之一）；贡礼（2 只阉公鸡、2 只童子鸡、12个鸡蛋、半伊采[④]奶油，每三十霍尔特居住地交纳 1 头小牛）；劳役（每年 52 个带畜力劳动日或 104 个人工）。

法令按整个地块为单位规定农民的收益和负担。那些后来大量出现的拥有小块地（只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霍尔特居住地）

① 在蒂萨河东部，包括贝凯什州和琼拉德州一带，历史上多发生农民运动，故得名。

② 即今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

③ 塞凯伊人聚居的地方，在今罗马尼亚的马罗什一带。

④ 每伊采约为 0.8484 公升。

的农户则按比例交纳地租和完成劳役。

这道农奴地租和劳役的法令颁布后，全国贵族群情哗然。但 142 女皇通过她派来的官员，进行了十年的工作，还是把这道法令贯彻下去了。这样，在匈牙利统一了农奴负担，一直执行到1848年(此法令在埃尔代伊未能执行)。

哈布斯堡王朝的经济政策

在十八世纪，除了社会问题以外，经济政策上的问题也日益占据了重要地位。哈布斯堡帝国在经济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迅速发展的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荷兰和法国。由于经济上的落后，有可能使维也纳朝廷在政治上也沦为第二流的国家。因此，从十七世纪末，它就制定了一些有力的经济政策。查理三世[①]时代，哈布斯堡就曾进行过打入世界贸易市场的尝试。当时，在国家大力援助之下，建立了若干贸易机构，但无论在大西洋地区，还是在地中海地区，都竞争不过英国和法国。后来，在争夺奥国王位的战争中失去了工业最发达的省份西里西亚，此后，工业化，尤其是加速实现工业化便成了帝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玛利亚·特利莎与约瑟夫二世，在经济政策上试图采用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法国就已成功地实行过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它的实质是，在国家支持下（优惠税收、提供贷款等）建立工业企业，并为了扶植这些企业，用相当高的关税来保护其与外商竞争。玛利亚·特利莎的一项法令说："我们没有其他动机，只是想把钱留在国内。"

---

① 玛利亚·特利莎之父，在匈牙利国王的序列中为查理三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序列中为查理四世。

这种经济政策是同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经济分工同时进行的。维也纳朝廷想让匈牙利充当正在发展中的奥——捷工业的原料供应者和市场提供者。

在实行这种政策时，不是把整个帝国看成一个统一的关税区，而是把匈牙利和帝国内部世袭省份① 用内部海关线另行划开。通过这条内部海关线进入匈牙利的奥地利工业品几乎无需交纳关税，从匈牙利进入奥地利的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也几乎不上税。但从帝国境外进口的工业品则要交纳很高的海关税，而且从匈牙利进入奥地利的工业品也与其他国家的商品一样需要交纳高额关税。有一段时间，维也纳还下令禁止自己世袭省份也能生产的工业品入境，还制订了有关出口的禁令，以补充“不需要商品”的进口规定。维也纳曾多次禁止匈牙利把肉牛、粮食和金属、羊毛、钾碱、栎五倍子等工业原料运出奥地利边境。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尔泽维齐·盖尔盖伊对当时的局势这样写道：“奥地利世袭各省内的工厂所需要的某些工业原料几乎全部是从匈牙利运去的，而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又送到匈牙利。这样，匈牙利人买了自己的、却又是经过加工了的产品。原来卖出时吃亏，现在买进时也吃亏。匈牙利把皮革和毛皮、栎五倍子和一些丝绸运到奥地利；又从奥地利输入帽子、皮货、皮毛制品、丝绸制品和衣料。从匈牙利输出匈牙利羊毛和钾碱，又从奥地利进口大量呢子和毛料。此外，装饰品和纽伦堡工艺品（扣子、皮带等），以及珠宝、金银饰物，匈牙利莫不是从维也纳进口的。”

143

在这种情况下，哈布斯堡的经济政策自然不会促进匈牙利工业的发展，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两个生产粗棉纺品和半成品的手

---

① 指奥地利本土上的省份。

工业作坊。而在这个"匈牙利王国"里主要还是落后的行会工业和刚刚开始的家庭工业。

哈布斯堡的海关政策改变了匈牙利外贸的传统结构。匈牙利商人在几个世纪以来曾一直来往于博罗斯洛[①]和莱比锡博览会，把酒类运去，买回廉价的棉织品。匈牙利的牲畜经常在传统市场威尼斯出售。当年通过活跃的波兰市场促进了海基奥尔姚的酒类[②]生产。但在十八世纪中叶，这些传统的市场都丢失掉了，互利的外贸关系中断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匈牙利在外贸上只是与奥地利保持关系。出口的主要产品有肉牛、羊毛、粮食、铜、酒、烟草、生皮、钾碱等，87%运往奥地利。从奥地利进口的主要有奢侈品、纺织品、调料等，占进口总额的85%。

工业化基础的虚弱使国内商业的规模也很小。国家几乎是单一的农业国。贝尔泽维齐埋怨道：一个消费者要靠十九个生产者养活。无怪贸易主要是地方性的，而且主要靠本钱不大的行会商人和比较活跃的希腊人在集市上进行，集市上买不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小贩、货郎以及北方的布商了。 144

恶劣的交通条件影响贸易的发展。没有现代化的道路，当时所谓修路，只不过是土上垫土。秋春两季只有几条邮路可以通行。此外，度量衡制度混乱，各地互不相同。货币短缺，几乎没有信贷活动。所有这些都说明，工业和商业发展速度之所以如此缓慢，不能完全归咎于哈布斯堡的经济政策。当我们分析当时的经济情况时，还要看到这个国家在各方面的落后状态（人口密度低，城市化水平低，缺乏应有的交通运输网，只有满足低要求的国内市场等）和僵死的等级政治所维护的封建关系。

帝国内部的生产分工对农业起了推动作用。

---

① 今波兰弗罗茨瓦夫。

② 匈牙利最有名的托卡伊葡萄酒就是这里的产品。

匈牙利的农业在十八世纪有了显著的发展。通过不断改良土壤、开垦荒地、排干沼泽和泥塘等，大大地扩展了耕地。粮食生产中的技术落后状态虽然没有什么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中耕作物（马铃薯、玉米、烟草等）却逐渐发展起来了。畜牧业上，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优良品种了。这除了受到军队支持以外，国家还建立了种马场（巴博尔瑙、麦泽海杰什等地）。此外，还引入了美利奴绵羊。到十八世纪末，出现了第一批厩养的良种奶牛。由于农田面积的扩大，可供天然放牧的草地减少，因此厩养日益普遍，145 这一重大变化促进了紫花苜蓿等饲草的种植。还有，也许很少有人想到，在奥尔弗尔德大平原上生长着的槐树至今才有二百年的历史。在萨尔瓦什和奥尔楚特植物园里至今还生长着当时第一批引进的此种槐树。

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的一个倡导者就是业已受到启蒙运动洗礼的国家本身。这里，还应当提到几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先行者：泰赛迪克·沙姆埃尔在萨尔瓦什建立了农业学校，并留下了大量的农业科学论著；费什泰蒂奇·久尔吉伯爵（虽然主要出于他大面积自营地的需要）在该世纪最后十年中于凯斯特海伊① 建立了第一个匈牙利国家经济科学院。

约瑟夫二世的尝试

约瑟夫二世在位总共才十年（1780—1790）。但他的规划和思想所引起的波澜——至少在历史著作中——至今尚未完全平静下来。约瑟夫二世确是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大

① 在巴拉顿湖畔。

量平庸的统治者当中无疑是一个有声有色、富于想象力的人。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准备作一番大事业。为了熟悉他自己将要统治的那几个国家，他经常微服出巡，广泛倾听各阶层、各等级、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的人们的疾苦。在经过长期等待之后，他终于登上皇位。此后，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帝国的统治者，还当作帝国的第一个奴仆。

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发生着重大变革的时代。那时，正当法国大革命（1789）的前夕，封建主义世界经历着最后的岁月。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已经预告着革命风暴的来临。这些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嘲弄了封建主义社会令人不可忍耐的宗教习俗、统治者的愚昧和政治上的专制。约瑟夫二世与他同时代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及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都看到了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性。因此，他也成了启蒙主义的信徒。当然，这并是说他当了“戴王冠的革命者”。不是，哪怕一分钟也没有当过，因为他的改革恰好是竭力为了拯救旧世界。他认为，人民群众发挥政治作用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因此他的信条是：“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能依靠人民。”

约瑟夫二世想把整个帝国建成强大、富庶的国家。为实现这一宿愿，他选择了专制的做法。他从没有召开过国会，也没有为自己加冕，为的是避免宣誓去实现旧的等级制宪法。所以，他成了“戴礼帽的国王”。

他的改革的第一部分具有教会色彩。天主教教会在查理三世和玛利亚·特利莎时期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教会不仅成了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通过其数不胜数的教士控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掌管教育，还通过书籍检查机构监督文学和科学事业。尽管匈牙利居民中几乎一半信奉别的宗教，但教会宣布：匈牙利是圣母玛利亚的国家。他们公开或隐蔽地挑动宗教

146 仇视心理，禁止其他宗教活动自由，规定非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

约瑟夫二世从来也不反对教会，但他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局面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而且听命于罗马的教会也同样会阻碍他政治主张的实现。因此，他发布了著名的《忍耐法令》，命令停止迫害新教徒，并在一定限制的前提下允许新教徒和东正教徒享有宗教活动自由权和享有担任公职的权利。他还从教会手中夺走了书刊检查和出版批准权。他限制罗马的权利，解散了既不搞教育、又不从事医疗护理的修道院。同时，把被解散的修道院的财产用来建造国家神学院。而且尽量把教会控制得能够为国家利益效劳。约瑟夫二世决心将他的一切计划付诸实现，因此，连教皇庇护六世亲自前来维也纳（即所谓"反卡诺莎之行"）也没有能动摇他的决心。

约瑟夫二世关于农奴的法令(1783—1785）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想通过这些法令限制地主的横征暴敛。他保证自由迁居和自由选择职业，禁止地主无充分理由地、"不合法"地剥夺农奴的土地。他还取消了"农奴"这个名称，但他并没有想到解放农奴和彻底铲除农奴——地主的关系。

147 王朝对埃尔代伊的罗马尼亚族农奴起义所持的立场就体现了这位皇帝的农奴政策。1784 年，二、三万罗马尼亚农民在两个曾去过维也纳的农奴霍里亚和克洛斯卡领导下，拿起了武器，在胡尼奥德和埃尔代伊的埃尔茨山发动了起义，毛洛什两岸的乡村贵族庄园燃起了熊熊烈火，但起义却很快就孤立了，因为罗马尼亚农民不仅要求土地，而且还强烈要求实行东正教。开始时，皇家军队处于犹豫和等待状态，后来却对起义军进行了血腥镇压，起义领导人也被车裂。

约瑟夫二世的一部分法令公开谋求建立统一的帝国。例如，

他规定用德文代替“已经死亡的”拉丁文，使德文成为官方语言。按照他的这道命令，要在几年之内，在一切机关里，在各级司法部门，在匈牙利也一样，一律改为用德文办案。学校里也只有会德文的教师可以任教。这项法令引起了一致激烈的反对。同时，这项法令还产生了一个积极作用，因为引起了人们对匈牙利语言和文学的注意和兴趣。

约瑟夫二世还想通过改革行政区域来削弱匈牙利贵族的政治权力。他看到，贵族州这个制度对其统治具有反抗、抵制和破坏的作用，因此下令把匈牙利划分为十个区，从而剥夺了各贵族州的实权。但是，旨在取消贵族特殊地位和免税特权的计划措施更严重地触犯了贵族阶层。约瑟夫二世的军事工程师开始丈量匈牙利全国和贵族的地产。原来对匈牙利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实际上也是为此目的服务的。今天我们已经难于想象这两个法令激起了贵族们何等的愤怒，而事实上只是给乡村贵族的庭院标上了门牌号码，把地主也和交租的农奴一样列在了同一个花名册上。这对他们来说，已无异是世界末日来临了。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种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整个制度还是瓦解了。1788 年，奥地利同俄罗斯结成了联盟，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战争所带来的困难，尤其是强行征收粮食，造成了国内尖锐的矛盾。在战争过程中，“灾祸”越来越多。法国爆发了革命，在哈布斯堡的一个远方国家比利时发生了民族起义。在匈牙利，农民对战争负担不满，贵族阶层公开反对朝廷。鼠疫摧残着军队，战争失利，又进一步瓦解着军队。灰心丧气的皇帝本人也因病离开了前线，并在临终的床上亲手撕毁了他的终生杰作：除了忍耐法令和农奴法令以外，其他一切命令均予撤销。约瑟夫二世的制度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而崩溃了，他既不能战胜复旧势力，也没有认识正在诞生的民族意识的历史作用。

六、从匈牙利雅各宾派到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届等级国会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

贵 族 运 动

148　1790年2月，约瑟夫二世大业未竟，弃世而去，长眠于维也纳圣芳济教堂的地下室。但是，由他引起的风暴却加剧了。在一段时间里，局势受着各州贵族的左右。

在头几个月的动乱中受到触犯的贵族力图进行报复，他们追究约瑟夫时代官员们的责任，并把他们赶走，还把大量土地的文书放在绞刑架下付之一炬。为了不要弄脏他们那双“自由”的手，他们让奴隶们把庄园的门牌号刮掉。他们感到，皇帝想要他们德国化，于是他们便示威性地有意突出匈牙利的东西，匈牙利的服装，匈牙利的语言，总之，凡是被认为是匈牙利的一切东西都时兴起来。自尊心高涨的贵族们为了维护权力，号召全体贵族武装起来，组织自己的军队。在一片钟声和热闹的庆祝活动中，他们把王冠从维也纳运回匈牙利。1790年夏，在中断了几个世纪以后宣布重新在布达召开国会。

但是，贵族运动的几个基本弱点却很快就暴露出来了。首先，贵族毫不掩饰地表现了阶级利己主义。他们把对农奴的绝对统治

当作天经地义的事，声称："哪些人生来当国王，哪些人当贵族，哪些人当奴隶，这是天意，是人所不能改变的"，他们还要取消约瑟夫二世的农奴法令。在同样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也和被歧视的城市市民和正在觉醒的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对立起来。另一方面，贵族阶级大肆宣扬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然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对于未来并没有明确的设想。各种书籍、计划，大量的政治小册子充斥一时，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佩斯州的普通贵族欧乔伊·鲍洛格·彼得的观点在当时也许可以说是最风行的了。根据他的意见，约瑟夫二世的非法统治"切断了哈布斯堡家族承袭匈牙利王位的纽带"。匈牙利人民（当时他在这里指的是贵族）有权同哈布斯堡签订一项能更好地保证贵族特权和等级体制的新条约。

即位的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在一段时期内对匈牙利发生的事情束手无策，因为法国革命、对土耳其的战争和普鲁士人的威胁使得哈布斯堡王朝的对外政策摇摆不定。但当他和普鲁士人达成协议，结束了对土耳其旷日持久的战争并缔结了和约时，匈牙利贵族政治上活动的余地就不大了。朝廷开始策动贵族内部的反对派。各城市贴出标语，请求朝廷支持。在泰迈什城举行会议的塞尔维亚人（所谓伊利里亚① 国会上）要求自治。而对贵族阶级威胁最大的却是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在萨博尔奇起草的题为《农民决议》的宣言号召"饱经苦难的贫苦农民"拿起武器反对"祸国殃民的老爷们"，并威胁性地宣布："约瑟夫二世的法令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

149

这样一来，国内外都得不到支持的贵族妥协了。国会由布达

① 伊利里亚或称伊利里科姆，古地名。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亚德里亚海东岸，居民称伊利里亚人。南部斯拉夫人认为伊利里亚人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号召伊利里亚人的后裔团结起来反对匈牙利人。

迁至靠近维也纳的波若尼，在没有遭到反对的情况下，利奥波德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甚至匈牙利宰相也是从哈布斯堡家族中推选的（是亚历山大·利奥波德，国王的小儿子）。他们接受了玛利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关于农奴法令及宗教方面的措施。关于独立的问题，他们也只能满足于1791年第十号法令，再次重申"匈牙利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这一条款。根据条款，匈牙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和习惯，通过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匈牙利雅各宾派

150 约瑟夫死后的贵族运动燃起了民族情感的火焰。有关独立的话题再次提起，但是匈牙利的贵族不认为改变落后的社会关系的时机已到。他们在国会上，只是成立一些委员会去从事改革的准备工作。非常说明问题的是，在这个时候所作的计划，直到1832—1836年的国会上才进行讨论。一些期望改变社会的爱国者对此深感不满。

当时最有学识、最杰出的进步政治家之一豪伊诺齐·尤若夫是这样描绘当时匈牙利的特点的："这里没有任何安全……因为大贵族不仅能轻易地把非贵族的平民和农民的财产攫为己有，而且能把匈牙利普通贵族的财产也纳入私囊。非贵族即无人身安全，因为安全是作为特权被贵族所享有的。在他们看来，非贵族的人不属于人民，即使具有当年梭伦① 的智慧，也休想能担任公职。整个匈牙利几乎没有航运，没有贸易，没有工厂，也不雇用人员。土地荒芜，工业萧条……国家和真正的、繁荣的科学相距万里……

① 雅典的立法者，相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

那些前耶稣会分子极力不让科学书籍译成匈牙利文、斯洛伐克文、霍尔瓦特文和德文，他们害怕人民得到启蒙思想，害怕人民得到新的、符合正义和善美的政治法典。”

匈牙利雅各宾派是社会变革及“新的”和“正义的政治法典”的拥护者和战士。他们是对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抱有极大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法学家和教员，他们与最彻底的革命者——法国雅各宾派观点越来越一致。

饱经沧桑的穷贵族毛尔蒂诺维奇·伊格纳茨是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他的生涯充满坎坷。童年时代，他被虔诚的母亲送往修道院，在那里成了一名神学教师。但这位具有非凡的天才、能说多种外语、周游过世界的僧侣，感到在修道院内很不自在，却对自然科学、发明创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世界观上，他与教会大相径庭。在哲学方面，他已完全站到无神论一边。约瑟夫二世时代，他获得大学教授的称号。从利奥波德二世即位后，任朝廷化学顾问，但同时又担任警察局密探。弗兰西斯一世时免除了他在朝廷的职务，而他自己想在社会上发挥作用的欲望早就同社会改革的要求联在一起了。因此，他成了一位革命者。

匈牙利雅各宾派的领导人都是当时最杰出、最高尚的人物，除了毛尔蒂诺维奇和同样是生涯坎坷的洛茨科维奇·亚诺什以外，还有豪伊诺齐·尤若夫，他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是农奴解放运动的先驱战士。考津齐是这样描写他的：“他的心象一团火，炽热地爱自己的祖国”。森特毛尔姚伊·费伦茨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积极参加运动的还有当时最优秀的诗人考津齐、鲍恰尼、森特约比·沙波和韦尔谢基。

总的来说，匈牙利雅各宾派在约瑟夫二世时代，甚至在利奥波德二世时代仍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因为他们不是指望贵族，而是期望朝廷进行社会革新。他们相信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但弗兰西斯一世（1792—1835）却使他们大失所望，皇帝拒绝了改革的计划，他所追求的是清除法国“革命的恶魔”，并在王朝所辖各国继续保持旧制度。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因而转为反对政府，并开始秘密组织起来。

1794年春，毛尔蒂诺维奇开始组织了两个秘密团体，一个叫“改良者协会”，另一个叫“自由和平等协会”。在他的庞大计划内，第一个任务打算交由改良者协会去完成，这主要是想竭力把各州贵族团结起来，与他们一起来推翻三大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大贵族和大主教的政权。接着，在温和的改良以后，则由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自由和平等协会”来彻底消灭封建主义。毛尔蒂诺维奇以问答形式分别用小册子概括了两个协会的革命纲领。

改良者协会的纲领比较完整。匈牙利雅各宾派希望创立一个建立在联邦基础上的共和国以代替哈布斯堡君主制度。（因而他们的运动人们通常称之谓共和国运动。）他们设想的联邦组织，是以民族区域自治构成共和的匈牙利，剥夺大贵族的特权，剥夺大主教的财产，给农民以政治权利，保障他们的财产。

152

雅各宾派的组织活动是把问答手册交给他们认为可靠的人进行复写传播。然而他们的组织活动还是很快被发现了。1794年秋冬，当局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为了恐吓进步力量，当局制造了大量政治案件。他们希望——尤其在青年人中——清除“虚伪的原则、非宗教的信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危险思想”。其实这次约有三百人参加的活动根本没有直接威胁当时的社会制度，但仍有十八人被判处死刑，十六人被判重刑关入地牢。1795年5月20日，毛尔蒂诺维奇、豪伊诺齐、洛茨科维奇、森特毛尔姚伊和希格劳伊等在当时称为“将军地”的广场① 被斩首。几天后，年轻的厄

① 这块地方为纪念被处决的雅各宾派成员，后来被叫做“韦尔麦泽”即“血地”，在布达。

兹·帕尔和索拉尔奇克·山多尔也被处决，因为他俩在审讯过程中仍然热情地宣扬他们的信念。对考津齐及其他几个人的判决，因国王“恩典”，改为无期徒刑，把他们投入库弗斯泰因和斯皮埃尔贝格[①]的黑暗的地牢中。被判处的人并没有被刽子手的屠刀和黑暗的地牢所吓倒。豪伊诺齐在诀别书中写道：“我将以宽慰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为改善人类的社会作出了一些贡献”。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匈牙利

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的战争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为了扼杀法国革命，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君主国发动了这场战争，沙皇俄国以及担心失去海上霸权和工业领先地位的英国也参加了进去。但是它们未能战胜革命的法国，而后来，当拿破仑成为法军统帅时，它们甚至窘于对抗。拿破仑把革命的、正义的、防守性的战争逐渐变成征服战争，战争动员了被进攻和被奴役的各国人民起来进行自卫，最后也导致了拿破仑的失败。

拿破仑战争以后，获胜的各国统治者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准备重建备遭破坏的封建的欧洲(1814—1815)。在维也纳会议上，为了巩固封建制度，预防革命爆发，在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带领下，各国统治者相约要团结一致。这一反动的同盟就是“神圣同盟”。直到1848年，欧洲基本上一直由这个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的神圣同盟制度统治着。

在拿破仑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起着带头作用，而惧怕革命会使其丧失特权的匈牙利贵族，也极力支持维也纳朝廷。在国会

① 都在奥地利。

上，他们总是赞成增加税收和招募新兵以“维护王位和古老的宪法”。有几次，他们曾决定武装全体贵族，可是1809年，在杰尔附近真与对方遭遇时，装备陈旧的贵族武装一败涂地，然而贵族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却始终不渝。打败了奥皇主力的拿破仑在申布龙宣言中号召匈牙利人：“把民族的生死存亡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匈牙利贵族对此却充耳不闻。

长期的战争实际上对贵族有利，因为战争几乎没有触及到匈牙利的土地，而粮价却成倍上涨。无怪地主要盼望“静静的春雨和长期的战争”了。由于战争频繁，所有的产品销路很广，货币滚滚而来。新古典主义式的贵族庄园和豪华的住宅雨后春笋般地建造起来。昂贵的家具，维也纳的时装，纵情的狂欢和无虑的奢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盛行达数年之久。

然而战时的繁荣从来不是巩固的，这是因为繁荣的基础不是生产的增长，而是滥印钞票之故。1811年流通的纸币竟是1790年的四十倍。因而在这期间，纸币的实际价值下降到票面价值的十分之一，就不足为奇了。（一百福林纸币只能换10福林银币，有时连这点也换不到。）战争经济和无限增加的国债造成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维也纳政府曾多次通过货币贬值的方法试图挽回局势，然而匈牙利贵族坚决反对。因此，当1812年国王解散不顺从的国会时，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贵族的战争同盟便告解体。

匈牙利的经济和贵族统治阶级的危机

拿破仑战争以后，地主遇到了多年的困境。大部分军队被解散，市场供过于求。战争年代，含有杂质，带有土味的匈牙利粮

食到处都有主顾，而在经济萧条年月却无人问津。长短不齐、油腻肮脏的羊毛竞争不过干净、美观而又便宜的澳大利亚羊毛。匈牙利的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德国农业的后面，三分之一的耕地是休闲地，实际上一直荒芜着。播下的种子，充其量只能得到四、五倍于种子的收成。作物用镰刀收割，用马拉滚子脱粒，粮食贮藏在地窖。与在经济繁荣年代由一两个有胆识的、资本雄厚的大贵族所开办的几个“现代化”农业大企业相比，农业的落后状态更使人触目惊心。在他们那里，采用作物轮作制，种植青饲料，也种玉米、油菜、向日葵和马铃薯，以代替单一的粮食作物。他们采用机械化操作，由受过训练的专家和经济管理人员进行领导。在传统的经营者和使用新方法的经营者之间，差别不断扩大。对于大量中小土地所有者贵族来说，现代化经营几乎是无法达到的空想。在匈牙利的信贷条件下，本来就债台高筑的普通贵族无法进行投资，无法对自己的土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 154

当然，匈牙利农业的危机状况与交通条件的极端恶劣是分不开的。商人们如果要到远地经商，往往事先要准备好遗嘱。由于工业不发达，因而国内市场有限，即便在战争年代，工业也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发展。除了几个铁矿、小锻工厂、玻璃工场，以及制造粗呢的手工工场和小型的手工造纸厂外，为数较多的只有水力磨、畜力磨以及庄园酿酒厂。至于迪欧什杰尔的炼铁厂，加奇的制呢厂和在佩斯的沃莱罗丝织厂等大厂只能算是例外。

155 经济萧条的岁月使贵族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严重困难，地主们感到普遍的沮丧和绝望。有一个叫德热菲的贵族表达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情绪，他说：“在这个国家里，从事农业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在这里，对于经营农业的人来说，和平比战争要坏得多。”由于贵族们生活上的要求还是那么多，于是债务逐年增加。到十九世纪

中叶，情况已到这种地步，以致德阿克·费伦茨[①]说："在我们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户显要的人家不是负债累累的。"此外，许多贵族家庭都有世代承袭下来的复杂的财产诉讼问题。当时的匈牙利是律师和高利贷者的天堂。

十九世纪上半叶，相对说来人数众多的匈牙利贵族（约五十到六十万），就其财产和社会地位而言，有着巨大的差别。大量所谓只有"七棵李树"的穷贵族与拥有成万或成几十万霍尔特土地的大贵族相比无异赤贫。鲍詹尼·菲力普公爵在1820年花费七百公斤银子建造一辆豪华的马车，埃斯泰尔哈齐公爵的一套匈牙利贵族盛装估计价值一百五十万福林。但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贵族被迫外出谋生，十多万贵族则在租来的地上从事农耕。他们虽然不交纳国家的税收，但其"贫穷的"生活条件与农奴相差无几。当时典型的匈牙利大贵族居住在国外，回匈牙利只是来打猎，匈牙利话说得很糟，有的则根本不会说。而大部分小贵族则连州界也没有迈出过。不少人就象裴多菲的诗中写的那样："我不写字，不读书，因为我是匈牙利贵族。"以此奉为生活准则。

那些所谓中等土地所有者阶层是当时普通贵族政治上的代表。能列入这一阶层的贵族一般拥有一两千霍尔特的土地，或至少有几百霍尔特。这样一点财产，要想经常去国外旅行或在宫廷内混混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情愿在优裕的物质条件下和自立的情况下生活。那些所谓殷实贵族，一般是受过拉丁文教育，学过法律，担任过一官半职的人。这些人在州里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中有发言权。他们是贵族州的领导人和在国会的代表，其中最优秀的分子有德阿克、克尔切伊、拜泽雷吉和伯蒂等，这些人后来成了整个民族的领导人。

① 十九世纪后期的著名政治家。

民族文化的发展和1825—1827年国会

匈牙利经济中所发生的危机现象，只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才变得明显起来，而匈牙利的政治生活，却在雅各宾派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以后就已大大削弱了。对革命的惧怕使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的贵族暂时纠合在一起，然而1812年以后，双方的对立又开始加剧。弗兰西斯一世实行独裁统治，连国会都未召开过。为独立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要只是在文化领域里表现出来。（这一现象在中欧和东欧相当普遍。大多是文化——主要是文学——起着先锋的作用。在缺少全国性的政治论坛的情况下，首先是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关于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并且加以宣传，只是在这以后，一些问题才得以重视，成为国家政治领域中的问题。） 156

从次序上看，文化领域中第一个成为政治问题的是民族语言问题。在十八世纪末爆发的民族运动中，人们已经看到了语言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重大意义。要使匈牙利语能适应时代和各方面的要求，还必须做一番努力。在当时发生的语言革新便解决了这一问题。革新的结果，使匈牙利语不仅能满足对语言最为苛求的诗人的创作活动，而且也充分适应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需要。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考津齐·费伦茨，他正好象征了运动的性质。当年，他曾因参与组织雅各宾派的活动而被判处死刑，后因国王“恩典”改判囚于库弗斯泰因地牢。在遭受六年半的苦难生活以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

匈牙利的文化生活、独立的科学和艺术也是在十九世纪初叶

发轫的。1802年，塞切尼·费伦茨创建了民族博物馆。费什泰蒂奇·久尔吉在凯斯特海伊，泰谢迪克·沙穆尔在绍尔沃什为匈牙利的农业技术教育奠定了基础。第一份科学杂志出版了，文学界（代表人物有基什福卢迪·山多尔、福泽考什·米哈伊、考托瑙·尤若夫和弗勒什毛尔蒂·米哈伊）活跃起来了。匈牙利的戏剧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发展，比豪里和洛沃陶用小提琴奏出了当时典型的匈牙利乐曲——募兵曲。

发展着的文化增强了匈牙利人的民族意识。二十年代初，当神圣同盟发生动摇的时候，它在使人们记起1790年的情景并再次席卷全国的政治热潮中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挫败意大利的自由斗争①，维也纳朝廷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它需要钱，需要士兵。然而大部分州不愿意交纳巧立名目的非法课税和拒绝承担招募新157兵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弗兰西斯一世被迫放弃专制统治，在1825年再度召开了国会。

国会上，各州贵族强烈反对朝廷的决定，集中全力要求巩固、“保卫”宪法，而丝毫没有涉及改革问题。仅有的一次，当最受欢迎的国会代表费尔舍比基·纳吉·帕尔试图为农民的利益发言时，“尊敬的国会”同样也毫不客气地把他嘘走了。但无论如何，这届国会还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1825年11月3日，当代表们再次谈论建立科学院的必要性时，一个大贵族出身的青年骑兵军官捐赠了一年的收入六万银福林。这样，随着科学院的建立，塞切尼·伊斯特万（1791—1860）便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

① 即意大利复兴运动。

改良运动的发动者塞切尼

塞切尼出身于维也纳的塞切尼宫中，但童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纳吉岑克的庄园里度过的。他的生活开始时和其他地位相同的大贵族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当过军官，参加过莱比锡战役，在维也纳出入宫廷。不久，他放弃了放荡空虚的大贵族生活方式，独自和青年时代的朋友韦谢莱尼·米克洛什一起从伦敦到君士坦丁堡，走遍了东方和西方。这位能说多种语言、学识渊博的大贵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英国深深地吸引着他。

158

当塞切尼以慷慨的捐助创建科学院时，他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他在1830年出版的著作《信贷》一书概括了他的设想。他宣传进行审慎的、温和的改良，中心的问题是保证信贷。塞切尼认为，信贷对于“集体福利”能起到“魔术师的作用”。以适当的投资便能创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农业（也就是说便能购置播种机、脱粒机、现代化的铁犁和购买种畜，便能建造经济设施以及在生产中使用专业人员等）。在信贷的扶持下，可以建筑桥梁和道路，随着交通状况的彻底改变，产品销售的问题就能随之解决。

但是信贷问题和许多别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当时人们认为这一现象是无法改变的。信贷的最大障碍是“世袭法”。(地主不能随意支配祖传的土地，因而无钱时只能借高利贷。)塞切尼大胆宣传必须取消自拉约什大王以来就存在的这个“世袭法”，即使由此可能造成几个浪荡的大贵族的财产被放债的人拍卖掉，那也在所不惜。

塞切尼还清楚地看到，现代化的大庄园不可能建筑在落后的农奴劳役上，“靠棍棒、鞭子打不出一个繁荣的国家，用强制劳动的

手只能种出无色无香的花。”塞切尼提议：必须取消农奴劳役，而代之以生产力高得多的雇用劳动。必须取消扼杀农奴劳动积极性的“玖一税”，否则农奴生产的东西越多，交纳的也越多。出于同样的考虑，塞切尼为了繁荣手工艺，积极为取消行会和(各个州、城市当局的）价格限制不断进行努力。

159

塞切尼同当时“必须遵循的”思想方法作了彻底的决裂。这种思想方法认为，贵族的匈牙利和匈牙利的贵族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塞切尼却认为：“这个国家只是一片大荒地，只有将来也许会美好些。”他说：“许多人认为，已经有了匈牙利——但我想，将来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匈牙利！”塞切尼看到，国家繁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教育，他把国家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寄托在不断增多的“受教育的人”身上。

塞切尼不是想通过革命的道路，而是希望通过缓慢的发展来实现他的设想。从《信贷》这一著作中也可发现，虽然他无情鞭笞自己的阶级，但还是认为，适合领导改良运动的只有大贵族。根据节制、谨慎的精神，他概要说明了纲领的对外政策背景，可是他没有提出民族自决的问题。虽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表示不满，但他认为，身处日耳曼和斯拉夫两大民族中间的匈牙利难于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他认为，只有在哈布斯堡帝国的范畴中匈牙利才有前途。他并且相信，他的宏图定能得到维也纳朝廷的赞同。

《信贷》的反响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当年《信贷》再版，围绕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出现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全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改良的人站在塞切尼一边，而保守派却指控他搞农民暴动。不少人写文章试图进行反驳，但塞切尼在他另外两部著作《世界》(1831)和《阶段》(1833)中，把他们的论据一一驳倒。

塞切尼把他的理论纲领同他不倦地进行的一系列首创性的实

践结合起来。他主要致力于发展农业和改善交通。为此，他创立了匈牙利经济协会，组织赛马，治理多瑙河和蒂萨河，使轮船可以通航，使主要水道得以利用。塞切尼为建设和美化佩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第一座永久性的多瑙河桥——四十年代建成的链子桥便是他最得意的杰作，也成了布达佩斯的象征。

从塞切尼投入政治生涯的第一天起，他便置身于激烈的斗争之中。这些斗争说明，他是一位忠实的、富于牺牲精神的、进步事业的拥护者，但他的纲领不能解决当时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在他的纲领中，没有关于独立和农奴解放的问题，因为他既不愿意同哈布斯堡王朝发生冲突，也不希望推翻封建社会的支柱。但这一切都不能降低他的历史作用。塞切尼把自己的民族引到了彻底改变其面貌的方向上。

农奴问题。1831 年的农民起义

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已经看到封建制度在崩溃。很显然，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大土地所有者贵族和靠租种土地与农民为伍的穷贵族只不过在原则上是“同样的贵族”，“同样的自由”。贵族阶层解体了，富裕的中等土地所有者贵族和大贵族以整个贵族的名义领导着国家。在农业和工业中，我们能够发现旧制度崩溃的更为明显的现象。建立在老式的、农奴劳役基础上的、生产谷物的贵族自营地发生了危机，行会手工业因缺乏竞争能力而岌岌可危。要想复兴经济生活，需要投资，需要机械化、工业化和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

农奴的情况最能充分说明封建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中，也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一方面加强了相

对来说人数较少的富裕农民阶层，另一方面使少地或无地的雇农（农业无产者的前身）大量增加。小土地经营者期望得到更多的物质和社会自由，而雇农则除了做短工和收割分成之外，还需要谋求其他劳动机会。当然，农奴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处境，但已感到有问题，这就本能地促使他们与封建制度相对抗。

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与十八世纪相比已变得更为尖锐。调整地租和劳役诚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步骤，但它只是保护了农奴租种的土地，对不属于农奴租地的新垦地和与地主共同使用的牧场却未作规定。地主为了增加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利用维尔伯齐《三章法》，以极少量的钱“换回”——实际上是夺走——农奴以辛勤的劳161 动新开垦的土地。地主为了发展其畜牧业，竭力使用公共牧场，使农奴再次受到打击。后来，在大部分村庄，虽然实行地主和农奴的牧场分开——“牧场分离”的办法，但情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还应看到，这时国家的税收提高，尤其是各州征收的所谓“门户税”飞速增加，农奴们的不满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1831年，在北部高地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第一次大规模的霍乱流行加速了起义的爆发。当急性病霍乱代替了慢慢致死的鼠疫时，整个欧洲陷入一片恐慌。当这场从印度传来的传染病到达匈牙利边境时，已有六百万人丧生。对于这场前所未见的传染病，当局采取“军事隔离”和组织“防瘟机构”都无济于事。在匈牙利，这场霍乱夺走了二十五万人的生命。

这场大灾难和当局为对付这场灾难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有些措施遭到农民的误会，例如用药物对井水进行消毒被认为是放毒药），触发了农民的满腔仇恨。瘟疫传入匈牙利时，正值收割季节，它夺去了农奴在奥尔弗尔德大平原上取得全年粮食的机会，加上愚昧无知的庄园管理人让农奴在许多村庄事先挖好大坑，以便日后有地方埋葬死于霍乱的人。愤怒已极的农奴们便以棍棒、农具

及落入他们手中的任何武器向地主及其支持者发起进攻。

尽管起义没有一位杰出的领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却宛如一片野火迅速扩展。起义是在曾普伦州发难的，很快便扩展到临近各州。大部分起义者是斯洛伐克人，但当地的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鲁廷人也拿起了武器。他们拒绝为地主服役，他们为自己所受的不公道遭遇进行了血的报仇。起义者毫无根据地指望“好心的沙皇”或“好心的国王”给予援助。由于军队的残酷镇压，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162

“霍乱暴动”——当时贵族社会这样称呼1831年的农民起义——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许多人要求加强镇压，要求政府“为保持内部的勇气（安全），任何时候都需拥有足够的军队”。但另一部人受塞切尼思想影响的比较理智的贵族却与此相反，他们在坚定的改革政策中寻求解决的办法。

越来越多的匈牙利贵族卷入到当时的两大思潮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从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思想宝库中寻找武装自己的东西。自由主义在整个大陆上胜利地传播。虽然自由主义的概念在一个国家和在另一个国家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之间毕竟有着不少共同点，所有一切的中心是对自由的追求。它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它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言论、新闻和集会的自由），为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所有这一切，在匈牙利也有各式各样的理解和解释，但自由主义思想的信奉者一致认为，旧制度不能这样没有变革地继续存在下去。

在多民族的或者说政治上分裂的中欧，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形成资产阶级民族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宣传建立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它加强了民族意识，使民族文化和民族特点得以发展。正如我们已提及的，在许多地方（在匈牙利贵族中也是这样），民族主义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是

一致的。在匈牙利历史上，1832——1836年的国会便证明了这一点。

1832—1836年国会。韦谢莱尼和克尔切伊

1832年12月在波若尼召开了等级国会。有五十二个州，各州派两名代表参加下议院，在上议院只有主教、州督、大贵族家族、伯爵、男爵和公爵的席位，所谓国会青年派是国会中人数最多，同时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派别。他们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是一批大学毕业的青年法学家，即所谓法学实习生。他们随同各州的代表来到波若尼以进行法学实习和取得政治上的经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具有激进的政治见解，而且也从不加以掩饰。他们从会议旁听席上向进步的代表热烈欢呼，呵斥执政党代表。

163 当时的国会里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政党。一些州在给代表的指示中规定了代表应持的政治立场，这些指示往往互相有不少差别，但就其立场而言，毕竟有某些相同之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就可以大体上划出两党的轮廓。宫廷党，即执政党，在上议院中占绝对多数，而要求改革的反对党，在一些问题上能把下议院的多数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年迈的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在开幕词中提醒代表们要谨防"革新的弊病"和"照搬外国的情况"。然而国会没有完全遵照国王的告诫行事，谈了不少朝廷听来颇为刺耳的话。许多代表对1831年波兰的自由斗争发表了动人的演说，关于过渡的问题和不同民族间的通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在一系列激情的发言以后，就匈牙利语的问题通过了重要的法律提案。

但国会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仍然是农奴问题。这个问题争论了多年。反对党建议采取自愿赎身的办法。他们建议农奴通过同地主自由协商可以将自己赎身，不再为地主服劳役，不再交纳玖一税，可以把自己耕种的这块租地作为私人财产。禁止地主法庭滥用权力审判农奴，同时取消农奴几项较小的负担。温和的，但仍然意味着进步的改良运动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而 164 朝廷却拒绝了以激烈的斗争所通过的提议。(各项提议只有在国会和国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方可成为法律。)宫廷打回了法律提案，于是政府要求各州重新召开州议会，利用金钱和酒肉收买了破落贵族的选票，再配上棍棒，于是在许多州挫败了反对派，指示代表改变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讨论最重要的改革提案，即便在下议院，也得不到必要的票数。因此，一直延续了四年的国会收效甚少，宣布收场。但有一点却是很明显的，要想把社会改革和民族独立问题从议事日程中抹掉，现在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这方面，国会中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家韦谢莱尼·米克洛什(1796——1850)和克尔切伊·费伦茨(1790——1838)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韦谢莱尼是埃尔代伊青年贵族的代表，身材魁梧、勇力过人、气宇轩昂。克尔切伊说他是“令人敬畏家庭的令人敬畏的苗裔”。他是几个世纪以来一个一直与朝廷对抗的家族的后代。他的父亲虽然封地在日博①，却多年被关在库弗斯泰因地牢，他在获释后骄傲地说：“约瑟夫皇帝教会我受苦，但没有教会我害怕。”韦谢莱尼在塞切尼的影响下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由于新闻检查的原因，他在布加勒斯特发表的题为《错误的观点》这一政治论文中，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和塞切尼一样无情地鞭挞“不可一世”的大贵族、“愚昧

① 在今罗马尼亚克鲁日县。

无知和游手好闲"的普通贵族以及各独断专行的贵族州。但在独立问题上，韦谢莱尼却要比塞切尼激进得多、坚定得多。他认为"我们和奥地利的这场婚姻并非是不能解除的"。塞切尼寻求解决的办法是靠同朝廷的密切联系，而韦谢莱尼却越来越大胆地鞭挞维也纳朝廷。

克尔切伊是全国知名的诗人，匈牙利国歌歌词就是他在1823年创作的。他出身于索特马尔州一个富裕的中等地主家庭，但他是一个谦逊的和不愿抛头露面的人物。自他来到波若尼以后，他在自己的会议日记中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令人深思的问题："你将为她（祖国）做些什么？你有能力把蕴藏在心中二十年的理想付诸实现吗？……如果有人想使你退却，你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吗？如果人们都背离你的时候，你还敢同风浪作斗争吗？"

克尔切伊在国会的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虽然朝廷派人注意他的每一个活动，但他对于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他是一位主张农奴永世赎身和农奴解放最坚定的发言人。他的整个纲领可以概括为"自由和财产"五个字。1834年12月，他所在的州——在政府的宣传鼓动影响下——指示他要改变立场，但他宁愿辞职也没有同意。国会青年派一直把他送到波若尼边界，并铭记着他临别时的箴言："我们的口号是：祖国和进步。"

除了克尔切伊和韦谢莱尼以外，反对派还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比豪尔州的代表伯蒂·厄登，托尔瑙州的拜泽雷吉·伊斯特万，琼格拉德州的青年代表克洛扎尔·加博尔。佐洛州的德阿克·费伦茨是首次参加这届国会，他是反对派后来的领袖。首次参加国会的还有匈牙利改革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科苏特·拉约什。科苏特并非代表他的州，而是一个大贵族派他到波若尼去了解会议情况的。他刚到国会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没有地产的曾普伦州的律师，但当国会结束时，他已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了。科苏特

166

的这一巨大成就应归功于他编写的《国会报导》。《国会报导》——为了避免新闻检查——是手抄的，由国会青年派复写出版，因而数量不多，总共四、五十份。但当它们被分发到四、五十个州的时候，足可以左右这些州的社会舆论。对于它的重要性，有一个代表——恰如其分地——这样写道："《国会报导》在偏见中打开了一个裂缝，进步的时代将努力扩大它，独裁政权已经无法堵上它。"

维也纳试图扼杀改良运动

哈布斯堡朝廷惧于改良运动的迅速传播。弗兰西斯一世死后(1835)，疾病缠身、低能的斐迪南五世即位，实际权力操纵在由几个亲王和大臣组成的秘密小集团，即所谓"小内阁"手里。这一小集团对反动势力极为有利。当国会还在开会，他们便采取了第一项报复措施：对韦谢莱尼进行起诉。根据韦谢莱尼在索特马尔州的一次演说，控以"犯上罪"。在这篇演说中，韦谢莱尼对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因为它阻挠实现农奴永世赎身。他说，看来维也纳希望"九百万农民起来造反反对贵族。那时，政府当然会保护贵族的，但贵族们却就会悔之莫及，因为他们这样就会由自由人降为奴仆了。"

国会闭幕后，反动派转为公开的进攻。他们把最傲慢、最冷酷、忠于朝廷的大贵族帕尔菲·菲代尔任命为匈牙利总理。这个连匈牙利话都不会说的大贵族果然全力为朝廷效劳。政治诉讼案一个接着一个，在审理了韦谢莱尼的案件以后，接着对国会青年派领导人进行起诉，其中洛沃希·拉斯洛被判处关十年地狱。科苏特·拉约什也于1837年被捕，因为他在反映各州生活的《政法报导》中鼓动对案件的不满。

朝廷抛出的政治诉讼案的如意算盘打错了。1839年，当韦谢莱尼被判处三年监禁时，他在人民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人们还清楚地记得，1838年3月，当解冻的洪水挟着冰块淹没佩斯的危急时刻，他驾着船，到处进行救援，人们叫他是“洪水船工”。）朝廷对科苏特的判决，也同样使更多的人拥护科苏特。政府的行动促使要求进行改革的思想迅速扩展，如果还有什么比它发展得更快的话，那就是对政府的仇恨了。

1839—1840年的国会也反映了同样的情绪。在这届国会上，已不能拒绝“自愿永世赎身”了。随着“赎身法庭”的设立，世袭法这个堡垒也出现了缺口。但是，国会上谈论最多的事仍然是政府167 的专制统治和对言论自由粗暴的干涉问题。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最后由比较温和的大贵族担任总理，对政治诉讼案中的英雄人物，通过大赦予以释放。

洛沃希在离开斯皮埃尔贝格堡的监狱时精神失常，韦谢莱尼也是委顿不堪，两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唯有科苏特则“象火中再生的凤凰，神采飞扬地走出牢房”。科苏特还很好地利用在牢狱中度过的几年光阴，他学习英语，增长了社会经济学的知识。他后来写道：“那时我给自己作了关于我国状况的报告，并在我的脑海里制订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科苏特的纲领和《佩斯消息报》

科苏特很快得到机会把他的计划公诸于众。梅特涅[1]出于策略的考虑，同意科苏特编辑秘密警察、佩斯的出版商兰德莱尔的

① 当时奥地利宰相。

报纸。梅特涅以为借助于新闻检查，日后可以砍断难于管束的编辑的翅膀。这样，从1841年1月开始，每周出刊两期的《佩斯消息报》就问世了。开始总共只有六十个订户，但半年以后，订户已达四千个。特别是根据读者要求，还把上半年的报纸重印再次发行，这在新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说明科苏特的思想具有长远的意义。

科苏特进一步发展了塞切尼的改良计划。他在最初发行的报纸上就提出要求解放农奴，"取消农奴制，给他们以自由的土地！"科苏特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即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规定必须实现永世赎身。（立法机构[①]宣布解放农奴，国家承担地主的损失。）第二项重要的步骤是取消贵族免税的特权，实行普遍纳税制度。第三项步骤是实行人民代表制，非贵族可以参加立法机构。科苏特认为，贵族的这些让步，能够使农民们关心维护国家的独立。那时，科苏特还没有考虑过同哈布斯堡王朝决裂的问题，但是他始终强调匈牙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依附奥地利。科苏特奉行当年反对约瑟夫二世的贵族们的独立政策，但和他们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必须解决社会问题。在科苏特的纲领中，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

168

科苏特曾设法把贵族的利益和农奴的利益协调起来，即"利益统一"。他把整个反对派营垒的纲领条理化了。他打算把领导交给拥有中等土地的贵族。对惧怕进步的大贵族，科苏特指出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倘若你们愿意，可以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尊重你们。如果必要的话，就不需要你们，甚至反对你们！"

《佩斯消息报》的影响不可抗拒。科苏特使报纸成了现代化的武器。在匈牙利，是他第一个引进了社论这个形式。他以活泼的、

---

① 指国会。

富于感染力的风格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报纸发行量和对群众的影响方面，没有一家报纸能与之匹敌。科苏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所写的社论，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大贵族和教会的上层分子，出于维护其财产和维护封建制，试图出版各种报纸与之竞争。他们攻击科苏特的思想，诽谤科苏特的人格，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在人们中间也没有引起反应。而当塞切尼起来发表不同见解的时候，全国轰动了。

169 塞切尼是改良运动的发动者，是一位受到全国尊敬的人物，科苏特也称他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然而塞切尼从1832年开始就不同意科苏特的观点。他认为，最初几期的《佩斯消息报》描绘的蓝图是革命和灾难的景象。因此，他在《东方民族》这篇文章中指责科苏特“以他的手法”（即尖锐的笔调）“把匈牙利人推向坟墓”，他认为科苏特把匈牙利置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对立面，而后者却拥有巨大的权力足以把匈牙利碾成齑粉。根据塞切尼的意见，只有通过内部逐步的改革，同维也纳朝廷手挽着手，国家才能前进。科苏特的答复是非常有礼貌的，然而又是极为坚定的。在展开的这场大辩论中，反对派中所有的重要人物，如德阿克、韦谢莱尼、厄特弗什等都站在科苏特一边。塞切尼的目的，不仅是要降低和抑制科苏特的作用，而且想在介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建立一个中间路线的党并开展活动。但塞切尼的意图落空了，他未能建立起一个温和的改革党。在争论中，他孤立了，而且大失民心。他虽然没有放弃他的改良思想，但越来越向政府靠拢。

匈牙利的国语和少数民族问题

四十年代初，围绕改良思想的争论日益激烈，每一届国会更

加重了其尖锐的程度。例如在1843—1844年的国会召开之前，在大多数州，不仅为了争夺选票大肆贿赂宴请，而且往往还造成了流血事件。辩论得最激烈的是贵族免税问题，而极力维护免税特权的人，正好是与农民为伍的穷贵族。这些贵族眼光短浅，闭闻塞见，往往连州府在何处都不知道。但当各党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需要选票的时候，执政党便花钱买通这批穷贵族充数，这群无知的穷贵族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为了维护贵族免税制，情绪激动的穷贵族甚至不惜在议会中大打出手。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决不放弃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我们不交税！"由于他们的选票和手中的棍棒，使德阿克·费伦茨在国会代表选举中惨遭失败。

170

实行普遍纳税制的议案在国会上最终被挫败。就连共同承担被称为门户税的州税一事也未能使会上的各等级接受。然而1843—1844年的国会，反对派也还取得了不少重大胜利。1848年第二号法令规定，匈牙利语是国语，即它是立法、行政、司法和公共教育的正式语言。

十八世纪末叶，匈牙利语开始胜利向前发展。为了促进匈牙利语的健康发展，首先在大学设立教研室，后来，匈牙利语成了中学的一门必修课。十九世纪初叶，继教育领域以后，匈牙利语在立法和行政领域内也已普遍使用。开始时迈的步子不大：除了正式的拉丁文外，只有半栏的版面是用匈牙利文撰写的国会提案。匈牙利的官府也接受用匈文书写的申请和状纸。1825年，匈牙利科学院的创建标志着这道防线已被突破。朝廷官员和国内的保守分子企图阻挡这一进程（梅特涅耽心帝国的分裂，保守分子害怕民主的传播），但都枉费心机。1830年，给匈牙利的职员规定了必须掌握的匈语知识，1836年，匈牙利语成了正式的法律语言，1844年，匈牙利语获得完全彻底的胜利，成了匈牙利的国语。

匈牙利的国语在民族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

时，却加剧了同少数民族的矛盾。匈牙利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遭受土耳其的蹂躏和十八世纪人口再度增多以后，匈牙利族人的比例却不断减少。改革时期，全国大部分居民是少数民族。(根据当时著名的统计学家费涅什·埃莱克的统计，1842 年，匈牙利王国——包括匈牙利本土，埃尔代伊和霍尔瓦特——共有一千二百多万居民，其中匈牙利族居民不足五百万，其余为：二百多万罗马尼亚人，一百五十万斯洛伐克人，一百多万德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约一百万霍尔瓦特人，五十万鲁廷人。)

改良时期的政治家们没有从这一局势中作出应有的结论。他们认为，这块土地是匈牙利人以血的代价换来的，近千年来匈牙利人一直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是匈牙利人与土耳其人及鞑靼人作战，以鲜血保卫了这块土地，因此他们有权利要求匈牙利语作为国语，甚至还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少数民族要逐步匈牙利化。这些政治家没有注意到少数民族的历史——至少没有注意到霍尔瓦特人的历史。他们坚持"一个政治民族"的观点，深信只要扩大没有任何语言和宗教差别的民主自由权利，少数民族问题也就随而解决。

172 少数民族虽然也拥护扩大自由权利，却不同意自由主义派的匈牙利贵族的论点。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和思想家，还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独立的民族权利，虽然暂时还没有提出分割匈牙利的领土问题。

随着匈牙利民族的觉醒，少数民族也开始觉醒起来。在这一蓬勃发展的运动中，霍尔瓦特贵族在霍尔瓦特人地区起着发动和领导作用，在没有本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知识分子则起着发动和领导作用。由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教士或（在教会学校中任教的）教师，因而教会在少数民族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居住地是东正教会，斯

洛伐克人居住地是路德教会。)

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意味着国内各族人民进入了发展为独立民族的第一阶段。可以这样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匈牙利各少数民族都已产生了自己民族的文学语言。

有关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论说极大地提高了少数民族的觉悟。霍尔瓦特族的高伊声称，南斯拉夫人是古代伊利里亚人的后裔。依据“达科罗马尼亚”的理论，罗马尼亚人是达科人和罗马人融合的结果，他们在埃尔代伊地区比匈牙利人出现得还早。在佩斯从事活动的斯洛伐克神甫扬·科拉在他的诗中倾注着斯拉夫人相互交流和彼此团结的思想。

少数民族独立的新闻机构的建立，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活动。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和其他语言的报纸相继出版，这些报纸，虽然措辞谨慎，但仍然表达了他们独立的政治愿望。在一切民族运动内部，几乎没有例外地进行着保守的、绝对忠于朝廷的教会派别同资产阶级左翼之间尖锐的斗争。在罗马尼亚人那里，鲍拉日福尔弗① 的教师伯尔努蒂乌属于左翼，在斯洛伐克人那里，斯图尔除了为实现民族目标以外，还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要求。遗憾的是匈牙利的反对派和类似斯图尔的政治家之间未能找到共同一致的道路。

改良时期的反对派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一站不住脚的思想。因而他们用怀疑的目光去看待来自萨格拉布、考尔洛察②、鲍拉日福尔弗以及来自波若尼学院的，得到广泛传播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各少数民族面对匈牙利人，把维也纳看作“自由的保护神”，因而他们多次成为朝廷手中的工具，(特别是霍尔瓦特的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布拉日。

② 即今南斯拉夫雷姆斯基卡洛弗奇，在今诺维萨德东南。1741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疆域内的塞尔维亚教会举行集会，要求实现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权利。

"伊利里亚"党更是如此。)这就使问题更为复杂化了。对于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政策,中等贵族是基于对沙皇俄国的恐惧而制订的。对于斯拉夫族人所进行的文化传播工作,匈牙利中等贵族也误认为是在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并毫无根据地担心,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在政治上也会站在沙皇一边。

在改良时期,城市的德意志居民的同化问题和犹太人的权利平等问题也出现了。拥有地方和政治自治权的埃尔代伊撒克逊人激烈反对匈牙利人,而德意志市民(尤其在首都)却很快就匈牙173 利化了。由于外国人往匈牙利移民,在数目上增长很快的犹太人与匈牙利人同化的趋势也很强烈。厄特弗什和绍洛伊为争取犹太人的平等权利进行了斗争。

少数民族尖锐的斗争是改良时期的特点。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的匈牙利民族不善于同国内的其他民族合作。尽管这是当时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特点,但毕竟是使人痛心的,因为只有反动派才从其中得到了好处。

匈牙利工业的发展和工业保护协会

除了民族问题和为社会改革而进行的努力以外,经济发展也成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经常性的社会生活问题,甚至也成了政治问题。十八世纪中叶,匈牙利贵族一言不发地接受了朝廷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匈牙利国家发展不利的关税法令也没有提出异议。而改良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却看到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因而时刻注视着经济的发展情况。

174 改良时期的这几年使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经济生活生气勃勃。手工业工人的数字从1815年的八万八千人增加到1846年

的二十三万三千人，差不多增长了两倍。从事工业的人数飞速增长，首先是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也就是说，在国内，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贸易扩大了)。越来越多的农奴购买工业品，尤其是购买服装。而早先，大部分这类产品都由他们自己生产。农奴们通过出售农产品，挣钱比较容易了。除了变得活跃的国内商品交换这一因素外，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奴们出售农产品。对外贸易也有了增长，三十年内，匈牙利对奥地利出口的农产品（小麦、羊毛、烟叶)、葡萄酒和牛肉有些增加了一倍。治理了下多瑙河① 和蒂萨河（这首先是塞切尼和瓦沙尔海伊·帕尔工程师的功劳),轮船开始通航。1846年，匈牙利的第一条铁路在佩斯和瓦茨之间建成通车，不久，蒸汽机车又向着索尔诺克奔驰。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先是农业，之后是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第一批蒸汽碾磨厂、酿酒厂、制糖厂和现代化的烧酒厂相继建成，其他如勒克、施利克和维达奇等几个农业机器制造厂，戈尔德贝格老布达纺织厂② 以及甘兹·阿布拉罕铸铁厂③ 都是在这时奠基的。从当时的标准来看，雇有一千名工人的老布达造船厂和克巴尼亚砖瓦厂已是一个大厂了。沃莱罗丝织厂在一段时间内也曾享有盛誉。

首都的两部分——布达和佩斯的迅速扩展是经济发展最明显的标志，尤其是佩斯高速度的建设使城市面貌为之一新。1780年，全市人口只有一万三千人，他们居住在旧城内，而到1848 年，人口已达到十一万，几乎增长了九倍。许多公共建筑（匈牙利民族

175

① 指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南段。

② 为今日老布达纺织厂——匈牙利最大的纺织厂的前身。

③ 为今日甘茨——马瓦格车辆厂，甘茨起重机和锅炉厂，布达佩斯造船厂的前身。

博物馆，州府大厦）、饭店和公寓拔地而起。最有名的博览会都在佩斯举行，并在这里建立了匈牙利第一个极为重要的信贷机构一佩斯国家第一储蓄银行（由法伊·安德拉什领导）和贸易银行（由乌尔蒙·莫里茨领导）。佩斯成了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就本国范围而言，经济的发展当然是迅速的，但若与奥地利比较一下，它的弱点就很快暴露出来了。（1846年，匈牙利从事工业的占人口的三十五分之一，而奥地利在1840年就占人口的十三分之一。）匈牙利的工业如果要赶上哈布斯堡王朝中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朝廷对匈牙利采取的不利的关税政策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贵族政治家的言论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工业化的问题和关税问题，这并非偶然。科苏特最清楚地了解工业化对民族的重要性，“没有工业独立，政治独立无异幻想”——他在《佩斯消息报》上这样写道。如何才能摆脱百年来的落后状态呢，对于这个问题，科苏特建议建立保护关税。“你们应该让孩子长大成人，然后打开栅栏让他前去搏斗”——科苏特说。

科苏特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工业化事业服务。在他的宣传鼓动下，1841年成立了工业协会，他让大贵族反对派的领导人鲍詹尼·拉约什伯爵担任协会会长。1842年，工业协会举办了第一届匈牙利工业展览会。然而科苏特还有更宏伟的计划。为了匈牙利能独立地进行贸易，他除鼓动制订菲乌迈铁路计划外，还提出了“匈牙利人到海上去！”——的口号。

176

工业迅速而有效地发展自然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各州的代表都懂得这一点，因而在1843—1844年的国会上，代表们希望制订这方面的法律。维也纳朝廷却固执地不予理睬。针对这种情况，爱国者们成立了保护国内工业的“保护协会”。

保护协会指出，通过社会运动为匈牙利的工业创造市场是它

的直接目的。如果不能在国境线上，那就在各自的门口进行限制。保护协会会员以名誉担保，即便在匈牙利的产品比较贵，而且质量并不那么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购买匈牙利的工业品。每个人，不论其是贵族还是非贵族，都可以加入保护协会。这一运动的发展迅猛异常，很快又成立了一百四十六个地方分会。

但保护国内工业协会的真正意义不在经济上，而在于政治方面。协会的誓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在奥地利——捷克的工厂主中间造成巨大的惊恐。他们很快发现，没有政治支柱，光靠社会的决心——用科苏特多少有点辛酸的话说"靠跺脚"——是创造不出匈牙利工业来的。保护协会虽然未能达到预定的目标，但也取得了许多其他的收获。协会冲破了封建社会固定不变的限制，战胜了在匈牙利极为普遍的分裂主义现象，协会打破了各州在本州境内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为创立一个超于各州的、完全独立的全国反对党起了推动作用。

维也纳朝廷的新反击

四十年代中期，惧于匈牙利形势发展的朝廷试图再次进行反击。梅特涅看到，"匈牙利站在革命的前厅里"，"政府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影响"。 177

在维也纳方面，当然也注意到了上一次失败的原因。当时，他们曾企图用最粗暴的手段，用政治案件来扼杀通过1832—1836年这届国会而得到发展的改革运动。现在，他们不采用最后的手段，而是利用政府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开始了经过通盘考虑的、全面的政治反击。

第一步，他们从科苏特手中夺取他那具有魔力的笔。兰德莱

尔根据朝廷的命令把《佩斯消息报》的编辑权交给了别人。政府暗中指望，害怕物质上困境的考虑会促使这个危险人物就范。梅特涅曾试图亲自打动他的心，但白费心机。科苏特的答复很简短，然而很坚定："我知道会挨饿，但我不背叛。"科苏特没有失望："虽然报纸没有了，但嘴没有堵着，手没有捆着。"他全力以赴投入协会的工作，当了协会会长，而且是协会最主要的推动者。

保护国内工业协会给维也纳方面也造成了许多麻烦。他们(很有道理地）开始把协会看作全国性的反对党。而这反对党也确实具有实际力量：它控制了大多数州。实际上，这表明政府只控制着国家的一部分。对政府来说，夺回这个反对党的堡垒——被其控制的州——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178 维也纳朝廷和过去一样，为此次行动进行了人事变动。维也纳把政治生活的实际领导权交由两个年轻的贵族匈牙利总理奥波尼·久尔吉伯爵和埃尔代伊的总理约希考·绍穆男爵承担。奥波尼等试图采用双管齐下的进攻方法掌握主动权：一方面打出改革不可避免的旗号，另一方面派出行政官员前往他们认为州长不够坚定的那些州去。

行政官员的高额薪奉直接由维也纳支付，但同时要求他们在所在的州内要创造执行党的多数。行政官员们——一般都是生活富裕的各州地主——为实现此目的，不择手段，竭力效忠。他们贿赂、威胁人们，当认为时机对执行党有利的时候，他们就召开州议会。而对难于驾驭的州议会，则不止一次地通过动用军队予以解散。例如在比豪尔，蒂萨·拉约什动用上刺刀的军队和全副武装的骑兵向反对党发起攻击，政府则对反对党领导人进行起诉。

政府大规模的攻击收到了效果。1846年，韦谢莱尼极为悲观地判断力量的对比。"在两个祖国内（匈牙利和埃尔代伊），我们已经没有多数了"——他写给科苏特的信中这样说。1846年年终，

政府正式建立了保守党，以图巩固他们暂时得到的胜利。保守党没有提出一个明目张胆的反动纲领，因为这样做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保守党强调与奥地利的步调一致，把旨在保持旧制度的意图隐藏到“谨慎前进”的空话后面。

反对党的形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

反对派必须接受挑战。尤其是科苏特，他以极大的热情，为把持有不同观点的反对派人士集中到一个营垒中而努力奔走。在独立的问题上，反对派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但在有关国内的改革，特别是改革的速度和实施的方法问题上，意见却有分歧。（在相对的基础上，根据某些问题的保留程度，我们还可以把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右翼是比较富裕的中等地主，希望进行比较温和的改良，并寻求同哈布斯堡王朝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把德阿克和森特基拉伊·莫里兹视为自己的领袖。由科苏特领导的左翼，在解决独立问题和农奴问题方面激进得多（当然，当时还根本没有考虑到同哈布斯堡王朝决裂和不顾地主利益的农奴解放问题。）厄特弗什代表的是第三条路线，他和他的拥护者一起激烈抨击以州为建制的行政制度，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以缩小各州权力。（因而属于这一派的人被称作集权制派。）以州为建制单位的行政制度固然是滥用职权和独断专行的温床，但却又是反对派的支柱，这就使厄特弗什等人处于矛盾的境地。

被形形色色的和政治上并不一致的反对派营垒奉为领袖的德阿克之所以不愿制订一个比较明确的党的纲领，是因为他担心因此将失去不少追随者。在这一点上，科苏特的观点与之完全不同。“我们的队伍宁愿小些，但要坚强……让我们象鹰的翅膀一样，

179

它不离开鹰的身体，而是使它扩展得更大。”他认为，党要和整个民族紧密相连，要象翅膀一样把民族引向前进的方向！

时间很快地为争辩作出了结论。执政党的成立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从1846年到1848年的全国性的饥馑，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染病，尤其是在气候条件恶劣的地区，使数以千计的人丧生。1846年，在邻近的加利西亚发生了流血的农民起义。维也纳朝廷使乌克兰的农民与为独立而斗争的波兰地主发生了对抗。“欧洲的上空出现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科苏特写道，“让我们共同前进吧，否则我们就推你们前进”。

1847年春，在德阿克和鲍詹尼的领导下终于成立了统一的反对党。在称为“反对党声明”中概述了党的纲领，其中有要求农奴解放，实行普遍征税，实行人民代表制和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项内容。但在具体实施方面，这一划时代的纲领还有许多地方含糊不清。贵族中连最进步的政治家也都是受形势所迫才怀着沉重的心情下决心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

180

为实现进步而斗争的人物并不在贵族政治家的行列之中。只有那些与旧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牵连的人，那些年轻的作家、大学生和刚刚走上生活道路的知识分子，才对通向未来的道路看得最清楚，他们深感封建主义的框框过分狭小。裴多菲、约凯伊和沃什瓦里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他们支持反对党，但又不止一次地对其表示不满并进行严厉的批评。“年轻的匈牙利”——正如敌人和朋友这样称呼他们的——“他们不愿意对祖国只是修修补补，而是要使它全身换上新装。”

除了在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追求世界自由的青年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外，还有第一个代表农民起来说话、引起了全国注意的政治家坦契奇·米哈伊。这个出身于穷困的阿奇泰

塞尔①一个小农户家庭的政治家经历了坎坷不平的生涯。年轻时他曾在地主庄园里当雇工，后因不堪忍受那里的非人生活，愤怒出走，当了一名织布工，后又成了助理教师。二十四岁时，他坐到了中学低年级学生中间——学习。后来，他步行走遍了整个欧洲。此后，他开始写作，由于新闻检查，他的书不能在国内出版，只好把作品送往国外印刷，然后偷偷运入国内。贫困、迫害、监禁都不能使他屈服。他是本阶级的忠实儿子，他说："我是庄稼汉，我是农民的儿子，对此我从不感到羞愧。只有那些不履行对祖国的职责，吮吸我们同胞的血汗无所事事的人才应感到耻辱。"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人民之书》、《人民之声就是上帝之声》中，他为农奴的解放——不需偿付赎金的农奴的解放而斗争。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立场："我们租种的土地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因为是我们在耕种，而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证明财产的所有权"……"当然是耕者有其田。"同时，坦契奇寻求同反对党的领袖们，主要是同科苏特的合作，但他也不反对寻求农奴解放的其他方式。

最后一届等级国会（1847—1848）

政治阵线的分明以及保守党和反对党的建立使1847年的国会选举异常激烈。哪一方都不惜金钱和酒肉。尤其是佩斯州的选举意义重大，因为在这里，科苏特被反对党推选为代表之一。政府千方百计谋求反对党推举别人。但尽管总理大臣，考洛乔的大主教，瓦茨的主教和佩斯州的行政官员倾巢出动都无济于事，科苏特还是成了"首席州"②的一名代表。

① 在科马罗姆州。
② 布达佩斯市在佩斯州，所以佩斯州影响最大。

塞切尼在竞选斗争中也发表了演说。他在题为《政治纲领片断》的竞选文章中激烈地指控科苏特，说他是“行将爆发的革命的罪魁祸首”。塞切尼害怕即将来临的时刻，担心整个民族的安危，因而他希望阻止实现科苏特的愿望。为此，他自己也竞选当州代表，虽然他在所在的州肖普朗州遭到失败，但他还是作为邻近的莫雄州的代表进入了下议院。

国会中双方旗鼓相当。反对党如能维持下议院的微弱多数和脆弱的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总算做到了这一点。科苏特在德阿克不在的情况下当了反对党的领袖，他把火力集中指向引起人们痛恨的行政管理制度上，指向政府专制主义的行径上。奥波尼等虽然答应作某些改革，并让国王用匈牙利语发表讲话（这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以来还是头一回），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第一次投票时他们就遭到失败：下议院谴责了政府。当维也纳正盘算解散国会的时候，他们发现在改革问题上，反对党根本不打算下决心采取最后步骤，而且反对党内部的团结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下议院只派出一个委员会去谈判农奴永世赎身的方法，并满足于接受门户税而不实行普遍征税制。反对党的右翼政治家并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支持科苏特，他们嫉妒他，害怕他的革命精神。倘若革命不在1848年春天横扫欧洲的话，那么1847—1848年的波若尼国会大概不会成为最后一届封建主义的国会了。

七、1848—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

182

三　月　革　命

一场在整个欧洲酝酿着的革命又首先在巴黎爆发。1848 年 2 月 23 日晚上打响了第一枪，第二天，路易·菲力浦即被推翻。法国成立了革命的共和国。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展着。和法国接壤的德意志诸国的学生、郊区工人和对现实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也举行示威游行，惊慌失措的统治阶级只好节节退让。他们免除了专制的部长们的职务，并把宪法交给"心爱的"人民行使，成立立宪政府。

巴黎事件在维也纳引起极大的震动，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革命有朝一日也会触动哈布斯堡王朝。科苏特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巴黎革命的消息只是在 3 月 1 日才传到波若尼，但科苏特在 3 月 3 日就将一份新的、全面的纲领草案提交议会。这份纲领要求制定一个全哈布斯堡帝国的宪法，成立匈牙利民族责任内阁，并要求解放农奴，对被压迫阶级实行根本性的资产阶级改革。当维也纳宫廷正在寻找更加策略、能够拒绝这些建议的办法的时候，突然，出乎他们意料，1848 年 3 月 13 日维也纳也爆发了以学生和郊区工人为主力的革命。经过短时间的巷战以后，起义者夺得了胜利：奥皇被迫免去梅特涅的首相职务，并答应制定宪法。

梅特涅逃往国外，三国神圣同盟也从此彻底解体。

维也纳革命之火也燃烧到了匈牙利。1848年3月14日晚，由维也纳开往佩斯的船带来了维也纳的好消息，裴多菲代表青年们发出了呼声："革命的风暴已经在我们的近邻掀起。我们还犹豫不决吗？不！我们要行动起来……明天就干起来……后天也许已经晚了。"

3月15日早晨，一群热情的青年在裴多菲、沃什瓦里和约凯伊的率领下从比尔瓦克斯咖啡馆出发了。他们的纲领是事先就拟定好的《十二条款》，而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则表达了他们的感情。起先是大学生，接着是佩斯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尤若夫日"前来赶集的农民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越来越壮大的游行群众队 183 伍首先来到座落在今天科苏特大街上的兰德莱尔印刷厂，以"人民的名义"夺得了印刷机，并开始印刷第一份自由的刊物：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十二条款》。

匈牙利民族希望什么？

和平，自由和团结。

1. 要求出版自由，取消书报检查

2. 在布达—佩斯成立责任内阁

3. 每年在佩斯召开议会

4.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建立民族自卫军

6. 在平等代表权的基础上共同负担捐税

7. 废除农奴劳役制

8. 设立有陪审团的审判制度

9. 组织国家银行

10. 军队忠于宪法，不许把匈牙利军队派往国外，撤销外国在匈牙利的驻军

11. 释放政治犯

12. 埃尔代伊归并匈牙利，成立联邦。

"平等，自由，博爱！"

群众大会在博物馆广场举行，这时大约已有一万人聚集在这里。春雨滂沱也没有把群众淋跑。革命之火燃遍佩斯和布达。下午，市政府表示支持革命纲领，接着在市政厅大楼组成公安委员会（又称治安委员会）负责领导革命。当两万多群众高举大旗涌向总督公署[①]大门的时候，这时在布达旧制度最后的维护者——总督公署的官员，正在考虑依靠七千名卫戍部队采取恐怖行动，"是不是需要"把最激进的人物投入监狱。裴多菲在那个幸福日子的夜晚在日记中写道："总督大人吓得面色苍白，颤抖不已。只经过五分钟的协商就全部达成了协议。"军队放下了武器，撤销了书报检查，并释放政治犯。一年前被关进监狱的坦契奇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回到佩斯，当晚在民族戏院演出《班克督军》[②]，以示庆祝。 184

其间从维也纳传来的革命消息在波若尼市瞬息万变的形势中也引起了新的变化。采取拖延策略的贵族院议员，一直还没有对科苏特的"决议"进行讨论，现在在皇城发生的事件影响下见风使舵，起而支持科苏特的纲领草案。议会决定，3月15日派一个高级代表团携带纲领草案前去维也纳。科苏特事后写道，1848年3月15日这一天，在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城里，不是哈布斯堡家族，而是他成了事件的主宰。享受到自由幸福的维也纳人民以无限的热情欢迎他。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第一个在3月3日的草案中提出，同样给奥地利人民以宪法。因此，科苏特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维也纳。

维也纳宫廷面临着艰难窘困的选择：要么让步，要么公开诉

① 1723—1848，1861—67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最高权力机构。

② 描写匈牙利人反对外国统治者的名剧，参见（70）页。

诸武力。哈布斯堡王朝最高决策机关——国务会议，按其意愿是乐于选择后者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既无必要的财源，又无足够的兵力。这时恰好又传来佩斯革命的消息。在这前途未卜、险象环生，哈布斯堡王朝的统一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朝廷让步了，接受了匈牙利议会的要求，并任命鲍詹尼·拉约什伯爵①为首相。

1848年法令的诞生

布达—佩斯到处响彻裴多菲的诗句“起来，匈牙利人”。正当这个时候，在欧洲革命形势影响下，波若尼议会着手制定法律。当时，议会代表们面临的形势是：梅特涅垮台了，在意大利，甚至在普鲁士，革命也取得了胜利。而最触动他们的则是听说佩斯及佩斯近郊人民要行动起来了，甚至还谣传，就在拉科什麦泽②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多热农民起义军。这些消息推动代表们不分昼夜地开会，往往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制定出过去讨论几十年也解决不了的极为复杂的法令条文。

186

3月18日，即在斯提芬宰相③所谓的“第一阵惊恐”中，宣布解放农奴。议会在深夜通过了永远废除劳役制和什一税的法令草案。教会也宣布放弃宗教什一税。根据当时一个目睹者记载，“惊恐万状和慑于革命形势而作出这一决定的主教们看来十分伤心，因为他们因此将失去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当然，对相当多的贵族

---

① 就是原来的匈牙利工业协会会长，参见第（428）页。

② 1510年多热起义时农民集合的地方，在布达佩斯附近。

③ 有别于中世纪的宰相。自从奥地利统治以来宰相实际上是国王的代表。十八世纪末斯提芬是最后一个宰相，

来说，他们也是希望最好能撤销解放农奴的法令的。但是议会暂时还是在科苏特的掌握下，迅速地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有关实行普遍课税，与埃尔代伊联合，出版自由，产生新的代表选举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其他法令。

3月底，维也纳宫廷感到进行第一次反扑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试图用中央集权政府来减弱匈牙利的独立性。奥皇要求匈牙利议会延缓执行解放农奴的法令，并要匈牙利责任内阁放弃最重要的两个部，即财政部和国防部，而由维也纳内阁统一管理。但维也纳宫廷显然是操之过急了，匈牙利议会拒绝奥皇的要求，拒绝放弃责任内阁的实权。消息传来，佩斯人民举行了抗议大会。在炽热的气氛中提出更激进的要求。人们高呼："维也纳欺骗了我们！""我们不要德意志人①的政府！""共和国万岁！"在这些日子里，裴多菲写下了光辉的诗篇《海在咆哮，这是人民的海洋》。

一个永远的真理，
用浪花写在天空：
虽然船在上面，
水在下面，
然而水仍是主人翁！

——（据孙用译）

宰相斯提芬亲王本人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又是奥地利驻匈军队的指挥官。他在给维也纳告急的信中写道："如果在最近几天还不能首先对财政部和国防部方面采取适宜对策的话，我们就将失去匈牙利。"面临强大的反抗，维也纳只得退让。奥皇批准

① 奥地利人也是德意志人。

了组织责任内阁和解放农奴等法令。几天之后，奥皇在弗兰西斯·约瑟夫亲王陪同下亲自前赴波若尼。1848年4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斐迪南五世批准了一切法令，最后一届等级议会宣告结束。

不管从民族独立，还是从社会进步的观点来看，1848年的法令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慑于革命的压力，宫廷和等级议会同意了实现代议制的改革措施。据此将由选举出来的国会来取代旧的等级议会。新的国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人民的基础，即不仅是贵族，而是具有一定财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可参加选举，而且职权范围也要大得多。原来国家政权一部分职能由所谓中枢机关（首相府、总督公署、政事厅）行使，另一部分（如国防、财政 187 和外交）则直接掌握在维也纳宫廷手里。现在，除了外交以外，其它几乎全部转到匈牙利责任内阁手中了。根据法律规定，匈牙利内阁独立于维也纳政府，它只对匈牙利国民代表会议负责。同时，国王① 也必须对国家法律负责，因此，国王的命令只有当有关部长（表面上看是为了承担责任）签署后方能生效。

1848年法令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它宣布解放农奴，也就是废除劳役制（徭役和地租等），把农奴的地块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答应给地主赔偿，但具体解决办法另交国民代表会议讨论。）法令还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上说，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都必须遵守同一法律，不管穷人和富人犯罪都同样受法律制裁。宣布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并宣布特权继承法无效。

当然，1848年法令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是后来证明它致命的一个缺点是没有解决民族问题，没有调整好匈牙利和哈布斯堡

① 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

家族，——准确地说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1848 年法令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宣告几百万农奴的解放，成立了匈牙利责任内阁，废除了几世纪以来的劳役、什一税、玖一税和法律上的不平等状态。1848 年法令在实质上消灭了封建制度，并为匈牙利向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鲍詹尼政府
(1848 年 4 月—9 月)

4 月 14 日，政府决定从波若尼迁都佩斯。在佩斯的轮船码头上聚集了上万的欢迎群众，由这次革命的英雄人物之一沃什瓦里致欢迎词。他在讲话中提到，当年马加什国王是推选产生的，并提请政府注意，这位国王也只有得到人民的推举才能即位。因此今后“在这个城市里，只有代表人民的人才能掌握政权。”

借助三月革命的春风上台的政府成员包括了当时一切知名的受爱戴的政治家。鲍詹尼·拉约什任首相，内务部长是塞美莱·贝尔道隆，司法部长德阿克·费伦茨，宗教和教育部长厄特沃什·尤若夫男爵，农业—工业部长克劳乌札尔·加波尔。除了这些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以外，塞切尼·伊斯特万伯爵被任命为交通部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对未来充满信心，任职数周。兼管外交的国王事务部长由全国最大的地主埃斯代尔哈齐·帕尔公爵担任。经过长时间的物色以后，梅萨洛什·拉扎尔上校当了国防部长。政府中最革命的人物科苏特担任财政部长。(不管是维也纳，还是鲍詹尼本人都不愿意任命他，只是出于人民的压力才不得不这样做。至于为什么任命他为财政部长，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财政部里他“破坏得”可能小一些。)

匈牙利第一任责任内阁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接管政权的。188 没有钱财，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经验，也没有一个能适应新环境的国家政权。国家处于革命的烈火中，世界充满着动荡与不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执行建设新世界的48年法令的。鲍詹尼认为解决的办法在于与维也纳宫廷进行真诚的合作和迫使革命退却。

如果必要，政府会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镇压不满的农民群众，因为他们夺回被地主霸占的牧场，平分可耕地，个别的甚至提出要求土地改革。政府严厉地镇压矿工和反对行会制度的行会青年的示威运动。他们力图把局势控制在三月法令的水平上，坚决阻止革命的继续发展。

政府无力解决民族问题。霍尔瓦特、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少数民族不满足于三月革命的成果。他们要求自己的民族权利，甚至要求不同程度的区域自治。当匈牙利政府把他们的要求，无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统统予以拒绝的时候，他们就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科苏特对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也很不理解，他在三月革命时期曾经对一个塞尔维亚政治家说过：“那么让我们用剑来见分晓吧!”后来这句话变成了悲惨的现实。)48年夏初，在南方爆发了塞尔维亚人起义，而霍尔瓦特的总督叶拉契奇也越来越不加掩饰地进行着准备。

189 随着欧洲革命力量的减弱，鲍詹尼政府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困难了。维也纳宫廷在公开场合下谴责叶拉契奇的桀骜不驯，但暗地里又继续撺掇这个总督，给他钱，给他武器。许多迹象表明，维也纳宫廷企图利用少数民族运动来扼杀匈牙利革命。

就在这样日益困难的处境下，6月初在佩斯召开了第一届国民代表会议。在匈牙利历史上第一次有非贵族出身的人参加选举。当然，代表中除了少数几个农民和平民外，绝大多数是具有中等地产的贵族。政党力量对比在新形势下也有了相应的改变。执政

党取代改良时期的保守党和反对党而占优势。主张激进纲领的被称为左派。国会绝大多数代表是政府的忠实支持者。为数不多的左派中有象坦契奇·米哈伊，派尔采尔·莫尔，马达拉斯·拉斯洛和泰莱基·拉斯洛等优秀人物。

在上述情况下，国会除进行武装保卫国家外别无出路。1848年7月11日科苏特·拉约什代表政府要求募集20万新兵和拨款4200万福林。由于患病而面色发白的科苏特做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演讲：

“先生们！当我走上讲台，号召你们‘拯救我们的祖国’的时候，我胸中充满了不可言喻的高尚之感。我仿佛感到，上帝赐给我一个能唤醒死者的簧箫，如果是有罪的或胆小鬼，那就永远死去吧；如果是有生命力的，那就永远醒来吧！先生们！现在民族在你们手中，上帝今天已经把民族的命运交给了你们。”科苏特在代表们面前把不断出现的危险局面作了生动的描绘，他那超群的口才和庄严的气氛紧紧扣住代表们的心弦。他的政敌尼亚里·帕尔第一个奋然而起，紧接着全体代表都站了起来，热情不断高呼：“我们同意！我们同意！”科苏特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我想要求的，你们已经做到了；我要为我们伟大的民族鞠躬尽瘁！我只能说，当把今天的决议付诸实行时的毅力也能象今天的爱国热情这样高涨的话，那么即使在地狱的门口，匈牙利也是不可被战胜的！”

九月转折。反革命的第一次武装进攻

夏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匈牙利民族面临严重的抉择。反革命势力早在1848年夏天就开始反攻。卡芬雅克将军在6月份用武

190 力镇压了巴黎工人起义；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军队扼杀了布拉格起义；8月中旬，拉德茨基元帅占领了米兰市。反革命力量的普遍得势，特别是意大利、奥地利和捷克革命遭到镇压和失利以后，使哈布斯堡已有可能集中全力对付匈牙利革命。其借口仍然是要匈牙利交出独立的财权、军权以及放弃讨伐塞尔维亚—霍尔瓦特叛变的自卫权力。

鲍詹尼和德阿克主张甚至作重大让步也要避免公开冲突。8月底，他们奔赴维也纳，但是根本没有受到接见；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维也纳宫廷要进攻，而无意谈判。他们准备利用叶拉契奇来进攻匈牙利。1848年3月，这个负债累累的男爵、边防军上校在维也纳宫廷中最反动的集团支持下被任命为总督。叶拉契奇从受命的第一天起就拒绝服从匈牙利政府。早在夏天，他就把霍尔瓦特的大量军队调往德拉瓦河附近。6月份还受到奥皇表面谴责的叶拉契奇，9月初就因为其效劳而受到奥皇的公开奖赏了。奥皇命令他："要为整个王朝效忠"。——维也纳已放手使用叶拉契奇了。

科苏特清醒地看到：已经不能按照常规的政治步骤办事了，革命的成果只有用革命的行动才能维护。科苏特没有迟疑。佩斯人民全力支持他，国会也和他站在一起。这个匈牙利的革命领袖看到维也纳宫廷已经公开地进行敌对行动，于是募集新兵，并且开始印刷面值五福林的货币。

这一切都是在仓忙中进行的。9月11日，在叶拉契奇的带领下总共四万人越过德拉瓦河。与之相对垒的匈牙利军队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而且它的指挥官都不愿意打仗。不管是泰莱基·阿达姆伯爵，还是他的接替人都拒绝抵抗，一味退却。叶拉契奇的军队沿着巴拉顿湖向首都推进，并取得节节胜利，他们颇为自信地扬言，10月1日他们就可以在佩斯接到家信了。

形势确实是岌岌可危。鲍詹尼政府辞职了，他曾试图组织一个新的、比前一届大大右倾而热心于搞妥协的右翼政府，但由于得不到维也纳宫廷的首肯而告吹。塞切尼因受到痛苦的精神折磨而神经失常，企图自杀。德阿克和克劳乌扎尔引退，厄特沃什则避居国外。他们和大家一样，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变得畏缩不前，踌躇不决。许多达官显贵，名宦巨商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也纷纷逃往国外。

在政府辞职和宰相斯提芬亲王逃往维也纳以后，就由国会选出来的国防委员会行使职权。国防委员会（OHB）是一个革命政府，它不是由国王，而是由国民代表会议任命的，它没有拘泥于固有法律，而是依据实际的需要来行使职权。科苏特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灵魂，他以非凡的能力组织反抗。在他的号召下，首都人民准备保卫祖国，在奥皇军队中服役的匈牙利士兵撕下黄黑绶带，换上了红色的标志，决心当国防军为祖国而战。科苏特向驻扎在国外的士兵发出号召："祖国处在生死存亡之秋。有良心的匈牙利人，快快回国！"然后科苏特开始前往奥尔弗尔德大平原①募兵。他到了采格莱德，凯奇凯梅特和塞格德，在他热情的演说感召下，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国防军。无怪他在塞格德充满信心地说道："我相信人民是如此强大，如果他们振臂而起，团结一致，就是天塌下来也能用自己有力的双手把它支撑起来。"

1848年9月，匈牙利民族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反抗。马克思（应为恩格斯——译者）在《新莱茵报》上这样写道："长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民族人民接受敌人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②和卡诺③（或者

---

① 指今匈牙利东部大平原地区。

② 若尔日·雅克·丹东：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③ 尼古拉·拉查尔·卡诺：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

说一个热情的政治家和军事组织家的形象。”①

对叶拉契奇作战的胜利和维也纳十月革命

当拒绝抵抗的叛变将领为叶拉契奇敞开道路的时候，多瑙河西部的农民却手持镰刀和锄头奋起同烧杀抢掠的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尽管不能进击密集的大部队，但小股侵略军和掉队者却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起义农民捕抓叶拉契奇的邮差，向军营射击，并不断干扰敌方的后勤供应。

反革命的第一次进攻到9月底达到最高峰。叶拉契奇的军队占领了塞凯什白堡，维也纳宫廷新任命的全匈牙利军队总司令、伯爵拉姆贝格中将微行到达首都，试图进行旨在扼杀革命的谈判，但示威的群众28日在桥头认出了他，把他从马车里拉出来，当场处死。第二天叶拉契奇闻讯十分沮丧。

192 9月29日，叶拉契奇的军队在韦伦采湖附近，帕科兹德和舒科罗之间与数量上得到补充、革命士气大大增强的匈牙利军队会战，被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匈军击败。叶拉契奇，这个几天前连和亲王宰相谈判都不愿意的人，现在居然请求停战三天。根据协议精神，谈判期间双方军队应驻原地不动，但是这个丧魂落魄的总督却在夜幕掩盖之下集中军队，从侧面经过莫尔和吉尔撤出了国境。疲乏而沮丧的士兵慑于匈军威力，兼程逃窜。

在非正规部队卓著成效的配合下，国防军把叶拉契奇的军队全部赶出了国境。特别是托尔纳州的欧佐劳地区一战更为辉煌。

---

① 《匈牙利的斗争》，《马恩全集》第六卷，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在这里，托尔纳州的国民自卫队包围了叶拉契奇侧翼的一万名军队，然后国防军在派尔采尔·莫尔和戈尔盖·阿尔吐尔的指挥下加强了攻势，迫使罗特将军不得不无条件投降。

维也纳布尔格的朝廷得知叶拉契奇惨败的消息后，十分惊慌，他们急忙采取新的措施来镇压匈牙利人民的自由斗争。国防大臣拉多尔伯爵着手制定向匈牙利进行全面反扑的计划。匈牙利战胜叶拉契奇对维也纳人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知道，这是和自己命运攸关的一件大事。10月4日的一份革命报刊这样写道："维也纳！关心和站在匈牙利一边吧：假如他们胜利了，这也是你们的胜利；如果匈牙利失败了，那也将是你们的末日。"事实上革命 193 的维也纳确实没有袖手旁观。10月6日，匆忙驰援叶拉契奇的奥皇军队的一个师哗变，并且和维也纳人民一起把忠于奥皇的军队赶出城市。他们包围了国防部，在一个烟筒里把浑身发抖的拉多尔拖出来，愤怒的人民把他吊死在路灯杆上。维也纳宫廷只得仓惶放弃首都而逃往摩拉维亚的奥尔木茨。在维也纳，革命再次胜利了。

现在是把奥匈两国革命联合在一起的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然而追击叶拉契奇的匈军却在边境停了下来。匈牙利的政治家们在这时犹豫不决，裹足不前，他们不愿意超越"法制"的规范，而在等待维也纳议会的态度。这期间维也纳周围已被八万奥皇军队层层包围。但等科苏特到达，匈军最后决定发起进攻时已为时过晚了。10月30日，在什维哈特附近，匈军被数倍于己的敌方优势兵力所击败。第二天，维也纳最后一块街垒阵地也落到了文迪施格雷茨手中。

反革命的第二次进攻

正如恩格斯所说，"维也纳是匈牙利独立的桥头堡，维也纳陷落以后，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奥皇军队对匈牙利的进攻。"奥皇军队卷土重来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而且这次已经不是由霍尔瓦特的总督，而是由奥军元帅文迪施格雷茨亲自率领了。

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着手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建设军队。全国各地都在招募新兵。学生纷纷入伍，大学几乎空旷无人，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拿起了武器。当然国防军的基本力量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正在形成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多在技术部队中服务。有许多是从国外来参加战斗的，他们中有不少是在国外服役的匈牙利士兵以及国际战士，在这里，他们同时也是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投入这场斗争数量最多的是波兰人；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也为数不少；另外还有德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建成了一支革命军队。9月中旬还只有14个营的国防军，到12月中旬就发展到64个营。

卫国战争的准备工作是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哈布斯堡王朝完全把匈牙利孤立起来了。当时，匈牙利几乎没有工业，就是用黄金也买不到武器。边境地区到处战火纷飞，在南方地区要和塞尔维亚起义者、在埃尔代伊则要和罗马尼亚边防军、在摩拉瓦河和发格河之间地区要和斯洛伐克起义者进行流血的、痛苦的斗争。受维也纳宫廷挑唆的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反对匈牙利的自由斗争。但问题还不止如此，就连匈牙利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在国会内形成了一个求和派别，谋求和哈布斯堡建立"体面"妥协的可能性。叛徒和

谣言的传播者也大有人在。特别是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如在 194
教会的上层分子，贵族，旧官吏和旧军官中间——用裴多菲的话说——更是内奸成群。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文迪施格雷茨的进攻。

科苏特以为，对方大规模的进攻春天才会开始，但哈布斯堡却急于要赶快消灭匈牙利革命。他们重新组织和部署军事力量。同时，维也纳小内阁鉴于在革命的那些日子里斐迪南五世过于软弱无能，便强迫他逊位。1848年12月2日另立18岁的弗兰西斯·约瑟夫代替不管在体力上和精力上都软弱得多的斐迪南五世。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上台就立即发布向匈牙利进攻的命令。12月13日，在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率领下共有五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奥地利军队从莱塔河① 附近发起进攻。

军事力量的对比对匈牙利是很不利的。和文迪施格雷茨相对峙的是大约只有2万5千人组成的被称为"上多瑙河部队"的匈军，而且大部分是新兵。司令是戈尔盖·阿尔吐尔将军。他是自由斗争中经常提到的，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戈尔盖1818年出生在一个早年富裕、继而没落的中等贵族家庭。他本想当军官，因未能在哈布斯堡军队中崭露头角，颇感失意，于是在当上尉官后不久便退伍了。后来他一面代替亲戚管理土地，一面攻读化学，准备在佩斯大学里任教。自由斗争一开始他便入伍作战，并且很快就显示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欧佐劳战役中功勋卓著；在担任切佩尔岛军事指挥官时，逮捕了散发叶拉契奇宣传品的齐奇·厄顿伯爵，并由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以绞刑，从而得到科苏特的器重，被调到主力部队。什维哈特战役 195
以后成了国防军中最重要和职位最高的指挥官之一。这位当年奥皇军队的上尉年仅30岁时就一跃成为将军。

① 多瑙河支流，一度为奥匈边界河。

但不久戈尔盖就和科苏特发生了分歧。在文迪施格雷茨进攻的时候，戈尔盖只想保持自己的实力，不做任何抵抗，节节退让。仅仅两个星期，奥皇军队就已经开始向首都进逼了。这时派尔采尔·莫尔把他在特拉瓦河流域的部队调往戈尔盖一边，以便共同抵抗奥军，但是在莫尔附近遭到重挫，致使多瑙河以西地区失陷，首都受到严重威胁。革命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这年年底，国会要就生死存亡的问题作出决定。在国会的秘密会议上，求和派实际上主张投降。但当举行公开会议之际，佩斯人民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拥入议会旁听席，留在外面的人则爬在窗口上高喊科苏特的名字，以表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把国会、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迁到德布勒森，以便继续抵抗。科苏特当时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我们为民族的利益而工作。"

1848—1849 年冬天。重大的困难，激励人心的胜利

尽管国会作出了决议，自由斗争依然困难重重，在执行决议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撤出佩斯的工作在严寒中进行。佩斯至索尔诺克的铁路运载量很有限。首尾相连、络绎不绝的马车队在公路上驮着政府机关的文件和军工厂的器材缓缓而行。国会代表零零散散地来到德布勒森。还有一些代表根本就不去了。德阿克回到自己的庄园，众议院议长帕兹曼迪则投降了敌人。在佩斯，"皇帝的代表"文迪施格雷茨成了主人。很多人群起投降，不少贵族接受了皇帝的任命。早在 1 月初，匈牙利以埃斯泰尔戈姆的红衣主教为首的主教团就保证无条件忠于弗兰西斯·约瑟夫皇

帝。在他们的布道词中号召教徒们效忠皇帝，因为“合法的政权只有皇帝才能享有；只有皇帝的政权才配享受教会的祝福。”

维也纳宫廷这时对自己的胜利已深信不疑。文迪施格雷茨对匈牙利国会派来的代表根本不予理睬。他把他们看做只是代表个人，简短地宣布，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无条件投降。但是这个公爵和他的主子一样失算了。科苏特在自由斗争的新首府成功地加强了政权。在801个贵族院议员中，直到三月份只有28人到达，但另一方面，众议院早在1月中旬就恢复了工作，而国防委员会依靠蒂萨河以东各州人民的支持已经着手做反攻的准备了。在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后，战场上很快又重新迸发出希望的火光。首先是从埃尔代伊，从贝姆将军那儿传来了胜利的消息。

贝姆·尤若夫，士兵们亲热地称他为“贝姆老爹”，原来是波兰军官。早在1830—1831年的波兰自由斗争中就已崭露头角。自由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法国，但1848年又重新回到军队作战。他是维也纳革命的军事组织者和英雄之一。在最后一块街垒阵地失陷以后，他逃到波若尼，并参加到匈牙利革命行列之中。科苏特任命他为从埃尔代伊撤退出来的埃尔代伊军司令。 196

贝姆接受的是一支衣衫褴褛、士气沮丧、从军事观点上来看已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当在埃尔代伊的奥军司令普赫内尔将军已经威胁着纳吉瓦劳德的时候，这个矮矮个子、五十四岁的将军以非凡的毅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运用巧妙的战术，在1848年12月中旬发起突然袭击。这一惊人的、闪电般的进击取得了胜利。贝姆在圣诞节的时候已经攻陷科罗日瓦尔，并以出奇不意的行动解放了埃尔代伊北部和塞凯伊费尔德地区。在那里，当时只有以著名的铸炮能手加博尔·阿隆为首的一批哈罗姆塞基的塞凯伊人抵抗着奥军。1月和2月也是在艰难的、但却是胜利的战斗中渡

过的。开始，在攻打奥军的巢穴——纳吉塞本①时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击退。在维扎克纳地区双方相持了四天，但是在毛罗什河的比什克桥头贝姆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并且巧妙地利用了普赫内尔的困难，于3月初占领纳吉塞本。失去重要阵地的奥皇统帅这时不得不带领军队逃窜到当时被沙皇军队占领的罗马尼亚大公国避难。

军事上经常采取主动，急行军，在近战中集中使用火力，指挥员的果断和勇敢，对少数民族的体谅，这些就是贝姆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无怪士兵们都爱戴他，在他的部队中战斗的裴多菲也和他有着亲密的友谊。裴多菲曾这样写道：

我们如何能不胜利，
因为贝姆是我们的统帅，
他是自由斗争的老英雄！

和贝姆赢得胜利的同时，匈牙利自由斗争的形势在其他战场上也得到了巩固。最大的战役发生在北部高地。佩斯——布达失陷以后，戈尔盖把军队调往北方。他在瓦茨发表声明，尖锐地批评科苏特，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完全脱离德布勒森政府的管辖，但他始终没有接受哈布斯堡的引诱进行公开叛变。

戈尔盖在瓦茨声明以后便带领军队向矿区②转移。他们从这些地方撤出时，把库存的金银也带走了。他们在艰难崎岖的山路上行军，有时大雪没到膝盖。但在戈尔盖的带领下军队不断壮大，因为行进中还招募了不少斯洛伐克人参加军队，同时连续的战斗也锻炼了军队。行军的后期他把"上多瑙河部队"分成两部分，分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锡皮乌。
② 参见第（81）页。

别通过加拉姆河①上游和瓦格河谷，准备与友军会师，但赢得重新会师的机会应归功于革命者古戎将军②的部队。在古戎将军的指挥下，经过八小时的激战，革命军于1849年2月5日占领了布朗尼斯科隘口．从而打通了和克劳普卡部队会师的道路。

2月中旬，科苏特已经准备反攻。除了戈尔盖和克劳普卡的军队以外，南方的多米扬尼奇③的师团也已整装待发。但科苏特不敢把这支业已相当强大的军队交给戈尔盖指挥，便任命波兰将军德姆比尼斯基为总司令。但德姆比尼斯基不熟悉匈牙利的情况，因此没有得到匈牙利军官，特别是深感受辱的戈尔盖的充分支持。这也就是国防军2月底在卡波尔纳发动第一次进攻失利的原因之一。但是文迪施格雷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胜利。他对在奥尔木茨的主子报告说："我打退了暴动者，把他们大部分消灭了。我希望几天之内将占领德布勒森，并且把叛乱者的老巢置于我的控制之下。"宫廷也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以为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帝国"的时机已经到来，那时匈牙利将仅仅是奥地利的一个行省。

197

春季进军和独立宣言

卡波尔纳战役失败还不到一个月，戈尔盖，克劳普卡，奥乌利奇和多米扬尼奇带领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大约五万人的军队在蒂萨河附近发起新的反攻。这时科苏特不得不重新任命戈尔盖为总司令。

---

① 即赫龙河。

② 英国人，1848年夏参加自由斗争。

③ 塞尔维亚人。

有一个军沿着豪特冯—佩斯的公路线发起进攻，而另外三个军则向敌人背后迂回。但是这一作战计划却在豪特冯（4月2日）和塔比欧比奇凯(4月4日）两个战役中暴露了。敌人发现了匈军正在对他们包围，因此在伊绍塞克附近（4月6日）尽管以重大的代价，但还是突围了。

198

反攻的第二阶段是匈国防军准备解放包围已久的科马罗姆。出其不意的进击使敌人慌乱不堪。奥军原以为匈军会向佩斯方向发起进攻，只是在经过瓦茨浴血巷战（4月10日）和纳吉绍罗的对垒战（4月19日）中遭到新的失败以后才开始意识到匈军的作战意图。因希望落空而大为沮丧的哈布斯堡撤了文迪施格雷茨的职务，新任总司令急忙把主力部队调回，并在维也纳城下构筑工事。当4月24日戈尔盖光复了科马罗姆，并且越过多瑙河时，敌人再一次从他手下溜掉了。

一系列光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匈牙利国防军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敌人从蒂萨河畔击退到科马罗姆。革命士兵的觉悟和司令官的英勇善战使战争赢得了引人震惊的胜利。战斗中多米扬尼奇的“红帽军”高呼着“刺刀对准敌人，向前！”的口号冲在最前头。匈牙利是当时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国家。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写道：“我一听到匈牙利这个名称，就觉得我的德国内衣太小，它下边好象一片大海在沸腾，好象有喇叭的声音向我号召。”（据冯至译）

和春季攻势取得胜利的同时，国会也做出决定性步骤。作为对取消匈牙利独立的所谓“奥尔木茨宪法”的回答，国会宣布废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4月14日，在挤满了群众的德布勒森大教堂内，科苏特宣读了《独立宣言》。他宣布匈牙利是一个“自由、自主和独立的欧洲国家”，他还以民族的名义宣布，鉴于哈布斯堡家族在“灾难不断的三个世纪中”所犯下的罪行（背信弃义，践踏民

族权利和独立），因此，“立即废除其王位，驱逐出匈牙利并加以流放”。《独立宣言》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后，科苏特被推选为国家元首。

革命的匈牙利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达数周之久，当5月21日，经过三周的围攻以后终于光复了布达时，人们更加兴高采烈。布达的奥军指挥官亨奇将军不惜以野蛮手段毁坏佩斯（被毁的建筑物中包括今日业已重建的、古典主义风格的维高多厅），行将完工的链子桥仅仅出于偶然而幸免于难。（炸药炸死了前去执行炸桥任务的奥军上校。）

自由斗争的失败

在巨大胜利的背后，早在欢乐的那些日子里潜伏着的内外危机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哈布斯堡家族固然受到了匈牙利民族的遣责，但《独立宣言》由于它所宣布的独立并没有真正的军事上的和政治上的保证，因此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国会中占少数、但有影响的主和派不管是公开还是暗地都反对独立宣言。当然，真正的危险还在于戈尔盖也同意他们的立场。随着春季攻势取得胜利，戈尔盖的威望也大大提高了，于是他打算以获胜的军事统帅的资格单独和哈布斯堡谈判。春季攻势取得巨大胜利以后，他热衷于搞政治交易，4月底贻误了追击敌人和包围维也纳的大好时机。只是到了5月底才开始把革命军队调往瓦格河岸，但这时，缺乏指挥和分散的军队连连遭到失败。

独立宣言发表后取代国防委员会而成立的塞美利政府（其中由鲍詹尼·卡斯米尔任外交部长，杜切克·费伦茨任财政部长，乌科维奇·塞波任司法部长，恰尼·拉斯洛任交通部长，著名的

历史学家霍尔瓦特·米哈伊为文化部长）在口头上宣扬“革命，共和，民主”，但在行动上却大相径庭。他们设法排挤国家元首科苏特，并取消了那些最革命的措施。他们解散处置叛徒的革命特别法庭，排挤了警察系统的左派领导人，实际上政府的安全机构都取消了。塞美利政府的这些做法，似乎自由斗争已经大功告成。而特别有害的则是政府和国会对农民的政策。1848 年 9 月，当叶拉契奇的军队越过国境的时候，国会曾经放宽了对农民的政策。但是到了 1849 年春天，本来应该以更大的努力来争取农民的时候，在贵族阶层里却出现了这样的舆论，说什么：“有产阶级由于过分优待农民已经受够罪了。”可以想象，当村、镇官府制度重新复活的时候，在昨天的农奴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但最大的和最严重的危险却是来自外部的敌人。当匈牙利的春季进军取得一系列胜利以后，哈布斯堡王朝看到，它已无力来单独镇压匈牙利革命了，于是便接受了早就毛遂自荐的俄国沙皇的援助。尼古拉一世，这个“欧洲宪兵”，1849 年 6 月以二十万大军 201 通过杜克洛隘口和埃尔代伊诸通道发起进攻。俄——奥联军的力量两倍于大部分由新兵组成、而且装备低劣的匈牙利国防军（三十七万比十七万）。

自由斗争这场悲剧性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全国到处响彻着风暴来临的警钟，号召城乡人民起来作最后的斗争，并向欧洲各国发出呼吁：“在匈牙利的土地上自由正在和奴役进行战斗……在匈牙利的战场上决定着欧洲自由的存亡！”但在 1849 年夏天，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都先后被镇压下去了，欧洲各国政府都反对匈牙利革命。他们的看法概括地表现在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向俄国大使的讲话中。他说：“解决得越快越好！”

科苏特知道，必须尽一切努力集中兵力，并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抵抗，才是出路。“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尽快联合起来，祖国

尚可挽救，否则，就没有希望。"他试图把军队集中在政府的最后一个所在地奥劳德周围，并从那里支援罗马尼亚。但这最后一个尝试已无济于事了。联合少数民族的努力为时已晚，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外部优势敌军的进逼而引起的沮丧情绪已无法动员人民进行有力的斗争。军队的集中也由于戈尔盖反对科苏特而未能实现。戈尔盖只是在7月中旬才把大部分匈牙利军队调离科马罗姆，202 进度缓慢，而且还力图和正在后面追击的俄国军队进行勾搭。当军队到达奥劳德时，贝姆的部队已经在谢盖什瓦尔[①]被击败，裴多菲也在那次战役中阵亡。几天以后，在泰迈什瓦尔战役中大部分国防军解体了。

在这严重的历史时刻，戈尔盖，这支硕果仅存军队的指挥官，成了关键人物。戈尔盖要求赋予他全权代表的资格。他声称，只有作为全权总司令，才有可能通过俄国进行谈判。于是，8月11日，科苏特和塞美利政府一起辞职。此时自由斗争的失败已成定局，但如果在当时能采用军事上的手段和谈判相配合，也许争取得到较大范围的大赦，但戈尔盖没有这样做。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向俄国军队总司令巴斯克维奇公爵无条件投降。(这极大地伤害了既虚荣又残暴的奥地利总司令海瑙。) 8月13日，在维拉戈什战场上，在沙俄军队的包围下，终于演出了这一场悲剧。匈牙利革命在国际反动力量联合进攻下，同时也由于内部力量的软弱，被镇压下去了。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点"火星"也熄灭了。

① 今属罗马尼亚。

203

八、专制政体和妥协

海瑙军事统治

"匈牙利已经拜倒在您的脚下"——这是沙俄军队总司令巴斯克维奇公爵在维拉戈什接受匈军投降那天向他的主子尼古拉一世所写的报告中的一句话。匈牙利军队的精华，共三万国防军放下了武器。科苏特，塞美利和贝姆等自由斗争的领导人越过南方边境线逃亡到邻国土耳其去了。其他一些人，或寄希望于敌人的宽恕，或不愿离开祖国，而投降了敌人。

从维拉戈什投降以后，匈牙利革命就悲剧性地结束了。9月底，自由斗争最坚强的堡垒科马罗姆宣布投降。革命人民在原来以为是坚不可摧的城堡失陷以后，痛苦地感到，匈牙利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武装，只有听任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人——海瑙的摆布了。

海瑙将军早在意大利的时候就臭名昭著。他在小小的布雷西亚城用极其野蛮和残暴的手段镇压了革命，因而得到"布雷西亚豺狼"的外号。弗兰西斯·约瑟夫没有理会沙皇要他对匈牙利有所宽容的呼吁，还是授海瑙以全权，派往匈牙利掌握生杀予夺大权。这个匈牙利的"刽子手"自己供认："我是爱秩序的人，杀人对我来说不受良心责备，因为我坚信这是防止今后一切革命发生的唯一手段。"

海瑙军事恐怖专制一直延续到1850年夏天，它给匈牙利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上台伊始，也就是1849年10月6日——拉多尔[①]被绞死一周年——在奥劳德有十三位国防军的将军被绞死或枪杀，他们是：奥乌利奇·拉约什，多米扬尼奇·亚诺什，德热菲·奥利斯蒂德，基什·埃尔诺，克内齐奇·卡罗伊，劳内尔·久尔吉，拉扎尔·维尔莫什，莱宁盖—韦斯特堡·卡罗伊，纳吉—山多尔·尤若夫，珀尔腾堡·埃尔诺，什维代尔·尤若夫，特勒克·伊格纳茨，维切伊·卡罗伊。同一天，他们还在佩斯新大楼的兵营（即今电视大楼所在地）里枪杀了第一任总理鲍詹尼·拉约什，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自由斗争的其他几个领导人。逃往国外的领导人也被缺席判处死刑：把他们的名字挂在绞刑架上。另外，还有上千的爱国者被判重刑，投入监狱。有四万名国防军战士送到奥地利军队中当兵作为惩罚。此时，匈牙利到处是外国军队和告密者，爱国者隐名埋姓，四处藏匿。可怕的寂静一时宠罩着这个失去了自由的国家。韦勒什毛尔蒂[②]在描写当时这种可怕情景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204

“这里正是严寒的冬天，
到处是沉默，
大雪和死亡。”

巴哈政权

1849年底，维也纳宫廷妄图借助刺刀的威力来重新建立一个

① 特奥托尔·拉多尔，奥皇政府国防部长，1848年10月6日被维也纳起义群众吊死。

② 匈牙利十九世纪著名诗人。

统一的帝国。这一计划是根据亚历山大·巴哈的设想制定的，这个政权也因此而得名。当时一个历史学家诙谐地总结道：这个体制有四根支柱：站着的军队，坐着的官吏，跪着的神甫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1850年，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海瑙下台，取消军事独裁专制，取而代之的是巴哈政权。

巴哈致力于把匈牙利建成为最能适应“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帝国的形式。他取消州的建制，把全国划分为若干总督区。虽然哈布斯堡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士兵，但以在伦巴底和匈牙利驻军最多。抄家、没收财产几乎是家常便饭，戴着铜帽子的宪兵到处搜捕爱国者，每捕获一名，便可得奖。德意志和捷克的官吏在刺刀保护下横行霸道，被人们讥笑为“巴哈骠骑兵”。维也纳宫廷把一度对少数民族所作的诺言也置之脑后，匈牙利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样遭殃。匈牙利的一个政治家有一个恰到好处的评语：少数民族得到的奖赏和匈牙利人得到的惩罚一样。在整个帝国推行的巴哈体制无视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现实，他们妄图把民族问题抛弃不管。

巴哈政权把天主教会看作精神支柱。因此，他们和教皇签订了新的协定。协议除加强中世纪的特权以外，还规定对教育实行全面监督，保证宗教对一些国家事务的干予。维也纳宫廷在匈牙利也主要指望主教团的支持。除此之外，一部分大贵族也支持巴哈政权，富裕的中等贵族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中，巴哈体制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彻头彻尾的反动。1848年法令中有关匈牙利独立的条款虽然被废除了，但是革命所取得的基本成果不可能完全取消。比如废除农奴制和普遍纳税诸项，巴哈政权也不得不付诸实施。根据1853年所颁发的所谓地租法，对农奴的土地进行估价，确定免交赎金的数字，并规定逐步向地主支付赎金。

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传统关税边界废除以后，对于匈牙利的农业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共同的关税领域和日益扩大的市场促使粮食生产不断增长。当然发展最快的还是大庄园，因为在殃及整个匈牙利农业的资本缺乏问题中，相对说来它们所受威胁最小。大地主采用机械化（铁犁、播种机、打谷机）、兴建农用建筑和发展畜牧业来组织资本主义农业大企业（然而劳动力的保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封建方式的，雇用雇农，土地仍按轮作制耕种）。那些还没有摆脱旧债务的中、小地主自然不能按时代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地产。农民的经营方式自然更为落后。十九世纪下半叶，农村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来耕种土地。

工业领域的发展所受到的限制更大，因为共同的关税领域对落后的匈牙利工业是不利的。只有农产品加工业和铁路建筑业有较大的发展。面粉工业兴旺起来了，新建了一批制糖厂和酿酒厂，1848年，铁路线为一百七十八公里，到1867年就增长到二千一百六十公里。

有限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用巨大的代价换取的。巴哈政权把庞大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光是回收科苏特钞票一项就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由于垄断组织的形成（首先是烟草工业）和大量增加纳税额，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1848年的课税相比，五十年代末税务总额增长了九倍。 206

巴哈政权的垮台

巴哈政权在国内是没有多大基础的。就连无限矢忠奥皇的、坚持保守立场的大地主贵族的大部分也不欢迎，具体说来，他们所要求的是对1847年制度做某些修改这样一个政策。他们曾就

此上书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富裕的中等贵族则追随德阿克·费伦茨。德阿克退隐到佐洛州的庄园中，尽管当局多次邀请，但一直不参予政事。他的追随者也都这样做：不在机关供职，极力欺骗外国当局，并等待政治局势好转。（他们把这一行动称为"消极抵抗"。）

在促使匈牙利民族保持抵抗精神方面，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起了杰出的作用。诗人奥劳尼·亚诺什以他感人的诗篇唤醒人们对裴多菲和1848年革命的怀念，他歌颂了与英国侵略者作斗争的威尔士诗人。沃伊达·亚诺什写了小说《等待黎明的人》，马达拉斯·维克托尔和塞凯伊·贝尔道朗则把匈牙利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的业绩再现在画布上。

巴哈统治时期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武装反抗。首先是当年科马罗姆炮兵指挥官马克·尤若夫领导的起义。后来，一个叫利伯尼的裁缝学徒工曾对奥皇行刺，但皇帝仅仅受了点轻伤。这以后警察局还得到有人组织起义的消息，于是逮捕了很多人，其中有匈牙利妇女运动的先驱者科苏特·茹饶，勒韦伊·克拉劳和泰莱基·布朗卡。

以科苏特为首，流亡在国外的人也组织了斗争。自由斗争失败以后，科苏特及其战友逃往土耳其。开始，奥地利和沙俄政府都极力要求把他引渡回匈牙利，只是因为英国政府害怕俄奥力量继续加强，从中干预才没有得逞。经过几年的软禁以后，科苏特才得以前往美国，后又到了英国。各国当局在他逗留期间总是持谨慎态度，而人民则把他看作是自由的象征而给予热情欢迎。他以雄辩的演讲为匈牙利争取了很多朋友。与此同时，他没有放弃外交斗争。他和反哈布斯堡的法国和普鲁士建立了联系。因为他预见到第一个冲突将在意大利发生，于是他自己也迁到小小的、但独立的皮埃蒙特（即撒丁王国）的首府都灵定居。

由于内部的反对，特别是外交上的失败，1859年巴哈政权终于垮台了。日益增长的各民族力量摧毁了巴哈十年的经营。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爆发是它失败的前因之一。在这次战 207 争中，奥地利由于两面派的政策造成了沙俄和它疏远，但却又没有物色到另外的强大伙伴。巴哈政权花费了巨大的经费来维持军队和庞大的行政机构，远远超过它财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但是尽管如此，在国际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就暴露了奥地利军事力量的薄弱和外交政策的孤立。1859年爆发了奥地利和受到法国支持的意大利之间的战争。领导不力的奥军在肖尔费里诺附近遭到惨败。奥地利被迫放弃伦巴底，同时也失去了在意大利中部的势力范围。军事上的失败伴随着经济上的困难。帝国国债以灾难性的速度增长，收支失去平衡，国家濒临崩溃。巴哈政权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巴哈本人也于1859年夏天被撤职。

对于这些事件，匈牙利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以推广匈牙利文字和服装的形式酝酿着反抗了。1859年，正值匈牙利文字改革大师考津奇·费伦茨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组织了具有政治性质的庆祝活动，民族反抗更加强烈了。奥意战争期间，匈牙利全国到处歌颂科苏特和意大利自由斗争的英雄加里波第。维也纳害怕再爆发一次新的起义。尽管奥意很快签订了和约，奥地利并改组了政府，但骚动并没有平静下来。1860年3月15日，佩斯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警察用武力镇压，一名法学院大学生被打死。接着塞切尼悲剧性的死亡更激起群众的激情。

塞切尼从1848年秋天起就住在维也纳的德布林精神病治疗 208 所，五十年代末恢复正常，便开始工作。他以辛辣的讽刺文章揭露了巴哈体制的矛盾和弱点。警察当局查明了这个在国外发表匿名文章的作者是谁，于是对这位年已七旬的政治家无理寻衅，甚

至进行侮辱性的抄家。警察部长还公开威胁说："疯人院已不能再成为阁下的避难所"。同时，由于担心新的反对哈布斯堡的自由斗争再度兴起，塞切尼便在1860年4月8日凌晨自杀了。噩耗传来，城乡震惊，举国哀悼。奥劳尼·亚诺什的诗篇表达了人民对他永恒的爱戴：

谁和百万人民紧相连，
谁就不会死去，
他巨大的精神财富将永世长存。

第一次妥协尝试的失败

一连串严重的失败和日益加剧的困难使维也纳清楚地看到，巴哈体制和死板的中央集权制统治已彻底被历史抛弃了。必须尽快地另寻出路，以挽回当前的政治局势。弗兰西斯·约瑟夫听取了保守的大贵族的劝告，于1860年秋郑重地宣布放弃独裁，放弃公开的专制制度。但他仍尽力保持帝国的统一。于是颁布了宪法(即所谓的"十月敕书")，但他对于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包括匈牙利在内，只答应在将来给予一定的自治权，至于那些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则继续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根据他的设想成立的有三百四十三名代表的"帝国议会"中，匈牙利只占八十五名，埃尔代伊占二十六名。弗兰西斯·约瑟夫为了使这个"强制的宪法"，即"不容更改的基本法"能够通过，重新恢复了1848年以前的中枢机关(总理府，总督公署和枢密院)以及各州的自治政府。

可是弗兰西斯·约瑟夫和他的谋士们失算了。在匈牙利没有多少人对"十月敕书"所作的让步感到满意。许多地方把正在国外

流亡的科苏特和克劳普卡等选进州委员会，而要追究那些在巴哈政权中任过职的人。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绪。

1861年的国会——正是弗兰西斯·约瑟夫为了通过新宪法而召开的——采取了反对朝廷的立场。国会代表一致认为，应该坚持斐迪南五世1848年签署的宪法。但是在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上，国会代表中产生了意见分歧，并因此分裂为两个党（这两个党的影响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地起着作用，所以这里有必要较多地谈一下）。

上书党，以德阿克·费伦茨为首，它得到主要是由多瑙河西部地区的地主所支持，这一派人承认弗兰西斯·约瑟夫是匈牙利真正的国王，主张用给宫廷上书的办法申述自己的意见。决议党，它的成员大部分是蒂萨河东岸的中等地主，他们不承认未经国会批准就登基的弗兰西斯·约瑟夫为国王，因此，他们主张用向世界舆论发表决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纲领。这一派的首领是从国外流亡回国的泰莱基·拉斯洛。这两个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多数人倾向于泰莱基的党。当斗争达到顶点，在选举前夕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泰莱基突然自杀。其原因至今还不清楚。在即将胜利的前夜，难道会对胜利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害怕？或许，这个对荣誉如此珍惜的人，认为和自己在流亡年代的政治信仰相比，甚至认为自己的党在四八年的立场都是对民族权利的背叛？无论什么原因，事实是：脆弱的神经受不了这个决战的沉重压力而自杀了。泰莱基死亡以后，国会也仅以3票的多数通过了德阿克的建议。

209

当然，维也纳宫廷对于上书党的观点也没有同意，并且把国会也解散了。德阿克·费伦茨清楚地看到，今后还会有新的较量，他在最后一次讲话中再次重申他消极抵抗的纲领："如果有必要，我们的民族将不惜忍受一切，就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忍受苦

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卫国家的权力。因为被暴力和强权夺走的东西，终将由时间和幸运重新带给我们。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想要重新得到因为害怕苦难而自动放弃了的东西，那就会很困难，很成问题。”

国会解散以后，果然出现了更加困难的年月。压迫重新代替了持续了约一年的较自由的政治生活。新的领导人是什梅林·安道尔。他把恢复在拿破仑战争时被消灭了的德意志帝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奥地利为己任。他在向建立一个联邦制的210国家作了一些没有结果的尝试以后，又重新着手恢复全帝国的集中制。什梅林的实际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他解散各州的议会，恢复军事法庭，他相信时间对他是有利的。(他的执政时间是1861—1865年，人们称为“过渡时期”。）什梅林和巴哈一样，也垮台了。外交形势说明，哈布斯堡要想在德国恢复昔日的权力，要想重建帝国只能是幻想而已。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个永远在背后威胁着的匈牙利，奥地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历史事件在为妥协准备着条件。

妥　　协

流亡在外的人也致力于解决多瑙河流域的问题。1862年，科苏特发表了组织多瑙河联邦的主张，号召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哈布斯堡王朝。他倡议建立一个匈牙利——霍尔瓦特——埃尔代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联邦。联邦由联邦委员会领导，每年轮流在各国的首都召开会议。国防、外交和贸易属于联邦共同事务，而联邦各成员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则完全独立。科苏特是这样总结他的主张的：“在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

罗马尼亚人之间建立团结，谅解和友好！这就是我最热烈的愿望，最真诚的建议！”多瑙河联邦的蓝图具有许多进步的设想，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却无法实现。

匈牙利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和哈布斯堡妥协，这是1848年自由斗争时期的主和派早就希望实现的。六十年代中期，匈牙利地主阶级对妥协的愿望再次高涨起来。由于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苦闷以及连年歉收而日益增长的物质上的困难，使得消极对抗的力量也消耗殆尽了。

在双方都有类似愿望的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通向妥协的事件：先是1865年4月，德阿克在《佩斯日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复活节有感》的文章，他声明："我们随时准备通过合乎法律的途径使我国的法律与帝国安全一致起来。"这意味着对1848年法律的修正和对所谓"共同事务"的承诺。弗兰西斯·约瑟夫看到，什梅林既无力整顿帝国紊乱的经济，又不可能实现恢复当年的德意志帝国的宏图，于是改组了内阁，并于1865年底召开了国会。

哈布斯堡在普奥战争中的失败（这是匈牙利舆论所不希望的）加速了妥协谈判的最后进程。（匈牙利的自由派人士对于意大利的统一和意大利战胜奥地利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在普奥战争中匈牙利的新闻报道和政界人物却都支持奥地利。）他们害怕，德阿克也这样认为，一旦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在"强大的俄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个独立的匈牙利。但最后决定事件进程的是外部力量的对比。1866年夏天，在捷克的克尼格拉茨①附近，奥地利军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奥地利被迫向普鲁士让步，正式声明放弃对德国国内统一事务的干预。哈布斯堡家族在德国的影

211

① 今赫拉德茨——克拉洛维。

响实际上由此消失了。意大利作为普鲁士的盟国得到了自拿破仑战争以后就归属于奥地利的威尼斯。从此，奥地利从意大利也被排挤出来。这一切都使匈牙利问题的解决变得愈加重要了。

1867年春达成妥协协议，哈布斯堡帝国改组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就是说，帝国是由两个在内政上各自独立的立宪制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两个国家除了共拥一君以外，还有共同的外交，军事，财政和每十年修订一次的关税联盟。(两国共同的事务由设立在维也纳的共同部门来领导，由两国议会选出同等人数组成的委员会和代表团进行监督，委员会和代表团的例行会议则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轮流召开。匈牙利承担部分国家债务，负担共同费用的30%。这个定额在二元国的后期增加到33%。)

212 这个妥协实际上是两国统治阶级之间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产生重新加强了对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因此，匈牙利的统治阶级是乐意为此放弃一部分民族独立权利的。(其实两国共同的事务正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限制了匈牙利作为独立的国家的作用。)科苏特坚决反对这一妥协。他在决定性的投票前几天发表了给德阿克的公开信，宣称："我从这一事实中看到民族的灭亡，正因为我看到这一点……我的责任感使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不是为了要和你辩论，而是以上帝、祖国和后代的名义恳求你：请你用远大的政治家的眼光来考虑一下长远的后果吧，你将把祖国引向何方。我们不但应该热爱它正在飞逝的现在，而且也应该热爱它业已无法改变的过去和行将来临的未来。请不要把我们的民族引向那今后无法驾御的地方！"

德阿克和匈牙利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意科苏特的观点，在激烈的辩论以后，议会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妥协条款。德阿克在国会上这样解释道："武装斗争和革命即使有成功的希望，也只应是万不得已时才能采取的手段。……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

等待着令人怀疑的未来，而且这期间民族的力量、幸福、信任和希望一天天在消蚀，这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打算。因为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所等待的事情不会到来，或者当它到来的时候，对我们变得越来越弱的民族已经太晚了。因此，除了试一试第三种方式（即妥协）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考虑到当时欧洲的列强是支持哈布斯堡，并且在当时情况下用人民的、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已是不可能，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现实的妥协（或者不妨说是一个反映了实际力量对比的协议）。妥协结束了专制制度，匈牙利成为带有一定限制的“民族国家”，并且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这次自上而下结束革命的妥协是匈牙利历史上充满矛盾的转折点。诚然，它在很大程度上给匈牙利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却又造成了匈牙利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并且由于原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加强，使民主运动的发展更加困难了。

九、二元制的第一阶段1867—1900

（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发展）

妥协后的政治形势

213　尽管国会在1867年5月以二百零九票赞成、八十九票反对通过了有关妥协的法律条款，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即使在6月，首都隆重举行为弗兰西斯·约瑟夫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加冕的庆祝活动时，妥协问题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以“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圣徒国王”为首的奥匈帝国成立了，但不管是莱塔河的这边或那一边[①]都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妥协是真诚的和牢固的。

帝国的人民和政治家都感到哈布斯堡帝国新的——二元制的——形式是很不稳定的，或者说是临时性的。看到匈牙利人取得的这些成绩，捷克人也想争取同等地位，使帝国成为一个三元国。（在两个世纪之交时，霍尔瓦特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其时维也纳宫廷里仍然有中央集权政府的信徒，当然，另外也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建立一个联邦帝国。这一切正反映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少数民族问题所带来的困难。

---

① 指奥地利和匈牙利双方。莱塔河是边境河。

二元制度最终还是加强了。被各种尝试弄得精疲力竭的弗兰西斯·约瑟夫几乎顽固地坚持二元制。匈牙利在1867—1875年之间多次的政治斗争也促进了二元制的暂时巩固，其中国际关系和匈牙利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起着决定性作用。

妥协以后政党的形成主要是依据各派在1867年所采取的立场来划分的。于是形成了德阿克党，中左党和极左党。从人数上看——至少在议会内是这样——德阿克党力量最强。不过这个党的成员却是五花八门的。既有老的保守分子和自由派，也有破落乡绅和显赫的贵族，还有资产阶级和神甫，只有一样东西把他们连在一起，那就是要保卫"妥协"的成果。这些人中间的极大多数与妥协有着政治上，甚至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年老的德阿克·费伦茨很自然在这个人们争先恐后要求加入的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拒绝了赐给他的产业和总理职位。在他1876年逝世的时候，他当年的朋友,后来变成最大对手的科苏特认为他是一个"在帝国中具有共和性格的人"。他的信徒则把他称誉为"祖国的智者"。但他政治上的创造力随着妥协的实现而告枯竭。正如他无力把自己的党团结起来一样，在政治上他也没有能再作出较大建树。 214

中左党是以其在议会中的态度而得名的。这一派的大多数人是原1861年国会的决议党人，大多系蒂萨河东部地区的地主。其首领也是原这一派的蒂萨·卡尔曼。中左党的方针集中反映在"比豪尔纲领"中，要求对67年的妥协进行修正，即要求建立独立的匈牙利军队和得到更大的经济自主权。这个以蒂萨河以东地区的地主为支柱的党要对妥协中限制了民族独立的一些条款进行修正。可是他们在纲领中尽管写得很激进，在行动上却根本无意实行。实际上中左党的作用只是牵制和阻止对妥协不满的群众。

被称为极左党的议会代表很少，但他们的群众很多。他们坚

决拒绝妥协，而坚持1848年的立场(后来称为四八年党，以后又改名为独立党，直到1918年止)。这里起最大作用的是流亡中的科苏特，他在国防军和其他一些民主团体中（主要是奥尔弗尔德平原地区）受到广泛的、特殊的尊敬。当年国防军的服装，印有科苏特头像的纸币都成了珍贵的纪念品。每当平原地区的农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科苏特父亲"的时候，这时在他们的心中又重新点燃起1848年革命的希望之火。科苏特成了政治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妥协后第一任政府的首脑是安德拉希·久拉伯爵。这个不足四十岁、颇为自信却又略嫌浮躁的贵族在1848年斗争中曾作为科苏特的使者派往土耳其首都。妥协前后他已成为德阿克的忠实追随者，也就是这样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少数民族问题
安德拉希政府的改革措施

安德拉希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与妥协有关的问题。它不顾罗马尼亚人和萨克逊人的反对，实行了埃尔代伊和匈牙利人的联合；它在维也纳宫廷的支持下和霍尔瓦特人就解决了国家权力[1]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且在长时间的争吵以后通过了民族法。

埃尔代伊成了匈牙利的一部分，而霍尔瓦特和斯拉沃尼亚则得到了一定的自治权，成了匈牙利的"伙伴国"，由霍尔瓦特总督为首的特别省政府管理内政（省府设在萨格勒布），它可向匈牙

① 安德拉希政府致力于加强奥匈关系，并加强匈牙利在巴尔干的势力。与霍尔瓦特之间的国家关系法和民族政策都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作出的

利国会派遣29名代表管理共同事务(边疆军管区取消以后又增加到40名)。在政府中专有霍尔瓦特的部长。费乌迈[①]——它的归属问题是匈牙利和霍尔瓦特谈判中双方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附属于匈牙利王国的特区”,由国王任命的总督来行使权力。

霍尔瓦特的大地主和一部分教会上层人物是同意这个所谓“霍尔瓦特妥协”的,但特拉瓦河另一边的大多数人则激烈地反对,他们要求在哈布斯堡内部享有和匈牙利人同等的地位。直到帝国崩溃为止,霍尔瓦特问题一直是争执最多的问题之一。1868年通过的民族法当然更谈不上解决了。

民族问题,在欧洲这个多民族的,——而且使问题变得极其复杂的——人种混杂的地区,不管是1848年革命,还是以后的妥协,都无法解决。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存在符合欧洲列强国家的利益,所以不可能建立几个民族国家来取代它。

就匈牙利而言,在1848年革命时和妥协以后,少数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来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提出来的。1848—1849年间,哈布斯堡想利用少数民族来扼杀匈牙利革命,因而在当时少数民族曾指望得到维也纳宫廷的支持。妥协以后的情况则起了根本的变化。达成协议的双方——匈牙利地主阶级和维也纳宫廷——在镇压少数民族上采取了共同的行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了经过皇帝批准的第一个民族法。 216 (1848年春天召开的国会上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是1849年7月,即自由斗争失败前的几个星期中制订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法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

“在民族平等基础上”通过的法律(1868年第44号)首要的,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上仍然不承认少数民族,而只是在有

① 今南斯拉夫的里也考港口。

限度的范围内允许各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文字的权利。国会设想在旧的、“一个政治民族”基础上和占居民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达成谅解。早在改革时期就形成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条法律中是这样写的：马札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是一个民族，即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匈牙利民族，本国的一切公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法律规定，在州、区和宗教范围内有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自由，各小学和中学也可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个在少数民族代表投票反对下强行通过的少数民族法令是一个不祥之兆。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除了这个非驴非马的——从根本上说来 217 是失败的——妥协以外，同时还通过了另外几个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重要法令，诸如国民教育法和州的建制改革法。

有关义务教育法令的计划是厄特沃什·尤若夫在1868年制订的。(他是第一届责任内阁①成员中在1868年唯一出任部长的人。）这个计划尽管远比1848年夏天的草案要后退许多，但仍然遭到教会上层的坚决反对。法令最后还是规定了对十二岁以前的学龄儿童进行义务教育，规定建立国立和公立中学以及国家对教会学校的监督等。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大大提高了公共教育的水平，但是教育对劳动人民的子女来说还不够普及。(1869年统计，男子中有61%，妇女中76%是文盲，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分别下降到45%和55%。应该指出的是，和八十年代其他各国相比，奥地利的文盲为34%，意大利为62%，法国为31%。)

1868年的国民教育法令规定对六——十二岁的学龄儿童用本民族语言实行一贯制教育，十二——十五岁的学生实行每周二——五小时的所谓“复习”义务教育。教育法还规定在那些没有

① 1848年鲍詹尼内阁

相应的教会学校的地方要设立公立学校，这一点遭到了宗教界最强烈的反对。特别是在乡下，他们宣传反对那种“伤风败俗的”“民族学堂”。当时教学条件很差，在极大多数农村，全校六个年级的八十——一百个学生往往只有一个教员。

州建制的改革更是很不彻底。由于各州早先多次地成为民族反抗运动的根据地，所以那些反对派的政治家们不同意减弱州的权力。但司法和行政不可避免地加以分开则还是实现了。当然这些州在此后仍主要搞政治，其本职工作——行政治理，只是附带从事。

二元制度的巩固

217

妥协后的几年，由于国家预算不断出现赤字以及德阿克党日趋瓦解，政治形势越来越复杂化了。执政党分裂成几派，围绕着一些“肥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的声誉大降，在议会的中期选举中席位锐减。特别是在 1871 年安德拉希当了帝国外交部长和卢那·梅尼赫尔任匈牙利总理以后更加速了这一崩溃的过程。

卢那在实现妥协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并享有财经专家的名望。在他任职的两年中，确实不辞辛劳地为自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在国家收支平衡方面却收效甚微。他利用职权和灵通的消息来为自己牟利，因此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当有人在议院提出，尼雷吉哈佐—乌格瓦尔的铁路线为什么通过卢那的私人产业时，他回答说：“命运要让铁路通过我的产业难道也要我负责？”当然，象卢那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妥协以后经济很快繁荣，在盖工厂、修铁路都很容易赚钱的情况下，那种不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的人在德阿克党的议员中几乎绝无仅有。但

218

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刺激了中左党的成员，他们对于做反对党已经感到厌倦，于是越来越公开地倾向于和执政党(即德阿克党)合作。

1875年两党终于合并。中左党为了要承担执政党的角色，不惜放弃纲领中的任何内容。“不要挑三拣四！”——当时这个党的一个政论家曾这样写道。极左的“四八年党”把这些人的行动归结为：蒂萨把“比豪尔纲领抛弃了”（他把原则连同他的反对派的立场一起出卖了）。这个在以后三十年连续执政的新党取名为“自由党”。在欧洲各国，很多在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叫自由党。可是匈牙利的自由党出于本国的特点，主要是由地主组成的，它在议会中也仅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对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则采用暴力。和“第一代”，即改良时代的自由主义相比，这“第二代”的自由主义是破烂陈腐的自由主义，它已逐渐失去社会的敏感性。它不是一个着眼于全欧的，而是眼光相当局限的政党，而且吸收了相当多的民族主义的消极成分。但无论如何，毕竟还是这个党，创造了自由主义发展的条件。党的领袖是蒂萨·卡尔曼，他在1875—1890年的15年中连续担任总理。这个1867年的反对派领袖，变成二元制时代执政最长的一个总理。他的相对说来比较长时间的统治意味着妥协制度的巩固。

蒂萨是一个缺乏远大计划的政治家，从这点来讲他和革命以前信奉自由主义的科苏特和德阿克一代人中的优秀分子是无法比拟的，但无疑他是一个敏锐的策略家、有经验的鼓动家和优秀的辩论家。他用以巩固其统治的手段是把他的追随者安插到各个机关和行政系统（如州和区等）中去，并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难怪他的对手把这些只会点头哈腰的官员讽刺为马木留克①，把蒂萨称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① 马木留克系埃及中世纪的近卫兵，此处意即政治上的盲目追随者。

政治生活范围也变得很窄小。除了地主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律师和作家可以发表发表意见。在农民和工人眼里，政治只不过是“老爷们的游戏”而已。在全国大约只有6—7%的人有选举权，而且，因为是公开选举，舞弊、营私不一而足。坦契奇·米哈伊在1867年以后仍然是国会议员，他在《自传》一书中饶有风趣地描述了欧罗什哈佐地区的执政党是如何击败他的。他写道：“选举前一天的下午一切都准备就绪：烹调好了牛羊猪肉，运来了雪白的面包，酒类丰盛更是不在话下。从区里来的选民是向我表示支持，然而当一见免费的酒池肉林，便坐下来大吃大喝，于是我就落选了。”（对这样的强迫，欺诈，游说，不负责任的空头支票等等逼真的描写我们还可以在当时的另一位国会代表米克萨特·卡尔曼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尤其是《匈牙利的两次选举》这篇短篇小说更是入木三分。）

“尊敬的国会！”对国会的这个称呼在蒂萨时代带有讽刺的意味并非偶然。米克萨特在他大量的小品文中以不无沉重的心情描述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可笑的事情。有一个名叫凯尔卡波伊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在谈到议会时也写道：“在大约四百个代表中仅有二十五——三十人能真正不间断地做有益的工作……而国会的大多数代表则都是些领取厚禄，无所事事之辈。”

蒂萨政府主要的支柱是旧的中等地主贵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人们仿效英国人的称呼称他们为“乡绅”（dzsentri）①。这些失去了财产、但仍然过着“老爷”生活（整日玩牌，打猎，作乐）的绅士们在蒂萨之流的庇护下充斥着政府部门、中央机关、各州的行政机构和军队的领导部门。

① 源自英语绅士（Gentleman）。在匈语中演变为“摆阔气的没落封建地主，贵族，乡绅”。

220 蒂萨政府日益巩固，它利用政权指挥内政。这固然促使国内形势的安定及政权的稳固，但另一方面却又推行了不少日后导致政局紧张的措施。比如颁布了雇农法令，允许"主人"对雇农实行体罚，并且可以用暴力强迫追回离开了原主人和庄园的雇农和工人。（蒂萨执政时期成立了宪兵队。）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导致不良后果的步骤。它力图用暴力来镇压方兴未艾的少数民族运动。关闭了不少少数民族中学，解散了几个少数民族团体（如斯洛伐克的文学社和塞尔维亚的青年团），并且对一些少数民族的领导人提出诉讼。政府的某些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声明当然就更促使少数民族敌对情绪的增长。

在外交方面，蒂萨政府无保留地支持曾在建立三国同盟时起决定作用的帝国外交部长安德拉希·久拉伯爵。帝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匈牙利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早在改良时期俄国就使匈牙利地主阶级吓得丧魂落魄，因此他们决定联德反俄。匈牙利的统治阶级担心从土耳其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巴尔干斯拉夫人民会和俄国联盟，或者至少会受彼得堡的控制。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斯拉夫王朝，或者斯拉夫集团的存在，对匈牙利境内的斯拉夫民族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吸引力，迟早会导致匈牙利，以至于整个帝国的垮台。因此，匈牙利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自己在喀尔巴阡盆地的统治便向德国靠拢，大力支持1879年签订的德奥两国同盟（后来由于意大利的加入而形成了三国同盟）。

221 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互相争权夺利。帝国力图阻止沙皇俄国在巴尔干扩张领土。当土耳其帝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解放和独立国家的建立时，它一方面在这些国家尽力扶植亲帝国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自己也亲自动手。在1878年柏林议定书的基础上帝国——在匈牙利舆论激烈反对下——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867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发展

二元制时期相对说来一个最积极的方面是经济领域中的成绩。匈牙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改良和专制时期，到了上世纪最后三十年，则以比东欧其他任何国家都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了。这是和政治形势的稳定，信贷业的活跃，铁路网的建设以及帝国内部形成的经济分工分不开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拥有足够的资本来源，信贷事业和信贷组织的扩大。统计资料表明：1867—1890年之间匈牙利的信贷机构增长了二十四倍，资本总额增长了九倍多。这些 222 情况一方面说明每一个较大的居民点都至少有一个银行办事处或信贷合作社，另一方面也说明匈牙利的资本力量已大幅度增长了。

妥协后信贷业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是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分不开的，它促使大银行的建立。(其中有在维也纳罗切赫尔德援助下建成的普通信贷银行，它和改良时期成立的商业银行一样是全国最大的银行。)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是由于外国资本家看到了行将发展的匈牙利有利可图，这当然不可避免地造成相当一部分利润流出匈牙利。但由于国内资金缺乏，为使经济的迅速发展，从外国引进资本还是必要的。外国资本在开始时曾起了推动作用，但到了上世纪末，主要是由于开展了储蓄运动，国内的资本已处于主导地位。

信贷业的发展当然还远远谈不上一帆风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给经济带来了多次严重的破坏和暂时的倒退。其中1873年的危机最为严重。这次危机和证券交易所大规模倒闭结合在一起，并

造成了几家大银行的停业。但不久"信贷总额"重新成倍增长，到了 1900 年，匈牙利信贷机构的资本总额已达到五十亿克朗。①

匈牙利经济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铁路网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交通改革。四十年代初期，陆上交通还很有限，规模很小。春秋 223 两季道路无法保证畅通。1846 年修建了佩斯—瓦茨② 的第一条铁路线。1848 年匈牙利铁路线的总长仅二百公里。妥协时期尽管增长了九倍，但始终也只有二千公里左右。这以后，有些年份差不多可以修建一千公里，因此，到了上世纪末铁路线总长就超过了一万七千公里。就是说，全国各地铁路线已四通八达，匈牙利也进入国际贸易流通了。

随着兴建铁路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一些有害的现象。妥协以后，那些财阀和政界人物都把投资兴建铁路当做是攫取暴利的大好机会。有关法令还规定了投资资本在几十年之内的利润和利息（如果达不到规定的盈利，则由国家补偿差额)。这样一来，铁路建筑的费用异常昂贵。有影响的政客始而在批准铁路建设方面，后来则在平息贪污案件中大发其财。铁路修建中出现的大量贪污行为迫使政府不得不取消所得的利润保证法，而力图把由私人公司修建的铁路买过来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这方面鲍洛什·加博尔③ 起了很大作用。)

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农业的发展最为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铁路的修建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由于关卡制度使整个帝国成为匈牙利的农产品的市场。帝国内部形成 224 了相应的分工，工业较发达的奥地利和捷克的一些省份依靠匈牙利供应原料和粮食。(十九世纪末，在欧洲农业遇到了比自己便宜

---

① 1892——1926 年匈货币名。

② 瓦茨离佩斯三十公里。

③ 当时的交通部长。

得多的俄国和美国的小麦竞争时，得到保证的市场和优惠的粮食价格就更显出其重大的意义了。）

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根本的变化。播种面积扩大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开垦了某些大草原和牧场，另一方面又治理了河流，即“拦洪造田”所带来的结果。农业技术也得到根本的改造。几百年来习惯的每两年或三年休耕一次的耕作方法已被淘汰。到上世纪末已普遍推广了轮种制的耕作方法，因此荒地越来越少了。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大约增长了一倍，并且推广了玉米、马铃薯和甜菜的种植。机械化耕作逐渐得到推广，特别是播种机、打谷机和铁犁。露天放牧的牲畜头数大大减少（实际上只有霍尔多巴吉①和布高齐②等草原上还在饲养，引进了一种瑞士良种奶牛和肉牛来代替虽耐艰苦但产奶和产肉都较少的匈牙利原牛。）

尽管有上述变化，但匈牙利农业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农业是按所谓普鲁士道路发展的，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土地分配不均。1848年革命解放了农奴，原来由他们耕种的土地成了农民所有制，但无地赤贫没有分到土地，大地产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到两个世纪之交，一百二十八万户小农只占有可耕地的5.5%，而54%的土地仍属于地主所有。同时，占有一千霍尔特以上土地的大约四千户大地主却占有31.18%的土地。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大部分中等地主中，由于不能适应新形式的生产而走向破产。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倾向在农民阶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少数富裕农民更加富裕，而大多数中农，尤其是贫农却走向破产，农业无产者的数目急剧上升。

---

① 在匈牙利东北部奥尔弗尔德大平原。

② 在巴奇——基什孔州。

匈牙利的农业和较发达的西方邻国的农业相比一直是落后得多。尽管中耕作物(玉米和马铃薯)有了发展，但仍是单一作物，小麦在农业中仍起决定作用。生产中缺乏足够的精耕细作，因此一当匈牙利的小麦和羊毛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种植成本低、又是以廉价的海路运来的俄国和美国的小麦，以及质优价廉的澳大利亚羊毛时，就更显出它的弊病来了。上世纪末，匈牙利遇到了葡萄根瘤蚜虫的灾害，使葡萄种植业遭受了重大打击，这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尽管有上述困难和不足，二元制时期毕竟是匈牙利农业高度发展的阶段。

225

匈牙利大工业的发展

匈牙利在妥协时期仅有少量的大工业。在这薄弱的基础上，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也象沙皇俄国一样，匈牙利的大工业才有了长足发展。工业革命的浪潮也就是在这时到达匈牙利。大企业生产，或者说生产的机械化，机器以及蒸汽机的使用迅速普及。

工业的发展只是在妥协以后的年代才真正建立了基础，或者象当时说的那样掀起了“Gründolàs热”[1]。国内和国外的(主要是奥地利)资本家争相建立银行、储蓄所、铁路建筑公司和工业企业等。开始，只是少数资本家的个别经营，到这时股份公司相继出现。仅在第一次发展时期的1867—1873年间就出现了一百七十多个股份公司，更不待说还有更大数量的交通、商业企业和信贷单位。这一切固然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伴随着大量难以置信的投机倒把、盘剥、欺榨和贪污。

---

① Grün：德文，原意是绿色的，此处指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之意。

1873年波及整个欧洲的生产过剩危机致使刚刚发展起来，尚不完全巩固的匈牙利工业停顿了好几年。由于交易所的倒闭，许多新建的银行、工业企业都破产了。日甚一日的财政困难、(由德阿克党垮台而引起的)政治危机、农业歉收以及波及全国的霍乱，使情况更加恶化。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回升。

这个时期匈牙利的面粉工业不论是产量，还是设备上都达到了世界水平。富裕的粮食商首先在首都建立了大面粉工厂（如孔科尔迪亚面粉厂，布达佩斯第一面粉厂，巴诺尼亚面粉厂等)。产品不仅供应首都，而且运往帝国其他各国，甚至远销海外。 226

农业加工工业另一个大的部门是制糖业和酒精制造业。在欧洲，甜菜制糖业生产始于上世纪中叶，在匈牙利则从上世纪最后十年才开始。这个时期匈牙利有名的制糖厂中有塞兰奇和豪特望制糖厂。农产品还用于生产各种酒类。拥有巨大酒窖的克巴尼奥地区是最大的产酒地(那里有德莱尔——哈根——马赫尔啤酒厂)。

铁路建筑和农业中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促进了矿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贵重金属、金和银矿的年产量虽有所下降，但是石煤的生产在二十年中间却翻了一番。褐煤生产增长了四倍多(1890年埃斯泰尔戈姆，佩奇，绍尔戈陶尔扬，日尔韦尔基等地石煤的开采量为一百万吨，褐煤的开采量为一百二十万吨)。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有甘兹厂，马瓦格(匈牙利钢铁联合企业)，里毛木拉尼炼铁厂，迪欧什久尔国营炼铁厂，什里克和朗格机器厂等。

甘兹厂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典型的。甘兹·阿布拉汉于1844年创立时只有一个小的翻砂车间。1868年以后，这个厂发展成立了股份公司，几年以后工人数目就增加到五百多人。在这个厂的发展过程中，梅赫沃特·安德拉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由普通钳工上升为总经理的杰出发明家。他用冷硬铸件制造了当时世

227 界上最好的火车车轮以及辗辊。甘兹厂后来又转为生产电气器材，这个厂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工程师，如齐拜尔诺夫斯基·卡罗伊、布拉特·奥托·蒂图斯、班基·多纳特、德里·米克萨等。

当时很多工业部门还相当落后。地方制砖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充其量也只是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建筑工业的需要。此外，在纺织工业中，除了加奇和若尔纳纺织厂以外，值得一提的就只有戈尔德堡厂。在皮革制造业中有沃尔福涅尔皮革厂。其它方面，在两个世纪之交不管是轻工业，还是化学工业产品都不多。在八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尽管曾经有意识地对工业进行扶植，但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总观妥协后匈牙利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到上个世纪末匈牙利的大工业已经形成，虽然国民经济收入还始终取决于农业收成如何，但国家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业性质的了。自然，匈牙利的工业结构还受帝国内部分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这个分工促进了农产品加工工业、与铁路修建有密切关系的采矿业、冶炼业以及部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而轻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范围就要小得多。(有关外贸的统计资料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除了农产品以外，其它能出口的产品很少。直至1900年，匈牙利进口的纺织品超过了谷物、面粉和肉类的出口总值，这是因为纺织工业品还不能保证国内需求的10%。)尽管匈牙利工业结构有单一发展的倾向，但事实说明，二元制时期匈牙利工业发展水平已经接近莱塔河彼岸① 的水平了。历史上形成的落后局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①指奥地利。

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初步形成，人口也得到迅速增长。十九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为一千三百万，五十年以后增至一千七百万。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很快，而农村则相当缓慢。（二元制时期农村人口增长2%，而城市则是200%。）突然增长的人口，一部分于两个世纪之交流向海外，另一部分涌进城市。由于工厂和工业企业大多数集中在首都，因此，布达佩斯的发展速度尤其迅速。

佩斯、布达、老布达这三个行政上互相独立的城市的总人口在1848年是十五万左右。1873年，这三个城市合并成统一的布达佩斯（不算现在的郊区），总人口是三十万，但到1900年已发展成为七十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了。行政机关和各种机构鳞次栉比，城市外围兴建了一批批大工厂，这一切都说明，布达佩斯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建成的有佩斯的维高多大厅（费思尔·弗雷杰什设计），国家歌剧院（易伯尔·米克洛什设计），今民族画廊（即当时的最高法院，由豪乌斯蒙·拉约什设计），还有大型建筑国会大厦（是根据什泰特尔的设想建成的）。在 228 上世纪最后十年里，依据大城市建设规划并在拆毁若干旧街道和房屋的基础上新建成了舒加尔路（即今人民共和国路）和大环形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先是使用公共汽车，到世纪末就出现了有轨电车。原来仅有的一座链子桥已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又陆续兴建了一座座横跨多瑙河的新桥。资本家利用居民房屋拥挤的情况，在华丽的大建筑物四周盖上成百成千座出租房屋。这些房屋外表十分乏味，质量不高，院落窄小不见阳光。资本家利用地皮、房子、货

物和人力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他们要在投资里尽快捞回大量资财。

尽管首都建设速度飞快，工业发展显著，但匈牙利主要还是依赖农业。同时，农村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贵族们找到了发财之道：他们将自己的大地产改建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同时继续在国家政治领域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也在工业企业的收入中受益。(在银行和企业的董事会名单中总有几个"历史上的伟大家族"的姓氏，少不了有塞切尼，有齐奇，有卡罗利，有泰莱基等等。他们的作用除了提供姓氏，在俱乐部中谈天外，主要用来和上层官方打交道。)那些中等的地主贵族在新的229 社会中就比较难于立足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破产了。但这批乡绅并没有走投无路，这个阶层也保住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但却挤进了各部，各机关，充斥着各州和军队各部门。(这些都被认为是上等人的工作，并且他们都具有进入这些部门的关系。米克萨特在他的小说中上千次地、极其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社会阶层。)在匈牙利，社会的改造是通过"匈牙利第三等级"，即有地产的普通贵族领导下完成的，而资产阶级最有代表性的阶层并没有能在匈牙利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有机地形成起来。

资产阶级的少数上层金融资本家阶层，即无论在财产上和等级上都具有特殊地位的工厂主、大商人、银行家，大多是移民进来的德意志大工业家和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银行家。约有二万五至三万个大部分被匈牙利族同化的商人、工业家、企业家、土地出租者阶层则是中产阶级的中坚。而小资产阶级的组成主要是城乡的小工业家、小商人，这里有匈牙利族，也有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就其出身、财产状况、生活习惯以及政治态度来说互有很大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不能形

成独立的观点的原因。

大地产原封不动地被保留这一情况决定了农民的命运。(直至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明文规定的不能出卖和不准分割的大地主地产，以及限定嗣续的产业数量及面积还有所增加。)宗教和世俗大地主的存在妨碍着农村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分成少数富裕农民阶层，受天气和税收制约的中农、小农以及贫农阶 230 层。赤贫的农业无产阶级的数目迅速增长。到上世纪末，短工和雇工的数目已达三百八十万人！而当时匈牙利的工业尚还无力吸收这批巨大的后备军。在建筑大工厂、治理河道、修筑铁路的时候，他们尚可充当挖土小工，但到世纪末这种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出于无奈，一些人只得拿起包袱流向海外，或者终日站在大平原一些城市的人市上等待着拍卖劳动力。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土地分配——对不算小的一部分农业无产者分给能维持生活的一份土地，但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却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过这事。相反，有一个当时的执政者认为："向农民许诺给予土地就象向工人许诺给予资本一样，只不过是乌托帮的理论而已。"

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组成独立的阶级对匈牙利社会说来是具有决定性的改变。早先，工人主要是在矿上和行会内工作，而且数量不多。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起了变化。十九世纪末叶，工业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7%。虽然相对来讲这个数字不算大(当时奥地利工业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4%，德国占38%，英国则占46%)，但是它表明，在匈牙利工人阶级已经形成。到1900年，产业工人的数目已经达到50万人。

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流进城市的农业无产者。成千上万的一贫如洗的农民抛弃了故乡和原有的生活习惯，在工厂中出卖劳动力找饭吃。由于他们从全国各个角落涌向城市，特别是 231 涌向布达佩斯，因此工人阶级的队伍包括了各少数民族。熟练工

人的大部分是从国外，主要是德国移民进来的，这更增加了工人阶级的多样性。正因为如此，直至今天匈牙利各工业部门中仍使用大量的德国技术名词。

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即使在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困难的。技术工人中的一部分人能过上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工人的绝大多数生活却非常艰苦。劳动时间没有规定，平均每天要在没有安全和保健措施的车间工作十六——十四小时。住宅状况更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在郊区工人住宅里，成批成批的工人死于贫困和传染性的肺病。1883年，一个工厂的经理写道："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很少有人关心着工人生活这一严重问题。如丧失工作能力以及年老以后怎么办？广大的工人群众，包括他们的家属，在遇到上述情况后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只有乞求别人或者依靠社会救济过活。……这在我国工厂中……十分遗憾！……因工致残或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经常出现，这些人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只能靠乞讨度过他们悲惨的一生。"

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开始

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第一代战士是到过国外的匈牙利工人和移居到匈牙利的外国工人。他们带来了1864年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消息，尽管他们宣传的是费迪南·拉萨尔不那么正确的观点（如超阶级的"人民自由国家"，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下成立生产合作社制度，取消或消除所谓的铁的工资制度等等），但是从这里已经看出，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组织已经提到了日程。

……（如……）和资产阶级分子试图……他们，……工

人早在1868年就成立了完全独立的总工同盟。它的第一任主席（尽管任职时间不长）是旦契奇·米哈伊。一部分小工商业者和学徒工也加入了总工同盟，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争取开办独立的工场。在以后的十年中，工人运动中产业工人的数目和比例逐步增加，工运的革命性也因而增强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也传到了总工同盟，因而增加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活动。由于钢铁工人福尔卡什·卡罗伊的努力，他们和第一国际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并举行过几次有组织的罢工。当法国首都成立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消息传来，这时工人的活动更加活跃了。而在公社被残酷地镇压以后，工人举行了 232 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工人们的帽子上别着黑纱，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马赛曲行进在舒加尔路工地上。游行结束时宣告："工人阶级并不因巴黎公社被镇压就认为失败了。"

欧洲的资产阶级被巴黎公社吓得惊慌失措，公社失败以后，他们便开始疯狂地镇压工人政党。在匈牙利，当时的总工同盟领导人均被逮捕，并开始了所谓的"不忠诚案件"的审讯（1871年）。政府对总工同盟的恐怖政策使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暂告结束。

一个新的、比前更大规模的工运高潮时期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当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匈牙利出生的弗兰克尔·列奥回到祖国以后开始的。弗兰克尔出身于老布达一个医生家庭，本是金饰匠，他差不多走遍了欧洲各国。巴黎公社期间他担任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负责人，并手执武器参加了街垒战。公社失败以后，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得以逃脱。他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助手，曾在第一国际工作过几年，此后便回到了匈牙利。

弗兰克尔把建立匈牙利的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在用德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的《工人周报》撰文要

求普选权，公民自由权（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同那些与当局有勾结的派别和组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读者。在这个基础上，于1880年建立了匈牙利总工人党，在纲领中已经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作为最终目的提出来了。

233 蒂萨·卡尔曼政府对于工人运动的高涨十分害怕，开始实行武力镇压。首先把弗兰克尔·列奥逮捕入狱，以后又强迫他流亡国外，对总工人党的其他领导人则采取恐吓政策。蒂萨之流还设法把那些倒向政府的妥协分子弄到这个群龙无首的党的领导岗位上去。

八十年代末，匈牙利总工人党已经完全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了。然而匈牙利工人运动在国际工运的支持下又出现了新的高涨。18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就研究了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形势。代表大会委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直接帮助匈牙利工人运动。这样，恩格尔蒙·帕尔又重新来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出生的白铁匠工人，早年曾献身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运动。

国际工人运动大规模的高涨，党的领导机构的重建，使匈牙利工运很快成熟起来并取得成就。1890年5月1日，是匈牙利第一次大规模的五一节活动，有六万名首都男女工人高举旗帜和标语牌举行游行。群众大会热烈地通过国际的决议，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要求制定保护工人的法令和庆祝五一节等。

第一个五一节所反映出来的力量已经表明，成立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时机已经成熟。1890年12月，在匈牙利总工人党召开的234 例行代表大会上就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这次会议在匈牙利工运史上被认为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通过的纲领，即“原则声明”，是当时各国最好的马克思主

义的纲领之一。"声明"正确地宣称："在现状的重压下，工人阶级几乎快要支持不住了，究其原因并不在于个别的国家机构，而是在于整个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劳动工具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致力于用集体劳动来取代与工资制度相关联的当今的生产方式。"可见，纲领把建立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的。纲领正确地强调了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和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而斗争的必要性。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最中心的要求就是实现秘密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在要求秘密投票权的同时，"原则声明"还指出："如果没有这个，代议制就失去其意义。"

"原则声明"的缺点在于没有分析匈牙利的具体情况，没有把农民问题放到适当的位置，对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更没有给予重视。制定纲领的人也未谈到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恩格斯在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是这样总结匈牙利工人运动教训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且产生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①

① 恩格斯：《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3页。

九十年代的危机

七十一八十年代二元制不论从外交和内政来看都是巩固的。但是在上世纪最后十年中帝国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首先是在外交领域出现的危机。对德国的一边倒，和德意志帝国签订再保险协定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哈布斯堡王朝对俄的政策也越来越僵硬。和两个邻国互相敌视对方的巴尔干政策引起战争的危险在不断增长。

九十年代初，二元制在帝国内部也开始出现裂痕。这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代议制的弱化，奥地利政府的更迭频繁，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解决各少数民族，特别是捷克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要求，以及奥地利各党派之间的斗争。

二元制在匈牙利的危机是从蒂萨·卡尔曼政府倒台开始的。这个几乎以军事纪律统治着党的总理，这个“将军”于 1890 年被迫辞职了。他的辞职是由有关募新兵的权利以及对科苏特公民权的争论引起的。当国会表决通过征兵数额及匈牙利预备军官必须通过德文考试的议案时，遭到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的反对。蒂萨本人好不容易才从愤怒的人群中逃出国会大厦。此外，根据原先的一个法令，连续十年不在国内居住又没有到所在国的奥匈使馆办理手续，便自动地失去了匈牙利国籍，人们要求把科苏特作为例外来处理，蒂萨做不到这一点，于是辞职了。

被人们深恶痛绝的蒂萨倒台以后的几年中政府不断更迭。光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就有四个总理相继上台（他们是：绍帕里·久拉伯爵、维克莱·久拉、班非·德热男爵和塞尔·卡尔曼）。他们的更迭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也失去了平衡。

十九世纪末民族斗争愈来愈激烈，重新提出对"妥协"①进行修正的想法。这一争论特别是围绕着军队问题展开的。当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手中[illegible]各种议会对军队所能作的影响是[illegible]的。[illegible]"Schwarzgelb"②传统的所谓k.u.k.③[illegible]。在这个[illegible]利人[illegible]，并因此引起[illegible]次[illegible]反对派要求[illegible]的、象征性的匈牙利[illegible]，而且要在共同的军队中也要戴匈牙利[illegible]

当1894年科苏特逝世并把这位伟大的流亡者的骨灰移到布达佩斯安葬的时候，特别激发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情感。政府成员[illegible]首都表示[illegible]国和全世界表明，1848年革命在匈牙利人民心目中是多么重大的事件。[illegible]

围绕妥协问题所展开的斗争只是在议会[illegible]治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illegible]天主教总是设法阻止人们用世俗的形式处理生、死、婚嫁事宜[illegible]所谓的《[illegible]婚记[illegible]》一书)，议会，甚至在上议院也通过了改革法令[illegible]条。匈牙利[illegible]就是为了[illegible]政治改革而建立的[illegible]

九十年代，少数民族问题也更加激化了。[illegible]执政期间通过的少数民族法令，特别是在日常执行过程中具有[illegible]的[illegible]

① 指1867年奥匈的"妥协"。

② 德文，意即"黑——黄"——代表哈布斯堡家族的颜色。所谓"黑黄传统"，即无条件忠于奥皇室的意思。

③ 德文"皇帝和国王"的缩写。二元制时期以此标志共同事务。

是使少数民族匈牙利化。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报刊都天真地认为，238 巨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可以用在学校中推行匈牙利语和支持推行匈牙利化的组织就能实现匈牙利化的。国会中只有一个人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是莫恰里·拉约什。他数十年来一贯坚决认为，从长远观点看，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就如同解决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一样重要。莫恰里的这一观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就连他自己所在的党（独立党）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与此相反，比如班菲总理就曾公开声称：建立“一个最沙文主义的匈牙利国家”是再理想不过的。政府试图用武力对付少数民族的领导人和新闻记者，并且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族案件，把不少人投入监狱。没收少数民族的报纸，解散他们的组织，关闭他们的学校。尽管如此，匈牙利化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匈牙利族人口比例的少量增长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中德意志人和犹太人同化的结果。就在九十年代，由于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匈牙利就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

压迫和暴力还不仅仅用来对付少数民族。在“幸福的和平时期”① 中历届政府还使用宪兵与军队来镇压农业无产者的反抗运动。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斗争更加尖锐。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党在农村的宣传鼓动工作，首先在“风暴之角”掀起了革命的风暴。1891 年 5 月在欧罗什哈佐，贝凯什乔鲍和鲍多尼奥等地发生了流血冲突。琼格拉德和贝凯什州的城乡相继成立了农业工人协会，农业工人和贫农要求分配土地和分享政治权力。社会主义宣传的深入、工农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一年比一年增长的秋收罢工，239 使政府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进行武力镇压。

---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

最大的一次冲突是1894年在霍德梅泽瓦沙海伊发生的。警察局逮捕了当地农业工人协会的首领桑托·科瓦奇·亚诺什，贫苦农民包围了关押这位领导人的市政厅。这时，得到骑兵配合的警察开枪打死了一个农业工人，多人受伤。桑托送交法庭审判。这个"上过三年学的"农业无产者明确地阐明他们进行斗争的目的，并且用形象的语言来回答法官的提问，他说道："比如一个老年人在去葡萄园的路上拣到一颗核桃，他把它种到地里。他知道，他不会享受到核桃的果实，他是为子孙后代而栽种的。我也是这样。虽然，我看不到我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胜利，但是我还是愿意栽上这棵树，目的是为了将来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桑托·科瓦奇·亚诺什被判处徒刑，与农业社会主义运动和秋收罢工最有关系的州被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社会主义的宣传被禁止。这一切都表明为大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来扼杀农业社会主义运动。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他们还要使这一暴力行为合法化。1898年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所谓"奴隶法"，决定对参加秋收罢工的农业无产者给以残酷的报复，并用武力来保证镇压不满的农业工人。

少数民族和农业无产者的运动被匈牙利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在议会内继续就有关妥协的问题进行着无休止的空洞的争论，而对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却诉诸于警察的武力。1896年匈牙利举行了极其盛大的典礼来庆祝建国一千周年纪念日。当他们正在做着建立一个强大的、三千万匈牙利人国家的美梦的时候，却不曾意识到，正是在这个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美景中，民族和解和社会进步最后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了。

从两个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帝国主义时期的匈牙利）

帝国主义的发展

庆祝匈牙利建国一千周年的焰火刚刚熄灭，人们耳边还响着节日欢乐的乐曲，扩大匈牙利版图的美梦还未做完，二元制的各种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了。班菲政府蛮横的暴力既没有能阻挡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运动，也无法阻挡议会内反对派的反抗。政府的暴力只能使运动暂时平息。两个世纪之交政治上的沉寂犹如暴风雨到来之前不祥之兆的寂静一样。

妥协之后迅速发展的工业并没有因为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而停步，甚至本世纪初爆发的连续三年的生产过剩危机也未能使大规模加速发展的工业放慢速度。有人认为这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黄金时代"。一批批新厂房矗立起来了，到两个世纪之交布达佩斯已被工厂的烟囱所包围。本世纪初建成的工厂有：甘兹厂①、切佩尔的维什·蒙弗雷德厂②；联合灯泡厂、电气公司。这些工

① 与玛瓦格合并，成为今日的甘兹·玛瓦格。

② 即今日的切佩尔钢铁联合企业。

与不仅在生产技术上，而且在经济管理上都超过了前半个世纪中建立的工厂。虽然匈牙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有许多技术革新，在生产及产品的现代化方面也有不少成绩，但是匈牙利的工厂和产品的大部分还不能赶上当时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水平。[illegible]卡尔曼·康多工程师发明的世界闻名的电气机车，[illegible]伊斯特万发明的汽车模型以及甘茨厂生产的白炽灯等产品固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这只是匈牙利工业产品的极小部分。落后的匈牙利工业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从1898年以后的十五年中，匈牙利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动力增长了两倍，而电力生产则提高了五倍。由于世纪初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工业发展的速度虽有所倒退，但随着危机后出现的繁荣景象就使这个倒退被止住了。

本世纪初的十五年中投资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工业资本增长了一倍，存款额数增加了一倍半。外国资本的比例下降，资本的构成大约60%来源于国内。这是由于个人消费品增加、市场扩大的结果。小麦的消费量增长10%，糖、煤气、石油增长160%，烟草增长900%。工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而引起的。都市化和城市人口的集中加速，脱离农业依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居民数几成倍增长，这为工业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稳定的市场。

工业生产体系和结构内部所发生的变化要比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发展大得多。前五十年[illegible]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互相孤立、进行着“大鱼吃小鱼”拼命竞争的那些工厂和企业家，现在日益为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在生产和销售上互相协调、排除竞争的联合以及跨越工业部门的垄断组织所代替。在匈牙利，垄断组织最广泛的形式就是卡特尔。一个个工业部门最大的资本集中起来了，那些没有加入卡特尔的企业家则会被别人组联合的

力量挤垮或者至少被迫就范参加卡特尔。很短时间内，卡特尔就垄断了原材料生产的绝大部分，如铁的95%，煤炭的71%；煤和铁的卡特尔组织垄断了国内市场。当生产掌握在互相角逐的资本家手中时，竞争可以制止价格上涨，因为顾客总是到价格便宜的地方去购买。而卡特尔消灭了竞争和角逐，这样一来靠工资生活、需求不断增长的城市居民就陷入了任人摆布的处境。其后果是，物价急剧上涨。比如自从煤炭卡特尔在1900年形成以后，煤的价格大约涨了一半，糖的价格在1906—1910年之间涨了50%。再如，1911年石油加工卡特尔形成以后，每一公升煤油的价格立刻就涨了十费列①，灯泡卡特尔在1903年组成以后的几年中，每个电灯泡涨了十一十五费列。居民不得不用高价购买必需品，卡特尔资本家却从中攫取了大量利润。商品价格大约普遍上涨了50%。但是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资却很少有相应的提高。

242

243 本世纪初，以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五个大银行为中心形成了银行组织，他们集中了占国家大部分，即57%的资金。这些银行为在卡特尔内的大工业企业提供资金，在这些企业中，日后有不少成为银行的资产。因此，在卡特尔组织的背后是大银行。机器制造业卡特尔和火柴卡特尔属"商业银行"，砖瓦工业卡特尔与"匈牙利银行"有关系，糖业、酿酒业和其它卡特尔则依附于"贴现银行"和"信贷银行"。银行以它的大量资金直接控制着工业；而银行资本家也就成了工厂的太上皇。这样，匈牙利就在银行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资本。匈牙利的经济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

① 匈辅币。

农　　业

匈牙利的农业具有特有的两重性。一方面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共存，另一方面劳动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仍保持着传统的落后状态，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灿烂的”农业繁荣。由于在帝国内部的经济分工中匈牙利首先是扮演着贮藏室和食品供应者的角色，这就为农业提供了实际上是无限广阔的内部市场。这一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谷物价格上涨，1906 年农产品关税提高了 30—50%，更为匈牙利农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每一公担小麦上涨了七个克朗，肉类价格也大幅度上涨。由于价格上涨，差不多每年都给农业生产者，首先是大地主，增加成亿的收入。

但是匈牙利农业的所有制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大地主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由于封建残余的存在和农业劳动力的低廉，从而得到大量收入。这样积累起来的盈利促使了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同时，国外流入的巨大资本又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在二十年内，农业的抵押贷款总额从七亿三千七百万克朗上升到二十五亿五千六百万克朗就足以说明。这一方面表明土地大量出售（达到土地总值的 40%），另一方面也说明贷款能力有了增加，反映了资本家对贷款的信心。对农业投入的大量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工业及银行资本集团和大地主之间的联系，甚至大银行、大企业家也在农村中购买或租用农业地产，或者通过信贷的方式在农业中获取利润。在大银行的操纵下加速了工业、商业、银行资本家和农业资本之间的联系。金融资本在全国越来越占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的发展总的来说对农业生产起了有利的影响。尽管 244

在生产关系中变化不大，但在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中，现代化的技术和科学成就的影响则引起了重大变化。在资本力量雄厚的大地主产业上已开始进行土壤和品种的改良，大量使用化肥。许多地方已实现了现代化管理，修建了畜舍、粮仓和其它经济建筑物。尽管农作物种植中的大部分劳动仍需农民们艰辛的手工劳动来完成，但90%以上的脱粒工作已经由三万多台机器来完成了。播种机一般只在大地产上使用。

尽管在相对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化的大地主和发展速度较慢的农民经济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整个农业向前发展了。如果说以前西班牙和平均产量比西方国家落后将近一个世纪的话，那么现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改变了。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中，小麦的产量平均增长14%，其它谷物增长20%，马铃薯和玉蜀黍大约增长40%，生产总值则增长40%左右。畜牧业的发展也是如此。[illegible]西班牙的畜牧业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illegible]大约相当于890[illegible]的[illegible]

如果说西班牙的农业从本世纪之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得到了发展，而且发展比较快的话，[illegible]不能解决由于土地关系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甚至可以说这些矛盾更加激化了。如果有人在瓦伦西亚平原地区[illegible]畜牧业，[illegible]河之间地区和南部地区成片的玉蜀黍和[illegible]的生产，在[illegible]凯[illegible]纳[illegible]格[illegible]的水果、葱、辣椒的生产，同时也看到了[illegible]大地产的[illegible]和使用[illegible]的悲惨命运，那么他们也会作出同样的结论的。[illegible]来看，农业的发展是不完整的，内部是相反，更加走向两极分化。

贵族社会

全国经济生活控制在日益强大的城市的工业资本家手中。但是国家的政界首脑和社会名流始终还是由贵族[illegible]年的大、中地主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在[illegible]议会[illegible]在整个议会中占大多数。军队的领导权也[illegible]有这一阶层的人才有资格占有[illegible]贵族在居民中所占比例之大，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欧洲的任何国家（除了波兰以外）都无法比拟的。[illegible]的贵族地主失去了大批土地，[illegible]意改变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他们[illegible]体 245
力劳动，对于经商和从事工业生产也认为有损于自己的身份。他们顽固地坚持至少要在表面上保持旧的生活方式。他们盘踞在国家和州的各个机关里，占在政界和军界的领导岗位上。他们决定着社会的生活，阻碍着社会上的相互交往，他们把从封建社会继承过来的思想方法和社会习惯在帝国主义时期加以推行。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和[illegible]、工业、商业的绝大部分的德意志大资产阶级不仅不反对这种封建的乡绅精神，相反还去仿效他们，力图取得爵位、贵族和骑士的称号以及购置代表上流社会身份的地产，尽一切力量（除了金钱外）效仿国家政治领导阶层的模样。那些老贵族，尽管多方挑剔，还是把金融贵族接受到自己的圈子里，并且和他们一起以使我们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共同在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社会里[illegible]。工商金融贵族则[illegible]自己的企业装扮得更体面些，更具有吸引力些。于是在他们的银行、企业的董事会里或[illegible]上也安排老贵族的一些有名 246

气的人物。如蒂萨·伊斯特万伯爵是“工业——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安德拉希伯爵在里毛木拉尼炼铁厂任职；布达佩斯通用电气厂有泰莱基家族的职位。这样就形成了金融贵族和世袭贵族之间的勾结与分工。

在掌管政权的统治者和工农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存在着中、小资本家，官员和知识分子。根据当时的观念，由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处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因而把他们称为“中间阶层”。尽管上流社会从来也没有把这些“中间阶层”作为整体接受到自己的圈子中去，但这些人出于幻想，或出于自己的利益，还是把自己想象成是侧身于上流社会的人。这样一来他们就严重地脱离了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并且和统治阶级一起构成了类似种姓制度、似乎是高不可攀和封闭的特殊的匈牙利式“贵族社会”。

国家和人民

二十世纪前十年，匈牙利的人口——包括霍尔瓦特—斯拉沃尼亚在内——曾达到两千万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人口的增长，用今天的话说，已经达到人口学的顶点了。自1867年妥协以后，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即从一千五百四十万增长到二千零九十万。其中一千八百三十万生活在本土，二百六十万在霍尔瓦特—斯拉沃尼亚。如果按匈牙利今天的领土进行折算，这个发展也是迅速的、持久的和均衡的。1869年，在今日匈牙利领土范围内居住的人口是五百万，1880年接近五百五十万，1900年六百七十五万多人，1910年则接近七百七十五万人。四十年内，每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密度从五十三点九人增加到八十一点八人。

这个人口增长的幅度在全国各地并不平衡。最突出的就是首 247 都人口的增长，1869 年，它的居民是二十七万人，到 1910 年就发展到八十八万零三百七十一人，成为世界性的大城市。这一时期首都人口增长三两倍，其他城市增长还不到一倍，而农村人口仅仅增长了四分之一。这个统计数字向我们描绘了由于工业和文化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都市化的演变过程。

随着人口迅速而大量的流入城市，传统的居住范围被破坏了。成千上万的人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独家村搬到村镇，村镇上的人迁往城市，而地方城市又向布达佩斯集中，去寻找更好、更轻松、收入更多一点的工作，以便摆脱贫困和屈辱的农民生活。人口的主要流向是离开田地到城市去做工。农业无产者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体。流向城市的还有地方上中间阶层的小人物、知识分子、职员以及无业游民。他们受着商业、交通运输业、娱乐业和通讯事业快速发展的吸引，试图去碰碰运气，一部分人只是为了取得较好的糊口机会，而另一部分人则为着谋取功名或发财致富。这个宏大的、在组成上是极其复杂的潮流和他们带去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生活方式，使得城市，特别是首都的气氛变得光怪陆离，各种各样的矛盾也伴随而来了。抢劫、暗杀和巨大的贪污盗窃以及犯罪、卖淫、一些人的飞黄腾达以及迅速垮台几乎成了新闻报道的经常内容。

布达佩斯在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没有哪个城市能和它相比。但是尽管如此，在高速发展的地方城市中也形成了一些经济和文化中心。费乌迈[①]成了商业和工业中心，同时又是全国最大的港口；纳吉瓦劳德[②]是文化中心之一；米什科尔茨是工业基地；泰迈什瓦尔是大的商业城市；

① 今南斯拉夫的里也考港口。

② 即今罗马尼亚境内的蒂米什瓦拉。

科洛什瓦尔① 则成了埃尔代伊的文化重镇。

但是都市化的过程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人口的结构。1910年全国居民中农业人口依然高达64%，差不多80%的人居住在农村，或住在大地主的庄园里。在城市谋生，但家住农村的工业工人、建筑工人和挖土工人，象是一扇扇开向城市的窗户，使农村的人多少了解到城市的一些情况。尽管对城市生活的响往还没有席卷农村，但对于那些已经离开农村到城市的工人来说，地方主义的观念在思想中已是愈来愈淡薄了。

就居民的内部职业分工来说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居民的三分之二仍从事农业，但已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工业和商业部门工作。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中间阶层的比例数字的增长，如果说在农村还不明显，那么在城市就变得愈来愈大了。国家机构的行政部门，教育和卫生系统以及交通、商业和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各行各业，如新闻，水电，煤气以及其它的服务性行业的兴建促使了这个阶层的形成。城市越大，城市特点越突出，中间阶层的比例就越大。布达佩斯是最明显的例子，在居民总人口中，从事商业和信贷业的职工人数增加一倍，在二元制时期公务员人数比工人人数的增加要快二倍。

人口结构的变化并没有缓和社会紧张状况，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高傲的贵族以及花天酒地的大资本家与全国70—80%的贫苦人民——工人和农民——形成了尖锐的对比。绝大多数的居民家庭住在布达佩斯和其它大城市最典型的、只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的住宅里，工人家庭的居住条件也是如此。在农村，大地主家漂亮的高楼大院高高耸立在农民的那种茅草屋顶、小窗户、泥地、生火炉或在院子里做饭的小屋群中间。贫农和雇农房

① 即今罗马尼亚境内的克卢日。

中的一切摆设仍按照上世纪留传下来的模式。住在城市的许多居民不得不在只有硬铁床、草褥子和只有最简陋家具的租赁房子里忍受着凄凉生活的煎熬。随着国家机构的建立，二十多年来建立了医疗、司法、公安和学校网。城市的发展建立了供水、取暖、照明系统。但是在农村，有的孩子冬天由于缺乏必需的御寒衣物，特别是因为没有鞋子而不能去学校念书，春天和秋天又得充当父母必不可少的劳动助手，因为只有全家都参加劳动才能保证冬天有粮食和柴火。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无怪匈牙利是欧洲各国死亡人数比例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平均有七万人死于肺病。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尽管当时全国已经有六千二百个医生，二千四百个药房，四百六十二座医院，但也无济于事。而一些城市的资产阶级却住在有三、四个房间，在现代化的住宅里，过着舒适富裕的生活。统治阶级无力来保证全国大多数的人民能过起码的人的生活。

奥匈帝国和民族主义

当时的政治生活从大的范围来看，是由“帝国是奥匈共处的”这一特点决定的。在这个具有两个中心的国家，匈牙利具有两种命运。虽然到十九世纪末，匈牙利在帝国内部的地位有所加强，并且在单纯的内政问题上有独立的决定权，但在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军事上——在有关全帝国的一系列问题上总是由外国人在 249 外国，由紧紧抓住德语军队的维也纳宫廷以共同的皇帝和国王的名义来决定的。在“共同事务”中，王朝两部分之间的力量消长决定着匈牙利的分量。——而在关税、财政及其它“共同事务”的讨论中，民族矛盾继续存在，甚至越来越尖锐化了。民族的屈辱激

起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自尊感，真正的和传闻的屈辱在全国差不多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引起反响。在维护独立民族的存在和尊严的旗帜后面是人们对更好、更人道、更自由的生活的向往，他们认为，痛苦命运的根源来自外国人的统治。他们向往的是伊斯特万和马加什国王式的一个伟大而独立的和（他们认为）可以给人民以幸福生活的国家。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统治阶级和中间阶层往往用民族主义来遮盖他们的政治权术、猎取名声、摆脱厄运或掩盖派别斗争的真正面目。他们甚至常常还进行极端荒唐的尝试：设法把民族主义的空话和对王朝的忠诚结合起来。

匈牙利统治阶级认为，随心所欲地压迫占当时匈牙利人口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是理所当然的。统治阶级还从历史的角度来设法证明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正确的，他们把版图最大时独立的匈牙利作为根据。他们为了把更多的人民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便制造了建立匈牙利帝国的梦想。他们说历史上曾有过"三面环海……"的拉约什大王时期和巴托里时代的匈牙利—波兰王国。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招牌，用引证历史的办法，为的是继续保持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保留封建残余。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在匈牙利历史上是有其反动传统的。

但是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已经无法加以长期阻挡了。已经形成的民族知识分子被推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前列。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到来的民族运动过程使二元制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统治半个世纪之久的老皇帝和国王弗兰西斯·约瑟夫及其御前智囊则顽固地坚持其统治的旧手段，即维持当年的"妥协"原状和两个中心（二元制）的帝国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匈牙利统治阶级顽固坚持压迫自己的少数民族，坚持原封不动地保留一千年的"匈牙利王朝"，无疑只能加强维也纳宫廷的力量。但是在这个帝国中，继续坚持腐朽的"分而治之"的做法已

越来越不行了。北方的捷克、波兰，南方的塞尔维亚和达尔马提人，匈牙利土地上的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霍尔瓦特和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人等少数民族运动如火如荼。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削弱，相反却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斗争。帝国四邻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都支持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为争取独立自主的民族生活而进行的斗争。

资本主义的发展敲响了没落帝国的丧钟。这丧钟惊醒了一些 250 人，并促使他们改革二元制的国家制度以期免遭覆灭。改造帝国的方案一个接一个的产生了。这些方案的一部分是那个臭名昭著、仇视匈牙利人、急不可待地等着继位的王储弗兰西斯·斐迪南为首制定的。他企图把两个中心的国家改造成为三个中心的国家(即三元制)，这在短期内也许可以安抚捷克的统治集团，但却遭到匈牙利人的强烈反对。至于用建筑在民族原则上的国家联盟来代替帝国的地区原则，更被事实证明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拟订这些草案的人已经做得太晚了，用暴力支撑了几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最终由于弗兰西斯·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而引起的世界大战的风暴所摧毁。

两个世纪之交的议会斗争

庆祝匈牙利建国一千周年活动所带来的本世纪初的政治稳定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899年，手段灵活的塞尔·卡尔曼取代以暴力闻名的班菲男爵当了总理。班菲因其残暴被人民称为“多波卡巴夏”①。塞尔·卡尔曼对工人农民运动实行镇压，在政党和议

① 土耳其统治时期的一个残暴的官员。

会中实行温和的政策，并未能使国家的安定保持多久。1903 年，政府根据维也纳宫廷的旨意，向议会提出扩大新兵招募数字 25% 的草案。草案始而在国会，继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匈牙利的青年要在黑一黄条旗下，接受德语号令，为帝国利益卖命，这一事实差不多激怒了匈牙利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们要求建立一支使用匈牙利号令、由匈牙利人指挥、驻扎在匈牙利领土上的民族军队。这一要求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赞同。人民的这种情绪也符合地主和贵族的利益，因为他们希望能保证自己的子弟获得军官的头衔，此外他们还认为拥有一支民族的军队要比统一的、受维也纳指挥的共同军队更便于去镇压少数民族。议会起初试图在避开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取得舆论的支持。因此选择了以无休止的讨论和冗长的发言以及用妨碍议事的办法作为斗争方式。于是议会内互相谩骂和胡闹等层出不穷。反对扩大新兵招募数字、要求建立匈牙利军队的外地代表团也络绎不绝地来会见众议院议长。

塞尔·卡尔曼企图以耐心等待的策略拖垮反对派，而以蒂萨·伊斯特万为首的一些人则准备以暴力来消灭反对派的对立。皇帝听从了急躁的皇储弗兰西斯·斐迪南的意见，把击败匈牙利议会对抗行动的希望寄托在蒂萨·伊斯特万身上。蒂萨是匈牙利统治阶级一个最有代表性、最坚决、最残暴的人物。匈牙利伟大的诗人奥地·安德烈生动地把蒂萨称为是一个“野蛮的生番”，“放火的野人”，“当地主和做农民都是废料”。蒂萨以他的疯狂性和顽

251 固性着手破坏反对派的对抗。他建议用公开而暴烈的手段终止议会反对派的抵制行动，并要求修改议会法规。蒂萨的方案引起了激烈的反应，甚至他原先的一些追随者也纷纷动摇了。他放的这把火起初是烈焰冲天，但很快就熄灭了。议会的愤怒和对抗行为在一位幻想回到库鲁茨① 时代的议员、历史学家、诗人泰尔·卡

① 十八世纪初的拉科齐自由战争年代。

尔曼于1904年3月5日提出妥协方案而暂告平息。反对派同意在突发事件时批准“新兵招募法”，而蒂萨则放弃了他的议会修改法。

但是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蒂萨重新挑起争端。他在1904年10月的公开信中谴责反对派在“新兵招募法”中所采取的“妨碍议事”的活动中进行挑衅，以此准备发起新的攻势，修改议会法规。果然，仅仅过了一个月，他不顾议会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又重新提出议会法规修正案，并且在11月18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通过。

这一粗暴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反对派的各个党派在反对蒂萨的斗争中开始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在12月13日重新召开的议会上，反对派的代表们捣毁了会议厅的全部设备，这就足以证明议会斗争的激烈程度和贵族地主反对派的斗争方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蒂萨和他的党在1905年1月份的选举中遭 252 到彻底失败就不足为奇了。几个反对党组成了联盟：齐奇·南多尔伯爵的天主教人民党，独立48年党，和以小安德拉希·久拉伯爵为首的从自由党里分裂出来的人以及其他一些小党总共以二百五十四票对一百五十九票的优势击败了统治匈牙利达三十年之久的自由党人。蒂萨被迫退位。但一贯鼓吹宪法神圣和历来装得尊重法制的老国王无视选民的意愿，拒绝让反对党联盟执政，而指定他的亲信、私人卫队长费耶尔·盖萨组织无党派政府。这个无论在思想方法上和行动上都是典型军人的总理——因为他以前当过卫队长，因此他的政府也被称作是卫兵政府——把政府看成是贯彻国王命令的机关，一旦遭到抵制，便诉诸暴力。1月21日议会举行首次会议的时候，反对派根据科苏特·费伦茨① 的建议，

① 科苏特·拉约什的儿子。

认为政府是违背宪法的，并且宣布实行消极抵抗。各个州和市的行政机关都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就连国王委派下去的特使也无法整顿秩序。政府的实权已缩小到最低限度，而大部分实权则集中在反对派联盟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委任联盟派执掌国家大权，要么寻找另外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惯于欺骗人民的维也纳宫廷选择了后一种解决办法。根据内务部长克利斯多夫的建议，国王尽管多方犹豫但出于无奈，决定实行普选。维也纳宫廷和卫兵政府的幻想是，工人和农民将不会选举联盟派。

国王答应实行普遍和秘密选举，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这是不难理解的。在这以前，全国总人口中只有6.29%的人有选举权，而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对国家事务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工人阶级唯一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没有一个代表，就是最好的明证。工人运动日益加强，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正如伟大的诗人奥地·安德烈所预料的那样，"匈牙利将要有事情发生。"

252

联盟派的统治及其失败

本世纪初发生过几起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和游行。早在1901年，建筑、钢铁和五金工人就举行过游行，并且发生了工人和警察的流血冲突，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1901年在布达佩斯和许多外地城市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提出"要工作，要面包"，"给人民以权利"等口号。在这以前的几年中，全国差

253 不多每个工厂都举行过游行。光是1903年一年就发生了八百起要

求提高工资的行动，接着，1904 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同一年，在埃莱什特还发生了震憾全世界的警察枪杀示威的农业工人事件。

议会内的斗争也很激烈。国家政权变得软弱无力。当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时候，1905 年 1 月 25 日，布达佩斯传来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和“血腥的星期日”的消息。这消息对于各种矛盾已经激化的匈牙利社会说来就象一粒种子掉进了最肥沃的土壤里一样。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爆发了支持俄国革命的示威游行，举行群众集会，发表给俄国人表示祝贺的宣言。工人和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资产阶级政党和议会的反对派则以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的事例向国王发出威胁，力图迫使他做出让步，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妥协。

在矛盾激化期间，一方面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是专制统治阶级和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发生了冲突。这时，维也纳宫廷答应实行普遍和秘密选举，因而赢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支持，维也纳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破坏联盟派的统一了。

国王对普选权的允诺使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忘记了一切。今天我们如果不加分析地谴责当时那些由于相信统治者会实现诺言 254 而起来反对联盟派的人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人们当时对联盟派没有理由抱太多的希望，相反，在奥地利大选以后，考虑到也许维也纳宫廷信守诺言，在匈牙利实行普遍和秘密选举还有其一定的现实性。社会民主党的错误并不在于在这个问题上的目光短浅，而在于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一张王牌上，从而把工人阶级爆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引入歧途。正如《人民之声报》所写，全国“到处都动员起来了。”激烈的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1905 年 5 月发生了有三万人参加、持续数周之久的钢铁工人罢工，接

着是三千矿工的罢工，之后是多瑙河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参加罢工的农业工人、短工以及地主庄园的雇工勇敢地面对武装的士兵，有些地区的农民还用木棒和铁叉和警察、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把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情绪纳上了为争取普遍和秘密选举权而进行斗争的轨道，这无疑有助于卫兵政府，而且在软化联盟派方面也起了作用。但是普遍和秘密选举权并没有争取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成了统治阶级之间进行权力角逐中的玩偶，当它一旦对维也纳宫廷来说失去作用时，便可被任意抛弃。

现在是联盟派进行抉择的时候了：能不能把劳动阶级也团结在争取宪法的战斗中来？还是向统治阶级妥协？他们选择了后者。1906年4月，联盟派和维也纳宫廷达成协议。他们放弃了信誓旦旦的民族纲领，不再坚持在军队中使用匈牙利语和匈牙利号令，同意扩大招兵数字，放弃要求建立独立自主的关税区域，承认奥地利所签订的一切贸易条约。这样，维也纳宫廷便很高兴地从日程表上抹去了普遍和秘密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障碍阻止联盟派组织政府了。由于领导人短浅的目光而被维也纳宫廷所欺骗的工人阶级发现自己昨天的政敌和昨天策略上的同盟者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所唯一能勉强引以自慰的只是：维也纳也抛弃了昔日的奴仆，而于4月让联盟派的维克莱·山多尔当了总理。

聚集在联盟派内的、原反对派各党派的政策之间孕育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打着48年的独立纲领旗帜在联盟派内取得领导地位的独立党试图把原先的、以48年政纲为基础的独立口号和1867年的妥协精神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联盟派的统治只不过如昙花一现。所有那些在争夺政权时期的联合力量现在都变成了破坏因素。当他们还处在反对派地位的时候，提出一些受人欢迎的口号和许下大堆诺言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联盟派是和维也纳

宫廷达成协议而爬上统治地位的这件事本身就和联盟派内大多数党十几年来的宣传纲领发生了矛盾。上台后的联盟派无论是自己 255 当日的诺言，或是人民的要求，一切都不打算兑现。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仅失去大部分拥护自己的人，而且也没能争取到其他的社会支持。联盟派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措施使得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政府了。联盟政府对于人民的反抗则采取禁止集会和结社权利作为回答。

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翼反对派力量日趋增长和壮大。1906 年，在具有特殊理论修养的绍波·埃尔文指导下开始在党内进行了为思想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以后又成立了以奥尔帕里·久拉为首的党的革命派。派别是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斗争的影响下成立的。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见扩大，群众基础愈来愈广泛。1906 年工会会员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十三万人，如果加上农业工人协会会员，人数超过了十六万人。游行次数也从 1905 年的三百四十六次增加到 1906 年的六百二十五次，即将近两倍。

被社会民主党摈弃在外的农民为争取改善自己极端困苦的命运所进行的斗争也与日俱增。由于贫困，成千上万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成群流亡。到了 1907 年，向外移民的人数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大部分前往“自由就业的乐土”美国。有的整条街，整个村庄都变得空无一人。被钉上了钉子的窗户，以及毫无希望地等待着成堆美元和丈夫归来的妇女和孩子象征着匈牙利农民的命运。国家尚存，但人民却在受苦。

自然，大多数的农民还是在家乡寻找谋生的出路。经过多次 256 自发的运动，在秋收罢工和其它形式的斗争后农民组织起来了，并从中获得了新的力量。1906 年贝凯什乔鲍的“民意代表”、农民利益的忠诚代表者、封建匈牙利的抨击者阿希姆·安德拉什组织

了一个农民党——匈牙利独立社会主义农民党。他们的纲领是对一万霍尔特，以后又规定对一千霍尔特以上的大地产进行分配和低租金出租，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和民族的要求，赢得了蒂萨河以东地区大量农民群众的支持。尽管统治阶级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并于1908年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会上，作为农民斗争象征的多热·久尔吉的塑像揭幕，有四百个村庄派代表参加。但是，这位在封建的匈牙利社会环境中坚决维护农民利益、热情的阿希姆却在1911年被蒂萨河以东地区大地主日林斯基的两个儿子杀害了，而凶手居然没有受到惩处。纳焦塔蒂·萨波·伊斯特万于1909年组织的全国独立和48年农民党——尽管包括了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阶层——没有执行阿希姆的政策。

政府执行鼠目寸光和急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1907年10月27日的切尔诺瓦枪杀事件。以少数民族政治家、神甫赫林卡为首的农民群众为纪念教堂落成而举行集会时，警察开枪射击，打死15人，伤多人。但最大的一次斗争则是发生在霍尔瓦特[1]地区。事件的引起是由于政府公布了把懂匈语作为录用铁路职工先决条件的规定。但霍尔瓦特人在1908年9月的选举中，霍尔瓦特和塞尔维亚联合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对上述规定的有力回答。然而政府全然不顾选举的结果，在霍尔瓦特境内实行了专制政体，并捏造假证据以所谓出卖祖国的罪名对霍尔瓦特的领导人分别判处5—12年重刑，投入监狱。

1908年11月，政府通过一个新的选举法草案来代替陷于危机的选举改革——因为这事实上已无法回避了——更加激起全国人民对联盟派执政的普遍不满。这个选举法草案规定：凡二十四岁以上的有文化的男子可得到一张选票，在三十二岁以上的人中

257

① 今克罗地亚。

间，如果具有中学毕业文化程度、有三个孩子或者纳税二十克朗以上者，可领到二张选票；如果中学毕业或纳税一百克朗以上者，可领到三张选票。另外，占全国人口65%的文盲中，每十二个人只能合有一张选票。这个完全无视普遍和秘密选举权的所谓草案就连议会也未予通过。大多数代表拒绝这个计划，而在群众中则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此在执政三年以后，即1910年1月，当国王干脆把联盟派政府抛弃，另在老自由党的人物中，即在蒂萨的拥护者中挑选库恩·黑代尔瓦里·卡罗伊组织政府时，全国不但没有引起愤怒，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松了一口气。1910年6月 258 的选举中，新政府得到议会绝大多数的席位。改名为民族工党的自由党，重新在议会中成为有决定影响的大党。

准备世界大战

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的世界正在走向大战。在十九世纪瓜分殖民地中落伍的列强，特别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希望重新瓜分世界，而正在奴役着非洲、亚洲、澳洲和美洲大多数国家人民的英国和法国则力图保持原来的殖民地。新、老强盗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1891—1893年形成的法—俄同盟，1894年形成的英—法同盟，到1907年就扩大成英—法—俄三国同盟。这样，在德—奥匈—意同盟国的对立面出现了拥有强大力量的协约国。

德国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奥匈帝国所推行的讹诈政策使欧洲变成了火药库。由同盟国的侵略行径而引起的火星随时都可能引起席卷全球的大战。1908年，在匈牙利政府赞许下，奥匈帝国不顾 259 俄国的反对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严重伤害了南部斯拉夫人民，特别是塞尔维亚的利益。由于俄国准备不足，还没有足

够的力量在瓜分“欧洲病夫”——土耳其在巴尔干的财产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延缓了战争。但接着，为争夺四分五裂的土耳其帝国的遗产而爆发的 1912 和 1913 年的巴尔干战争，促使两个集团加速了对战争的准备。

尽管战争阴云四起，布达佩斯依旧歌舞升平。经过半世纪的和平生活以后的人们已没有战争恐怖的直接感受，同时也由于狂热的民族主义高唱入云，一些人全力进行着虚伪而好战的匈牙利传统教育，因此在首都并没有形成反战的气氛。这时期，布达佩斯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城市，它的情绪对全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有着沸腾生活，既有资本主义的富裕，又有工人阶级贫困的城市准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性。大环形路两边的豪华建筑已经完工。由哈乌蒙·拉约什设计改建的王宫与在多瑙河另一边耸立着的国会大厦隔岸相望，显示着匈牙利统治阶级的雄心壮志。和内城的繁华及座落在王宫所在地城堡山附近贵族聚居区的高雅和特利莎城区[①]的富裕生活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费伦茨城区、安焦尔费尔德城区[②]、市郊的贫民窟以及郊区的落后面貌。但是活跃的文化生活已经冲破小小的内城范围，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已开始转向人民，激进的政治家开始抨击带有封建残余的匈牙利社会制度，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具有或者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在蒙卡奇·米哈伊，西奈伊·迈尔谢·帕尔以及费涅什·阿道夫的美术创作中已出现普通老百姓的形象，而凯恩什多克已经在他的作品中描绘工人的生活和战斗了。巴尔托克和柯达伊在格调不高的吉卜赛音乐、肤浅的轻歌剧、以及虽然别出心裁，但却是玩世不恭的轻歌漫舞的首都音乐舞台上为反映匈牙

① 特利莎城区相当于今第六区。

② 费伦茨城区相当于今第九区。
安焦尔费尔德城区相当于今第十三区。

利人民精神世界的音乐争得了一席之地。团结在《西方》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则把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努力寻找出路作为己任。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奥地·安德烈。这个生长于祖国落后的土地却又受到资产阶级的巴黎的熏陶、天才的革命预言家已经从“一切美好和希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中看到了未来。社会民主党人绍波·埃尔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匈文；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亚西·奥斯卡尔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索祖国未来的道路。

一次新的革命正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酝酿着。地主庄园的雇工开始从中世纪贫困和愚昧的睡梦中惊醒，工人阶级正在成长为觉悟的和战斗的阶级，而统治阶级内部则越来越绽露出崩溃将要来临。

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和平稳定还在表面上维持着。在议会几经斗争以后，好象重新恢复了平静。1912 年春，库恩·黑代尔瓦里政府垮台，由卢卡奇·拉斯洛组阁，他同样是工党成员，情况依然如故，工人为争取普遍和秘密选举权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此伏彼起，而这些活动又都以警察的残酷镇压而告结束。

1912 年 5 月 22 日，蒂萨·伊斯特万当了议长。社会民主党号召工人起来和蒂萨在议会的独裁行为作斗争。第二天，空前规模的群众队伍涌向布达佩斯街头，高呼口号“普遍和秘密选举权 261 万岁！”“打倒蒂萨匪帮！”后来又提出“人民议会万岁！”“打倒独裁专制！”“打倒以蒂萨为首的匪帮！”“革命万岁！”等口号。共有四千人的群众队伍缓缓向市中心进发。当行进到斐迪南桥头时和警察相遇。警察命令游行队伍停止前进。群众高喊着：

“让我们到国会大厦去！我们要抗议蒂萨的暴行！打倒阶级议会！”警察当即拔出刺刀进行威胁。游行群众则报之以石块。如拳头大小的石块、砖头以及铁块投向警察。警察的警戒线很快被

冲破。——《人民之声报》就是这样报导"血腥的星期四"的一个场面。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感到自己象是歌德所描写的魔术师一样，他把魔鬼唤起，但却无法控制它①。被工人阶级的激情、政府军事法庭审讯的威胁以及被捕的危险所吓倒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制肘，宪兵、警察、军队残酷的镇压，使这场工人示威游行没有来得及发展成起义就被镇压了。电车和马车翻倒在街上，煤气路灯还在燃烧，到处都是被推倒的街垒和一堆堆石块，冲突中有六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切都说明这一天战斗的激烈程度。工人阶级这一次空前规模和激烈的示威游行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激励了全国最优秀的分子。鲍比奇②在他的题为《5月23日在拉科什保洛陶》的一首诗中写道："在如此多的谎言和纵饮作乐之后，真理总该到来了"。

蒂萨一伙利用工人阶级的示威游行对反对派实行暴力镇压。他们用武力把反对派排挤出议会，强行通过长期拖延下来的有关加强军事力量的草案，并且开始加紧备战。他们通过法令，规定在战争情况下将授于政府的特权。另一个法令还规定在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必须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制定这些法令都是为帝国主义战争做准备。一年以后，"欧洲最大的骗子手"——卢卡奇放弃总理的宝座，让位给首领蒂萨·伊斯特万。1911—1912年之间反战呼声低沉下来了。工人阶级反战的示威游行也不再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积极行动被软弱无力的新闻空谈所代替。聚集在伽利略小组里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议论消失在喧嚣的大城市噪音之中。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储弗兰西斯·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学生高弗里洛·普里齐普刺死

① 典故出自歌德名著《浮士德》。

② 匈牙利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家和诗人。

的消息传到了布达佩斯。当全国清醒过来的时候，在各建筑物的墙上都已挂满了老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话："一切我都想到了，一切我早就考虑好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了。

大　战

萨拉热窝决定性的枪响以后，战争的歇斯底里笼罩着全帝国。武装侵犯邻国是早有预谋的，现在可以利用的借口也有了。几年来，帝国政界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用武力讨伐塞尔维亚势在必行，因为它是奥匈在巴尔干实行侵略政策的障碍。而德国好战的领导集团多年来一直在准备用武力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德国早就在准备两条战线的作战计划，即臭名昭著的史里芬计划，其中心就是用闪电战术占领法国。他们认为实现既定计划的时刻到来了。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民群众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了。奥波尼①把一个仇恨匈牙利，而同时又被匈牙利人所仇恨的皇储一下子说成是"有天才、有抱负、有理想的王公后代"，安德拉希②还在议会中声称："他充满了高尚的理想和情操，他想利用这些来为帝国各民族服务……他所以遭到暗杀，是因为他是匈牙利根本利益所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急忙表示支持战争。亲西方的卡罗利集团以及资产阶级激进派微弱的反战声音完全被淹没在支持战争的一片喧嚣之中。社会民主党根据第二国际的原则及其通过的决议精神站出来反对战争，极力制止工人中的战争情绪。但这些微弱的反抗行动未能持续多久。首先是卡罗利党及激进派表示 263 愿意和同盟国参战政府合作，然后是社会民主党——步德国的社

① 当时是独立党的领袖。

② 宪法党的领袖，曾任匈总理，当时是帝国外交部长。

会民主党后尘——在7月底也妥协并加入了战争的煽动者行列。

军队总参谋部从萨拉热窝行刺事件发生后就立即鼓吹进行战争。他们在德国的帮助下很快说服了蒂萨（他由于担心时机选择不好而正在犹豫不决。）7月23日，奥匈政府向塞尔维亚提出条件十分苛刻的（根本无法实现的）最后通牒，并且不等回答就进行战争动员。五天以后对塞尔维亚宣战。闸门打开了：几天后俄国对奥匈宣战，德国对俄、法宣战，然后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开始了。

德国的战略是根据史里芬几年前制订的计划进行的。他们计划，全付武装的德国军队越过中立的比利时，在几周内占领法国，同时由奥匈军队来对付行动缓慢、准备尚未就绪的俄国军队。占领法国以后，两支军队再联合进攻俄国。因此奥匈军队从一开始就需要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军队的五分之四派往加里西亚去阻止可能配备大量兵力的俄军前进，并且要一直坚持到德军在西线取得胜利，并把军队的大部分投向东线为止。

9月11日，进展迅速的德国军队在马恩河附近遭到法国军队264的阻挡。至此闪电战计划宣告失败，德国被迫在西线进行持久的"阵地战"，并且不得不把大批军队投到东线以牵制正在前进的俄国军队。但是在塞尔维亚战场战果也并不理想。在暂时的胜利之后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失败。由于KUK（皇帝和国王）军队总参谋部的无能，使帝国在几个月之内就损失一百万人，从而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参战双方在第二年都集中了全部力量，在异常激烈、不惜作出最大的人力和物力牺牲，企图在战场上决一胜负。匈牙利士兵几个月来守卫着波兰的普热梅希尔要塞，备受大炮和攻击的折磨，但最后还是未能守位。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这时才感到战争并不象刚刚开始时向他们保证的那样会很快结束，现在他们不得不忍受

着地狱般的煎熬。

自从德军在比利时的依普尔发动大规模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就和奥匈军队一起在东线的高尔利采附近突破俄军阵地，并迫使俄军退出波兰国土。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参战以后，匈牙利士兵在伊崇佐战役中和多贝尔多高地的浴血战斗中吃尽了苦头。1915年10月保加利亚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塞尔维亚垮台了。占领者到处抢劫并惨无人道地迫害当地居民。 265

1916年，尽管牺牲了百万人的生命和无可计量的物质损失，也未能使两大列强集团的交量决出胜负。德国差不多用了十个月时间来围攻凡尔登地区的法军阵地，而英、法军队则在索姆河畔发动大规模反攻作为回答。英国初次使用新发明的钢铁巨物——坦克，引起德国的惊慌失措，而德国则使用毒瓦斯，使法军造成数以万计的死亡。与此同时，布鲁西洛夫将军在东线发动攻势袭击奥匈军队，俄国军队又重新进入喀尔巴阡山。只是由于德国的迅速援助，才使奥匈军队免遭全军覆没。

力量对比的变化吸引了罗马尼亚参加反对同盟国的作战，但是自从8月27日罗马尼亚正式宣战以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被同盟国军队打败并且占领了全国。

战争的第三年，各交战国都已精疲力竭，尤其是俄国和奥匈帝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266

1914年那种对战争的狂热和团结一致的现象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大战开始时匈牙利所有的政党言归于好，一致支持战争，并且感到自己肩负着去“解放”在沙皇统治下呻吟的俄国人民的使命。

战争的拖延、流血牺牲和接连不断的失败，加上贫困，使气氛彻底改变了。满载士兵的列车再也看不见欢送的人群，看不见乐善好施的贵妇人和各类团体赠送的礼物，再也听不到欢送的代

表团热情的讲演，只有失望伴随着他们开往前线。妇女和儿童代替了去前线的男子的工作。由于劳动力缺乏和原料的消耗，生产直线下降，物资奇缺已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1916年的谷物产量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二，1918年又降到二分之一。与食品和工业品奇缺的同时，货币发行量却达到战前的十五倍。物价上涨二倍，但工资仅提高一半。全国几乎很少有哪个家庭没有死人或者不盼望着远方儿子的归来。许多家庭因失去男劳动力而痛苦、悲伤。267 与此相反，那些军火商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排着长长的行列而经常买不到东西的人们，没有暖气设备房子里的住户，穿着破烂军服的孩子们，沿街乞讨的残废士兵，无一不用憎恨的眼光看着那些时髦的、在战争中成了百万富翁的老爷们。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谁在战争中遭到损失，谁在战争中得到利益。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在思考战争究竟对他们有什么意义。社会民主党早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就开始反映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许多人认为，完全是为了德国人的利益而打仗。早在1915年底，卡罗利·米哈依伯爵就提出缔结单独和约的设想，1916年夏又组织了一个新党，其纲领是：缔结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和把奥匈帝国改造成为一个同一统治者的联邦。同时还要求独立自主的关税区，独立的货币，独立的军队，普选权，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信贷政策。其他的资产阶级力量也行动起来了。国家开始瓦解。象征这场崩溃的是1916年11月21日，统治了将近七十年死板而僵化的老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死了。新的、年轻的统治者查理四世感到威胁哈布斯堡王朝生存的暴风雨行将来临，于是对外签订和约，对内实行自由主义的改良以期挽救王朝的覆灭。他的含糊其词的和谈建议被协约国所拒绝，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和 269 谈建议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中。帝国主义的列强试图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和平尝试失败以后又重新诉诸武力。1917年2月，德国

决定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以为这样可以使协约国陷于饥饿境地并切断其原料来源，决定凡开向英国和法国的船只，不论挂有交战国或中立国的旗帜，一律击沉。这一政策促使拥有最大运输能力的美国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

1917年2月，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奥匈帝国被压迫的人民和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工人、农民和激进的资产阶级阶层纷纷向俄国人民表示祝贺，《人民之声报》，甚至资产阶级的报纸也刊登文章表示支持。《人民之声报》撰文祝贺俄国人民革命的理想得以实现，资产阶级报刊则认为俄国专制制度被推翻会给帝国领导人以压力，同时也为同盟国的对立面俄国沙皇制度的被推翻而高兴。在前线打仗的匈牙利士兵和俄国士兵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从互相残杀变为友好，正象一个传单上写的那样：“兄弟对兄弟，不要开炮，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和你们，大家都一样。”在匈牙利国内，罢工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交通、冶金、军工厂的工人和矿工。成千上万的人又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工会会员比1914 270 年增加了三倍。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由于普遍的不满情绪，就连以前那些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坚定的支柱的群众也开始组织起来参加阶级斗争了。”

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代表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形势正在“奔向革命”。群众的大多数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和平了。在普通人的脑子里已把对和平的设想和民主要求结合在一起。统治阶级已经无法用旧的方式来维持其统治。僵化的、顽固的蒂萨于5月份宣告下台。

不管是年轻的贵族埃斯代尔哈齐·莫里兹，还是后来上台的老策略家维克莱·山多尔政府都未能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

虽然在军事上曾一度出现过希望，但在外交上并没有取得实

质性的成功。法国军队4月大举反攻，被德军挫败，意大利也被奥匈帝国的军队击退一百公里之远。6月份俄军的攻势也遭失败。值得怀疑的军事上的利益导致了严重的政治上的损失，帝国的政策又转向武力解决。恰在这时，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和军事交量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那就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工人和农民大众推翻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271

“奔向革命”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当夜所发表的著名的和平和土地宣言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把来自遥远的彼得堡的消息看作是自己热烈愿望的体现。11月25日，上万群众聚集在工业大厅听取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演说家波卡尼·德热热情洋溢的演说。群情激昂，高呼口号：“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引的道路！社会民主革命万岁！”

革命力量只能暂时的被阻挡，要想压制它是再也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及资产阶级阵营的崩溃日益加剧，旧制度的信徒在减少，而革命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却在增加。

革命力量在增长。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的力量也逐渐壮大。除了奥尔帕里·久拉，拉斯洛·耶诺，鲁道什·拉斯洛，瓦戈·贝拉，瓦尔加·耶诺，桑托·贝拉以外，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反对派领导人，如朗德列尔·耶诺，汉布尔格·耶诺，尼斯托尔·久尔吉等。在自由职业者工会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有海韦希·久拉，凯莱·尤若夫，革命学生伽利略小组的领导人有科尔文·奥托，

绍洛伊·伊姆雷，里瓦伊·尤若夫和杜青什考·伊洛娜，他们通过莫肖伊戈·安道尔的关系和工人取得直接联系。广大群众愈来愈倾向于“革命社会主义者”——以亚西·奥斯卡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及和平的鼓吹者卡罗利·米哈依等。群众的要求、愿望和行动常常走在领导人的前面，他们对世界政治事件，特别对年底的俄—德之间的布列斯特和谈特别注意。1918年1月13日，社会民主党多次在首都召开群众大会，工人群众还组织大规模的罢工要求进行和谈。工人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了。聚集在伽利略小组周围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们已经号召人们起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了。有一个传单这样写道："支援俄国兄弟，准备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一切准备。"

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有在战场上取得巨大的胜利才有可能推迟革命的爆发。 272

3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5月布加勒斯特和约的表面胜利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多大反响。在佛兰德[①]的"百日大战"中德国遭到失败，接着6月份在法国又遭挫折，差不多同一时间皮亚韦河流域奥匈的攻势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使在前线的士兵和国内的人都感到彻底失望了。

愈来愈孤立的统治集团在国内时而实行微小的让步，时而又是残暴的镇压，对少数民族则是不痛不痒的改革和粗暴的威胁相交替，企图以此来挽救危局。布达佩斯城防司令官卢卡希契·盖萨把从前线逃回的士兵成百成百地拉去枪杀，企图以此来维护首都的治安，蒂萨·伊斯特万则前往巴尔干以期保持少数民族的稳定。但是士兵不再听从卢卡希契的指挥，蒂萨也遭到少数民族的嘲弄。有一次他在波斯尼亚政界人物面前一反和解姿态，失去自

① 在比利时。

制，敲着桌子喊道："也许我们将被消灭，但是在我们被消灭以前，先要消灭你们！"

奥匈帝国的统治阶层已经力不从心了。尽管2月份卡托罗①发生的海军起义被海军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在德国人的协助下镇压下去了，但是不服从命令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5月20日发生了佩奇士兵哗变。全国到处都是从前线撤退回来的士兵和逃兵，到1918年年中已超过十多万人。从俄国回来的士兵带回了他们对俄国人民革命的感受，并试图以此来批判造成他们个人和人民贫穷命运的根源。

祖国用来迎接从远方归来备受苦难的儿子们的礼物是监视、隔离、家庭的贫困、上涨了十五—二十倍的食物以及工业品的奇缺。他们回到祖国不仅得不到休息，相反又被迫回到另一个战场。失望和痛苦在加深，他们越来越感到，仿效俄国的榜样才是唯一出路。许多从俄国回来的士兵不仅带回了革命的纪念品，而且带回了革命的思想，因为早在3月24日就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库恩·贝拉为首的俄共(布)匈牙利小组。

这时的奥匈帝国已是穷途末路。同盟国在战场上土崩瓦解。9月底保加利亚，10月中土耳其相继放下武器。维也纳内阁象一个行将淹死的人一样抓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建议这根救命稻草，但也无济于事。查理皇帝10月16日宣布成立奥地利联邦试图缓和局势，而维克莱仍顽固坚持匈牙利所属国家保持完整这一立场。这时，少数民族的领导人已经不愿意谈判，不满足于微小的让步了，而是直截了当宣布自己国家的独立。10月27日，罗马尼亚议会宣布埃尔代伊并入罗马尼亚王国版图，10月28日，捷克民族议会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成立。第二天，霍尔瓦特议会宣

① 南斯拉夫港口，现名科托尔。

告加入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接着31日加里西亚乌克兰也脱离了奥匈帝国。协约国列强原先希望保住奥匈帝国，现在也转而支持希望脱离出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委员会了。

卡罗利·米哈依在10月16日召开的议会上说，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清算的丧钟已经敲响”。当卡罗利·米哈依在议会的吵闹声中结束讲话以后，蒂萨·伊斯特万也只得承认战争已经失败。全国陷入惊慌失措之中。看来，时间证明卡罗利是对的，是有远见的。平民百姓从卡罗利身上看到了民主的伟人，他犹如一群瞎子中唯一有视力的人，资本家认为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救星。人们倒向卡罗利一边，力量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民主的敌人已经十分软弱，以至完全没有力量进行自卫了。卡罗利等公开要求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他们来管理。但这一要求没有立即实现，于是在10月25日由社会民主党、激进派以及卡罗利的独立48年党的左派成立了以卡罗利为首的民族委员会。热烈支持民族委员会、反对当权政府的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已经把政权交给了民族委员会。当人们得知国王仍然没有任命卡罗利当总理时，10月27日首都人民以特别的热情欢迎从维也纳归来的卡罗利，并且准备到布达山上的王宫里去迫使约瑟夫亲王①任命卡罗利。游行队伍在链子桥头遭到警察的开枪射击。亲王虽然任命豪迪克当总理，但是这个没有任何权力的政府首脑两天之后就被迫让位给卡罗利了。

10月30日，广大群众涌向街头，行进队伍中还有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在东火车站，他们挡住了满载士兵准备开往前线的一列火车。士兵们也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们逮捕了城防司令官，开始占领军事和通讯要地。军人和老百姓向奥斯托里亚旅馆进发，准备向民族委员会宣誓。工人阶级举行了总罢工，并

① 奥皇兼匈牙利国王的代表。

和士兵一起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被卷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张传单上骄傲地宣称：

“工人们，同志们！

革命已经开始了！

阶级统治的利己主义不可避免地把国家推向了革命。支持民族委员会的部队星期三晚上未经流血就占领了首都各主要据点，邮政局，电话中心，并宣誓矢忠于民族委员会……”

政权已经转到在奥斯托里亚旅馆办公的民族委员会手中。但事实上，与其说是它在领导革命，还不如说它并非毫无惧怕地被卷入了革命的漩涡。警察局，政府机关的领导人，军官团，政界名流都鱼贯前来，表示效忠民族委员会。11 月 2 日，就连约瑟夫亲王本人也携带儿子向民族委员会宣读了誓言。

10 月 31 日，卡罗利在国王面前宣誓就职，出任总理。但是 276 革命群众对帝国已经厌倦了，不愿再有更多的国王和王国。11 月 13 日，查理国王被迫发表辞职声明：“……我辞去一切国家事务，我决定承认有关匈牙利未来国家形式的决定。”

当革命的总部民族委员会还在犹豫不决时，新的部长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还决定继续保持王国的国家形式，但愤怒的群众推翻了这个决定。11 月 16 日，在聚集于国会大厦前几十万人的欢呼声中宣布成立共和国。从而为匈牙利完全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提供了条件。

十一、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还面临着下列问题：能不能实现10月30日在奥斯托里亚旅馆门前庄严宣誓的群众、占领公共建筑物的士兵以及几天内就建立了许多农村委员会的农民和其他人们的愿望？能不能继续得到这些把民族委员会推上政权高峰（虽然它几乎是身不由己地被推上去的）群众的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是否有能力保证对外争取条件适当的和约，对内满足已取得的民主成果？

远远脱离了本阶级、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怀着责任感的、知识渊博的卡罗利·米哈依及其追随者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亲协约国的基础之上。他们不懂得从胜利了的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可能得到的只能是掠夺性的和约，敌人不会一下子变成朋友。他们力图向协约国证明，匈牙利已成为独立的国家，已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这一制度的领导人不是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继承人。匈牙利要作为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摇篮——德国进行谈判。

1913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和协约国在波多瓦市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默许战前的国界线为军事分界线；但同时又规定，凡向德国进攻的协约国军队可占领匈牙利任何战略要地。这就等于给法国军队以自由占领匈牙利国土的权利。

卡罗利政府满心希望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派出军事停战代表团去贝尔格莱德会见法军司令弗朗歇·德斯贝依。代表团由卡罗利亲自率领，成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孚众望的政治家，如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亚希·奥斯卡尔，社会民主党最有影响的演说家鲍卡尼·德热，作家代表霍特瓦尼·拉约什，士兵委员会创始人切尔亚克·伊姆雷。代表团遭到法国将军傲慢的接待。他甚至连卡罗利的陈述都没有听完。新的军事分界线是以拜斯泰尔采①—毛罗什河—绍鲍特考②—鲍亚③—佩奇和德拉瓦河为界。

278 和谈给卡罗利政权以重大的打击。打击的重大与其说是条件苛刻，还不如说是对亲协约国幻想的破灭。事情清楚地表明，协约国考虑的不是卡罗利的政策，而是在邻国正在成立的民族国家的利益。新的匈牙利将既不可能对这些民族国家施加影响，也无法阻止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其同族的民族国家进行合并。企图通过谈判使长期受帝国压迫的少数民族不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是徒劳的。眼看谈判已经绝望，资产阶级民主的匈牙利试图回过头来再诉诸武力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又力不从心。11月初，派往阻击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匈牙利部队在中途就自行瓦解了。新政权的领导人在十字路口束手无策：要么把武器交给人民，那么就得实现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否则，就只有听从比自己强大的邻国的摆布。国防部长利德奈尔·久拉以解散军队为己任，而他的继任者鲍尔塔·奥尔拜尔特却开始组织反革命的军官、大学生、警察、大平原的骑兵军团、地主武装以及沙文主义的埃尔代伊的塞凯伊军团④来代替解散了的军队。反动派不愿意有一

①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② 即今南斯拉夫的苏博蒂察。
③ 匈南部邻近南斯拉夫的城市。
④ 塞凯伊军团是由埃尔代伊的匈牙利人组成。

支人民的军队，而民主力量又制止了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建立。这样一来，国家实际上就没有任何有力的防御力量了。要想保持匈牙利当年的疆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卡罗利认为不能自动放弃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政策。在协约国的唆使下，在邻国军队已经逼进军事分界线的时候，国内舆论还在幻想让法军或英、法军队占领匈牙利。首先是南斯拉夫军队开进巴奇考一巴纳特城，这一行动得到匈国内南部斯拉夫少数民族的欢迎。然后，在11月中旬，驻扎在北部高地的匈军和捷克正规军遭遇。11月24日，罗马尼亚军开始进攻，很快，罗马尼亚族占居民大多数的埃尔代伊就脱离了匈牙利，接着匈牙利族占优势的地区也被占领了。

越来越多的领土脱离了匈牙利的版图。卡罗利政权在外交上的失败，对保卫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上的一筹莫展，使得很多群众离开了资产阶级民主营垒。受民族沙文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自感伤了民族自尊心的群众越来越认为卡罗利政权不能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继战争而来的穷困和民主改革的迟迟没有实现使工农群众也开始反对卡罗利政权了。

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中麕集了拥有形形色色观点的人物：既有公开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加拉米·埃尔诺，又有一贯热衷于搞调和的孔菲·日格蒙德，也有革命者朗德列尔·耶诺。大多数领导人代表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小了，而能够反映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党员的意愿的人在领导层中却占少数。也许是工人阶级团结的信念，但也许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才没有引起革命派公开分裂出去。但当在莫斯科成立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库恩·贝拉以及其他二十四名成员在11月底回到祖国以后，分裂还是出现了。1918年11月24日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共产党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有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苏俄

279

回到祖国的共产党员，不倦的革命战士、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和目光远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库恩·贝拉，有稍后回国的、热情而坚定的萨穆埃里·蒂波尔、万杜什·卡罗伊、波尔·埃尔诺，还有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卓越的理论家鲁道什·拉斯洛、桑托·贝拉、瓦戈·贝拉及其他人；有革命社会主义者、革命斗争中最坚定的战士之一科尔文·奥托等人。在党中央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创办《红色报》。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治准备工作中，这个报纸起了很突出的作用。《红色报》在第一期的社论中就写道：“实现社会主义的时期已经到来。无产阶级决心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和意志……。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匈牙利工人阶级，准备迎接必然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

党从它成立的时候起就公开宣布，它的目的是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并组织工人阶级为此而奋斗。失望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营垒涌向共产党。在匈牙利国家铁路局北方路段，在甘兹车辆厂，在小佩斯联合灯泡厂，在新佩斯甘兹造船厂以及首都许多大工厂中首先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外地工人也很快开始仿效布达佩斯的榜样组织起来了。正象工人和农民由于对民主改革的步伐迟缓深感不满而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营垒一样，那些地主和资本家却因民主改革步伐太快、在保护他们的利益方面不够坚定和得力，因而也对卡罗利政权不满。他们开始组织反革命的营垒。1918 年 12 月，在极右煽动分子贡伯什·久拉的指挥下，成立了以帕洛维齐尼伯爵为首的“匈牙利全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接着又成立了由旧军官和其他反动分子为核心的“匈牙利全国武装力量联合会”。1 月，一些从少数民族地区逃亡出来的、怒气冲天的反动财主和旧政府职员、极右军官以及一切反对民主制度的敌人又聚集在一个公开宣扬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组织内，即“匈牙利人觉醒社”。

280

在日益无能为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面前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它们都有可能决定今后事件发展的方向。一边是推动革命继续发展的人们，另一边则是反革命的信徒。至于人民群众支持哪一边，最好的证据莫过于“匈牙利人觉醒社”每逢开会，必须有警察的保护才能免遭愤怒的群众的袭击这样的事了。

失望的工人和农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从资产阶级民主那里不能得到的东西，必须自己去争取。革命浪潮席卷着全国。12月16日，塞格德市群众用武力赶走了政府机关反动的领导人，两周以后，凯奇凯梅特市的第十三骑兵团赶走了军官。12月30日，在波若尼市士兵委员会夺取了政权，第二天，绍尔戈陶尔扬的矿工，几天后甘兹发电厂等一系列工厂选出自己的代表管理工厂以取代被驱逐的旧领导。

卡罗利政府试图阻挡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涛。围绕着究竟是资产阶级的，是社会民主党的，还是联合的政府才有能力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这一中心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被请出来作为主要仲裁的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支持社会民主党组织政府，但事实上最后却只是由社会民主党派出几名部长去“加强”以拜林凯伊·德奈什为首的政府，而卡罗利则当选为临时共和国总统。

这个得到了社会民主党支持的、旨在争取稳定局面的新政府把粉碎共产党作为首要的任务。他们试图用温和的民主改良来消除人民的不满，用消灭共产党来打击革命力量，并借此来稳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设想无疑是有某些根据的。因为在这期间，取得对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的胜利还始终存在着可能性，——在德国又开始了对革命者的迫害，德国工运中两个杰出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但是，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群众不是向反动派，而是向共产党更加靠拢了。共产党公开宣称，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社会主

281 义”。“社会主义不仅能消灭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能消灭资本主义使人类堕落的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公有化可以恢复人们失去的信念，同时还可以把失去的劳动热情归还给人类……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匈牙利工人阶级，准备迎接必然到来、而且可以说已经到来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1918年12月7日的《红色报》这样写道。

在反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德国反动派反共取得胜利的气氛中，1919年1月24日，在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会议上经过挑衅性的争吵以后，共产党员从苏维埃组织和工会中被排挤了出去。接着，2月3日，大批警察又捣毁了《红色报》编辑部。做了这一切准备之后，他们又对参加维高多大厅①共产党集会后游行示威的群众开枪寻衅，寻找借口逮捕共产党领导人。

2月20日夜，匈牙利共产党四十六名著名的领导人被捕入狱。政府利用在示威过程发生的冲突中有三名警察死亡的事件大肆宣扬，为他们举行大规模葬礼，并唆使警察在监狱把库恩及其他人都打伤了。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282 三天以后，卡罗利·米哈依根据2月16日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精神举行仪式，把自己在卡尔卡波尔纳的地产进行分配。这个土地改革法规定，凡五百霍尔特以上的私有土地和二百霍尔特以上的教会土地在支付偿金后予以没收。

但是，卡罗利这一行动在大地主中间没有得到响应。他们尽一切办法来破坏耕者有其田这一人民法令的执行。但是农民却自行单方面执行这个法令了。从东部奥尔弗尔德大平原地区兴起的占领土地的运动到3月初就波及到了多瑙河以西地区。在绍莫吉州声势尤为浩大，团结在合作社周围的农民在洛廷卡·山多尔的率

---

① 布达佩斯的一个游艺场所。

领下占领了这个州大部分的可耕地。

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拜林凯伊目光短浅的设想很快变成泡影。对苏俄武装干涉的失败，德国工运的新高涨，协约国企图占领一批又一批新领土，在这种形势下迫害共产党的行径再也进行不下去了。3月3日，工人苏维埃号召不久前被开除出去的工人共产党员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共产党领导人在监狱继续指导运动，他们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

3月20日，协约国驻布达佩斯代表团团长、法军中校威克斯向卡罗利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确立中立区，它加速了资产阶级政府不可避免的垮台。根据照会精神，匈牙利领土将进一步缩小。以德布勒森—戴沃瓦尼—焦毛—欧罗什哈佐—霍德梅泽瓦沙尔海伊和塞格德一线作为国界。显然，不能指望协约国的要求和企望之中有任何善意，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边界变动从未考虑匈牙利人民的利益。一个国家只有显示力量，才能使自己的意志具有分量；而只有赢得人民支持的政府才能具备这种条件。现在就连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参加，他们就不可能继续统治下去。他们决定到监狱去找被羁押的共产党领导人，就成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谈判，于是在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制定的原则基础上就两党合并和联合接管政权达成了协议：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今天在双方领导联席会议上决定实行两党完全合并。

合并的新政党在革命的共产国际尚未为其最后命名之前，暂称为匈牙利社会党。

实行合并的基础是：两党共同领导党和政府。

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立即接管政权。通过工农兵苏维埃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原订的国民议会选举计划自行作废。

283 必须立即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并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全部武装。

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反对协约国，必须同俄国苏维埃政府缔结最紧密、最真诚的军事和思想联盟。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匈牙利共产党”

这样，在世界上，无产阶级第一次通过和平道路取得了政权。继苏维埃俄罗斯以后的第二个无产阶级国家诞生了。

1919年3月21日，在星期五下午七时召开的工人苏维埃大会上，社会民主党的加尔巴伊·山多尔向热烈欢呼的、拥挤的人们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政府已辞职，无产阶级专政诞生了。既然无产阶级的统一实现了，就应及时用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在匈牙利已经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个新政府建议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联盟，并号召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对世界革命的憧憬使全体与会者激动不已。站在社会发展最前列的自豪感，为开拓未来而战斗的激情充满了人民的心田。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世界上几乎未曾有过一个阶级，如象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无产阶级那样在如此困难条件下取得政权的。这一英勇的行动有如当年被敌人四面包围、忍着饥饿的巴黎无产阶级在1871年建

立的巴黎公社，又象俄国工人阶级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匈牙利在经过持续四年的大战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食品、燃料和原料设备差不多已消耗殆尽，物资奇缺。旧统治阶级罪恶的政策以及长期的战争所造成的一切恶果都压在刚刚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肩上。饥饿威胁着首都的人民。敌对的资产阶级国家四面包围着这个已经没有军队的战败国。在国内，形形色色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正在组织起来。战胜的协约国列强支持资产阶级的邻国和国内的反动派，他们出于对无产阶级的仇恨和为了保持自己在中欧地区的优势，4月曾公开向库恩·贝拉宣称，他们要在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西方民主。匈牙利无产阶级斗争的支柱——苏俄，这个时期自己也正在为反对反革命白匪军团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285

匈牙利无产阶级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3月21日，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宣告：

“匈牙利无产阶级从今天起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联合政府的破产，迫使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采取这决定性的步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破产，工人阶级再也不愿忍受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奴役了。只有确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把国家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外交上，匈牙利革命面临的也几乎是绝境。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决定要对几乎全部匈牙利领土实行军事占领，而这个占领线实际上也就是将来最后的国界线，革命的匈牙利将无从得到粮食和煤炭。 286

在这种情况下，留给匈牙利革命的唯一自救手段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和贫苦农民专政。

工人阶级的完全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条件。正因为

考虑到这个历史的要求，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共产党决定实行完全的合并。

匈牙利社会党将作为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代替以上两党领导全国人民。

革命政府苏维埃受党的委托执掌政权。它的任务是在全国建设工农兵苏维埃。各级工农兵苏维埃专政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

匈牙利的国体是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政府苏维埃将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大建设工作。……

……匈牙利社会党和革命政府苏维埃知道，在这条勇敢和伟大的道路上，匈牙利工人阶级还需历尽无数困难，做出巨大牺牲，为了解决我们的粮食供应和解放矿山，还得准备打仗，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弟兄的解放和我们自身的生存还要继续进行斗争。贫穷、灾难和痛苦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跨上，同时我们也敢于跨上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对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充满信心。勇敢向前，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拯救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革命政府苏维埃立即着手对"十恶不赦的"旧社会进行改造。政府苏维埃以正由于其平庸无能才身居要津的哈尔巴伊·山多尔为首，成员包括十四名共产党员，十七名社会民主党员和二名资产阶级专家，他们以人民委员的名义领导各部工作。他们中间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领导人：在军事和外交人民委员会任职的库恩·贝拉，内务和铁道人民委员会有朗德列尔·耶诺和瓦戈·贝拉，领导农业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有汉布尔格·耶诺，尼斯托尔·久尔吉和万杜什·卡罗伊；萨穆埃里·蒂波尔任副军事人民委员，后任教育人民委员。在政府苏维埃中任职的还有一些热衷于搞妥协

的社会民主党人，如在军事人民委员会内有伯姆·维尔莫什，教育人民委员会内有孔非等。人民委员中的正职大多数由原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和中间派担任，而共产党员一般只担任副职。库恩·贝拉在人民委员会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后来领导权实际上也逐步转入了他的手中。

人民长期受压抑的理想和对一个合理的生活的向往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分钟起就开始迸发出来了，开展了为清除旧时代的残余、克服当前的困难和开拓未来的气壮山河的斗争。早在3月21日的宣言中就写道："革命政府苏维埃将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大建设工作。"

287

六天以后，宣布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化，凡雇有二十个工人以上的工、矿、交通运输业均收归国有，对金融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金融机构收归国有，由国家监督。七天以后颁布商业国有化。企业由生产委员领导，由企业工人选出的工人苏维埃负责组织和监督生产。5月20日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生产，主席由最优秀的共产党经济学家之一的瓦戈·耶诺担任。

无产阶级专政还敲响了社会落后的堡垒——压迫农民群众的封建大地主制度的丧钟。政府苏维埃在有关土地国有化法令中写道：

"匈牙利的土地属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所有。不劳动者不得享有土地。一切大、中地产连同其所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农业和工业工厂在内，一律无偿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根据政府4月3日的法令，无偿没收了一百霍尔特以上的大、中地产共七百万霍尔特，并在这些土地上开始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如果说用这种方式实行农业集体化对百年来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来说还没有思想准备的话，但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

的改善。农业工人的工资和实物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汉布尔格·耶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18年秋雇农的工资为十二——十六公担①谷物，到1919年春天就增加到二十四——二十八公担谷物，三十二公斤盐，二十四公斤煤油，八百公斤柴和三霍尔特的自留地。如果说在当时农民还没有得到私有土地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得到了过象样生活的起码条件以及看到了文明和幸福生活的前景，尽管这点在当时还是比较渺茫的。关于这些，莫里兹·日格蒙德②曾热情地写道："谁能相信，经过战争的恐怖和艰难岁月之后，生活会如此迅速地沸腾起来！快得使人惊讶！我除了用自然界的花蕾绽开来比喻外，没有别的方法……在这以前，那些伯爵、封建大地主、豪门贵族把土地和在它上面生息的人民紧紧地束缚着。但在红色革命的春天里成熟和奋起的人们一下子把大地主强加给他们的枷锁给打碎了。挣脱了枷锁的百万人民都以发自肺腑的愉快，用自己心灵的全部美丽和无限幸福讴歌这新的生活。"

288

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把注意力放在生活的每个领域。苏维埃政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做出这么多的事，并且还准备去做更多的事，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和崇敬。用革命的高速度着手进行的社会措施以及准备彻底改造匈牙利社会的措施，不胜枚举。

数十年来备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在战争的年月里变得捉襟见肘的小公务员，无衣无食的孤独老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饥饿难忍的寡妇和孤儿，无米可炊的家庭主妇以及在贫民窟里呻吟着的广大贫苦老百姓都在热切地等待着苏维埃共和国迅速改变他们的处境。

① 一公担等于一百公斤。

② 匈牙利最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工资提高了一倍。尽管当时物价不断上涨，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有较大的提高。对全体劳动者实行疾病和工伤保险，工人生病可领取60%—70%的工资，实行免费医疗。消灭贫民窟。无房和少房的人们搬进了以前财主家宽敞舒适的住宅，仅布达佩斯一地就有三万二千四百一十户迁进了新居，外地则更多。为孩子们组织了避暑，免费发给或减价发售衣服和鞋子（仅布达佩斯就有二万五千个贫苦孩子领到了新鞋），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措施。这一切都说明，尽管当时物质条件还很差，但无产阶级还是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实现人民寄予他们的希望，恨不得一下子把病入膏肓的社会完全改造过来。把所有学校和文化机关全部收归劳动人民所有，是最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学校收归国有，把义务教育的年龄从十岁延长到十四岁。在全国到处都掀起学习和教学热潮。国家决定对教学内容和形式同时加以改造，消灭落后的不分班级的学校，加强在校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了解，以代替对宗教的盲目崇拜。

289

苏维埃共和国试图把社会从寄生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坚决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实行普遍的强制劳动，但同时又以法律形式保证人民有劳动的权利。法令规定，"国家有义务赡养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以及愿意工作，但国家一时还无法给予工作的人"。国家将通过医院、疗养院和医疗温泉地给予患病者以免费医疗。国家禁止对私生子的歧视，保护学徒工，开放过去只供少数人使用的公园和博物馆。为贫苦的孩子们提供各种游乐场所。从未享受过休息的穷苦孩子们的笑声响彻休养胜地巴拉顿湖的上空，他们愉快而自由的喧笑声打破了昔日老爷们别墅的寂静。在牛奶奇缺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婴儿的需要，实行了急救医疗制度。国家以摧枯拉朽之势改造着腐朽的匈牙利旧社会。首都和全国都完全变了样。各地政权部门——尽管还有不少旧制度的人物——

真正的主人已经变成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了。这些以前任人欺凌和侮辱的穷人现在已在昨天还歧视他们的人面前挺起腰杆来了。布达佩斯旧日光怪陆离的畸形光彩顿即消失。大街上到处走动着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和穿旧制服的军人，他们神采飞扬，充满着革命的热忱。昔日市中心闹区达官贵人的傲气、特利莎城区的纸醉金迷和安焦尔费尔德及费伦茨城区炊无隔夜粮的极端穷困之间的那种宛如天壤的差别消失了。安焦尔费尔德和费伦茨城好象松了一口气，在内城和布达阔绰的住宅里，当年的阔老爷和挤进来住在一起的穷人尽管还是互相仇视，但却是共同分摊着舒适与不舒适，挨饿或受冻。人们虽为买到很少一点食品和煤油排长队而抱怨不满，但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迸发出极大的热情，使得每天的生活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人民在穷苦的深渊中创造着新的生活。

革　命　秩　序

290　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即不是由革命政府苏维埃，也不完全是由党，而是由希望变革、为建设新世界而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完成的。从布达佩斯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传遍全国的城市和乡村。仅在几天之内，各地居民中最激进、最坚定的代表人物夺取了当地的政权，建立了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往往还兼有立法职能)。4 月 7 日的苏维埃选举确立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这一过程，从而一举改变了资产阶级匈牙利的价值标准。革命前只有有财产的和“有文化的人”才有选举权，而现在的选举法令却规定：“凡年满十八岁，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者，如工人和职员等，以及从事家务劳动，以保证上述工人和职员等能从事其

本职工作者，不分性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红军战士，以及从事过有益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但目前已完全或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士兵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下列人员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以盈利为目的而雇用人员者；②不劳而获者；③商人；④牧师，僧侣；⑤精神病患者，以及因刑事犯罪行为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受管制者……。”根据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农村每一百人，城市每五百人产生一名委员。

对居民事务的处理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共有四百五十万人拥有选举权。被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是工人、农民、教员和其他知识分子。虽然不能说每个地区，但绝大多数地区的选举是成功的。被选出的绝大多数各级苏维埃组织具有充分的人民性。这些人要运用他们拥有的权力来反对机关里的官僚主义。

在苏维埃机构建设的同时开始了对旧公职人员的清洗。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而为列宁所强调过的巴黎公社的教训，即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不可能在旧官僚机构上建立起来。可是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这场革命是一次不流血的、用和平方式取得的革命而感到情况有所不同，认为在这个领域里也必须通过和平的和逐步过渡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只有很少一部分旧人员被驱逐，而选派了许多工人充当机关工作人员和旧人员一道工作。旧警察和宪兵的相当一部分人也被接受下来了。

这样，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很自然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熟悉业务，但消极怠工的旧人员；另一部分则是不熟悉业务，但忠于革命、工作热情的新干部。但新的措施本意再好，到最后也会被旧人员弄得面目全非。暗地里捣鬼层出不穷，趁国难当头搞投机倒把的人纷纷出笼，紧张空气在增长。群众舆论并不是根

据全心全意、但工作能力低的新干部，而是根据那些官僚主义旧人员以及损公肥私的假革命来判断新政权的。这些不满和失望情绪很快就被反动派所利用。

苏维埃共和国周围的敌人是很多的。帝国主义列强，新成立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邻国资产阶级政权，以及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他们为了扼杀新政权而联合起来了。还有那些投机钻营者，失去特权地位的人和灰心失望者也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这些人开始和苏维埃共和国做殊死的斗争。

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只有武装自卫才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保证。

1919年3月，军事人民委员会的宣言强调指出："任何革命，如果它不仅要取胜，而且还要生存下去以至得到最终的巩固，首先需要建立一支统一的、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和有铁的纪律的军队。"

3月25日建立了红军，并且成立红色警卫队以代替旧警察和宪兵，此外还建立了革命法庭。这一切措施如果光是对付国内的敌人，看来是足够了。

293

武装起来！武装起来！

长期的战争不仅使战败国消耗殆尽，即使是战胜国也备尝了苦头。西欧国家的人民中间虽然由于统治阶级人为鼓吹起来的胜利陶醉而减弱了革命的气氛，但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却是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

这使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更加强了要扼杀俄国无产阶级国家这一信念，但同时又感到在方法上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这样，英、

美、法帝国主义决定出钱和武器来支持中、东欧和亚洲的反革命力量，诸如波兰的白匪军团和罗马尼亚贵族军，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哥萨克叛变军官，沙皇将军的半正规化军队和由战俘拼凑的捷克军团直到形形色色的杂牌军队匪帮，使他们都来反对刚刚成立的年轻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很多人对俄国革命本来就不很了解，而西方报刊则更加大肆宣传，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只是俄国特有的现象，它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无政府状态，以至最后自取灭亡。正当帝国主义分子想使西欧人民相信这些论调的时候，恰在这时传来了匈牙利无产阶级胜利的消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

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打乱了帝国主义反革命的行动部署，打乱了反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也打乱了反革命力量的集结。他们立即改变部署，加强罗马尼亚和捷克的反动军队，以便在需要时对苏维埃匈牙利实行军事封锁，扼杀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时，资产阶级战胜国之间也在勾心斗角：英、美以及法国之间的矛盾阻止了协约国采取公开的武装干涉，因为这样将有利于拥有欧洲最大军队的法国。而当英国和美国试图用“和平”的方式来颠覆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法国却策动罗马尼亚贵族军向几乎没有军队的无产阶级匈牙利发动了武装干涉。4月16日，罗马尼亚军以三倍优势的兵力越过军事分界线，四天后进驻纳吉瓦劳德市，4月23日又占领德布勒森市。4月底已完成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包围之势。其间，捷克资产阶级军从北面，塞尔维亚军和法军从南面相继发动进攻。

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街上到处张贴着表示工人阶级力量和意志的标语：“武装起来！武装起来！”革命政府苏维埃在4月18日的会议上决定，各人民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人员的一半，以及全体工人的一半都要上前线。伯姆·维尔莫什被任命为红军总司

294

令，精通战术、热爱祖国、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天才指挥官斯特隆费尔德·欧列尔担任总参谋长。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敌军很快取得了胜利。在罗马尼亚战线，由于塞凯伊兵团指挥官的叛变，到4月26日大部分军队都投降了，从而为罗马尼亚军打开了直达蒂萨河的大门。5月1日，罗马尼亚军占领了索尔诺克。侵略军一路上肆无忌惮地烧杀奸淫。与此同时，法军和捷克军也发动了攻势。法军占领了马科和霍德梅泽瓦沙尔海伊，捷克军占领了沙多尔奥姚乌伊海伊和米什科尔茨，并直达绍尔戈陶尔扬。

在这严重危机的时刻，摆在匈牙利人民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受协约国和资产阶级邻国的任意蹂躏，要么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

295 首都劳动人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庆祝第一个自由的“五一节”。《红色报》这样写道：“上午九点，川流不息的劳动人民开始涌向城市公园绿色的草坪。盛开的丁香花、茂密的灌木丛、春天的美景迎接庆祝节日的人们。公园里所有娱乐场所和建筑物都披上了红色的新装，公园充满着红色节日的欢乐。”但是这不是无忧无虑的欢笑，而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民在作出重大决定后所享有的幸福之感。正象共产党演说家朗德列尔·耶诺在工业大厅前对群众说的那样：“在这伟大的红五月里，匈牙利无产阶级应当具有信念、决心和勇气。要相信我们伟大的永恒的真理，相信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下定决心！但不是象笨蛋、鼠目寸光之辈婆婆妈妈式的，而是要男子汉大丈夫式的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决心……。世界不属于胆小鬼和胡思乱想的人们……。无产阶级能不能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军队和枪枝，而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意识到它所献身的事业是多么伟大和神圣。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可怕决战，——如果它意识到现在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

但是如果失去勇气，就将失去一切，——那么，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失去，我们将能挽救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事业……。”

当表现工人阶级力量和意志的庆祝“五一”的欢乐还未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些搞妥协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就在当天夜里召开的 296 一次紧急会议上向库恩建议把政权交给一个右派工会政府，因为“无产阶级政权已经无望了”。革命政府苏维埃还来不及在第二天召开会议，伯姆·维尔莫什在凌晨就用电话指示红军司令部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在第二天召开的政府苏维埃扩大会议上，库恩坚持继续战斗的立场。但他没有掩盖事态的严重性，建议由无产阶级来作出决定。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和工人纠察队领导人一致决心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天发布政府苏维埃动员令。布达佩斯的工人群众拿起了武器。1848—1849年革命和卫国战争最动人的场面又重现了。人民群众象潮水般地聚集在卫国战争的革命旗帜下。一些工厂还成立了独立的工人师团。

几天以后就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新建的红军部队在萨穆埃里·蒂波尔的率领下从采格莱德出发，很快就收复了索尔诺克城，并把捷克侵略军阻挡在绍尔戈陶尔扬一线。

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人深知，这一机会将是十分短暂的，于是十万火急地开始了红军的重建。到5月10日，红军已有四个军，八个师和四个独立旅。并指派朗德列尔·耶诺，汉布尔格·耶诺和瓦戈·贝拉去加强红军指挥部。根据天才指挥官斯特隆费尔德·欧列尔的计划，红军于5月20日开始大规模的反攻，目的除收复北方工业区以外，还要将捷克和罗马尼亚侵略军分而战胜之。在朗德列尔率领下、布达佩斯工人占四分 297 之三的军队第二天就收复了米什科尔茨及其近郊。先早，红军指挥部曾得到这样的情报，说是协约国军将从南向北在多瑙——蒂

萨之间地区进军，因此，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放在南线，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后来证实这个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又把大批部队从南向北调动。5月30日，在二百五十公里的开阔战线上发起了全线进攻，并且很快取得了惊人的胜利。5月31日收复洛松茨、里毛桑博特和埃代莱尼，6月4日收复托卡伊和沙多尔奥姚乌伊海伊，6月6日考绍①市民游行欢迎红军进入市区。6月9日红军又占领了埃派尔耶什②，10日占领巴尔特福③，直逼喀尔巴阡山。

西北方面的红军在收复了普特诺克④和罗日纽⑤以后，经过埃尔谢克乌伊瓦尔⑥和列瓦⑦向祖约姆⑧挺进。

红军的胜利促使斯洛伐克于6月16日在埃派尔耶什宣告建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

红军迅速的巨大胜利显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威力，也证明了受到内部叛徒和反对派的夹攻、经济上还很困难、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小国是可以战胜在经济上强大得多、军事装备好得多、并且得到协约国支持的邻国联合力量的进攻。5月27日，列宁在向匈298 牙利工人致敬书中表达了工人军团的情绪，他指出："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

---

①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

②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雷肖夫。

③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巴尔杰约夫。

④ 在包尔绍德—奥色乌伊—曾普伦州。

⑤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罗兹纳瓦。

⑥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扎姆基。

⑦⑧ 均为今捷克斯洛伐克城市。

争。”①

邻国的武装进攻只是协约国的斗争手法之一。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协约国还采用了表面看来是做了让步的、可以接受的另一个策略。6月13日，法国总理、巴黎和会主席克雷孟梭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发出照会。这个照会概述了签订和约以后匈牙利大致上的疆界，同时要求北方战线的红军立即停止进攻，并撤回原地，与此同时，协约国答应把罗马尼亚军占领的蒂萨河以东地区让出来。无产阶级政府在这一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就决定接受克雷孟梭的建议。虽然列宁在电报中曾经警告库 300 恩说：“您开始和协约国谈判当然是对的。应该开始进行谈判，必须利用一切那怕可以争得暂时的停战或和平的可能性，以便使人民得到休息。但是一分钟也不要相信协约国，它在欺骗你们，它只是为了赢得时间好更有效地扼杀你们和我们。”②

事实证明列宁的话是正确的。

在红军部队作了战士们既不理解又影响士气的撤退之后，罗马尼亚军队并没有履行把蒂萨河沿岸让出来的诺言。

花了无数代价才争得的土地就这样白白地送给了敌人，这对人民的情绪是个很大的打击。始而在考洛乔发生了铁路工人罢工，继之在全国其他地方发生富农骚乱。一贯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感到无产阶级政权正在削弱，于是开始转向反革命一边。由于未能实现土地分配而失望的农民也逐渐离开了工人阶级。在这种形势下于6月12—13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右派之间就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爆发了尖锐的斗争。当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威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右派却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大讲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温和政策，并且试图把

①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3页。

② 《给贝拉·库恩》，《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535页。

301 共产党员从领导中排挤出去。尽管在代表大会上共产党还有力量打退右派的进攻，但是在6月14—23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右派又继续搞阴谋活动。6月24日，布达佩斯驻军军官和多瑙河快艇部队举行武装暴乱。但红色警卫队在几小时之内就击退了他们的进攻。

尽管取得了胜利，尽管在对敌斗争的最前列有最优秀的共产302 党员科尔文·奥托和萨穆埃里·蒂波尔，尽管在两党合并时被小资产阶级成分冲淡并且失去了先锋队性质的共产党开始进行重建，但是整个局面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伯姆、维特涅尔、佩耶尔及其一伙已经在维也纳秘密和协约国列强就推翻无产阶级政权达成了协议。渴望土地而没有得到满足的农民群众这时已不愿意站出来保卫苏维埃政权了。因为不同意没有任何保证就撤军而辞职的斯特隆费尔德·欧列尔的总参谋长职位由尤利艾尔·费伦茨取代。7月21日，红军向罗马尼亚军发起进攻，一开始进展是顺利的，但是由于隐藏在红军司令部的叛徒事先就把作战计划出卖给了敌人，因而很快失败了。鉴于军队的溃败，内部的叛卖，敌方的强大优势，人民的沮丧失望等局势，迫使政府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工会，因为它似乎有能力和协约国达成协议，并在国内实行民主。于是1919年8月1日成立了以派德尔·久拉为首的工会政府。

十二、匈牙利的反革命制度

反革命上台

303

当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正在为创建一个新世界而努力工作时，旧制度的追随者已经勾结起来，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大地主所有制了。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失去特权的贵族、为失去的工厂而哭泣的大工业主、为自己的保险柜祈祷的富豪和军官，个个心怀鬼胎，惧于人民的怒火，纷纷外逃。这些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比他们的爱国心要强烈得多。在他们中间，还有一群混水摸鱼的冒险者和别有用心的人。当这些关心自己的利益胜于热爱自己的祖国的逃亡者离开边境时，居然发现自己有着不可熄灭的“爱国”火焰，宣称必须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想返回来，但不能象奴仆一样羞辱地返回，而应当作为人民的老爷，胜利凯旋。在返回以前，他们往往为一小块施舍的面包和期望胜利后得到的巨大收益而争吵不休。但有一点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必须打败工人的统治，誓报血海深仇。在维也纳伦加塞街四号雄波尔—布亨伯爵华丽的府第里，匈牙利的贵族们聚集在拜特伦·伊斯特万伯爵的周围。他是一个眼界宽阔、富有政治素养的保守派，一个能干而狡猾的埃尔代伊大地主。在他的周围，有后来反革命制度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包括学者泰莱基·帕尔伯爵，正统派的领袖希格劳伊·安道尔伯爵和著名的演说家、年迈的奥波尼·奥尔拜尔特伯爵。属于这一营垒的，还

有保洛维齐尼·久尔吉侯爵，安德拉希·久拉伯爵，教权主义者齐奇伯爵，一贯投机的鲍詹尼·蒂沃道尔伯爵，以及贵族中的其他皎皎者。除这些世袭贵族外，富豪中以克劳乌斯·西蒙和乌尔蒙·阿道夫男爵最为突出。这个阵营内许多野心勃勃的人物中，野心最大、军事专政的公开鼓吹者、原总参谋部大尉贡伯什·久洛很快就崭露头角。

这一伙人已在4月12日成立了匈牙利反革命的参谋部——反布尔什维克委员会（ABC）。

另一派反革命分子在罗马尼亚军队占领区于5月5日成立了以奥劳德州的大地主、前奥劳德州州督卡罗伊·久洛伯爵为首的反革命政府。

304 在塞格德这个法国殖民主义占领区，一队队，一帮帮渴望掌权的军官，妄想拼命往上爬的官员和资本家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塞格德执行委员会，其成员是高级职员，工厂主，将军和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煽动者、天主教圣芳济会会长佐德劳韦茨·伊斯特万，还有前皇帝侍从官霍尔蒂·米克洛什，他是一个连匈牙利语都讲不清楚的皇家海军上将，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镇压卡托罗水兵起义的刽子手。在他的领导下，在塞格德开始组织由军官、富农、大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社会渣滓组成的反革命“国民军”。

内部的沮丧情绪和背叛、邻近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协约国的阴谋配合着这些反革命的“政府”、“委员会”和“军队”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

协约国的军事使团在全国影响最大。协约国驻维也纳使团的领导人之一、英国上校库宁汉7月31日向巴黎和会第四委员会满意地宣布，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谈判进展顺利。7月31日，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决定把政权移交给工会，这样，从表面看来，

政权基本上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这时，一场大赌注的政治赌博开始了。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的多数人天真地希望在紧迫的政治局势下挽救社会的民主，尽管当时由于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崩溃，要保持无产阶级的专政已没有希望。8月1日，派德尔·久拉政府上台的当天，一方面宣布要继续实行社会化，但同时他又下令缉捕共产党人。8月2日，他正式命令释放被捕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又从地狱里回来了！

第二天，恢复了旧资产阶级的法院、警察局和宪兵队。8月4日，把地产归还给原主。又过了两天，把工商业企业交还给资本家。

但是，匈牙利的老爷们对此并不满足，他们不考虑任何政治策略，只是怒气冲天，要把社会民主党人赶出政府。这些人不欣赏协约国的策略，连民主的外衣也不要了，他们所希望的，不仅要复仇，而且要掌权。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派德尔政府在六天的统治之后，被一个冒险的工厂主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和几个同伙轻易地赶下了台。沐猴而冠，弗里德里希当上了总理。

弗里德里希及其一伙统治国家的时间并不比派德尔长多少。他们也同前任一样，无法行使权力。弗里德里希集团之所以能维持两个月，只是因为在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派别中，没有一个能单独夺取政权而已。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支持弗里德里希，而法国人则帮助塞格德的那伙人。武装干涉的罗马尼亚军队于8月3日开进布 305 达佩斯。两天后，协约国的使团随即出现，并开始他们的正式活动。军事政权落入占领者的手中，没有协约国使团的支持，休想采取任何政治行动。谁要想取得政权或想继续留在政权内，他不必去寻求人民的支持，而必须去讨大国使团的欢心。

协约国需要一支看来能够维持反革命制度的力量。唯一现实的武装力量是在霍尔蒂统帅下的、不属于政府的二万五千人，加

上在匈牙利西部莱哈尔上校的部队，共计五万人的“国民军”。经过讨价还价，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方案基础上，由英国外交官乔治·克勒克爵士出面，各派力量达成以下协议：罗马尼亚军队撤离首都，“国民军”进驻布达佩斯，同时成立一个表面上民主的、代表各派政治势力的政府。根据协议，11月14日，占领军离开布达佩斯，把首都移交给由男爵莱哈尔上校指挥的白军进城部队。首都的居民以沉默的仇恨迎来了“国民军”。两天后，当首领霍尔蒂骑着白马进城时，迎接他的是奉命前往的公务员、关闭的商店、板窗紧闭的民房和死一般的寂静。

11月16日，全国人民开始尝到霍尔蒂及“国民军”的苦头。这支从来参加任何战斗的军队，是以屠杀共产党人、和平的工人农民以及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而显示其英勇的。他们首先在多瑙河以西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在毛尔曹利、希欧福克、陶波尔曹等地，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从城市和乡村传出，人们对白军的“英勇行为”不寒而栗。[306]白军中尤以普罗瑙伊·帕尔和欧什滕堡别动队最为残忍。

这里，我们只举一些原始材料便可感到当时恐怖气氛之一斑。塞切尼·尤若夫伯爵抱怨他的雇工说，他“对付不了这些人……”，普罗瑙伊便前去处理。当时在毛尔曹利的监狱里已关押了近三十人，这些人都被活活打死。后来，区长命令宪兵队“按照名单逮捕了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而且不是共产党人也抓”。[307]“连同从地方上抓来的人一起，已达到二百人。普罗瑙伊的人惨无人道地虐待被抓来的人。有的人头皮被活活剥下，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大头棒和狼牙棒打得死去活来。即便在毒刑以后还活在人世，要想恢复健康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普罗瑙伊自己的日记上，描绘了他的别动队令人震惊的暴行。关于在小小的埃宁格是如何恢复“秩序”的，他写道：“在小酒店的院子里，半小时之内，

一棵树上便吊了五个共产党人。老伯爵的佣人忘恩负义，理应吊死，后因老伯爵亲自求情，才免遭一死，最后被重打一百大棍，险些丧命。”

1919年11月，杀人的白色恐怖已扩展到多瑙河——蒂萨河之间的地区。黑姚什·伊斯特万、弗龙齐奥·基什·米哈伊及其同伙到处横行的消息不断传来，仅在凯奇凯梅特一地他们就屠杀了六十人。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两位领导人科尔文·奥托和拉斯洛·耶诺也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中。1920年，《人民之声报》的编辑绍莫齐·贝拉和巴乔·贝拉都惨遭杀害。

由多瑙河以西地区开始的大屠杀已扩展到布达佩斯。首都不列颠饭店的地下室是当时的行刑地点之一。受刑具折磨的人们的尖叫声使饭店的名字从此令人闻而生畏。反革命别动队的大屠杀和有组织制造的白色恐怖互相配合，在几个月内，就有五千人被杀，七万人被投入监狱或投入非人条件的拘留营。当时，大批思想进步的人被迫离开国家，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惧和疯狂的复仇气氛。

308

在此期间，政治赌博表面化了。由小学教师胡萨尔·卡罗伊于1919年11月23日组成的政府被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政客、人民党的律师希莫尼·塞马敦于1920年3月15日组成的政府所代替。在这些粉墨登场的人物后面，真正控制政权的人却是地主、金融资本家、土豪劣绅、军官和武装部队的总头目霍尔蒂·米克洛什集团。1920年3月初，霍尔蒂在其武装人员包围和占领的国会内选举自己为匈牙利王国的摄政。他拥有广泛的、近似国王的权力。他开始玩弄虚伪的花招，保持没有国王的王位，发表空洞无物的华丽的声明。

1920年1月，在巴黎附近的脱里亚农开始与匈牙利举行和

谈。虽然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奥波尼·奥尔拜尔特伯爵列举了许多确有实据、令人信服和富有感染力的论据，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被战胜者和战胜者是不能谈判的，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接受对方规定的条件而已。匈牙利统治阶级执行了几十年的沙文主义政策，现在它该为此付出代价了。国家原有领土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人口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二。尽管近一年来，国人对协约国的这一计划已颇有所闻，但当它真正成为事实的时候，全国仍然为此而震惊。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被真实的或想象出来的不平事件所引起的愤慨大大刺激了沙文主义情感的发作。昨天还在罗马尼亚刺刀的支持下组织起来打进首都的人，今日竟成了仇视罗马尼亚的急先锋，还把造成民族大灾难的和谈条件一古脑儿归咎于祖国昔日真正的保卫者。

当然，不能认为脱里亚农和约的条件是公平的，因为事实上它是把一切都建立在损害匈牙利利益基础上的一个文件，把相当多的匈牙利人居住的地方分割了出去。但是，这种对和约不满而爆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却被刚上台的反革命政权利用来巩固其尚未站稳脚跟的统治了。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和进行煽动的沙文主义使得匈牙利和邻国人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匈牙利大国主义政策所引起的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切断了同邻国取得协议或任何合作的途径，并在“残缺不全的匈牙利不算一个国家”、“不，永远不”及其他一些领土收复主义口号的煽动下常常引起不安和动乱，加剧了中——东欧的紧张局势。

309

反革命制度的巩固

匈牙利的大地主和金融资本家看到，在如此不稳定、过渡性

和没有力量的政府垮台之后，直接掌管国家领导权的时机已到。1920年7月19日，泰莱基·帕尔伯爵组织政府。贵族统治集团希望他把公开的、残暴的白色恐怖搞得隐蔽一些，“文明”一些，以缓和国际范围的愤慨和美化自己的形象。而当反革命别动队的暴徒不愿意这么干时，贵族统治集团也起来反对他们。与此同时，中世纪思想也似乎复活起来。当局制定了有关鞭打刑罚和把犹太排挤出大学的法律。1921年4月5日，哈布斯堡王朝前国王查理四世来到匈牙利，要求继承祖先的王位。一贯高喊忠于国王的霍尔蒂集团此时利用协约国和邻国反对查理四世之举，拒绝交出政权。与国王谋位有瓜葛的泰莱基政府被迫让位。1921年4月14日，泰莱基把政权交给他的朋友、最精明的贵族政客拜特伦·伊斯特万伯爵。

拜特伦·伊斯特万面临着重大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公开的、残暴的恐怖制度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西方国家的群众从一开始就反对匈牙利反革命的暴行，并且不止一次地对白色恐怖进行抗议。1920年6月，运输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运送反革命 310 匈牙利的货物。出口处于瘫痪状态。更为严重的是进口也被迫停止了。因此，限制极端分子的行动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不仅在西方群众中，就连在协约国的领导人中，对于从匈牙利传来的沙文主义的疯狂暴行危害着脱里亚农和约的消息也越来越感到不满。在国内，因缺乏人身和财产安全，因而使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不安的情绪，并激起他们起来反对恐怖主义分子。在公开而残暴的恐怖中，金融资本家也不认为这种公开的、野蛮的恐怖是维护他们利益的最好办法。

从瓶子里放出破坏性的反革命恐怖魔鬼是件容易的事，而当不需要它的时候，把它收回去，那就难多了。但此时，直接掌管国家的统治阶级已有足够的力量用武力把昔日最坚决的支持者抛

到一边。他们逮捕了民愤最大的反革命别动队的杀人犯，清洗了不列颠饭店，并开始做一些表面的调查工作。12月20日，虽然摄政宣布大赦，把所有因"过分热忱的爱国心"而犯有杀人罪的人统统释放，但反革命别动队分子和政客们还是看到了：要么学会新的方法，要么就靠边站。

311 要巩固这个制度，只有解除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至少也要争取一部分群众支持这个制度，而这也正是协约国所希望的。为此目的，1921年，拜特伦与出卖自己群众的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们事先就保证同政府团结一致）秘密达成了旨在涣散工人对抗情绪的协议。根据协议，社会民主党利用他们同国外的联系为匈牙利反革命制度效劳，并停止在农民和国家公务员中进行活动，以换取保持其合法性，使在流亡中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能返回国内。协议签字以后，党的领导因惧于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对这个被称为拜特伦——派耶尔协议的文件一直保守秘密。

一度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大为泄气。最初，当局答应分配土地，这使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感到有了希望，但后来根据纳焦塔迪·绍博·伊斯特万式方案进行的土地改革，农民得不到所需要的农具，而对所分得的小块贫瘠土地却要偿付高额赎金，因而大为失望。当局千方百计将农民中比较富有的阶层争取过去，并以各种优惠待遇拉拢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

拜特伦用相当高明的策略在国会中获得了重要的多数，并把大量小农党群众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1922年初，在执政党和小农党试图合并的计划失败之后，他退出了基督教民族统一党，继而加入了小农党。同年，根据新的选举法，除极高的年龄界限、财产额规定、提名条件、排除妇女、在一地居住年限等限制以外，在地方上还实行公开选举。这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选举制度。此外，大量的营私舞弊和专制的行政手段，使拜特伦的党在议会选

举中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继之在1927年的选举中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多数。

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议会不起来反对自己，于1927年取得了议会的一院制，恢复了上议院，部分议员由贵族家族选举，部分议员由摄政王任命，首先是从高级僧侣、不同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和贵族家庭成员中选择。

反革命政治的巩固要求财政稳定。政治和经济的巩固是有密切联系的，只要国内没有“秩序”，外国就不给予贷款，而没有外国的贷款，制度本身就不可能得到巩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1924年春，坚冰被打破了：匈牙利得到国际联盟较大的一笔贷款，共三亿零七百五十万本戈①。对于统治政权来说，虽然这笔外国贷款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但无论如何，经济情况也由此开始稳定了，并于1926年8月，采用本戈代替在通货膨胀中贬值的克朗。由于财政和政局的稳定，从1924年开始，战后极度下降的生产力逐步得到提高，1929年的产值已超过战前的12%强。纺织 312 工业发展最快，1925年比1913年增长一倍，1929年比1913年增长两倍。资本主义在反革命的匈牙利暂时又保住了自己。

尽管经济上得到巩固和国内形势相对稳定，但拜特伦的政府未能把匈牙利从孤立的对外关系中摆脱出来。他顽固地、声嘶力竭地要求修改疆界当然不可能导致与邻国和解。虽然行为古怪和反动的英国贵族罗瑟默②大肆鼓吹同匈牙利的友谊，但这远远不能抵消1925年发生的伪造法郎的大丑剧，不能抵消同极力主张修改疆域的法西斯意大利缔结的友好条约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当欧洲各列强放弃抵制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并与苏联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时候，匈牙利反革命制度的反苏政策仍然坚持不同苏联

① 1926—1946年间匈货币单位。

② 英国出版商，1917—1918年任英国航空大臣。

进行明明是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往来。

匈牙利和欧洲

不能过高地估计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处的国际环境中的作用。匈牙利同哈布斯堡王朝百年来的共处生涯已告结束。经过漫长的岁月，匈牙利第一次在形式上成为一个完全独立和自主的国家。但这是它在丧失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取得的。

当年非匈牙利语的人口高达一半的国家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少数民族居民，就连讲匈牙利语的居民也有近三分之一被并入邻国。中欧政治传统的框框崩溃了，巴尔干半岛各国居民长期的、在欧洲发展史上落后的、形成民族的进程结束了，其中部分原因是得到了原属匈牙利的一些地区，在匈牙利周围出现了不少新成立的或复兴的国家。在埃尔代伊和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基础上诞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罗马尼亚；由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加上霍尔瓦特[1]的并入，以及巴奇考——巴纳特的归并，产生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即后来的南斯拉夫；在北部，大部分是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地区和外喀尔巴阡山的部分地区与捷克的合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此时，一些庞大的、包含许多民族的帝国，如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已经解体，代之而兴的是许多独立的小国。这些小国在西方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条间隔地带，维护着西方的利益，特别是法国人

① 即克罗地亚。

在中欧的霸权地位。

匈牙利必须正视欧洲新的政治局面和本国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后果，首先是如何利用这一相对的独立性来维护民族的利益。 314

在战后新的欧洲格局中，原匈牙利在政治上所依附的大国消失了或削弱了。俄国已不再争夺中欧的霸权。虽然根据脱里亚农和约，大国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缩小了匈牙利的疆域和自然资源，但匈牙利毕竟还是可以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比较自由地选择今后的对外方针和政策。

新的、反革命的匈牙利其产生的环境和社会目标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个在粉碎了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形成的反革命制度以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作为它的主导思想。这当然就反映在它的对外政策中的一贯反苏，从而使当时的匈牙利成为各种反苏活动的基地。

但是，光是反苏并不意味着会把自己同战胜国和邻国孤立起来。相反，当协约国策划反苏阴谋时，还会增加匈牙利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可是匈牙利的反革命政权的另一个主导思想是全面修改脱里亚农和约，这就不合战胜国的口味了，而对于匈牙利的邻国来说，只有阻止修改和约才是自己生存的保障。尽管拜特伦、泰莱基及其一伙多方设法靠拢西方，终因这项政策而未能摆脱孤立的局面，而对于新兴的邻国说来则更处于对立的状态中了。这些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因为是出于反对匈牙利修改和约的企图才组成了“小协约国”联盟①。有些国家，它们的利益在于推翻 315 凡尔赛和约体系，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建立在重建欧洲的格局上。于是，匈牙利便在这些国家中寻求自己的同盟者。很快，匈牙利

① 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在1920—1938年间的政治和军事同盟。

就找到了自认为在凡尔赛和约中是丧失一切的、同时又在谋求称雄的意大利这个朋友。意大利这时已受到了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致命的影响。这样，他们就和德国的那些极端热衷于政变的反革命派别取得了联系，而当时的德国，国内矛盾重重，并正在与民主的幼稚病、战后的创伤和贫困进行斗争。匈牙利政府的官员常常是德国这些派别对外政策中唯一的（尽管是不常露面的）支柱。这不仅在德国为法西斯的企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而且在充满紧张局势的中欧政治生活中也不断加剧了混乱。欧洲的公众舆论曾多次准确地（有时则并不那么准确地）怀疑到在经常爆发的、有时是极为严重的政治冒险后面是反革命的匈牙利在作祟（如在霍尔瓦特的乌斯塔什①分子的运动中——这一运动导致刺杀塞尔维亚国王和法国外长——在奥地利分裂主义分子的南蒂罗尔的活动中以及在奥地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分子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尝试中等）。

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反革命制度的这一政策是建筑在实际的国内政治气氛上的。在所谓"具有千年历史的匈牙利是反对土耳其异教入侵和整个基督教欧洲的捍卫者，是基督教文明在东方仅存的硕果"的思想下教育出来的大部分匈牙利人，毫无意义地反对脱里亚农和约。他们根本不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而把在中欧建立匈牙利的霸权作为己任，从而在反对不公平的脱里亚农和约中，把实际上是更大的不公平当作准绳来遵守了。这样，主要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众中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主义的幻想搀和在一起。反革命制度不仅不引导人民认识历史的现实，反而煽起荒谬的沙文主义之火，引起人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加上国家的经济状况，人民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武装组织。

在战争期间，居民的物品供应紧张，物价飞涨。在反革命制度的第五个年头，通货膨胀达到顶峰。当时，动辄以百万为单位进行计算，人们拿着票面额巨大的货币只能买到极少的东西。1925年，人们所挣的工资连购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都不够。宣传机器却叫喊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脱里亚农和约，修改和约就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深受经济苦难的平民到处可以见到领土收复主义运动的口号："残缺不全的匈牙利不算一个国家，完整的匈牙利才是伊甸园！"

匈牙利经济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并非脱里亚农和约本身。在这方面，应当正视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其实在当时，匈牙利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到匈牙利已经从原来的经济统一体中分裂出来，需要根据新的地区特点形成自己的经济结构。在这个时期，匈牙利不再需要同一些国家在一起，把自己纳入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体系，而应当使自己和中欧的一些小国协调起来，求得经济上的共生。当时，其最大的活动范围则是取决于新的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形势，取决于正在从战时经济走向和平时期经营方式的、市场已经分配完毕的资本主义世界。

匈牙利经济的改组是一项范围极其广泛的、极需慎重的工作。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没有各种社会条件（例如缺乏彻底的农业改革），因而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生产。与邻国的紧密合作本来是匈牙利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当时无论从匈牙利还是邻国的政策来看，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不断向西方国家借债，但仍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因而国困民穷，一无起色。加之社会问题丛生，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从而给右翼势力以可乘之机，使保守的政治制度利用这一情况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反革命制度的社会

191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消除匈牙利社会的落后弊病。1919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更以疾风暴雨之势荡涤着这些弊病。工人、农民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从漫长的梦魔中摆脱出来，他们把头衔、等级，以及种种充满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混乱现象，如象摧枯拉朽一概予以破除。数百年内根深蒂固的、顽固坚持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几乎原封不动的习惯势力，在几个月内被一扫而光，人们衡量事物的新方法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相接触的新形式开始出现了。门第和金钱的势力被劳动光荣的观念所代替，只会唱高调的虚伪的民族意识被集体主义所取代。

反革命制度不仅破坏了革命的一切成果，而且恢复了1917年被迫放弃的东西，甚至走得更远，把昔日曾是悲剧的事，而今却被当作喜剧重演。一些头戴历史上风行过的帽子，打扮成"地道匈牙利人"的模样，拿着长柄斧，操着粗皮鞭到处横行霸道的反革命青年，一会儿穿着定居时匈牙利式的服装，一会儿穿上埃尔代伊哈伊杜①的骑兵服，他们想以过去的民族服装打扮来掩盖其真实的面孔。

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都憎恨这帮新老爷。虽然他们遭到了彻底失败，但仍不屈不挠。尽管有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又进行出卖，共产党人也被迫转入地下，但在白色恐怖最黑暗的日子里，各种形式的罢工、怠工和反抗仍不断出现。1919年9月6日，费尔舍高洛的罢工矿工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五人

① 十六、十七世纪匈牙利骑兵。

死亡。第二天，纳吉马纽克的矿工以费尔舍高洛的罢工工人为榜样，继续进行斗争。农民们不愿加入"国民"军。有关居民对军队敌视行为的报告一天多似一天地传到总司令部。下面的例子很说明这种反抗的程度：1919 年 11 月 25 日，在索尔诺克的两千名适龄入伍的人中，只有四百人报到；在有一万居民的绍鲍德萨拉什只有十二人应征入伍。 317

对工人来说，当然不会欢迎那种把工厂交还给旧厂主的制度。旧厂主在收回工厂以后的头一件事便是降低工资，恢复旧的监工以欺压工人。贫苦农民因谋生困难，又备受侮辱，因而对反革命制度极为仇视。至于土地改革方面的诺言也只是在短时间内引起了某些幻想而已。

取代粗暴的、公开使用武力的拜特伦政府的策略，首先着眼于争取"匈牙利传统的知识阶层"和富裕农民。拜特伦不是根据学识，而是按照家族和门第把士绅出身的、相当于实际需要量三倍的行政人员统统视为知识阶层。自然，这个只有原来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是养不起这么多公职人员的。

一个在战前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家，在 1914 年大约拥有六万五千名公职人员。而到了 1921 年，供养近八万名国家职工的负担却落在只有七百万人口国家的肩上。由于大肆煽动沙文主义，一些匈牙利人由于害怕已变为统治民族的少数民族进行报复，纷纷从埃尔代伊、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山麓涌入匈牙利。在三十五万难民中间，有二十万人是国家职员或其眷属，约两万人是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或他们的家属。这些抛弃了那里的地产和官职的人来到匈牙利以后靠亲友的接济为生，居住在车厢里或临时搭起的棚屋内。在他们的想象中，昔日的匈牙利有如某种天堂乐土。无怪他们很快成了为修改脱里亚农和约叫得最凶的人物，成了一切反动运动最狂热的斗士。他们的示威和暴力行动造成首都一片嘈杂。 318

他们一会儿捣毁利波特城区的俱乐部，一会儿砸烂特利莎城的赌场。其中的青年人更是带头在街上聚众闹事，殴打犹太人，在大学里大打出手，因为他们把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供养和安置大量的难民虽然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有时他们的暴行也令人不快，但对政府来说，这也正是把一切不幸归结为因国家受到宰割，宣传只有重新修定边界的大好借口。

“贵族世界”是战前一个落后国家的畸形产物，现在被用暴力319把它恢复了。这似乎是把历史车轮倒转了一百年。每逢节日盛会，贵族们个个身穿毛皮短大衣和佩剑的贵族服，狂热地寻找贵族家谱，追根溯源，互相竞争，看谁能够从过去真正的或为此而伪造的资料中找出几个贵族的头衔和祖宗。贵族世界的圈子（如果可能的话）比战前收缩得更紧了。谁要想松动松动它，谁就会把自己置于整个贵族社会的对立面，受到傲慢和冷淡的拒绝，甚至可能遭到这个“文明”阶层的武力对待。除了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和反动军官云集的组织，如“匈牙利全国武装力量协会”和种族主义者等组织以外，还有不少诸如“埃泰克兹”协会① 和“双十字血盟”等组织。这些协会和联盟加剧了笼罩全国的恐怖气氛。面对这种局面，靠双手谋生的劳动人民无能为力。大部分共产党人或是被害，或是逃亡国外。内部的派系斗争使维也纳的流亡者也陷于分裂。在严阵以待的反革命面前，劳动大众一次次的英勇斗争都轻易地被粉碎了。共产主义运动花了好几年的功夫才重新整顿了自己的队伍，直到1925年，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举行重建大会以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才建立了统一领导的、比较有战斗力的各级组织，从而对国内的工人群众起着较大的影响。1925年4月14日成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此时，它已有能力把

① 据传说，此为匈牙利人定居前曾居住过的地方。

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为了粉碎共产主义运动，警察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1926 年夏，他们对拉科西·马加什和其他五十二人进行审讯。次年，继续进行大逮捕。1928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彻底粉碎。

在反革命制度下的匈牙利，文化生活也衰退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员和自由职业者）充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思想，他们曾忠心耿耿地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服务。现在，反革命的仇恨想要消灭一切知识分子，那怕只有一点点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许多人遭到监禁、迫害和行政处分，其疯狂程度从以下事例中即可见其一斑：在 1919—1920 年间，光在布达佩斯就有一千多名教育工作者受到纪律委员会的审查。知识分子必须“洗脑”，方能为反革命效劳。在教育部长克莱拜尔什拜格·库诺伯爵的领导下，全国的贵族力图用匈牙利文化优越的口号来征服邻国人民。他们认为“在中欧各国人民的文化中，匈牙利的文化有如鹤立鸡群”。因此他们认为领导邻国人民是匈牙利人的使命。 320

在反革命制度的黑暗年代里，许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要么象尤哈斯·久拉一样，忍受着寂寞的折磨，要么象鲍比奇那样，遭到迫害和诽谤。官方大肆鼓吹海尔采格·费伦茨所写的反映匈牙利贵族阶级意识的平庸作品，并以此同当时具有伟大天才的作家莫里兹·日格蒙德抗衡。年青一代的艺术家、科学家在绝望中设法寻求一条摆脱灾难的道路，其中不少人接触了农民，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情况。

在国外流亡的共产党文学艺术家的作品既不同于匈牙利国内的官方文学，也有别于国内诗人痛苦的呻吟和低声叹息的格调，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在国外流亡的文学艺术家们的作品，由于反革命的新闻检查，只有极少部分传到国内。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也出现了 321

无产阶级的新型的抒情诗，其主要代表作为1922年出版的尤若夫·阿蒂拉的《美景的乞丐》，这一诗篇又于1925年被特地收在《不是我在呐喊》的诗集中。市郊贫民的生活，“用血和汗搅拌着原料”的玻璃工人，“喷着火星的烟囱天使”，争夺食物和做着拾黄金美梦的乞丐都出现在阿蒂拉的诗篇里。他的诗发出了怒吼，因为“不是我在呐喊，而是大地在隆隆作响”。

322

严重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世界在经过一段短期的、较为平静的岁月以后，又陷入了新的灾难的动荡之中。1929年10月，纽约证卷交易所爆发了大恐慌。一时间，股票暴跌，数小时内，巨额财产化为乌有。接着，伴随资本主义的幽灵——生产过剩的危机开始了，并迅速波及全世界。这就必须极大地降低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工厂纷纷倒闭，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挤满了大城市。农产品价格的暴跌在农村造成了极大的贫困。

由于工业生产降低40—50%，在资本主义国家，失业工人的数字已接近四千万。当时，只有大量出售堆积如山的工业品，才能消除危机。然而失业的人越多，购买的人就越少。因价格下跌，未失业工人的工资也随之降低，他们如能买得起每天的食品就很高兴了，根本谈不上买什么工业品。

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在经济上深深依赖于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匈牙利影响更大。1928年，匈牙利的工业生产下降到只及1927年的98.6%，1930、1931和1932年的工业生产分别只达到1927年的81.8%、67%和58%。

在这段时期内，匈牙利的大部分生产是农业，大部分居民从

事农业生产。因此，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的农业危机使大量的贫农和中农遭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但中等地主，甚至大地主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由于不能出口，卖不出去的粮食积压了数百万吨，主要农产品小麦的价格从三十三本戈下跌到九本戈。

1931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深了工农业危机所引起的灾难。困难重重的银行家取消了总额为四十三亿本戈贷款的绝大部分，国家濒于财政破产的边缘。在匈牙利，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人数约二十万。破产、变卖土地的农户数以万计。大地主利用为求得生存而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之间的竞争，把本来就低得可怜的工资压得更低，把危机造成的一部分损失转嫁给了在自己地产上劳动的雇工和农业工人。

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被解雇的职员、大学毕业的年轻医生、工程师、教员、法学家和农学家等找不到职业，生活艰难。谁要能上街铲雪、搬运行李或干些临时性的劳动，以挣上几个本戈，那他就是幸运的人了。在慈善机构的施粥帐篷前长长的队伍中，既有工人和农民，也有职员和知识分子。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饥饿和贫困。 323

在为争取较好的、较人道的生活条件，为了工作和面包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产党站在最前列。1929年秋，佩奇和绍尔戈陶尔扬的五千名工人面对宪兵的刺刀，坚持了四个星期的罢工斗争。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定于1930年9月1日举行的和平游行变成了抗议示威。十多万人在布达佩斯街头游行，高呼要求工作和面包的口号。

警察企图用暴力驱散示威者。对于1931年9月1日示威的情况，当时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被驱散的、受到钢刀和子弹威胁的群众的斗争热情愈来愈高，战斗精神愈来愈强。他们分为几支队伍，重新向市内进发。

在这当中，无产者充分表现了无穷无尽的才智和创造力：他们在城市公园发现了水龙皮带，便灌水射向警察。在克伦德，示威者掀翻了四轮煤车，用煤块同警察和宪兵搏斗。"在一天的示威中，就有一人死亡，七十人受重伤，数百人受轻伤。这足以说明，这一天工人群众同军警的斗争是多么激烈。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及其对群众的影响使统治阶级十分惊恐。于是，统治阶级开始疯狂地破坏党组织，他们利用1931年9月疯人毛图什考·西尔韦斯泰尔把比奥托尔巴吉铁路桥连同过桥的列车一起炸毁的事件，大肆追捕共产党人。他们竟不顾世界公众舆论的抗议，通过即刻判决，杀害了两位党的领导人绍洛伊·伊姆雷和菲尔什特·山多尔。同时，首都和地方的党组织遭到破坏。

面对群众的不满情绪，统治阶级越发感到摆脱危机、保住政权324是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拜特伦已于1931年8月倒台，接替他的是拥有二万五千霍尔特土地的大地主卡罗利·久拉伯爵。然而，统治阶级内部感到老一套的办法已行之无效，于是重又抬出了在1920——1921年间退居一旁、代表公开恐怖活动的极端派别，让其粉墨登场。这个派别的头子贡伯什·久拉，自1919——1920年开始就为人们所熟悉。他是一个残忍的、热衷于使用暴力的、亲德国法西斯分子的人物，是一个师承墨索里尼的种族主义分子。统治阶级认为用他的"铁腕"来建立秩序是合适的。因此，霍尔蒂摄政在1932年10月把他扶上总理的宝座。

实行全面法西斯专政的尝试

随着贡伯什出任总理，在匈牙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话浪潮。

贡伯什已不再象他的前任一样，一味地宣扬匈牙利“传统的知识阶层”和“强大而富裕的农民阶级”的统治，而是鼓吹所有匈牙利人（其中也包括工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和解”。实质上，他不是扩大工人的权利，而是破坏工人阶级的传统组织，他想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的劳资协会①，建立由国家领导的工人组织，把工人也拴在他 325 的破车上。

贡伯什许诺要实行土地改革，答应农民延期付税三年，并答应保护农民财产。这种完全不负责任的允诺和旨在赢得社会各阶层支持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建立全面的法西斯国家服务罢了。

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工人运动的影响，加剧了斗争的激烈程度。看来，金融资本使用旧的手段已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于是，公开的、残暴的专政代之而起。1933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德国上台。1936年，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得手，即便在资产阶级民主高度发展的法国，日见抬头的法西斯势力和进步力量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匈牙利金融资本家认为拜特伦式的隐蔽方式已不足以保证其稳定的统治，于是转而垂青于法西斯主义，支持由贡伯什领导的，由好斗的军官、士绅官员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派别。部分农民，尤其是富裕农民也一时对之深信不疑。就连寻找出路的一部 326 分知识分子也支持贡伯什的政策，相信其蛊惑人心的许愿，相信“人民”的国家与贵族的、封建主义色彩的拜特伦制度相比是进步的，因为毕竟它愿意依靠人民。由野心勃勃的埃克豪尔特·蒂博尔领导的全国最大的反对党——小农党也与贡伯什的执政党一度秘密配合，后又结成公开的联盟。社会民主党因惧于贡伯什的取缔威胁，不敢起而反对。处于非法状态的、在严重的困境下进行活

① 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创导的组织，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

动的共产党正在遭到残酷的迫害。

贡伯什全力以赴开始实施他的计划。1933 年 6 月，在各国政府首脑中，他是第一个迫不急待前去拜访希特勒的人。他把匈牙利同法西斯意大利拴在一起，后又越来越紧密地靠拢希特勒德国。

1935 年的选举是在闻所未闻的恐怖气氛中进行的。贡伯什虽然获得多数，但是他全面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企图实际上已破灭在即。劳资协会在工人阶级的反抗下垮台了，共产党人的影响不断扩大，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工人阶级保持了原有的组织。统治者诺言的兑现变得遥遥无期。1936 年，把“地产政策的改革”方案提交国会，以代替土地改革，实质上丝毫没有触动大地主的产业，贫苦农民一无所得。广大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把国家的未来寄托于农民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也深深感到失望。曾经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的政治空话的破灭，在全国引起了严重的失望情绪。

327

经济危机过后，与拥有大地产的贵族相勾结的金融资本家已不再需要贡伯什集团，即使在当时，他们也总是鄙视这群无教养、不懂贵族礼仪的小军官和目空一切的小官员们赤裸裸的权欲。他们当初只是出于对危机期间可能出现动乱的担心和岌岌可危的局势才把政权暂时交给了这群人。现在，当他们度过了经济危机之后，就准备抛弃贡伯什和 1935 年选举后在国家机构中任职的贡伯什的追随者们了。1936 年贡伯什之死挽救了他的垮台，因为他一死，瞧不起他的人和他的同伙都无妨同声颂扬这位已故领袖属于民族伟人之列。

在通往新的战争道路上

贡伯什虽死，却不能使国家脱离这位“领袖”所铺设的轨道。

在侵略成性的希特勒德国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在极右派大事鼓噪下，相继上台的几届政府都感到国内外的政治局势要求他们执行右的政策。纳粹德国则以惊人的速度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以建立“新欧洲”。在道拉尼·卡尔曼担任总理期间，就已和希特勒在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达成了秘密的原则的协议，匈牙利政府还默认德国剥夺盟国奥地利的独立。

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紧密关系不仅影响到匈牙利的对外政策，也影响到对内政策。由于国内道拉尼、伊姆雷迪和泰莱基这几届政府的政策混乱，极右势力“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们迅速崛起，他们想效法其主人，要把德国全面的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思想移植到匈牙利的土地上。因此，在匈牙利政治舞台上，那些效仿德国卐字的“镰刀十字”、“箭十字”的运动及其孪生运动迅速扩展。这些运动以混乱不堪的理论力图证明匈牙利人是可以追溯到“都兰时期”① 的历史悠久的高等民族。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者”从其德国主子那里学会了用简单明了、然而却是不负责任的空话去宣传实际上是混乱不堪和不着边际的理论，学会了利用人们向往富裕生活的心理使小资产阶级、热衷于混水摸鱼的半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接受他们的货色。他们通过大树特树“领袖”的威望，鼓吹“源远流长”的匈牙利种族进行统治的历史使命，并剥夺犹太人的经济地位和私有财产（当然是分给“国家社会党的兄弟们”），为萨洛希·费伦茨领导的“箭十字”运动赢得了相当可观的地盘。 328

然而纳粹德国此时的官方政策并没有把实现自己对匈牙利的设想建立在他们的匈牙利伙伴身上，而是竭力向匈牙利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屈从自己。就当时匈牙利国内条件来看，国家社会党徒执政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德国代理人充斥全国。他们对本来还

① 都兰，位于里海以东。这些人声称匈牙利人从那里起源。

安于现状的士瓦本① 人大肆煽动，"唤起"这些人当"欧洲未来主人"的妄想。

由于同纳粹德国结盟，在匈牙利，有组织的种族迫害开始了。1938年制定并实行了第一个犹太人法律。这项法律毁坏了不少犹太知识分子和无辜平民的生活，甚至剥夺了不少人最起码的生计。

329 在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中，为将来的参战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在德国的援助下，军队开始迅速武装。1938年3月5日，道拉尼在臭名昭著的"杰尔纲领"中宣布，在五年内要用十亿本戈使军队现代化。1938年3月12日，当纳粹军队占领中立的奥地利时，匈牙利政府打电报向强大的新邻居表示祝贺。当时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在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再次统一之际，匈牙利政府通过驻柏林公使向元首、帝国总理希特勒表示最热烈的良好的祝愿。同时坚定而愉快地希望继续保持我们两国之间良好的友善的关系。"

历届匈牙利政府总想赢得并保持希特勒德国对匈牙利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希望在政府的对外政策方面，力图保持最低限度的活动自由，确保对内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保守的匈牙利"基督教民族"势力则不同意国内那些"革新派"的行径，反对他们接受德国单方面的影响，反对他们简单地抄袭或移植德国的样本，从而破坏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政治和社会的赌博准则。因此，战前时期的政府总要左右开弓，对右翼的打击是在政治局势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对左翼则出于仇恨。道拉尼执行了这一政策。看来，他的继承人伊姆雷迪也将奉行这一政策，因为当时认为伊姆雷迪

330 反对单方面倾向德国。1938年5月，任命伊姆雷迪·贝拉为总理，接替道拉尼。伊姆雷迪是匈牙利金融资本家的宠儿，是造诣很深的经济专家，是单方面倾向德国的政策的反对者。但伊姆雷迪登上

① 从十八世纪开始定居于匈牙利的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总理宝座不久改变了他的政治方针，而认为出路在于加强亲德政策。当德国加紧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西方列强置他们的盟友于不顾，却在 1938 年秋季签订了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交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宰割。此时的伊姆雷迪更认为其亲德政策是正确的了。匈牙利政府与德国人配合，也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要求，并制造一系列事端，挑起沙文主义情绪。1938 年 11 月 2 日，根据维也纳仲裁① 的精神，开始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得到了斯洛伐克南部绝大多数是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在这个不光彩的收获中，许多人竟看不到国家的独立政策遭受牺牲，反而看到了追求修改脱里亚农和约的正确性。似乎二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修改和约的愿望开始实现了。在陶醉于“扩大疆域”的成就时，人们却忘掉了为取得这一“成就”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匈牙利的领导人大肆宣扬对德意志帝国的感激之情。匈牙利参加了法西斯国家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并退出了“国际联盟”，以表示为了当纳粹德国的忠实盟友，甘愿与西方大国相对抗。

1939年 的第二号法令，即第二个犹太人法律，反映了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已全盘照抄无误。这个法律使犹太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丧失了生活基础。两年后的第三个犹太人法律不仅禁止与犹太人通婚，而且还超过了纽伦堡这个“表率”②，对“侮辱种族”的试图也要严加惩罚。

匈牙利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灾难的道路。唯一能把执政者的双手拉回来的力量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团结基础上的、联合社会各反

---

① 1938 年11月 2 日第一次维也纳仲裁，轴心国将斯洛伐克南部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南部划归匈牙利，共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七平方公里，一百多万居民。1940 年 8 月 30 日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匈牙利得到北埃尔代伊，共四万三千四百九十二平方公里土地，二百四十万居民（其中包括一百一十万罗马尼亚人）。

② 德国国社党（纳粹党）常在纽伦堡开大会。

法西斯阶层的大团结，即人民阵线政策。1935 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制定组织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的斗争目标，将此作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唯一有效的武器。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社会大部分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在一个或几个主要问题上应取得一致，其他一切问题（包括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暂时服从这一主要问题。这样一种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局势是实现人民阵线政策的客观条件。”

无疑，在匈牙利实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策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是要求同德国结盟和进行战争。问题在于共产党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能否找到一条通向社会各阶层的道路，代表社会各界人士的政党和各组织能否认识到联合反德是超越一切事物的必要性。

农民在全体居民中人数最多，约四百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331 仍然无地，生活极度艰难。在这“三百万乞丐的国家”中，威风凛凛的大地主的产业毫无触动，他们占据着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数十万雇农和为了挣得几个铜板从早到晚进行劳动的短工，他们的手工劳动力，比起采用企业式经营，采用机械化生产要便宜得多，雇农的劳动报酬只不过是几公担粮食加一套衣服。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似乎是停滞不动的。这些在极端落后的环境下生活的广大农民，这几百万饥寒交迫，进行着牛马一般劳动的人们，在三十年代里被民俗学家、农村研究工作者和民粹派作家当作被突然发现的宝贝，被颂扬为人民的原始力量的源泉。其实，这一阶层的大多数人刚刚开始醒悟，刚刚冲破被孤立的壁垒，在经历了从前的卑躬屈膝、相信偏见和迷信以及进行了不成熟的造反以后，刚刚踏上提高政治觉悟的道路。其中比较有觉悟的那部分人，在两次骗人的土改以后，对信誓旦旦的许愿业已感到失望，本来他们是可以成为眼前反革命制度的坚定的反对派，也可以对广大农民发

挥作用。

对于十五万失业的农业无产者来说，就连贫苦农民的生活也算是美好的了。他们饥寒交迫，艰难度日，日复一日地寻找临时工作，但常常找不到。相比之下，约一百五十万小土地所有者就算得上被羡慕的人了。每个小土地所有者有几霍尔特的土地，全家人一起辛勤劳动，除耕种自己的土地以外，还努力做些其它的工作，以使全家生活有“可靠”的保证。

这些被反革命制度榨干了的广大农民无疑是可以团结在反对反革命制度的反法西斯同盟中来的。但是共产党人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一旦被发现，常有生命危险。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活动，是难于接近在村长和宪兵监督下生活的农村居民的，而社会民主党又无能力组织和争取农民群众，有时甚至还同政府搞些妥协。在 332 贡伯什当政时期，社会民主党甚至还愿意把建立劳资协会作为谈判的基础。在党内群众压力下，社会民主党才在原则上承认建立人民阵线政策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当时还仍不肯参加反法西斯的民族大团结。因此，在共产党人面前只有一种可能，即采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活动形式，尽量直接接近更多的工人群众，同时争取一些与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有较广泛联系的组织作为同盟者。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领导是实现这项政策的一个障碍，但是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在合作的原则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也妨碍了人民阵线运动的广泛展开。在第七次党代会以后，虽然他们放弃了在当时条件下为直接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要与人民阵线合作必须采取多方面的策略。由于他们把应该贴到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标签贴到每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身上，因此，尽管共产党人作出了英勇忘我的努力，也只能争取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获得了青年人的支持。在社会民主党合法的青年组织

“全国青年委员会”中，领导权逐步转到了共产党人手中。每逢星期天，一队队远足的青年工人云集布达山，工人的文艺演出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活动是组织和教育青年的一个重要环节。1937年8月11日，极右报纸《独立》上发表的一封情绪激愤的读者来信反映了这些游览活动的气氛。来信写道：“……星期日，当夜幕降临，在游览船返回途中，传出了最无耻的煽动和辱骂声。他们常常十人、十五人一组，在整个回归的路上，一直唱着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各种进行曲。这样一个小组，至少使一千名听众得到了‘娱乐’。在宁静的、星光灿烂的夜晚，响起了无产阶级的歌曲和青年工人进行曲。”法西斯暴徒曾多次袭击游览的青年工人队伍。作为回击，1937年9月16日，全国青年委员会将托姆保大街上箭十字党总部前面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据《民族新闻》9月17日报道，“事后，救护人员分乘三辆汽车，带着十名医生赶往托姆堡大街。由于受伤的人过多，不得不把驻扎在玛利亚·特利莎兵营中的军队救护人员也请去救援。此外，还请求救护中心派出一辆汽车连同医生一起前往救护。”

333

看来，同盟者的革命热情很高。在农民中得众望的小农党领导人是大家所熟悉的与贡伯什进行过秘密勾结的埃克豪尔特·蒂博尔。此人创立了“支持政府的反对派”观念。他拥护民族大团结，但奇怪的是，他既反对德国的压迫，也反对工人阶级。1937年，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和民粹派作家结成了“三月阵线”，寻求民族的出路。可是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识到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必要性。这些人的活动为那个时代打下了烙印。当时，海尔采克·费伦茨① 居然成了时代的“文豪”，豪尔沙涅·若尔特和托尔毛伊·采齐尔的甜腻的、脱离实际的作品是那个时代官方文学的代

① 霍尔蒂时代的御用“文豪”，以写消遣性文学作品为主，鼓吹无冲突论。

表。时代还迫使鲍比奇写下了“他是罪人的同伙，因为他沉默不语”这样痛苦自责的诗句。时代也迫使伊耶什·久拉指控地主造成了农民辛酸的过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巴尔托克，当他不愿再把自己优秀的、对于那些人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作品献给“堪称为民族败类的匈牙利的老爷们”时，愤而离开了匈牙利。匈牙利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尤若夫·阿蒂拉被迫自尽。匈牙利的文化界在无情的、准备战争的反革命制度下挣扎着。 334

战争前夕 334

奥地利被占领和西方大国的退让愈加增大了希特勒德国的胃口。就在希特勒高唱和平滥调时，在德国参谋部的保险柜里已经存放着占领毗邻的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详细计划了。大规模的战争准备需要“第三帝国”更多的资源，因而对匈牙利的食品和原料的需求量也就更大。还在1937年，匈牙利四分之一的对外贸易是同德国进行的，德国的资本进一步渗入匈牙利的工业。1938——1939年间，投入匈牙利采矿业和工业企业的德国资本达一亿二千五百万本戈，约占这个工业部门股分总额的12%。1939年，当奥地利的投资转入德国人的手中之后，总理泰莱基·帕尔伯爵本人就认为：“德意志帝国在我国拥有广泛的、大量的投资，通过它们可以对匈牙利的经济生活进行监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对其发生影响。”

法西斯德国对东南欧的小国玩弄离间政策。它先是怂恿匈牙利和波兰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后又利用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答应满足匈牙利修改脱里亚农和约的企图，同时又以此向罗马尼亚政府进行讹诈。所有国家都为此付出了高

昂的代价。德国的经济要求一个接着一个，并且更加贪得无厌，更加难以满足。由于慕尼黑协定，西方大国同意把东南欧纳入了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英国和法国所执行的政策似乎给人以既能讨好希特勒又能同西方民主大国保持友谊的印象。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列强的政策确实也表现为不惜代价保持和平，通过让步来满足法西斯侵略者的要求和把侵略者引向反苏。1939年，在令人窒息的纳粹式拥抱的气氛中，摄政王任命匈牙利统治阶级和匈牙利世袭贵族阶层的一个最博学的成员、一个"久经磨炼"的政客泰莱基伯爵为总理。此人系拜特伦派，在1919年的反革命活动中扮演过主要角色。

335 泰莱基除了保持同德国的友谊以外，还竭力扩大与意大利的传统联盟关系，同时尽力与英国和法国友好相处。看来，他在国内既打击左派力量，也打击右派势力。他在加紧迫害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旨在操纵工人阶级、反对工会的所谓"同业行会"组织的同时，逮捕了箭十字党的头目萨洛希。但是，箭十字党员又重建其党，并由于从德国源源得到了相当于五、六百万本戈的马克，加上德国政策的影响以及他们自己耸人听闻的宣传，在1939年的大选中竟获得了一百万张选票，从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反对党。

二十年来先后执政的匈牙利各届政府一直把全面修改凡尔赛体系构成部分的脱里亚农和约为己任。因此，这个东欧小国自然不会同法西斯德国对立。鉴于匈牙利只有在其邻国被击败的情况下才能满足自己的领土要求，因此就势必将实现自己的梦想——修改和约与充当希特勒侵略的帮凶联在一起。1939年3月中旬，当匈牙利参加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时，它已经这样做了。匈牙利当局在其宣传机构大肆庆贺"扩充疆域"的喧嚣声中已经下定决心为实现德国建立"新欧洲"的计划而效劳了。同时，德国的计划确实也把匈牙利列入第三帝国自己的版图之内了。当然，此时德国还未

露出其对匈牙利的真实意图，而满足于霍尔蒂在德国侵占匈牙利传统的盟国——波兰时保持沉默。至于匈牙利对德国此举纯系忍让而并非出于本意，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1939年9月1日，当德军不宣而战进攻波兰时，匈牙利一方面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则向大量逃避纳粹迫害的波兰军官提供庇护所。波兰事件充分证明了绥靖政策只能助长德国的贪欲。9月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匈牙利政界始终希望通过同希特勒德国的合作兼并更多的领土，同时却又装出强邻在侧，身不由已的样子，力图保持同英、法友好。战争爆发时，未参战的匈牙利大肆鼓噪战备，并实行军事生产体制，同时将工人组织活动的可能性限制到最低程度。政府认为，在战争所形成的局势下，当年大事鼓吹、近来却因德国的压力而被搁置一旁的改变埃尔代伊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泰莱基·帕尔总理于9月3日致函墨索里尼，谋求这位意大利领袖在“将匈罗领土问题作长久的合理解决”方面给予支持。但由于解决这一矛盾与德国人的计划不协调，因而遭到制止。 336

虽然西方大国已对德宣战，但对于波兰人同庞大的、现代化的德国军队所进行的三周壮烈的斗争却只作壁上观。在马奇诺防线后面的法国以及前来支援的英军按兵不动，静观着守卫齐格菲防线的德军，而不去触动他们一下，迫使在波兰的侵略军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当西方大国还在采取载入历史史册的“奇怪的战争”①的消极态度时，德国人却再次采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战略计划，对敌手采用“闪电战”加以各个击破。西方列强玩弄骗局，同希特勒上台以来为反对纳粹的威胁而寻找盟友的苏联进行谈判，同时还一直希望把法西斯庞大的军事力量转到反苏的

① 德国占领波兰后，英法于9月3日对德宣战，但在此后长达七个月之久双方并未交火，世称“奇怪的战争”。

轨道上去。其实，苏联早就发现谈判是靠不住的，为了免于彻底孤立，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西方反苏的领导人失算了。希特勒军队没有把目标转向苏联。1940 年春，德国人不仅迫使法国屈膝投降，而且在数星期内攻占了荷兰、比利时、丹麦和挪威等中立国。在泰莱基政府的坚持下，在意大利同情匈政府立场的情况下，德国人虽然并不热心，但现在已愿意考虑罗——匈的冲突问题了。

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根据 1940 年 8 月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把埃尔代伊北部划归匈牙利。对这一决定，不仅匈牙利沙文主义者不满意（他们希望收回整个埃尔代伊①），罗马尼亚政府也不满意（他们希望保持整个埃尔代伊）。这样，充当仲裁人的纳粹德国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把两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为讨取希特勒德国的欢心，匈罗都向德国争宠，双方都竞相抬高自己，竭立表示对第三帝国的无限忠心和感激之情。德、意、日签订的三国公约墨迹未干，匈牙利政府便于 11 月 20 日急忙参加三国公约。很显然，现在同德国人的亲善比维持同西方的关系要重要得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同德国的巴尔干政策计划协调一致——但也注意同西方列强的关系—— 1940 年 12 月，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签订了“永恒友谊条约”。1941 年 3 月 25 日，当亲纳粹的南斯拉夫政府参加三国公约时，全国愤怒的人民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政府赶下了台，希特勒当即决定进攻南斯拉夫。当希特勒暗示匈牙利可乘机再度“扩充疆域”，要求霍尔蒂参与这一行动时，他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正当泰莱基政府就此事进行试探时，西方大国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一旦南斯拉夫遭到进攻，他们将对匈牙利发动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

战争。在这可能到来的灾难面前总是忐忑不安的泰莱基总理或许 337
意识到后果严重，或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于1941年4月2日深夜自杀。这可以从他写给摄政的遗书得到证实：

“尊敬的阁下！

由于懦弱，我们违背了以莫哈赤讲话为基础的永恒条约。我们的民族已感到，我们抛弃了她的荣誉。我们站到了坏人一边，因为所谓的暴行既不针对匈牙利人，甚至也不针对德国人，而是纯系捏造。我们乘人之危，是一个最丑恶的民族。我没有劝阻你，是有罪的。

泰莱基·帕尔”

给摄政的第二封信写道：

“尊敬的阁下！

倘若我的行动不能完全成功，倘若我还活下去，我向你辞职。”

泰莱基的令人震动的遗书未能使匈牙利统治集团脱离业已开 338
始的道路。在总理自杀后的一片惊愕情绪中，霍尔蒂摄政只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从他给希特勒的信中便可清楚这一点：“在我们良知的斗争中，还有什么比总理的自杀更表明其深度呢！我们的良知使我们请求德国军事领导在确定我军任务时，使之永远同我们的良知相吻合。”接着，人所共知的亲德派巴尔多希·拉斯洛出任新总理。在德军发动进攻后的第四天，即4月12日，匈牙利军队就进攻正趋崩溃的南斯拉夫，并占领了巴奇考、巴兰尼亚三角地带和穆劳地区。仅在诺维萨德一地所进行的大屠杀就有二万三

千人惨遭杀害。这充分说明，反革命匈牙利的一部分人确实是纳粹德国当之无愧的门生。

1941年夏季，轴心国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德、意把罗马——柏林看作一个轴心，并称自己为轴心国）对于西欧、中欧和巴尔干的几乎所有国家，不是占领，就是将它们沦为仆从国。只有英伦数岛全然不顾德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顽强抗击试图登陆的德国人。德军未能占领英国，宣告了至今行之有效的闪电战的失败，迫使德国必须作打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因而，扩大原料和食品供应基地便被提到了重要地位。希特勒认为将其统治世界的宏图付诸实现的时机已到，便将早已策划好的"巴巴罗萨计划"立即加以执行。1941年6月22日，纳粹军队不顾与苏联签订尚不到两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进攻苏联。他们狂妄叫嚣三个月之内就能迫使幅员辽阔的苏联投降。

在纳粹军队进攻苏联以后，匈政府便立即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四天后，又大肆叫嚷苏联飞机轰炸了考绍市①，为其发动战争找到了借口。尽管考绍机场司令当即宣布说，轰炸考绍市的飞机是德国的，但政府未经国会讨论，就迫不及待地于第二天对苏宣战。虽然苏联政府发出了友好的和平的信息，但匈牙利终究走上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的道路。

匈牙利反法西斯力量阻止不了反苏的侵略战争。尽管共产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为了组织起来团结对敌，不知冒过多少次生命危险，抱着多么善良的愿望和英勇忘我的牺牲精神，但仍未能阻止匈牙利对苏的强盗战争。这时，在匈牙利反革命的宣传下堕落了二十年的、因各种矛盾而互相分裂的、被政治领导人多次引入歧途和出卖的匈牙利社会的各派别，或是顽固地维护其原有的

①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曾根据第一次维也纳仲裁重又划归了匈牙利。

思想，或是痛苦地寻求摆脱灾难的出路，其中也有不少人走入了死胡同。战争的繁荣和军事生产的极大发展所带来的较好的就业机会和较多的收入，以及德国法西斯分子军事上取得的巨大胜利一时迷惑了许多人，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的出路在于如何跟上法西斯的步伐，而不去进行反法西斯的团结工作。这样，匈牙利社会在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一方面是反德的，特别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另一方面是在匈牙利推行全面法西斯主义的各种力量，特别是箭十字党——中间加速崩溃和瓦解。 339

在困难条件下进行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仍然把实现工人的团结作为首要的任务。党清楚地看到，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活动的和分散的党组织不能直接接近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如果把党组织建在工会和群众组织之中，并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合作，就能做到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党员中也有不少人愿意站到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来，愿意在他们的地方党组织中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然而，以派耶尔为首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却继续奉行旧政策，采取效忠政府的立场，号召社会民主党党员，把在各组织内活动和散发反法西斯传单的共产党员交给“就近的警察机构”。共产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全国挖土工人协会内，尤其是通过全国青年委员会和工会全国理事会，对广大工人和农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这对于实现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团结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反对在工人阶级内部开展团结工作一样，对农民影响最大的小农党的领导也多方阻碍争取农民的工作。在 340 1939 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小农党的领导中，埃克豪尔特·蒂博尔的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只是在后来，以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和蒂尔迪·佐尔坦为首的反法西斯力量才在党内逐渐扩大影响，加强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至于 1939 年夏季成立的、愿

意合作的民族农民党对群众的影响仍还较小。

此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仍在苦苦寻求国家的出路。民粹派作家和诗人的营垒在战前就已迅速瓦解，其成员从共产党人到极右派分子都有，分布在各种组织内，参加各种运动。多数民粹派人既不同意资本主义，也不同意社会主义，而是从匈牙利的社会特点中引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提出了许多社会形式的设想。他们寻求某种特殊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形式，提出了"农民社会主义"或"匈牙利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想把匈牙利的社会引向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民粹派虽然影响很大，但真正接受他们的理论的只不过是匈牙利知识阶层和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追随贵族和士绅阶层，并把他们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这些贵族官员和知识分子尽管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并不过分热心，也担心德意志沙文主义妨碍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实现，但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远比反德情绪强烈得多。不少人由于德国军事上的胜利和醉心于"扩大匈牙利的疆域"，因而对希特勒崇敬不已。另一些人则由于三个对犹太人的法律，他们可以在损害犹太人的基础上攫取财富。因此，中、小资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人紧紧地把自己和这个制度拴在一起，切望法西斯主义获胜。

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由于准备战争，多年来失业的威胁没有再度出现。同时，匈牙利从 1938 年开始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尽管它是欧洲最后几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之一），并于 1940 年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 7%，1941 年 5 月又提高了 8%。即使如此，由于食品愈来愈缺乏，物价不断上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对生活状况仍为不满。从下面的例子便可看出群众的情绪，1941 年，苏联也参加了布达佩斯国际博览会。在苏联馆前面排着一行行长队，不仅反映了群众的好奇心理，而且也表达了群众的情感。

人们在寻求生路，而政府的宣传机器和从事蛊惑性宣传的右翼运动拥有足够的条件去影响寻找出路的人。箭十字党在1939年的选举获胜以后，因其内讧，濒于瓦解，但它所鼓吹的种族主义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仍然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一些土地重新划归匈牙利以后，政府在德国的压力下承认人民联盟① 为匈牙利德意志人唯一的正式组织。这样，除匈牙利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外，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在匈牙利深深扎下了根。

虽然存在着各种反法西斯团结的社会因素，但同时那种本身包含着德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力量也加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匈牙利

341

是什么力量促使匈牙利政府以装备低劣、缺乏战斗力的军队投入一场反对一个大国的、前景莫测的战争呢？这个大国不仅没有向匈牙利提出过任何要求，而且正如它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 6 月 22 日向匈牙利驻莫斯科公使克里什托菲表示的那样，在匈牙利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在重新处理埃尔代伊的问题上，苏联将持积极的态度。很显然，所谓苏联轰炸考绍市只不过是挑起战争的一个借口，霍尔蒂本人在战后也被迫承认这一点，而认为匈牙利统治阶级对共产党的仇恨充其量不过是感情因素，绝对不是走这致命一步的充分理由。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似乎是德国这一强邻的威胁才迫使匈牙利参战。1941 年 7 月 2 日，匈牙利驻柏林大使斯托姚伊·德迈（后任总理）写给巴尔多希总理的信即可证明这一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他写道："对于因我最近的一些报告所引

① 全名为"匈牙利德意志人人民联盟"，于 1938 年在"德意志人战友联盟"基础上成立。

起的误解，我表示深切的遗憾。似乎我提出了自相矛盾的看法——时而说德国人并不希望我们参与对俄作战，时而则认为他们希望我们参战。纵观我的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最重要的报告，我不能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误解，因为我所有的报告，都极为一贯地表明了我的信念，即德国政治权威方面明确希望我们避免参与对苏战争……。”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也只考虑由芬兰和罗马尼亚军队参与进攻。

匈牙利参战的真正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基于纳粹分子至此所取得的成功，认为德国人将赢得战争胜利，而担心如果匈牙利不参加反苏“十字军战争”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和不久也随之参战的斯洛伐克人将来在瓜分大欧洲时比他们更有利。如果要修改和约，那么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就必须建立优于罗马尼亚人的新“功勋”。就这样，奉行了二十年的要求修改脱里亚农和约的政策导致了匈牙利参加战争。以总参谋长韦尔特·亨利为首的军界则是从一开始便推行参战的政策，为加强军队和参战，他们向摄政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备忘录。军方领导人是如何判断这场战争可能的进程呢？没有什么比国防部长鲍尔陶在6月15日的部长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战争可能的结局的估计更有代表性了。他说：“德国人在三个星期内打败了波兰人，约在同样的时间内征服了法国人，后又在十二天内击溃了南斯拉夫军队，并在三个星期内占领了整个巴尔干。我认为，六个星期内，德国人将出现在莫斯科，并彻底打败俄国。”

无论如何，接近霍尔蒂的人都认为应当参加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参加战后分赃，而且还必须保持一部分军事力量，以便在分配战争成果时，可以在邻国面前显示力量，以满足自己的要求。342 暂时，德国人要求匈牙利在军事上作出的牺牲不象在经济上的损失那样大，这对匈牙利上述的策略是有利的。

越来越多的匈牙利产品流入德国。战争期间匈牙利对外贸易

的四分之三是和德国进行的。德国尤其需要匈牙利提供粮食和食品。为了满足德国的需要，国内口粮定量逐步降低。最后导致出现了一种怪诞的现象：德国每人的口粮份额（包括面包）反而比匈牙利人的还多。1942年制定了尤尔切克农产品交售制度，根据地亩的纯收入量规定交纳农产品数量。这样，致使后来在全国出现了灾难性的食品短缺现象，黑市价格飞涨。通货膨胀也使劳动人民受到打击。德国人不给匈牙利运到德国去的产品付款，而匈牙利则必须以增发通货才能抵消德国所欠的此类债务。纸币数量在无保证金的情况下开始增加。1938—1944年间，纸币数量增加十三倍，其中42%是用于抵偿德国欠款的。

战争所派生的现象逐一出现：折磨神经的排队购物，面包质量低劣，燃料缺乏，木底鞋代替皮鞋，糖、鸡蛋和纺织品在市场上消失。全国人民已经为统治阶级的罪恶政策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匈牙利统治者这时还认为他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德国人除了在经济上进行榨取之外，还对匈牙利派出四万名士兵开赴前线表示满意。德军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取得了迅速的成效。他们占据了苏联的大片土地，很快攻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希特勒已准备举行隆重的莫斯科入城式。看来，匈牙利军队用较小的代价就可以列入以后胜利者的行列了，匈牙利统治阶级可以享受胜利者所应得的战利品了，而且还与西方大国之间避免了战争状态。

战争的胜利暂时阻止了匈牙利倾向西方的意图。接替已故总理泰莱基·帕尔的巴尔多希·拉斯洛眼光短浅的、亲德的政治路线得到了加强。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工人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在巴奇考，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无辜被杀，几千名罗马尼亚人被逐出埃尔代伊。由于执行了第三个犹太人法律，致使十万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职员和收入微薄的人丧失了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三万至四万名生活在匈牙利的外籍犹太人被

赶往被占领的苏联领土，并全部遭到残杀。国内的恐怖气氛也在加剧，军事判决已扩展到普通居民，即规定在法庭的两小时内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得上诉。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被关进集中营。

对战争的成功所寄托的无限希望有如朝露一样的短命。德军343非但未能隆重地开进莫斯科，相反却从苏联首都开始败退。苏联人民英勇的抵抗和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彻底粉粹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间，匈牙利同英国和后来参战的美利坚合众国也进入了交战状态。德军在对苏联发动的"闪电战"遭受失败以后，德国人对匈牙利已不能满足于经济上的支持了。1942年春，匈牙利政府在希特勒强烈要求之下，向苏德战线派出为数二十五万人的第二军团，同时还向前线派出四万名民工。

时运发生逆转。现在已不能指望以很小的代价换取迅速而巨大的胜利了，只能冒着极大的风险，缓慢从事，甚至还可能遭受失败。于是，"秋千政策"应运而生。而此时正在作战的、完全受制于希特勒的匈牙利，其各种条件比泰莱基时期更坏。1942年春，霍尔蒂的心腹、早年拜特伦路线的代表、保守派大地主卡劳伊·米克洛什接管政府。卡劳伊虽不再无休止地表白对德国人的忠诚和感激之情，而是试图证明战争是为匈牙利本身的利益进行的，但这对争取西方大国和长久地蒙骗国内人民业已无济于事了。很明显，卡劳伊的秋千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离开法西斯轴心国的轨道。正当他高唱匈牙利的利益时，受德国指挥的匈牙利军队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战争的泥潭。1942年年中，当德国人集中全力准备攻占斯大林格勒、夺取富庶的高加索油田，并迂回包围莫斯科时，匈军被指定的任务是在顿河河曲充当德军的北翼。由于冬季来临，在夏季一度向前推进的德军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11月，苏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包围并歼灭了保卢斯集团军围困斯大林格勒的三十万德军。1月，被击败的德军开始狼狈遁逃。这时，

德国盟友露出了其真实的嘴脸，他们想用匈牙利士兵的躯体来掩护自己撤退。匈军指挥官居然慨然承担了这一任务。为了掩护德国人，致使数以万计的匈牙利士兵付出了生命。1月15日，在毫无希望的局面下，匈军司令亚尼·古斯塔夫上将命令说："不准后退一步！要采用最严厉的措施阻止任何一个人放弃阵地。只能在阵地战死，绝对不许后退！"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亚尼自己也很清楚。在命令下达几分钟后，他在给德军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的报告中指出："我已给第七军和第四军发布命令，命令他们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将会全军覆没。"因此，当苏军在1月份进行反攻时，匈牙利第二军团损失掉70—80%的兵员，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世界大战的重大转折点以后

冬季战争的恐怖更加速了匈牙利第二集团军的覆灭。成千上万名身穿夏季服装的匈牙利士兵冻死在零下30——40度严寒的无边无际的雪原中。装备低劣的匈军防线被强大的苏军彻底摧毁。匈军士兵狼狈逃窜，即使侥幸躲过了风雪、严寒或对方的冲锋，往往逃不过阻止退却的盟军的子弹。有多少匈牙利家庭在为远方的、为异国的利益而惨死的儿子哭泣。匈军四万人死亡，七万人失踪或被俘，表明了沃罗涅日之战这一悲剧的程度。旗开得胜的诺言却换来了惊人的惨败，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引起了强烈的震惊。各阶层、各党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盘算着摆脱这一灾难的出路。以摄政和卡劳伊为首的统治阶级的一个派别认为，应该使英国人和美国人明白，匈牙利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的。他们希望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西方列强身上，但又认为不宜

与德国公开决裂，当然更谈不上对抗了。于是再次全力以赴开始向西方进行试探。他们的代理人通常是掩饰得比较笨拙的官方或半官方的代表，纷纷来到中立国的首都伯尔尼、里斯本、斯德哥尔摩、安卡拉、马德里，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或寻找其他途径，345 以求同西方进行接触。在当地的匈牙利使馆也参加这些秘密活动。这类尝试在 1943 年秋季曾获得了某些成效，并达成了秘密协议。协议规定，如果西方军队抵达匈牙利边境，匈军应放下武器。霍尔蒂一伙认为，西方军队会比苏军先到匈牙利，因而通过谈判和协议能够使他们维持其统治。事实上，这些人不可能对形势做出现实的估计，也不可能同迄今为止的政策决裂。

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站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一边。亲德的政客和军官更加受到重用，德国代理人更多地打入国家机关和军队参谋部。虽然匈军在苏联前线遭到惨败，虽然意大利退出战争和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登陆，但匈牙利统治阶层中不少人仍然盲目相信纳粹会取得胜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虽然惊恐万状，狐疑不定，但还是象过去那样，唯那些据统治地位的“有识之士”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德国人此时已难于用“主动撤离”或其他类似的话来将失败说成是胜利了。在匈牙利年岁较大的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传统反德情绪，旧的匈牙利贵族生活方式也与纳粹的那一套相距很远。但在匈牙利的年轻一代中却很少有这种气味。他们在反革命的教育下，在为个人前程奋斗的新环境中形成的思想感情使他们更接近于德国法西斯主义。大部分年轻的知识分子、职员和资产阶级分子对希特勒无限信任，他们从未想象过德国人会吃败仗。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共产党人提出了代表全国各阶层利益的奋斗目标，站在反德力量的前列。从 1941 年 9 月开始，匈牙利共产党提出以建立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匈牙利而斗争的口号，以团结反

法西斯和爱国力量。共产党人的口号是："立即单独媾和！"、"要和平，要面包！"、"不给希特勒提供一名匈牙利士兵！"、"把我国军队调回国内！"这些口号在匈牙利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1年10月6日，在匈牙利第一任独立政府总理鲍詹尼的长明灯前举行了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11月1日，要求民族独立的数千名群众来到凯赖派希①的科苏特和坦契奇的墓前献花圈，举行示威游行。其中有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小农党和农民党的政治家、作家、艺术家、无党派人士、爱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提出新的人民阵线政策的条件已经成熟。要求民族独立和自由把所有反德志士聚集在共同的旗帜下。1941年圣诞节的《人民之声报》②除载有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外，还发表了反革命领导的史学家之一、多才的塞克菲·久拉③、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以及其他一些反德的爱国人士和政治、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都阐明，只有达到民族的团结，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不久以后，成立了包括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在内的"历史纪念委员会"，以指导民族抵抗运动。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的组织，除共产党人外，还有各政治、社会和宗教组织的人士。

345

"历史纪念委员会"计划在1942年3月15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借口箭十字党准备挑衅，企图阻止这次游行示威。尽管如此，数千名群众仍聚集在裴多菲纪念碑前，要求结束战争，要求缔结单独的和约。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裴多菲塑像前宣誓，要求建立独立、民主的匈牙利。国家的有识之士希望把匈牙利人民从灾难的威胁中解救出来。继3月15日的游行示威而来的是政府的镇压行动，其目的是要扼杀人民

---

①在布达佩斯东郊。

②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③解放后任驻苏大使，国家主席团委员。

阵线运动的领导力量——匈牙利共产党。3月15日游行示威以后，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其中党的两位领导人罗饶·费伦茨和申海尔兹·佐尔坦在受尽百般折磨后惨遭杀害。

反共的恐怖削弱了人民阵线运动的力量。从1943年初开始，战争过程中发生的转折以及战局的恶化要求采取同德国人断绝关系的明智政策。虽然卡劳伊政府根据与英国人达成的秘密协议的 347 精神，应于1943年下半年逐步把匈牙利军队撤离军事行动，但没有勇气削弱同德国的关系。1943年9月，当秘密协议达成的时候，他们指望在巴尔干登陆和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后盟国军队能迅速抵达匈牙利边境，但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并在巴尔干岛上击退了登陆的部队。

1943年11月，三个盟国领导人(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会晤时作出决定，由苏军解放匈牙利。看来匈牙利政府对此确实一无所知。但从战局的发展，从苏军迅速而又节节胜利向前推进来看，英美军队不可能先于苏军抵达匈境。此外，匈牙利政府也注意到，西方大国已不愿同卡劳伊的代表举行会谈，然而匈牙利领导人仍在顽固地坚持试图同西方接触。盲目的反共仇恨和对苏联的恐惧心使他们无法进行冷静的思考。

强大的苏联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直逼匈牙利边境。至此，霍尔蒂和卡劳伊仍在试图同西方单独媾和上枉费时间。1944年春，虽然匈牙利统治者对苏军的威力已非常清楚，但他们仍幻想在东部边境挡住苏军的进攻，以等待西方军队的到达。

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未能达到使国家由英美军队占领的 348 目的。英国人通过瑞士通知与他们联系的匈牙利代表和苏联进行谈判。从意大利人退出战争中“吸取教训的”德国人在获悉匈牙利人的这些行动之后，决定迅速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3月初，“维菊计划”准备就绪。此计划准备了两手，或是镇压武装的反抗，

或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匈牙利。

德国人的占领

1944年3月17日，希特勒召见霍尔蒂，通知他德国已决定出兵占领匈牙利，同时建议霍尔蒂继续留任摄政。霍尔蒂竟承担了这一卑躬曲膝的角色。1944年3月19日，国家良知的喉舌、共产党领导下的科苏特电台从莫斯科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号召：

"匈牙利的兄弟姐妹们！

……在科苏特逝世纪念日的时候，全国再次沉浸在哀悼之中。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祖国！他们不满足我们已经作出的牺牲，他们要彻底毁灭我们……德国的占领意味着国家被掠夺和千万人的死亡，意味着城市被炸毁、国家变为战场，意味着我们的祖国和我国人民要遭受毁灭……"

科苏特电台不祥的预言证实了。与德军一起到达的秘密警察、全欧洲都惧怕的盖世太保不仅开始逮捕共产党人，还开始关押社会民主党、小农党、农民党的党员，关押进步学者、艺术家和国家的杰出人物。数天内，三千名反法西斯战士落入了德国政治警察的魔掌。与盖世太保一同来到匈牙利的还有以埃希曼为首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特派小组。匈牙利犹太人的悲剧开始了。事件接二连三不断出现。起先命令他们佩戴黄星，接着把全国的犹太人强行迁入连中世纪也为之羞辱的犹太人隔离区。5月间，一列列装满犹太人的拥挤不堪的、铁门紧锁的货车开向死亡营、毒气室。全国地方上近五十万匈牙利国籍的犹太人，不论妇女、儿童、老人，一律被强行运走，大部分被杀害。

在劳动服务队里干活的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命运也并非好一

些。他们在虐待成性的武装监工的皮鞭下，在践踏人类尊严的长官的兽行下，痛苦熬煎。人们不仅惨遭杀戮，就连对生活的信念也横遭扼杀。

德国的占领不仅使共产党人、反法西斯人士和被迫害的犹太人遭殃，而且全国人民也都深受其害。由于食品配给量日益减少，城镇居民一直在挨饿。德国占领后，他们又饱尝英美空袭的恐怖。

德军侵占匈牙利后，曾担任匈牙利驻柏林十年之久的大使、对纳粹分子无限崇拜和死心塌地的走狗斯托姚伊·德迈组织政351 府。从此，希特勒在匈牙利的代表埃德蒙·魏森美尔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匈牙利第一军团数万名士兵再次开赴前线，三万至三万五千名匈牙利士兵被编入纳粹党卫军进行作战。这一时期，在苏联前线的匈军共达二十五万人。匈牙利当局竭尽全力希望给予德国人以支援，计划到年底共派一百万匈军投入战争。因此，匈牙利新政府奴性十足的忠诚博得了德国的信任。

在被统治者出卖了的国家里，进步力量虽然大为削弱，而且不断受到迫害，但还是组织起来了。此时，被禁止、受迫害和被迫转入地下的社会民主党和小农党的领导人也已认识到反法西斯团结的必要性。1944年5月成立了“匈牙利阵线”，号召人民进行反抗和怠工。但是，团结在匈牙利阵线内的代表小土地所有者、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力量没有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组织武装斗争的建议。进步力量(除几个较小的共产党的武装队伍以外)没有能力组织反德的武装斗争，而走投无路的统治阶级也下不了决心摆脱德国法西斯而与苏联进行合作。8月中旬，当罗马尼亚人与德国人352 决裂，并为解放自己的祖国站在苏军一边战斗时，霍尔蒂仍顽固地坚持抵御苏军，等待西方盟军的到来。霍尔蒂一伙在这一实质上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统治的尝试中物色合适的人物以代替德

国人的仆从斯托姚伊。1944年8月24日，霍尔蒂把不熟悉政治的军人洛考托什·盖萨上将提升为总理，并再次向英美试探。但对方明确通知匈牙利，为了实现停火，匈牙利必须和苏联取得联系。这期间，苏联红军已击溃为占领南埃尔代伊和企图阻止苏军向前挺进的匈牙利部队，并已开始解放匈牙利的国土。

在这种情况下，霍尔蒂一伙很清楚，如果不能迅速摆脱德国人并放下武器，整个国家就会变为战场，成为德国利益的牺牲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转向苏联政府。

1944年9月28日，匈牙利停战代表团终于秘密前往莫斯科。10月11日，苏联下令自己的军队在毛科① 一线停止前进，匈牙利则接受了盟军的停战条件：

“第一条：匈牙利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别国不得干涉其内政。

第二条：国防军保持其武器，它将同仍然占领匈牙利领土的或还在其领土上战斗的部队作战。

第三条：匈牙利军队与俄国军队一起进攻德军。匈军退到1937的边界线。边界线的最后划定，有待于今后和谈后决定。”

在当时的情况下，停战条件是非常公平合理的。现在，本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去反对德国，以实施停战条件。然而，霍尔蒂对此协议的生效又干了些什么呢？没有。他不敢依靠进步群众(其实他们可以构成实施这些条款的群众基础)。在军队领导和上层官员中则是充斥着德国代理人和希特勒的信徒。因此，10月15日中午，当电台广播霍尔蒂关于停战声明时，匈牙利没有丝毫的准备，没有掌握足够可以保证实现这个声明的军事力量。接着，德国人把霍尔蒂劫往德国，迫使他收回在电台广播的声明，要他把政权“自

① 在琼格拉德州。

愿”移交给对纳粹死心塌地的箭十字党狂热的头子萨洛希·费伦茨。10月15日晚，萨洛希在电台宣布他已接管政权。从这一天起，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几个月的恐怖便在全国出现了。

354

箭十字党的恐怖统治

箭十字党徒的恐怖统治使国家彻底陷于崩溃。此时，德国人确实从心里感到满意了。萨洛希及其匪帮拚命把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共同的战争”中去。他们强迫十四至六十岁的男子、妇女和儿童从事劳动服务或进行武装战斗，答应给希特勒派兵一百五十万人。他们狂人般地帮助德国人破坏和掠夺自己的国家。他们拆毁了工厂，把机器、国家贵重金属的储备、无法估量的艺术珍品和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等，总之，把国家能够搬动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统统劫往德国。

他们迫使士兵和被招募来的男子为维护他们的利益作出无谓的牺牲，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谁不听从他们疯狂的命令，谁就会被处死。当时，所有的声明、命令都以“处死”来威胁群众。所谓处死并非仅仅是一种威胁手段，这一点，每天都可以得到证实。箭十字党的暴徒遍及城市和乡村，他们到处抢劫和杀戮，只是由于苏军节节胜利和向前挺进，才使群众从箭十字党徒进一步的大屠杀中解救出来。听到苏军日益逼近的消息后，箭十字党徒和德国人到处在没有受到居民阻止的地方毁坏工业设施，炸毁桥梁，劫355 运财宝，赶走牲畜，还按照全部撤空的命令迫使居民随同他们一起“逃往”德国。

在首都，他们的暴行最令人恐怖。一队队箭十字党徒不断寻找逃兵和犹太人。大街上，形形色色的箭十字党徒都戴有臂章，

全副武装的小分队到处出没。许多不幸的人被带到“箭十字党党部”，在受到他们的非人折磨之后被投入多瑙河淹死。被抓获的犹太人和爱国者被徒步赶往德国。途中，大量的人因箭十字党徒和纳粹德国党卫队的子弹，因饥饿、寒冷或精疲力竭而丧生。如有人想停停步，就立即遭到枪杀。片刻的停留，便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一部分实际上已没有足够的力气再往前走，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死亡的道路，以免再受痛苦。

箭十字党徒的逞凶和苏军的向前挺进增强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尽管有即决处死的命令和残暴的镇压，但还是有成千的士兵从溃败的军队里逃走了，应征入伍的人也躲藏了起来。乡村和城镇的劳动人民在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执行全部撤空的命令。在切佩尔、米什科尔茨、欧兹德和其他一些地方，人们起来阻止拆毁机器运往德国。共产党人处处站在反抗斗争的最前列。从1944年夏季开始，国内已有小股游击队活动。8月，拉科齐游击队和裴多菲游击队开始行动。9月，诺格拉迪游击队继而出现。在同德国人展开的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中，基利安·久尔吉、罗饶·里哈德以及其他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英勇的反抗战士沙洛瓦里·安德烈被警察杀害。在米什科尔茨、杰尔、佩奇、欧兹德、绍尔戈陶尔杨，在陶陶矿区，在首都布达佩斯，处处都展开了武装的游击斗争。人们开始怠工和进行爆炸活动，炸毁了象征在匈牙利实行全面法西斯统治的贡伯什·久拉的塑像，爆炸的弹片使正在首都剧场举行大会的箭十字党党徒惊恐万状、作鸟兽散。

在箭十字党的恐怖统治之下，其他各党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倡议，愿意组织武装斗争。11月初，在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的领导下，成立了武装抵抗的中心组织——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然而箭十字党徒却很快抓获了起义领导人。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基什·亚诺什中将、纳吉·耶诺、陶

尔乔伊·维尔莫什和一起被捕的共产党人全被杀害。由于苏军迅速向前挺进，自愿参加苏军的布达团的士兵几乎未能进入战斗。

苏军迅速挺进带来了法西斯统治的末日和国家的自由，这是匈牙利自己的力量所不能做到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从东南、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从东北、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从南面，即从南斯拉夫方面向匈境内进军。在解放了蒂萨河以东地区和匈牙利东南部以后，12月25日苏军包围了布达佩斯。被困在首都的十万多德国人和忠于箭十字党的匈牙利士兵，不顾美丽的首都作为残酷战场的严重后果，听从德国人和箭十字党的命令"死守"城市。苏军为了保护城市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未动用重炮。躲藏在地下室的首都居民由于恐惧、饥饿、寒冷以及"死守者"的暴行，被折磨了一个半月。在反动制度垂死挣扎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相信箭十字党和德国领导的愚蠢的宣传，期待着"神密的武器"以及"解放者德军"的到来。苏军战士展开巷战，夺取了城市，他们为解放首都付出了不少血的代价。多瑙河以西地区的人民，在德军不顾一切的顽抗之下继续经受了几个星期的苦难。1945年4月4日，胜利的苏军解放了匈牙利的全部国土。一个月后，苏军攻克法西斯德国的首都柏林，盟国军队共同迫使德国野兽投降。匈牙利开始了新的生活。遭受了如此痛苦的国家获得了自由，迎来了1945年的春天。

五月的天，请把你的光辉洒满人间，
你的光辉比任何年代都强烈百倍！
匈牙利的大地上，长夜漫漫无天日，
我们在战斗中死去，在奴役中熬煎，
我们多么需要你呀，珍贵的五月天，

你给我们力量，燃起我们心灵的火焰。
我们能够说，现在我们已经觉醒，
我们敢于战斗，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

（加博尔·安多尔：歌唱1945年的五月天）

十三、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

“匈牙利将获得新生”

359　反革命制度愚蠢的战争以及法西斯的破坏，给解放了的匈牙利人民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解放者苏军所遇见的，是被炸断的桥梁、烧毁的房屋、破坏的街道、扭曲的铁轨、断裂的电网、劫掠一空的工厂、仓库和商店。那些在战斗中或在德军撤退时未曾毁掉的东西，则被箭十字党党徒和逃跑的旧制度的老爷们抢劫一空。民族经济遭受二百二十亿本戈的损失，占国民财产的40%。360 半数以上的牲口、近30%的农业机械设备遭到毁坏或被掠夺到西方。大部分工业和矿山机械设备、原料及成品贮备被毁。全国交通濒于停顿，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桥梁，三分之一的铁路遭受严重破坏，大部分汽车、机车，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毁，就是被劫往德国。由于电力、电话和煤气供应遭到破坏，由于各种设备和线路被毁，由于大量缺煤、缺少能源，因而连提供几小时最低限度的需求都得不到保证。当年人口百万、美丽的首都，在遭到狂轰滥炸和长期的围困之后，变成了一座废墟的城市。被烧毁的王宫的断壁残垣，浓烟滚滚的维高多大厅，堆满瓦砾、弹坑累累的道路，这一切都象征着经历了长期战斗的大城市的毁灭，尤其是布达，更是被作困兽之斗的党卫军弄得遍体鳞伤。躲在地下室里的人们衣衫褴褛，面黄饥瘦，他们是这些令人可怕景象的目击者。其中不少人紧抱着小包袱或小皮箱，他们一生劳动所积攒下来的

或世代祖传剩下来的就只有这点东西了。不少的人在自己家的废 361
墟中可怜地翻寻着，许多人在为死去的亲人痛哭，更多的人在绝望与一线希望之间寻找他们的家属，每个人怀着忧虑与希望的心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今后怎么办？

1944年秋，在解放了的部分国土上，生活重新开始了。和大部分群众不服从箭十字党撤走的命令相反，那些被法西斯野蛮宣传吓破了胆或心怀仇恨的高级官员、在反革命统治下干尽了坏事的领导阶层、大部分地主、工厂主和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纷纷逃入还在德军控制下的多瑙河以西地区，或是逃离这个国家。国家的解放，在群众中威信扫地并要对战争负责的统治阶层的逃跑、反革命军队和行政系统的崩溃造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时间证明了，旧制度的被迫害者，那些早就起来反对这场疯狂战争的人——首先是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解放者红军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全国政治和经济的复活。在解放区，迅速地建立了许多政党，这些党在德国占领时遭到破坏或被迫转入地下。1944年10月，在奥普罗·安陶尔、卡达尔·亚诺什、里瓦伊·尤若夫、沃什·佐尔坦的领导下，共产党进行公开活动了。1945年2月，拉科西·马加什由苏联回国，担任党的领导。1944年12月，匈牙利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临时党章。所有已解放的城市都建 362
立了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1944年11月30日，党在解放了的塞格德公布了“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和发展匈牙利的纲领”。同时，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党也成立了。1944年12月3日，在已解放的部分国土上，五个民主党，即独立小农党、匈牙利共产党、民族农民党、资产阶级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的代表联合组成了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它以实现国家生活的民主化为自己的目标。

独立阵线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它与苏联，与邻近已解放的

各国人民及西方盟国紧密合作，清除社会中的法西斯分子。此外，它提出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把基础工业部门和能源供应收归国有。独立阵线的建立，是基于在许多乡村和城镇早已有不少自发产生的、建立在各党合作基础上的地方民族委员会。而独立阵线的建立，又使各地方委员会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些地方委员会便成为正式的机构了。在独立阵线的倡议下，不仅国家政权的地方组织扩大了，而且还成立了国家政权的中央组织——临时国会和临时政府。10 月 11 日，在解放了的塞格德开始组织国家的重建工作。从 12 月开始，解放了的德布勒森市成了为 363 建立民主的匈牙利而进行斗争的中心，成了东部已解放地区的心脏。在一个遍地废墟、交通中断、饥寒交迫的国家中，召开一次国会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二十四名代表分乘十九辆卡车，花了十天工夫，走遍了已解放的国土上的四十四个城镇和大部分乡村，把地方居民民主选出的新的国会代表聚集起来，送到德布勒森。1944 年 12 月 21 日，在一所古老中学的大厅里召开了临时国会，共有群众大会选举产生的二百三十名代表参加。这次临时国会的召开，好似一百年来为国家的独立而进行斗争的象征，因为开会的场所，正是百年前——1849 年脱离哈布斯堡王朝、庄严宣布国家独立的地方。国会显示了反法西斯的广泛团结。前霍尔蒂的将军和高级官员、反德的伯爵、职员、神甫、小手工业者和商人同全国各阶层的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开会。从党的分野看，代表们代表了所有的民主党派，除有共产党代表七十一人外，还有小农党代表五十五名、社会民主党代表三十八名、农民党代表十六名、资产阶级民主党代表十二名、无党派人士十九名、工会代表十九名，这些人联合组成了临时政府。

前匈牙利第一军团司令达尔诺基·米克洛什·贝拉上将任临 364 时政府主席。作家、农民党的埃尔代伊·费伦茨任内务部长，贝

凯什乔鲍的图书商久哲西·亚诺什任外交部长，泰莱基·帕尔的儿子泰莱基·盖萨伯爵任文化部长，纳吉·伊姆雷[1]任农业部长，经济学家加博尔·尤诺夫任贸易部长，社会民主党的律师沃伦蒂尼·阿戈什任司法部长，泥瓦匠陶卡奇·费伦茨任工业部长，福劳戈·加博尔上将任食品部长，共产党学者莫尔纳尔·埃里克特任福利部长。临时政府是匈牙利进步历史的继承者。临时政府的声明说：

“临时政府忠于拉科齐和科苏特的伟大传统，将永远同在若干世纪中奴役自己国家的德意志压迫者及在一代人的时期内，曾两次把我国卷入到战争失败中和民族崩溃中的德意志联盟决裂……

为了重振国家的经济，为了实现农民多少世纪以来的梦想，为了巩固匈牙利民主的支柱……必须立即实行土地改革，使数十万没有土地的人和小农成为有生命力的经济的主人。”

根据声明的精神，临时政府于 1944 年 12 月 28 日宣布，与德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并向德国宣战。1945 年 1 月 20 日在莫斯科与盟国签署停战协定。协定宣布，匈牙利积极参与反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邻国因其进行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根据停战协定，解散一切法西斯组织，清算战争罪犯。停战协定规定恢复 1937 年的边界。盟国派出一个常设监督委员会来到匈牙利，负责监督停战协定条款的执行情况。

停战协定本身不仅要求消灭法西斯残余，而且为在全国实现民主化的进程创造了条件。吸取这次战争教训的全国人民同样希望如此。这期间，国内、外的政治局势有利于向民主化方向发展。1945 年 1 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建立社会的民主生活。政府解散了宪兵队，成立了民主的警察局以代之，还建立了人民法

---

① 即 1954 年和 1956 年任总理的纳吉·伊姆雷。

院，对战犯和反人民的罪犯进行审判。一切公职人员以及后来的一切私营企业的雇员必须到甄别委员会去报告自己在反革命制度下、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的活动情况。尽管部分甄别委员会把这一工作看作是走过场，但一些最猖狂的法西斯分子毕竟还是被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了。关于必须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命令，是临时民族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命令之一。“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和发展匈牙利”这一文件，是 1944 年初由匈牙利共产党制定的，后来，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把它作为总纲。但这一文件没有提到要求实现工人监督或为实现监督而建立工人组织。然而没有本单位的工人组织，就无法对资本进行有效的监督。这样，工业的民主化问题，就由各该工厂委员会负责了。

367　在解放了的国家内，少数人占有大片土地的情况依然如故。埃斯泰尔哈齐・帕尔公爵占有土地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霍尔特，费什泰蒂奇・久尔吉公爵占有六万九千四百零六霍尔特，保洛维齐尼・奥尔丰兹侯爵占有五万四千七百霍尔特，埃格尔的教会占有六万七千二百五十四霍尔特，考洛乔的大主教占有近六万霍尔特的土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匈牙利还存在着封建主义。但是，全国土地信用所拥有十二万六千一百四十九霍尔特，匈牙利综合煤矿股份公司拥有八千五百五十九霍尔特，里毛穆拉尼——绍尔戈陶尔扬钢铁股份公司拥有五千四百九十九霍尔特的土地，这已表现出金融资本在农业方面的影响。

1945 年 3 月 17 日颁发的土地改革令给大土地所有制以毁灭性的打击。被定作卖国贼的法西斯分子的土地全部没收。地主土地凡超过一百霍尔特，农民土地凡超过二百霍尔特，以及任何人超过一千霍尔特的土地，国家予以征用。只有参加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人，才可保留三百霍尔特的土地。各地都成立了土地申请委员会。事实表明，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大于他们亘古以来的小心谨

慎，也比反动派所散布的复辟旧制度的恐怖更为强烈。近六十五万人申请土地。总计五百六十万霍尔特可分耕地中，有三百二十六万霍尔特的土地分给了十万零九千八百七十五个雇工、二十六万一千零八十八个农业工人、二十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个少量土地所有者①、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个小土地所有者②、二万二千一百六十四个农业合同工和小手工业者、一千二百五十六个专业农业人员和一千一百六十四个林业职工。

土地改革奠定了改造农村社会的基础。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地主、大土地所有者③，再也不会出现与他们截然相反的、靠做短工谋生的无地农民、累断筋骨的雇农和生活艰难的小农了。现在，农村中唯一的"贵族"是富裕的农民。但是，过去已经有了一点家产，有了一些农具的旧农民与仍然带着昔日贫困遗产的、只有极少数农具、靠分得的几霍尔特土地（全国平均每户分得5.1霍尔特）的"新农民"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差别。将没收的十五万件小型农业机械分配给他们，仅如沧海之一粟。由于缺少耕畜，因而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耕种土地。

各地由普通工人、农民和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始终站在土地改革和重建新生活的最前列。他们打破一切条条框框，以无限的热情和清醒的头脑去消灭法西斯的残余，清除各处的废墟，组织生产劳动，在农村和城市建立正常的生活。开始，当正式的政府机构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人民证明自己能领导这个国家的生活。

共产党是整个国家的生活、民主化和工作开始的动力。在一

① 指原拥有五霍尔特土地以下的人。

② 指原有土地靠家庭劳动力经营可自足者，其土地比少量土地所有者略多。

③ 指拥有一千霍尔特以上土地的人。

个备受破坏的国家内，共产党人在人民中播下了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种子，宣称"匈牙利将获得新生"。全国解放后，大约只有10%的工厂能开工。在机器被烧毁、被掠走，原料贮备枯竭的情况下，在逃跑的工厂主所抛弃的工厂中，工人们用自己的双手，用忘我的劳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创建了新的生活。当工人们开始清除废墟，修理找到的几部被损坏的机器，把一些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产所需的原料搜集在一起的时候，工人们并没有指望什么报酬，368 即便得到了一些，那也会随即流失在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的浪潮中。

国家重建的动力——匈牙利共产党在1945年3月20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指出，要保证国家生活走上轨道，恢复铁路、道路、邮政、工厂，尤其是恢复农业机械工业是件头等重要的任务。党代会后，国民议会决定拨款二十多亿本戈用于恢复交通和恢复生产。苏联帮助匈牙利开始重建工作。经受残酷战争的破坏、本身需要和大量物资短缺作斗争的苏联，在1945年春把一万五千吨粮食、三千吨肉、二千吨糖、二千吨马铃薯及其他食品运到饥饿的匈牙利，首先运给首都人民。根据1945年8月签订的合作和互换货物的协议，苏联以大量的原料，首先是棉花、焦炭和铁矿砂支援匈牙利人民进行工业生产。要使苏联大量的原料和矿产品，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煤，工业产品，大城市居民生活所必需的食品能运往指定的地点，这是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369 共产党提出了"面向铁路"的口号，并由从苏联回国的格罗·埃尔诺领导交通的重建工作。人们提出要在年底前修复一万辆铁路车辆和五百台机车的奋斗目标。

为重建轨道和最主要的桥梁以恢复交通，展开了一次"桥梁战"。同时，为保证燃料供应，又打了一场"夺煤战"。

这时候，工人阶级是如何响应匈牙利共产党发出的号召呢？

以煤的生产为例，尽管有矿主的阴谋破坏，但煤产量从1945年1月份的一千车皮，提高到9月份的一千七百车皮。

为重建国家而辛勤劳动的各阶层人民，不仅要与重建工作中的一切困难作斗争，而且还需克服生活中每天遇到的问题。在没有粮食贮备、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中，食品和工业品灾难性地紧张。食物配给证上每人一百五十——二百克一份的面包也不能保证供应，面粉、猪油、黄油和其他头等食物从商店里消失了，却重新出现在以高价进行敲榨勒索的黑市上。正在复兴的城市的瓦砾上，除了有投机商在到处活动外，每天所看到的，是那些收入微薄的人将自己最后一件可穿的衣服拿去换一点食物的景象。街 370 道上，许多参加义务劳动或被安排参加劳动的、衣衫褴褛的人在打扫碎砖残瓦，但在几个新开的咖啡馆内，用支付现钱逃避了公益劳动的投机商们，却在大量贩卖囤积的货物以获取法国拿破仑金币①、美元和各种外汇。

本戈已贬值到不能作为交换的手段了。从1945年夏季开始，它的币值暴跌，如此贬值的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大约在一年的时间内，一百四十万的五次乘方本戈的币值，才相当于1938年的一个金本戈的币值。印钞票机滥印纸币，人们只能以百万为单位来计算“百万票面的本戈”，后来，又要用万亿为单位来计算“万亿票面的本戈”。从十二月份开始，交纳税款也要用“万亿”来计算了。货币的贬值使经济生活正常化无法实现，工资远远赶不上暴涨的价格。在价格每小时上涨数倍的情况下，早上拿到手的工资，到晚上只够买一盒火柴。于是物物交换取代货币流通，收入微薄的人不得不将自己最后的有用之物、暂时可以不穿的衣服包在小包袱内，拿出去换东西。一队队背着背囊的人离开城市来到乡村，

---

① 值二十法郎。

用他们的衣物去换取粮食；而另外一批批背着背囊的农村人，则挤满了难得行驶的火车，他们带着粮食到城里去换取工业品。当工人、小农、新农民和穷苦的劳动者在重建自己的国家并在通货膨胀下呻吟的时候，昔日的资本家却变成了投机商，他们在被毁国土的废墟上搜括了大量的财富。这时，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了：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是在为谁重建国家？是为他们自己，还是为昔日的剥削者？是为创造社会福利的人，还是为趁火打劫的人？

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问题上，所有的党意见都一致，而法西斯主义的忠实信徒、害怕追究责任的资产阶级分子，国家的行政人员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却保持沉默，躲在一边。但当涉及国家今后走哪条道路的时候，各党间的矛盾便表现出来了。于是，从隐匿处钻出来的反动派便乘机开始为保卫他们反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疯狂的活动。1945 年，当每个人必须在甄别委员会面前报告自己的历史时，他们对大、小法西斯分子有组织的营救活动便开始了；当贯彻执行土地改革法令时，他们以各种名义设法保留土地，以便他们至少能保留几百霍尔特。人民法庭全国理事会则往往取消了各级地方人民法庭对法西斯分子依法惩处的判决。重建工作从而开始遭到阴谋破坏，沮丧的情绪开始抬头，因为“反正二十年内国家不可能得到重建”。行刺事件不断发生，苏联军人常被杀害，许多法西斯的阴谋活动被一一揭露，这一切告诫人们，反动派从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在全国，还有法西斯主义的积极活动者和他们的基地。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信徒感到他们身后有西方大国的支持。

在对德、日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当年战友般的同盟开始瓦解，371 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了。当苏联开始迫使奴役欧洲的法西斯野兽投降时，很显然，苏联是有能力解放

整个欧洲的，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中，西方大国不得不同意由苏联去解放中欧。但当西方大国看到中欧各国人民似乎欢迎这个可能性，并且准备沿这条道路走下去时，他们便在这些国家内开始进行疯狂的活动，以便使资本主义势力得胜。复活的资本主义势力理所当然地指望西方的全力支持。

这时候，匈牙利复活的反动势力还未能公开地形成一个党。但实际上，他们团结在拥有大量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德国占领时期被取缔过的“响当当”的小农党周围，要比自己组织一个党有利得多。在小农党的领导内部，右翼势力越来越强。小农党内不是彻头彻尾反动的领导人也认为，如果在选举前，各阶层能在这个党内看到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物，那对党来说将是有利的。党内具有民主思想的领袖和左派被排挤，大批反动分子涌进了小农党。小农党为了猎取选票，不择手段，迎合选民。例如在竞选海报上画上十字架，提出的口号里有诸如上帝、祖国、保护私有财产之类的话。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小农党得到57%的绝对多数的选票，而共产党只得到17%，社会民主党得到17%，民族农民党得到7%的选票。

在新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斗争 372
开始激化，主要表现为他们是支持小农党右翼领导人复活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支持共产党人旨在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所应走的道路。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问题，即能否阻止右翼势力的不断扩大，以免自己被孤立。

小农党的胜利，在龟缩起来的反动派的心头唤起了极大的希望。逃往西方的官员、资本家、军官和箭十字党人开始回国。当时小农党的大部分领导权虽已掌握在右翼手中，但毕竟还需小心从事，以免暴露其真正的意图。尽管大选的胜利巩固了小农党，小农党的蒂尔迪·佐尔坦取得了总理的职位，半数的部长职务也由小农

党员担任，但仍然需要考虑到，在政府中还有四个共产党部长，四个社会民主党部长和一个农民党部长。一些关键性的职位，如一个副总理的职位，内务部长的职位，福利部长和交通部长的职位都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在内务部的各机构内，在警察局，在国家经济领域的领导职务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和忠于本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人把武装部队里的相当一部分权力继续保留在自己的手中。要想夺取这些人的权力，除非使用武力，而苏联军队的存在对使用武力是非常不利的。

小农党党员队伍和选民的构成也促使小农党领导要谨慎从事。暂时，小农党还需要广大小农的支持。各党联合组成的独立阵线虽然还保持着，但由于反动派加紧进攻，加剧了国家的困难。这时，反动派开始起来反对土地改革。1946年初，许多地主纷纷起诉要求收回他们的土地。大为震惊的新农户体会到，在保卫土改果实的斗争中，站在他们一边的，不是小农党，而是共产党，他们提出了“我们不交还土地！”的口号。

显然，要反对右翼的进攻，只有集中左翼的力量方能取胜。面对小农党反动的领导及其影响下的反动势力，1946年3月5日，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和工会全国理事会的联盟——左翼联盟。

左翼力量团结的威力很快就表现出来了。小农党不敢公开地把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抛到群众面前，而左翼联盟却在群众的支持下，要求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左翼联盟在成立之时就提出要清洗国家机器，把铝土矿、油井、能源工业及全国最大的三个工厂——切佩尔的韦伊什·蒙弗雷特联合企业①、里毛穆拉尼·绍

---

① 即今切佩尔钢铁联合企业，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公司。

尔戈陶尔扬钢铁联合企业和甘兹康采恩收归国有，并要求把银行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在小农党的议会多数面前，左翼联盟以拥有群众与之相抗衡。1946年3月7日，四十多万群众在首都街头 373 举行游行，支持左翼联盟的要求，反对小农党的反动派。第二天，当左翼联盟在给小农党的备忘录中要求四天内把最反动的领导人驱逐出去时，慑于群众的示威和党内以道比·伊斯特万及俄图泰·久拉为首的民主势力的压力，二十一个极右的领导人被开除出党。这时候，离1946年2月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已有三个多月，当时共和国总统是蒂尔迪·佐尔坦，总理是纳吉·费伦茨，他们都是小农党的代表。

受小农党右翼领导人影响的人和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之间，在稳定财政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到1946年夏季，通货膨胀达到顶点，本戈已变得不值一文，依靠工资过活的劳动阶层极度贫困。这时，国家的重建工作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从苏联得到的原料和价值八百万福林的实物贷款大大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建立稳定的货币已刻不容缓，除投机商外，整个社会各阶层都要求这样做。团结在左翼联盟周围的进步力量赞同稳定货币。对共产党人和它的同盟者来说，货币的稳定是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劳动群众较好的生活条件的一种手段。然而反动派却妄想乘此机会，把国家这条航船引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水域。 374 1926年的财政稳定，使帝国主义的大银行在匈牙利大发其财。现在，在新的条件下，他们还想再重演一次。为此，他们声嘶力竭地说，只有用外国的贷款才能使国家在经济上保持稳定。很明显，在这方面所需的巨额，只有从西方，从美国，从英国才能得到，因为苏联的力量完全用在重建被破坏的国家上面。但共产党坚决主张，必须用国家内部的力量，不需要外国的贷款来建立新的货 375 币，并为这一经济方式制订了具体的计划。所以稳定货币的方针

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反动派千方百计破坏货币的稳定，共产党则动员全体人民来挫败反动派的计划。对于广大工人群众，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在1946年7月5日联合发表的声明中写着："请注意，要让商品通过合法渠道进入消费者的手里，不要落入经纪人的手中。时刻提高警惕！八月一日以后，在通货膨胀中投机的奸商们不能再从国家得到一分钱。有那样一些资本家，他们将会抱怨缺乏货币，实际上，他们的仓库里堆满了货物。要迫使人民的敌人出售商品而不要给他们贷款，要迫使他们把抢夺来的外汇和黄金交给国家。反动分子狂妄自大，低估人民的力量，但劳动人民的力量比他们的大。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我们所制订的目标就一定能达到。我们将用稳定的货币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货币的稳定获得了成功，1946年，价值稳定的新货币——福林问世了。

稳定货币所起的作用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很快就表现出来了，376 它给工商业活动的正常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的福林声誉高，又值钱，在供应困难的情况下，用它可以购买一切。货币不值钱的恶梦已吓不倒劳动人民了。从此，劳动热情高涨，一年内，工业生产增长了32%，农业生产增长了约30%，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近50%。反动派的估计没有实现，共产党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极大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共产党于1946年9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

到1946年秋，共产党已有六十五万名党员，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组织，它把国家成千上万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政治上最成熟的分子聚集在自己的组织内。党的力量蕴藏在它的组织性、目的性和纪律性之中，蕴藏在劳动群众的信任之中。在这次代表

大会上，党依靠这种力量，得以把澄清国家建设的性质问题提到日程上，得以提出“不为资本家，而是为人民建设祖国”的口号。党依靠这种力量，才能提出“人民公敌从联合政府中滚出去！”的号召。为达到此目的，党努力在农民的支持下加强工农联盟，把最广泛的各阶层农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每星期日，长蛇般的卡车从布达佩斯开往农村去帮助农民，同时，在政治上教育他们。反动派原计划组织“农民联盟”，在1946年9月7日布达佩斯举行农民节时，把带进城里的五万五千个农民聚集起来去反对国家民主化的发展，但这些农民没有参加示威，而是安安静静地回家去了。

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三年计划的制订，是这次代表大会重要的经济动议。右翼被迫接受这项计划作为谈判的基础。一场为建立计划经济，为把仍控制着大部分工业企业的大银行收归国有的战斗打响了。把大银行和大部分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大大地刺痛了资本家。一直主要是龟缩在小农党后面的反动派同进步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化了。面对左翼的力量，他们企图动员右翼势力，试图从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开始，通过小农党的反动领导，直到与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农民为敌的富农为止建立联盟。他们开始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而且触角伸得很长。1947年初，国家保安机关把他们揭露了出来。阴谋被揭露后，以纳吉·费伦茨为首的不少反动领导人逃亡美国。

1946年秋冬和1947年初，围绕着和平条约问题，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开始激化。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很明白，匈牙利是支持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个国家，它不可能从纳粹法西斯的受害者那里，或是从比自己更早起来反对德国的罗马尼亚那里索回自己的领土。反动派提出种种要求，而这些要求根本不切实际，完全是为了用来制造反共气氛。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情况，为全民族的利

377 益而为之奋斗。同时，人们从当时罗马尼亚国家主席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正确的民族政策中，从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会谈中，深信生活在邻国的匈牙利人的命运将会得到保证。1947年 2月 10日，匈牙利和邻国的代表团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此条约没有使人感到惊奇，因为条约的最重要之点是反映了 1945 年 1 月停战协定中确定的那些原则。和平条约的签订，废除了几次“维也纳仲裁”的条款，并根据 1937 年的状态确定了匈牙利的边界。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小农党反动领导人被公开揭露带来了许多新的良好的机会。愿意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小农党左翼领导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迪涅什·拉约什出任国家新的总理。

1947 年 8 月举行了国会选举。这个时机对进步力量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在小农党右翼被揭露、左翼进入领导以后，反动势力在小农党内已没有阵地，他们重新聚集在别的党内，其力量就分散得多了。这时候，以菲费尔·佐尔坦为首的、带着公开的反动纲领的匈牙利独立党和以鲍龙科维奇·伊斯特万为首的、力图将受教会影响的各阶层尽可能包罗进去的民主人民党成立了。

378 越来越明显，此时反动分子已感到，小农党对他们说来已经右得不够，而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却又对它失去了希望。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认为，对共产党所宣扬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未建立信念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是可以争取到他们一边来的，把这些阶层的选票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选票加在一起，他们便能获得绝对的多数，即便从最坏的方面来看，他们也能指望得到最多的选票。

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开始了。在城镇和乡村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和标语，接连不断地举行集会。各党的演说者信口许诺——不管是可能的，还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选举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小资产阶级群众并未跟随社会民主

党人。菲费尔的党得到14%的选票，鲍龙科维奇的党得到16%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得选票14.6%，小农党失去了71%的选民。拥有22%选票的匈牙利共产党成为全国最大的党。此时，右翼公开地单独地纠合在一起，而左翼的力量取得了绝对的多数。向人民民主方向的大转折开始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

1947年的国会选举证明，大部分居民，首先是工人和蒂萨河以东地区保持着革命传统的新农民——昔日的雇农和农业无产者——是跟共产党走的。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旧制度的信徒和被反动派欺骗的人还大量存在，他们主要聚集在匈牙利独立党的周围，而落后的、信奉宗教的群众则追随民主人民党。政治力量的分野已经明朗化。现在，反动派已不再隐蔽地，而是独立地出来活动了。因此，获得了绝对多数的联合政府的各党有可能去粉碎公开的敌人，并集中全力投入到巨大的、全国性的工作中去。

在这种局势下，当和共产党人实行更加全面的合作、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斗争便日益尖锐起来。右翼在选举遭到失败的激怒中发动了进攻，引起了政府危机。共产党人则带领工人群众，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内，走向街头，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9月6日，三十万工人在布达佩斯举行抗议示威。事件发生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被迫同意参加“工作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慑于形势，同意了党内的反对派和群众的要求，还参加了反对匈牙利独立党的行动，致使匈牙利独立党在党魁菲费尔和他的几个同伙逃往国外后就瓦解了。其后，鲍龙科维奇的党也自行解散。

379　随着工人阶级团结问题上升到首位，由班·安陶尔、凯特莉·安娜和塞里格·伊姆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同支持工人联合、团结在布达佩斯委员会周围的、由罗瑙伊·山多尔、绍考希奇·阿尔巴德和马罗山·久尔吉领导的左翼之间的斗争越发尖锐。右翼领导人，正如在10月5日的备忘录中所宣布的，他们宁肯分裂党，也不愿和共产党人搞联合。右翼推着反动派的破车，公开起来反对工人联合，这在正直的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不少人退出社会民主党，继而加入共产党。在几个月内，大约有十万名社会民主党员参加共产党。党员转入共产党的趋势有增无已，社会民主党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左翼胜利了，并于3月18日把臭名昭著的右翼领导人开除出党。共产党为了中止社会民主党人大量进入党内，下了停止接纳党员的命令。3月初，在两党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两党联合，成立了工人阶级统一的伟大的组织——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两党的联合为国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联合政府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统一的伟大的党能够公开地进行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开始发挥。这样，今后就可以加快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了。

380　1947年，把银行收归国有。由于相当一部分工厂归银行所有，所以此举使重工业的绝大部分，乃至整个制造业的大部分掌握到国家手中。1948年3月25日，把雇有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工厂统统实行国有化，从而使85%的工矿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因此把1948年称为“转折年”而被载入史册就不足为奇了。

从表面上看来，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在前些年，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与旧势力进行辩论和斗争，现在，这种势力不复存在了。在当年的辩论和斗争中，首先需要的是党员强烈的一致性和斗争性，而在新的形势下，在与反对派的斗争

不复存在，大家都在有计划按步骤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时候，[382] 党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把广大党员下降到工具的地位。

斯大林在苏联完成了一系列不朽的业绩以后，二十年内，他行使着几乎是无限的个人权力，一些年轻的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学生都想迅速照此办理。个人迷信把党的列宁的遗产——集体领导抛到一边去了。1949 年以后，自认为“斯大林最好的匈牙利学生”的拉科西·马加什便成了党内权力无边的人物。

这位才能非凡、在反革命的法庭上和监狱里大义凛然、表现勇敢的人，这位在担任国际工人运动领导职务① 时取得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知识的人，这位见识宽阔的共产党人，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中失去了他的理智，变得越来越脱离广大党员群众，开始采用命令主义和独断专横的政策。

社会主义建设在继续进行，错误暂时还暴露得不明显。在一片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声中，在一天天出现的成绩面前，在反对反动派余孽的斗争中，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的情况下，党员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党群众颂扬拉科西是很自然的，就连西班牙国内战争的英雄、党的最忠诚的领导人之一拉伊克·拉斯洛于 1949 年夏被指控搞间谍活动而被处死，并株连每个与拉伊克·拉斯洛有联系的人，同时也对曾在反革命制 [383] 度下逃亡西方参加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大部分人进行迫害时，大家也只是感到震惊，并未引起反抗。早在两党联合的代表大会上，党就接受了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敌人的进攻会得到加强的理论。认为由于没有反对党，

① 拉科西为匈共建党党员，1921—1924 年担任共产国际书记，1925 年在匈被捕，被判无期徒刑。

敌人就只能藏身于共产党队伍内，从党内发动进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违反法制的行动。拉伊克·拉斯洛、帕尔菲·久尔吉、瑟尼·蒂博尔、绍洛伊·安德拉什和共产主义运动其他的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成了这场运动的牺牲品。社会民主党内忠于工人阶级团结、受到民众爱戴的领导人绍考希奇·阿尔巴德、马罗山·久尔吉和其他一些人也很快被捕入狱。

1949年3月，独立阵线改组为独立人民阵线。在5月的选举中，已不是由各党参加，而是由按照共产党人纲领的独立人民阵线参加。选民们在选举中只需投票表示赞成还是反对这个纲领。有95.6%的选民投了赞成票。

匈牙利人民在人民阵线的选举中表现出对它的一致信任。在这个基础上，就能迅速地把不同意社会主义的旧资产阶级分子清除出国家机构，结束部队军官的自由化现象，把关键性的生产资料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到1949年底，把雇有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商业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这样，工商业的国有化实质上已经完成，具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领导的条件。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只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因此，从1950年起，便有可能开始实行旨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和消灭农业落后状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了。五年计划规定投资为五百零九亿福林，国民收入将提高63%，工业生产将提高90%，农业生产将提高35%，人民生活水平将提高35%。

国家的改造，在1949年8月通过的匈牙利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宪法通过前，在最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进行了讨论。宪法宣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一切权力归劳动人民”，大部分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匈牙利成为一个人民共和国

了。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必要建立一种在各方面都能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特征的新型的国家政权形式。1950年秋季产生了地方议会制，这是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统一的、吸收最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的政权形式。在第一次选举中，共选出了二十二万名地方议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产业工人二万二千零一十六人，劳动农民十万零三千六百三十八人，知识分子一万一千一百一十六人）。这样，就有二十多万普通人直接参加管理公众事务，匈牙利成了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国家。

在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年内，国营工业生产增长35%，投资总额接近一百亿福林，其间，劳动人 385 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农业方面，到年终时，全国有13%的耕地由国营农场或生产合作社经营。

在迅速取得成绩的时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于1951年2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一片庆贺一年内就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气氛中，决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给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定下的框框，似乎不是从实际的可能性出发，而是凭借一些愿望，无限地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会上还宣布在五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规定在五年内，制造工业的生产由原计划增长90%，提高到200%，其中重工业由原计划增长104.3%，提高到增长280%。与1949年相比，规定农业生产由原计划增长35%，提高到增长50%。投资总额由五百零九亿福林增加到八百五十亿福林。当然，有些人在当时就已看到，以这样的比例来提高五年计划的指标，从经济上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了解国民经济真正的实力。但在个人迷信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他们不能起来反对这样浮夸的计划，特别是由于这些计划，与其说是出自经济理由，不如说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更为确切。

386 由于朝鲜战争，国际局势变得尖锐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相信处于危险境地的世界可以避免一场大战。他们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必须确保内部之敌不能从背后对国家发动进攻，必须巩固社会主义。同时，必须建立庞大的重工业作为武器装备的可靠基地。

此后的几年，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由于匈牙利人民巨大的努力，虽说没有实现提高了的计划中所规定的实现不了的指标，但国家的面貌毕竟还是发生了变化。在五年计划期间，制造工业的生产提高131%，重工业生产增加两倍，机器工业生产增加两倍半。巨大的厂区平地而起，位于多瑙河畔的新型工业城市——多瑙新城的钢铁联合企业开始生产钢铁。索尔诺克市的蒂萨化学联合企业、规模巨大的马伊砖厂和海耶乔鲍水泥石灰厂相继建成，伊诺塔的“十一月七日”发电厂和多瑙新城发电厂开始发电。以上只是新建成的七十五个较大的工厂中的一部分。1950 — 1954 年间，工业生产增长 13%，而国营工业的生产却增长了 155%，建成了十五万套住宅、几百所学校和布达佩斯人民体育场。五年内，工业职工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截止 1954 年，职工人数已超过一百万。

在迅速和大规模的发展过程中，这项计划的错误也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工业完不成不留余地的计划，重工业无限度的发展阻碍了轻工业。由于在重工业上投入了过多的物力，因而使农业不能获得按比例发展所必须的投资。农业方面，五年计划规定了387 根本无法实现的 42%的增长率。尽管 1951 年获得了丰收，但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集体经营的正确原则被武断地歪曲。强制实行所有制的改造，无论对农业生产，还是对加强工农联盟，都引起了恶果。轻工业和农业不能提供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摆在消费者面前的，是数量少，质量差的服装、皮货与文化用品。肉

类和食品缺乏，到1952年，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

然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不去揭露和纠正错误，仍一味强调取得的成就。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观察到错误的人，如果他们敢于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的话，得到的回答便是列举无穷的巨大成就，并用数据来证明，在资本主义的旧匈牙利，那时的生活不知要比现在坏多少(当然，事实也确是这样)。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开始铲除个人迷信。在匈牙利也进行了清除的活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于1953年6月开始揭露在党的上层领导内出现的错误，作出了放慢工业速度、提高农业投资、放宽死板的农业义务交售制度的决议。由于降低了物价，改善了公用事业，加快了住房建设，取消了农民的拖欠债务，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

在揭露僵化的、教条主义领导错误的同时，却把那些在1947—1949年间主张按步就班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抬了出来。现在，不仅他们的功劳，就连他们的错误也被吹捧成美德。1947年和1948年，党的领导曾谴责纳吉·伊姆雷的主张和观点，而现在，在新的、比过去更为有利的条件下，他以总理的身份开始把原先的主张付诸实现了。为了执行这一任务，他着手招人结帮。因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形成了一个以纳吉·伊姆雷为核心的修正主义派别。而拉科西及其周围的人，由于不能同旧观点决裂，站在僵化的、宗派主义的立场上，继续同纳吉为首的派别进行越来越尖锐的斗争。

建立在利用现有力量对比关系上的无原则的勾心斗角，以及党的上层领导内右翼和左翼之间残酷的斗争开始了。在1954年5月召开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所有的文件中，尽管都强调了党的领导的团结，但实际上，党的领导内部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这一点，也反映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自相矛盾的

决议中。代表大会后，纳吉·伊姆雷随即发起进攻，他写了一篇篇文章，作了一次次讲演。在这些文章和讲演中，他一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攻击他的敌手，而党却没有力量起来反对纳吉·伊姆雷和他的追随者，因为在中央委员会内领导斗争的人，由于犯宗派主义的错误而被群众疏远了，甚至就在这时，他们仍不能同教条主义的观点决裂。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55年初对修正主义发动的反击未能获得成功。1956年春，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彻底消除个人迷信时，匈牙利的教条主义者仍388不愿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他们改变不了自己的观点。1956年夏，党解除了拉科西的职务。尽管他的职务仍由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格罗·埃尔诺接替，但在党的领导内，还是出现了一次澄清观点的过程。可是，一部分群众却被许多互相矛盾和互相攻讦的观点弄得无所适从，因而感到厌恶和不安。

人民民主的社会

在解放了的国家里，社会生活得到迅速、彻底的改造。旧的统治阶级和他们的仆从，连最后一点号召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这些人要对同法西斯德国结盟、把国家沦为希特勒的最后一个帮凶负责。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在胜利的苏军面前和人民的怒吼声中逃跑了。另一部分是在全国解放后留在国内的，主要是政治上本来持消极态度的人或是因反对亲德而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在解放的国土上，当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人民群众当然不会追随把国家卷入到一场灾难中去的人，而是支持曾经试图阻碍这一悲剧发生的人，或者支持至少是表示过反对的人。事实上，当苏联军队解放了全国，给了在反革命制度下被压迫的人

民群众——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向前猛进的机会的时候，同时也阻碍了昔日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因此，在遭到战争损失以后，在贵族社会重振旗鼓以前，民主力量就拔除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地产，给了贵族社会致命的打击。很显然，在这个国家内，在消灭了大土地所有制以后，他们已不可能按老框框生活了——“贵族的匈牙利”最终地沉没了。然而，当大土地所有制消灭时，大资本家的世界却仍然存在，因为金融和工业界（尽管受到限制）此后多年仍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些昔日的统治阶层认为，如果当年的“贵族的匈牙利”不能复活，那么至少应该把它改造成西方式的资 390 本主义国家。就这样，昨日竭力反对亲德，反对西方资本家的人物一下子变成了西方的膜拜者和美国的吹鼓手。后来，他们又成了妄图阻止人民民主的发展，妄图从社会主义道路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支柱。收入微薄的人，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职员，医生，工程师和教员，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内，仍保留着旧日的理想、意愿和打算，虽然他们已感到，工人阶级能提供一个崭新的、美好的、合理的世界，可是许多人仍然不能同长期以来诱惑着自己和羡慕不已的东西决裂，他们在希望恢复过去和指望更好的未来两种力量之间徘徊。但是，共产党人建设新世界的热情，纯洁的、忘我的情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

全国解放以后，匈牙利共产党把开展文化民主化的斗争、打碎前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压制反动的教权主义者的斗争作为首要的任务之一，同时，着手改善国家极端落后的文化条件。党清醒地看到，消除匈牙利旧的、反民主的遗产，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一项根本性的任务。所有的学校，应当为劳动阶级的子弟敞开大门。全国解放后，在1945年就实现了遭受失败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梦想——八年制义务的、免费的小 391

学教育。在过去的学校里，教育青年人去仇视邻近各国人民，向他们灌输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把一切奉若神明的盲目的、宗教的虔诚。因此，必须改变学校的教育思想。当时，有三分之二的学校掌握在教会手中，而教会根本不赞成无产阶级所制订的目标。经过三年的斗争，于1948年夏季将学校全部收归国有。从此，从小学到大学，可以根据统一的、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教育青年人。中学和大学为工农子弟敞开了大门。广泛的住宿学校教育网把劳动阶级的子女吸收进来，送到高等学校中去学习。在战前最后一个和平年，即1937—1938年，全国十六所高等院校的三十七个院中，有学生一万一千七百名，其中工农子弟只占3.5%，到1957—1958年度，在全国二十九所高等院校的四十二个院中，共有学生三万二千九百名，其中工农出身的子弟已占50%强，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吗?!以前仅属于贵族社会并由此派生的社会和物质特权是贵族们得天独厚的有利因素，如今却成了不利条件。住宿学校为工农子弟建立了学习的物质条件，高等学校择优录取劳动阶级的子弟。大部分旧中产阶级的子弟和有知识的农民、工人子弟组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孩子们得到学习机会的同时，父母们也开始学习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各种各样的夜校和函授学校，全民族的文化要求提高了。新的观众熙熙攘攘挤满了修复好的歌剧院和剧场。广大农村也有节目演出，在一些偏僻农村的老农中间，许多人都是平生头一次看到演出和电影。1938年，在农村只有四百万人次看过电影，1957年，看电影的人数已达六千三百万人次。以前，农村家庭充其量不过有一本历书，现在，书架上摆满了许多价格便宜的、出版量很大的古典著作和近代匈牙利的文学作品。

当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农民中寻求复兴祖国力量的民粹派

作家以大量作品问世，而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代表们则黯然失色。在老一代共产党作家周围形成了一代新的、代表党的、年轻的作家和诗人，虽然在社会生活的教条主义气氛的影响下，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不去描写实际生活，而是极力去撰写理想化了的东西，他们脱离了实际，但是新文学还是崭露头角，不断地成长着。

如果说，人们的思想发展得比较缓慢的话，那么匈牙利在1948—1949年间的面貌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业国有化后，工厂的领导大都由工人担任。

社会的鸿沟已经消除，新一代的人已不了解过去阶级的界限。知识和劳动，纯洁的思想和行动已成为评价人的尺度。

反革命暴乱

1956年秋，全国的局势一触即发。在党的领导层内，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的斗争造成了极端不稳定的局势。许多人忍受着屈辱和痛苦：农民们对义务交售农产品和地方当局的过火行为，对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做法深为不满；知识分子和被称作资产阶级或其他出身的人受到歧视；工人被限制公开发表意见，不能谈论生活水平下降。怀着正义感的人们奋然而起反对不平，激忿的情绪和紧张局面的矛头指向宗派主义领导人——拉科西及其同伙。广大群众，首先是为了有一个真正的、纯洁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行动起来，并不是反对共产党。他们聚集在凯赖佩什墓地，为刚恢复名誉的拉伊克·拉斯洛和他的同事举行葬礼，并且作出决定，决不能让教条主义的罪恶再现。

在不少人看来，拉科西集团的敌人——纳吉·伊姆雷已成了社会主义政策真正的斗士，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此时，他已和几

个心腹组成了一个秘密集团。

党中央委员会内一些有理智的势力，虽然通过了几个重要的旨在解救危局的决议，如关于纠正在知识分子政策中出现的错误，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关于加强对生产合作社的支援等决议，但对于一个分裂的、不稳定的领导来说，要想用这些决议来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已是不够的了。在动荡、混乱和失望的气氛中，10月23日，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迫使当局同意在布达佩斯举行大规模的学生示威。青年人走上街头，要求清除社会主义中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说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

393 1956年10月23日，有一部分下午还在反对教条主义领导的示威者，到晚上却惊异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此时，武装的小分队已遍布首都的大街小巷，并且包围了电台，巷战开始了。受西方帝国主义者唆使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制度残留下来的忠实信徒，他们利用党内的斗争，利用进步力量的内部混乱和无所适从，利用青年人的无知，把暴徒们武装起来，向人民共和国发动了武装进攻。他们从公共建筑物上取下象征社会主义的五星，公然撕毁和焚烧国旗上的人民共和国国徽，并且开始迫害国家保安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党和国家的领导在第一天就落入修正主义者的手中。反动力量进一步利用教条主义的错误，数天之内便把国家驱入反革命的营垒之中。不出几天，在崩溃了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组织内，成立了十几个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委员会”和“革命工人委员会”，它们很快向共产党人发起进攻。此时，政府还在高谈社会主义，但却已宣布匈牙利退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联盟，同时宣布“中立”。

当还是纳吉·伊姆雷坐在总理宝座上的时候，大街上，被折磨致死的和被吊死的共产党人的尸体到处可见，国家已被反革命所控制。1919年的反革命幽灵又在全国游荡。反革命暴徒在街上

逞凶作恶，不安和恐惧的心情逼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此时，反动派愈加公开要求复辟资本主义。从监狱中放出来的红衣主教明曾蒂·尤若夫在11月3日臭名昭著的广播演说中声称，要把恢复私有制当作首要的任务，并要求采取措施追究责任，这使许多人大为震惊。

1956年10月末和11月初发生的事件，使一周前还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领导、幻想着要求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而上街游行的人头脑清醒起来。事件如此迅速地朝着极端的反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方向发展，以致昨日还对事局抱有希望的成千上万的人，今日以惊恐的情绪向自己以及相互之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将导致什么？怎样才能建立秩序？现在，已不是在宗派主义、僵硬的政策和比较合理的、比较正确的政策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必须在保存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复辟资本主义两者之间作抉择。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地区，已有数百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并且有消息说，11月5日要处决捕获的三千名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内部力量来建立秩序的希望越来越小，而打一场全面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大。

看来，似乎已没有一种力量能使国家从无政府状态下和反革命的魔爪下摆脱出来。这时候，奥普罗·安陶尔、卡达尔·亚诺什、科沙·伊斯特万和明尼赫·费伦茨博士已在11月1日同纳吉·伊姆雷政府决裂，并在卡达尔·亚诺什的领导下，在索尔诺克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

新成立的政府在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中向全国人民阐述自己的纲领：

“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受严峻的日子。工农政权、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处在危急之中。匈牙利劳动人民，首先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用你们的双手，以英勇和忘我的劳动在过去十二年里所创造的一

切成果处在危急之中。反革命分子变得更加厚颜无耻，他们迫害信仰民主的人士，箭十字党徒和其他野兽们正在屠杀正直的爱国者和我们最优秀的同志……

必须结束反革命势力的暴行！

行动的钟声敲响了。保卫工农政权！保卫人民民主的成果！在国内建立秩序、安全和安定的局面……”

在工农革命政府建立的同时，它请求苏联援助，帮助恢复秩序。

几天后，全国的枪声已经停息。11月2日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重建的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1月6日发布告共产党员书，书中说：“为使我党重新强盛，为使我党能领导群众，我们必须同拉科西集团有害的政策和罪恶的方法决裂，这些政策和方法动摇了广大劳动人民对我党的信任，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力量。

395

我们也必须同纳吉·伊姆雷——洛松齐集团决裂，它放弃了工人阶级和人民政权的阵地，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为反革命势力扫清了道路，因而从根本上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

从那时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实际上已经为自己今后一贯遵循的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一政策，和教条主义及修正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党，党必须消灭多年来教条主义政策的一切错误与罪行，必须清除滥用群众反对教条主义的情绪而为自己谋取了阵地和笼络了人心的修正主义。必须挽回被拉科西集团所丧失的群众的信任，必须用党的政策来争取群众。总之，必须实现10月23日上街游行的示威者中忠于社会主义和出于善意的那部分人的要求，同时必须打击以某种形式有意或无意地为在夜间包围电台以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暴徒们效劳的人。尽管枪声已经停息，但反动派却没有退却，他们只是变换了武器和

策略，他们还有一部分不能低估的、误入歧途的群众。斗争以新的形式在继续进行。

对于政府来说，开始工作和开始正常生产不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也是经济问题。很显然，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波兰和其他国家的迅速援助只能提供暂时的帮助。工农政府坚决反对阻碍恢复秩序的人。面对受骗的人们，政府表现了最大的耐心，但凡是必须使用武力的地方，则坚决地使用之。正如在政府的纲领中宣布的那样，政府不准许迫害仅仅是参加了事件的人，但对还在继续有组织地反对人民政权的人则毫不容情。政府很快重建了武装力量和国家机构，解散了工人委员会，并于1957年2月建立了工人的武装队伍——工人纠察队。

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

工业生产开始恢复，遭受破坏的工业生产结构开始纠正。在进一步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越来越注意轻工业的发展。由于成功地执行了经济政策，到1957年，国营工业中每个工人的产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1957年春，形势已发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六月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会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条件”已经形成。这一切都证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党的会议现实地估计到这一形势，1957年全国建设工作的加快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国营工业的生产已经超过1955年的水平，合作化工业的生产超过1955年的25%。1957年，整个工业生产超过1955年生产水平的6%。

后来，制订了1958—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过去的经验教 396

训提醒新计划的制订者要特别谨慎，党的总政策也提出要实事求是，要着眼全局。计划规定工业生产提高25%，生产率提高15%，国民收入提高 13%。

其后几年再次证明，匈牙利的国民经济能向更高的程度发展。1960 年年终，国民收入不是增长了 13%，而是增长 22%，工业生产规定增长 25%，而实际增长 40%。

国家得到迅速的巩固，经济成果比人们预期的要好，全国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农业的形势却出现了特殊的现象。1956 年，尽管反革命拚命的煽动，大部分生产合作社依然存在，但后来却开始解体。不少地方在五十年代用行政手段迫使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感到，既然政府执行的是通情达理的政策，那么现在正是退回到个体经营的时候了。

在新的情况下使用旧的方法，当然不能阻止集体经营的解体。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同意可以归还退社农民的土地和牲畜，但同时强调，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今后仍然是决定性的任务。

397

一部分农民仍坚持合作化的道路，许多人却随着群众的情绪退出了合作社。

新的农民政策极大地缓和了激烈的情绪，挽回了农民的信任，同时还向犹豫不定的人们表明，国家不是只靠义务交售制才能筹措到必要的农产品。与一些人的预料相反，新执行的收购制以及自由出售剩余农产品的办法不仅保证收购到了早先的粮食数量，而且在 1957—1960 年间，国家得到的农产品比以前义务交售时期的还多，同时还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在发展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抛弃了过去行政命令的方法，根据实际进行宣传。在宣传鼓动的影响下，1958 年，有两万名新社员加入到集体生产的行列，这样，生产合作社社员便达到十四

万人。

但生产合作化运动的真正展开是在后几年里。许许多多的工人从城市来到农村，帮助实现农业现代化，帮助修理机器，同时向农民阐述党的政策。国家通过提供各种农业设备，信贷投资，使用机器的价格优惠，减价出售化肥以及其他多种方法支援生产合作社，并规定合作社社员也享有劳动保险待遇。

1960 年，合作社的耕地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75%以上，国营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加在一起，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0%。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取得了胜利。 398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59）已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总高潮的各项任务中。

在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加强计划性和加强国家纪律性的问题已经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同时，这也是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条件。七大指出："当我们期待每一个劳动者，向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要他们设法去寻求各种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求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上的工作人员这样去做。应当要求在重视实际的、考虑到国民经济的条件与能力的情况下制订计划。"七大规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任务。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需要更经济地、以更高的技术进行生产，需要提高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这些任务都一一需要解决。七大认为，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互利的国际合作，是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时，提出了要更好地利用现有设备的口号，而不是要建设一系列新的大型的工程。

由于工业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399
1938 年，全国工资收入的人，有半数在农业中劳动，只有 22%的人在工业中。到六十年代初，这两部分人基本相等，工业劳动者的数目已接近农业劳动者的数目，而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在国民收

入中已大大超过农业。这些变化使农民和工人的组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从地方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是迅速增加的工人阶级后备力量的最广阔的基础。

在合作社经营得到巩固的同时，农民队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59—1961年间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有90%的农民成为合作社社员。实际上，农村已经消灭了剥削，形成了统一的农民阶级。

知识分子的情况也有相当大的变化。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来自传统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而是来自从前被排除在文化壁垒以外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弟。人民的学校把农民子弟培养成为知识分子，各综合大学和学院通过夜校和函授，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培养成有学位证书的劳动者。403 提高到知识分子和行政人员岗位上的大部分工人干部，都能掌握履行自己职务所必须的各种知识及本领。大部分人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成为新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

匈牙利的新知识分子，尽管来源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情况各异，而且都还保留着自己的特点，但从质量上讲，它仍然是新型的。专业熟练程度、才能、学问、专业知识已提高到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们虽然没有凌驾于政治上的可靠性之上，但其重要性却是不亚于此的。这是新知识分子自然选择的基础。既是共产党人又是专业人员的理想实现了。

404 社会实际发生异常迅速变化的特点还表现在：1949年，依靠工资收入的占居民总数的49%，到1962年，这一数字已提高到70%。同一时期内，工人人数从41%增加到54%，知识分子的人数从8%增加到16%。1949年，当时有45%的居民还是小生产者，而到1962年，只剩下5%了。1949年，统计资料还没有把生产合作社的劳动者单列开，而到1962年，全国有25%的居民已

单列入这一范畴了。

现代化的生活、现代化的技术、改善了的生活条件使人们的思想、愿望、志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提高，从前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今天也能办到。消费的增加甚至已变成工业发展的条件。十年前，在许多人的眼里，电冰箱、各种家用机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奢侈品，而在今天，它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更何况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大多数妇女已投身于生产，只有实现机械化，才能减轻下班后还要上班的双重负担，全体人民都很清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其中包括个人的需要。随着整个社会一致化的出现，在匈牙利，变成社会主义民族的条件已经形成。从这一观点出发，1962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理所当然地宣布，“我国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已结完成……匈牙利人民进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时代。”

匈牙利和外部世界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匈牙利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有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国内形势的有利发展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发展对外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冷战的冰山开始融化，孤立主义、互相猜疑的气氛已经消散。在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殖民主义制度的崩溃和几十个新的年轻的国家的出现，对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匈牙利的边界已经开放，成千上万的人去邻近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观访问，继而再往别国旅行。现在，外界到底是好是坏，人们都有亲身的体会了，因而出现了判断事物和人物的新的尺度。

匈牙利的外交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在国际科学和文化会议上，越来越多地听到匈牙利代表发表演说的声音，而在以往几十年间，匈牙利人一直是缺席的。匈牙利的政策，使它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同“第三世界”许多年轻的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匈牙利的地位，仍由匈牙利的社会制度及由此产生的职责来决定。在当今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帝国主义军事组织所分成的两个敌对阵营的世界上，为了保卫匈牙利和维护它的安全，决定了它要积极参加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积极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活动。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积极参加更好的、更紧密的劳动分工，这是匈牙利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406

加强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坚强团结，同时扩大世界范围内互利的国际关系，是匈牙利对外政策的主旨，它与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及1960年会议的观点是一致的。匈牙利的经济力量增长了，政治稳定性巩固了，匈牙利在世界上的威望提高了。这证明，不是犹豫不决和原则让步，而是原则上的坚定性和一贯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就能够决定一个国家在外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抱同情的人中间也是如此。

现 状 一 瞥

写现在总比写过去难。正因为近，所以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往往会造成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其应有的重要性的现象，这些只能由漫长的未来和历史来作出正确的判断。此外，对于历史写作者来说，也难于摆脱个人主观印象。但是，事实是很难弄错的，或

至少不会出大错误。匈牙利经济增长的指数和所取得的成就就属此类。1960—1965年间执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数据证明，六十年代前半期，全国的经济力量继续极大地增强，国家财富继续 408 不断地增多。五年内，工业生产增长45%，建筑业和交通运输能力增长35%，农业生产增长10%。由于国民收入增加25%，才能使国民经济的固定基金增长31%，消费基金增长22%。

与经济发展的同时(甚至常常在这之前)，实际收入也增加了。1962—1968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9%，实际收入增长18%，各类社会福利提高38%，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定修建二十五万套住宅，实际建成二十八万二千套。

但发展国民经济广博的贮备竭尽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也比1959—1960年时低。一些内部的不平衡现象出现了，国民经济的 409 劳动力贮备也下降很快。

所有这一切告诫人们，必须寻求一条更有力、更有效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认为必须改变国民经济领导过于集中的方法。要本着这样的方针继续发展计划经济，即国家不要直接下达指示，而要使经济管理的各种手段，通过企业的利益，把国民经济的利益同劳动者的利益挂起钩来。要把中央的领导同地方的首创精神结合在一起。广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这种想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5月作出了全面改革经济领导体制的决议，这项决议在1967年举行的党的九大上被通过。在新经济体制中，企业的地位与在继续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内有原则的不同。正如党代会所说："在此以前，社会主义企业，实质上是分配给它们的国民经济任务的机械执行者，是执行任务的组织者。在新的领导体制内，在与国家计划的

总目标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企业拥有专用资金、投资基金和奖励基金。在新经济体制内，国家不给企业规定必须完成的计划指410 标……通常国家不采用直接下达指示的办法，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管理手段，采用适当的信贷政策，规定企业纯收入的使用以及通过其他的手段来保证计划指标的实现。如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旨在尽可能经济地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它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那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在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

当然，新的经济领导体制本身并非万应灵药，它只是更好地重视经济规律的一种手段。1965—1970年的五年计划的数据，证明了它不是一种坏手段。在此计划期内，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19—21%，现在，与1961—1965年的平均收入相比增长30—32%。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期，国民收入比第三个五年计划前期高40%。98%的国民收入是由社会主义部类提供的，77%的国民收入用于消费，23%用于积累，这一点是很说明问题的。

从今后建设的角度看，这个比例是否最适宜，可以进行讨论。但从满足居民目前的需要来看是有利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改革前，劳动者每年的平均收入约增长3%，1970年，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翻了一番。在此五年计划内，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收入增加30%，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37%。

在有计划地提高价格的同时，收入的增加，使许多早先不能满足的要求得以实现。五年内，零售业增长45%，每个居民的平均消费量每年增长4—6%，1970年的平均消费量超过1965年的27%。伴随着富裕的生活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一起产生的生活方式（和所有的烦恼与欢乐在一起）是形成社会主义匈牙利民族的特征。